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8

#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POUR UN MONDE MUTIPOLAIRE /  
POUR LA CINQUIEME INTERNATIONALE

[埃] 萨米尔·阿明/著  
( Samir Amin )

沈雁南 彭姝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8

本书作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著名学者，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运用社会主义理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体进行深入、独到的阶级分析，这对于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理论流派，无疑是一种鲜明的批判。作者的理论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POUR UN MONDE MUTIPOLAIRE / POUR LA CINQUIEME INTERNATIONALE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5801-4

定价：98.0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POUR UN MONDE MUTIPOLAIRE /  
POUR LA CINQUIEME INTERNATIONALE

[埃] 萨米尔·阿明/著  
( Samir Amin )

沈雁南 彭姝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埃及)阿明(Amin, S.)著;沈雁南,彭姝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5801-4

I. ①多… II. ①阿… ②沈… ③彭…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  
②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091.6 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8707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8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著者/(埃及)萨米尔·阿明  
译者/沈雁南 彭姝祎

出版人/沈雁南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编辑/陈 荻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75 字数:262千字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5801-4

著作权合同/图字01-2014-2351号

登 记 号

定 价/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Samir Amin

POUR UN MONDE MUTIPOLAIRE/POUR LA CINQUIEME INTERNATIONAL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language edition by Samir Amin.

All rights reserved.

---

本书根据法文版译出。

## 译者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急剧变革的年代，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在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世界最边缘地区，人们恐怕也不得不考虑世界将走向何方的问题。或许大多数人还在为每日的衣食住行操劳，无暇顾及这样过于宏观和“遥远”的事情；或许有那么多人因文化和地位等原因而无力、无心思考这种问题，但他们却也无法逃避世界变化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因此，世界的变化，国际社会的重建，无疑是关乎每个地球人今后如何生存的重大问题，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人们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的解体，作为世界变化和国际社会进入重组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仅仅是事物长期以来厚积薄发找到的突破口，宛如岩浆在地底下涌动已久终于在这个火山口喷出。事实上，世界的变化早在此前就已经悄悄地发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的急剧膨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等等，预示着地球上这个国际社会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了。于是，国际社会便以冷战格局的解体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重组时期；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溃散不幸成为国际社会转型的牺牲品，个中自有其具体的各种因缘，对此我们暂且不

论。即使所谓冷战的胜利者，也未必是它们自诩的那样大获全胜。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从两霸相争走向群雄逐鹿的时代，是旧的游戏规则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甚至有人称为“无政府主义”时代。因此，这绝非是冷战胜利者所理想的时代，尽管它们占有着很大优势，并希望借助这种优势建立起符合其理想的新规则。但是，新的竞争对手正在现身，并希望通过参与新规则的制定巩固其发展的地位。同时，冷战胜利者队伍里也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欧洲国家因“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而陷入一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停业整顿”状态；日本则因耿耿于怀其战败国地位而借中国钓鱼岛问题蠢蠢欲动，以打破“二战”后的体制安排，重振其军事和政治大国的“雄风”，走出日益低迷的经济困境。溃散阵营里的各个国家纷纷转轨，寻找新的方向；所谓胜利阵营的各国也因为“唯一”强大对手消失而重新自我定位，仿佛外来压力的减弱使得物体内部组织出现了松散，尽管敌人可能是更多了，但却因为定位不同而使力量更加分散了。国际社会一时风起云涌，幻象迷乱。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关系的研究便成为当下显学，各种学说层出不穷，现在的国际问题研究大概是自其形成专门学科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

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从摩根索、沃尔兹、基欧汉、温特、沃勒斯坦到阿明等学术大家，不仅对当代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从各种不同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和解释，而且还提出各种世界治理的思想，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应当承认，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之

际，这些思想理论对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充实作用。特别是以往重视不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说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得到更多关注，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界来说，更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萨米尔·阿明是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全球化问题、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世界治理发展方向和如何构建理想的新型国际体系的思路。与一般国际关系学者相比较，阿明似乎特别关注国际社会中的“阶级性”问题。本书是阿明集中讨论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转型问题的专著之一，也是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讨论国际问题的典型著述。

同时作为一位全球化问题的学者，阿明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社会体内，一国之外交思想和政策更多的是代表着其执政者背后的各种资本的利益。因此，国际社会如何构建，反映的是国际社会中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统治阶级的斗争。在阿明看来，美欧日三角组合类似于这个国际社会中的黑社会，故他称为“三合会”（港英时期的香港黑社会），是为背后的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是一种强权势力，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一种“集体帝国主义”。它们管理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经济领域，通过其代理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欺行霸市；在政治领域，则通过北约行使权力，甚至有取代联合国的趋势。阿明认为，（在冷战后北约责任）被重新定义后实际上它可以用来取代联合国。因此，针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阿明提倡的是



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并用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念来阐释他的全球化思想。

除了对集体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以外，阿明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在世界其他国家里，不同的国家也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如在俄罗斯，新的领导阶级来源于“寡头政治”，这个阶级通过私有化的国家转型而一夜暴富，并通过石油收入、拆分工业和国家进口市场佣金而继续拥有财富。因而阿明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买办资产阶级的特点，由此也决定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或者俄罗斯可以通过内部社会变化和民主进程，得到真正的复兴，并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者它继续走目前的道路，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样俄罗斯就仍然难以避免被三合会国家挤入“拉美化”的困境。

至于印度，阿明对其是否能跻身于21世纪崛起的大国行列表示怀疑。他认为，使印度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由于英国殖民统治从根本上将印度改造成一个附庸的资本主义农业国家，通过农业土地私有化将大多数农民排斥在外，导致形成一边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阶级和相对富裕的中农阶级，一边是大多数的贫穷农民。阿明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土地问题。如果不经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印度就不可能跻身现代化强国。因此，无论这个国家是否被认为实际上已经买办化，它仍将属于边缘的资本主义国家。

阿明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国家阶级属性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对国际社会进行分析的基础，认

为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一种帝国主义的传统仍然在主宰着中心/发达国家和边缘/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在所谓“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大变局后，追逐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种时髦，但是追随者的资本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它们的边缘属性，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社会变革或者社会革命，它们就将继续是中心国家（集体帝国主义）剥削的对象。因此，阿明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阶级属性；在现阶段则是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即南方国家）的团结，粉碎以美国为首的集体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

阿明在诸多论述中一直强调，当代世界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来源于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规律，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发展的经济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脱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的必然发展趋势。在本书的序言中，阿明特别对他所用的“多极世界”的概念做了说明。他认为，仅仅将“多极世界”用于解释美日欧等中心国家，甚而包括中国及俄罗斯、印度、巴西的关系协调是完全不够的，他所谓的“多极世界”是应该包括全体人类和所有国家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多极化。由于对“理想”的全球化形式（单极、分等级的多极、不分等级的多极）所做的选择是和某一国家所希望实行的社会模式（自由资本主义、另类的“社会”资本主义及其他的社会主义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任何“标准的”（即基本上是自由的）资本主义选择，都意味着在南北关系上的帝国主义态度。

对此，阿明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阿明明确标榜其对多极世界和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自称是反帝国主义的激进理念。他认为，必须改变南北关系中生产条件的巨大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五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他提出的这种矫正是在超越资本积累基本逻辑意义上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中其他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思潮的一种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

同时，阿明通过对充满社会矛盾的各种社会进行观察，分析这些社会矛盾对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影响，指出社会主义多极化理念的积极意义及世界治理的可行性发展趋向。《多极世界》运用社会主义理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体进行深入、独到的阶级分析，这对于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理论流派，无疑是一种鲜明的批判。因此，阿明的理论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应该是我们学界对待世界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应有的态度。

阿明不仅对全球化、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是当今世界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影响力的左翼学者和思想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年轻时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曾经担任过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任教和就职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和联合国在达喀尔的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从1980年起，阿明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现为第三世界

论坛理事长、替代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丰富的生活和工作阅历，以及涉猎复杂的多学科和广泛的研究领域，使他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思想深度。

阿明曾经在 1955 年出席中国积极推动并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的万隆会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浓厚兴趣，他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有着密切联系，其著述多有论及中国。阿明高度赞扬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积极影响。在上编《多极世界》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中国。阿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堪称“奇迹”。但与主流看法将其仅仅归功于市场效果和对外开放不同的是，阿明还关注 1949 年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段历史时期基础建设的贡献。他写到，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取得增长率两倍于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阿明特别强调，没有此前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奇迹”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在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中，阿明是比较强调中国革命的积极遗产的。

但是，阿明对中国未来何去何从感到的担忧在书中也不无流露。他认为，在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选择，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并据此而有三个可能出现的“场景”（或称为模式）：1. 国家分裂和沿海地区买办化；2.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3. 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将互为补充和相互冲突的市场资本主义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社会主义逻辑纳入社会主义长时期发展的前景中。

当然，阿明认为第一种场景是对帝国主义战略有利的，但这种选择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受“三合会”的帝国主义发展逻辑

控制并成为边缘国家的命运。他认为，进步的选择只能建立在优先扩张内部市场上，建立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和地区的不平等。与之形成对比的选择是，主要在经济发展的驱使下，不断地深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去。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的不平等，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就这些方面来看，取舍余地非常狭窄，除了选择“民族资本主义”外，它有望使中国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新的强国，甚至成为能迫使那些现在的超级大国放弃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但是任何一种内在选择余地有限的政治权力，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它的航向都是很难的，它或者会倒向右边（并以服从帝国主义计划而告终），或者倒向左边（向第三种场景演变）。

阿明的分析就其理论依据所自有的逻辑而言不无道理，但就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分析则是值得商榷的。诚如阿明所重视的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并非横空出世的来自某人或某些人的神来之笔，而是由其自身内在历史发展所使然的。其中，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百多年来饱受内忧外患的苦难经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重复杂因素纠结其间，加之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其改革开放所处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固然中国不大可能完全摆脱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用一般模式来套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不可取的。不论其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或是像阿明这样对中国友好的思想批评家，理想主义的愿望终究并不能代替现实。客观地来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或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就其社会现实，或就其经

济规模，或就其起步基础，等等而言，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确为古今中外无前例可循的。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们特别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和实事求是的行事方式，我以为这绝非是“官样文章”，而是具有深刻含义的。当然，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对其性质进行评判，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其实这也远非一两篇文章甚至一两部著作所能论证得了的。也许需要时隔若干个十年和若干代学者才能更清晰地予以深入分析和准确评判。本文仅想在此向读者说明，阿明在上编“多极世界”中对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尽符合真实，因此其所做的判断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阿明的分析及其所依据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不同的见解是可以讨论的。正如阿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论题是开放的，可以在对体系现实的分析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和他们的愿景上有各种不同看法。”我以为，阿明的书的确提供了讨论的路径和平台，尽管阿明的结论还有一些不为读者所能接受之处，但他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见解对于中国读者认识当今的世界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意义。

上编“多极世界”译者为沈雁南，下编“第五国际”译者为彭姝祎，特此说明。

沈雁南

## 序 言

本书的书名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的确如此，我希望建设一个多极世界，这当然就意味着以“全球军事控制”为特征的华盛顿霸权主义计划的失败。直截了当并毫不隐瞒地说，我认为，正是这个疯狂同时也因此而必然是罪恶的计划，将世界推入没完没了的战争中，尤其使南方国家民主和社会的进步失去任何希望；对北方国家也一样，即使表面上看没有那么严重。我从1991年的《混乱的帝国》起，就开始写这个问题了。

现在，需要对我用的这个词——“多极世界”——做些说明。如同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各种词语一样，“多极世界”也从来没有被明确地定义过，现在依然如此。对我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承认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体系不仅确实是“世界性的”（按不规范的英式法语是“mondialisé”、“globalisé”<sup>①</sup>），而且对这个体系（即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甚至极而言之是“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上的）的任何方式的选择，本身也只能是完全同样的“世界性的”。换句话说，我正是人们所说的“有选择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反对任何全球化的“反世界主义

---

<sup>①</sup> “世界化的”、“全球化的”。——译者注

者”——这不仅不符合我的事实，而且也并非我所希望的。

分歧主要在于人们对“多极”的理解不一样。一部分人认为，“多极”只是保证“三合会<sup>①</sup>”的每个搭档——包括欧洲（欧盟及其主要国家）和日本——与美国在主导世界事务方面拥有同等的地位。换句话说，这是“大西洋主义的再平衡”。某些人承认，在这种再平衡之外，同样也应该考虑到与其他大国保持一种协调——人们特别会想到中国及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有时甚至还包括某些南方国家，即那些或多或少地被看作“初露头角”或可能会“初露头角”的国家。

对我来说，这样的“多极”完全不够，它不能令人满意地应对各国人民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并创造社会进步的条件；而没有社会进步，民主化进程很难有牢固基础。我的“多极”观念是必须全面彻底改变现在的“南北关系”。这种改变必须创造一种能够削弱强权势力的环境，这些强权势力正在使（如其所名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日趋严重。照我看来，这种改变将会对“帝国主义”传统——不论这个词是否讨人喜欢——提出挑战，并通过对帝国主义的质疑，进而从根本上质疑资本主义。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与传统经济学家对市场全球化所想象的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中，这种帝国主义传统主宰了中心国家/边缘国家的关系。不过，我一开

---

<sup>①</sup> 原文为 Triade（英文为 Triad），有化学术语中“三素组”和音乐术语中“三和弦”等意，在有的情况下也被译为“三组合”。但历史上香港英国殖民当局也称香港黑社会组织“三合会”为“Triad”（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4%B8%89%E5%90%88%E6%9C%83>），从本书作者对美欧日等国组合的评价来看，借用此名显然有讽刺美国称霸世界之意。故认为译为“三合会”较为贴切。——译者注



始就要明确的是，在与任何拒绝追随美国霸权主义单边计划的人进行的政治讨论中，我的论题是开放的，可以在对体系现实的分析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和他们的愿景上有各种不同看法。

资本主义打造世界体系的理念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新的问题，这种理念与各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演变中或多或少取得的进展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更不能相提并论。追溯到1954~1955年，我写的第一部专著，就题为《世界规模的积累》。

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理念仍然是我关于“改变世界”的斗争目标的分析和主张的核心问题。篇幅所限，在此不容赘述我已经写过的对此问题的讨论。但是，我可以将我结合资本主义扩张提出的、认识现代全球化的四大发展阶段的结论概述如下：（1）“重商主义”阶段（1500~1800年），在此期间，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体系是由大西洋的欧洲，通过对美洲的征服和改造、贩卖黑奴和（紧随非洲之后）对亚洲开始的商业入侵建立起来的；（2）“古典主义”阶段（1800~1950年），世界体系建立在工业化中心国家与非工业化边缘国家之间形成鲜明对照的基础上（并伴随着迫使边缘国家政治地位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展的趋势）；（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阶段（1950~1980年），在此期间，各边缘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或社会主义革命，我理解为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迫使世界体系中旧的不对等关系发生了改变，并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个“谈判”的全球化时期很特殊。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是人们已知的历史上发展最为强劲的时期，发展遍及了整个世界，分布也较为平衡；（4）当前是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新

时期，这个新的世界体系的特征——从更长远来看——是我所说的“五极并存（cinq monopoles）”，在此期间，中心国家（三合会）完全受它们在体系重建中的利益所支配。

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体系本质上是永远追求极化（polarisant）的（实际上是“全球化价值法则”在起作用，在我看来，这个法则与“简单价值法则”<sup>①</sup>是有区别的）。根据我的分析，极化和帝国主义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我并不把帝国主义这个形容词仅仅用于以使一个民族服从另一个民族为目的的政治行为，人们可以从人类经历的各个时期中看到，这些政治行为是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关联的。我作此分析的兴趣，仅仅在于证明，当代帝国主义乃是资本扩张内在逻辑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常态特征，这种扩张自资本主义产生起到今天，就一直在进行着有利于中心国家的财富和权势的极化（polarisation）。使中心国家在构建其体系与边缘国家不对称关系中受益的各种“极（les monopoles）”，决定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历史上每个时期的特点。

从工业革命（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个极是工业，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就等同于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我们知道，边缘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从一种“追赶”的观点出发，强调优先发展工业。民族解放运动纷纷取得的成功，迫使帝国主义做出调整以适应形势需要。但

<sup>①</sup> 原文为“loi de la valeur tout court”。

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追赶”的进程，并进入了“后帝国主义”的历史阶段。因为，中心国家已经围绕着新的“极”重新组织起来，以确保它们对技术、全球资源开发、国际金融流通、通信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生产的控制，它们不得不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并加强极化。

从16世纪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一直是复数。帝国主义之间经常的、往往是激烈的冲突在世界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以在这一点上发生的重大改变而结束的：以一个“三合会”（美国、欧洲、日本）的集体帝国主义取代了复数的帝国主义。

我认为，新的集体帝国主义形成的根源在于竞争形势的改变。数十年来，大公司的竞争战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的。国内“竞赛”的胜利者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有利的地位。今天，要想在竞赛一开始就能占上风，起码要有将近5亿~6亿“潜在的消费者”的市场规模。争夺必须从一开始就在世界市场上展开并在此赢得胜利。而只有这些在世界市场上占上风的赢家才能在各自的国内市场上拥有威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成为大公司的第一战场。换句话说，在国家和世界这一对关系上，因果被颠倒了：过去是国内做强的走向世界，今天正相反。因此，跨国公司——不管是什么国籍——在世界市场的管理上有着共同利益。这些利益与资本主义一切固有的竞争形式——不论是什么——所决定的永远的、唯利是图的冲突交叉重叠在一起。

“三合会”所有伙伴跨国资本的主导阶层确实是休戚与共的，并表现在它们都集合在新自由主义的总旗帜下。从这个角

度来看，美国被看作“共同利益”的保护者（如必要也可以是军事上的）。华盛顿当然不打算“平均分配”它的领导者利益。相反，美国竭力使它的盟国处于从属地位，根据这种思想，它只准备对“三合会”内它的下属盟国做出较小让步。那么，统治资本的利益冲突会日益加剧以至于将大西洋联盟拖入破裂中去吗？

我所坚持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真正的多极观念，即关系到100%人类的、包括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多极。它与被大大地打了折扣的全球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提出这种全球化的那些人，即使从来没有明确但也暗示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三合会中心国家（只占人类的15%），其次才是在迫不得已时去考虑对“其他国家”（占人类的85%！）做出某些让步。我一向反对这种掺杂着西方—中心国家文化优越论的系统的扭曲。

由于（现代）“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于“理想”的全球化形式（单极、分等级的多极、不分等级的多极）所做的不同选择是和希望实行的社会模式（自由资本主义、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主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偏好紧密联系在一起。

任何考虑“标准的”（即基本上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的选择，都意味着一种在南北关系概念上的帝国主义态度，这是由资本积累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我选择的是另一极端，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激进理念，即承认改变南北关系中生产条件巨大不平等的必要性，这种不平等是五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造成的。我必须指出，这种矫正不仅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者的观

念（是在超越资本积累基本逻辑意义上的），而且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这种全球化社会主义理念既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也不同于当前社会及社会主义者新思想的各种思潮。

我的分析将始终致力于阐明可选的全球化的各种选择并涉及跟各种社会理念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各种分析属于“地缘政治学”。然而我必须指出，这些分析并没有借用传统地缘政治学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从根源上说，这门学科是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它认为民族-国家均有其地理位置和经济愿望所决定的永恒不变的“利益”，而实际上（de facto）经济愿望是被统治资本的愿望所掌握的。即使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杰作，如保罗·肯尼迪的著作，也能在这一点上发现它们的局限性。

相反，我所做的分析是从观察各种充满社会矛盾的社会（所有的，包括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开始的，所以，这种观察既不涉及社会观念，或所涉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不关系国家的所谓等级。对于各种挑战及其应对之策，不管是面对国内方面的还是对外关系方面的挑战，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必然不会有同样的认识，即使是当大众阶级和政府站在一起表面上似乎一致的时候。我将特别关注这些矛盾。只有对这些矛盾的分析才能考量出我们能想得到的各种“剧情”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分析同样还能够更清晰地凸显出我希望得到加强的选择，虽然这些选择是困难的，但却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分析将十分重视人们称为“社会运动”（特别是“有选择的世界主义”）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明确的或暗含着

的各种建议。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心国家里，围绕着资本优势领域（尤其是跨国金融领域）所形成的霸权主义集团，对南北关系的观念既是“自由主义的”（在经济意义上），也是帝国主义的。它们操纵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则仅限于，或者追随美国的霸权主义战略，或者力图缩小其影响，或甚至完全摆脱其影响。但是，另外一种霸权主义的集团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欧洲），因此应该指出其选择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条件及其局限性。做这样选择的集团并不一定要与资本主义的需求彻底决裂，但却完全能够迫使它适应走不出自身特有逻辑的要求。同样，我还认为，在边缘国家目前也存在着霸权主义集团——抛开它们的差别来看（对这种差别需要具体地、准确地分析），它们所关心的利益属于这样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具有“走狗”性质的霸权主义的集团。当然，还可能存在着另一种选择的集团，对它们来说，假如成功的话，将根据它们的需要来改变世界体系。

为了让本书阅读通畅，我在正文中尽量不设任何注释，读者可以从附录二里找到我所提到的参考读物。

# 目 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8

译者序 .....	1
序 言 .....	1

## 上编 多极世界

<b>第一章 “三合会”：团结或者分裂？ .....</b>	<b>3</b>
一 美国领导阶级的计划：在全球推行门罗主义 .....	5
二 欧洲计划的流沙困境 .....	10
三 欧洲人民与国家面临的三重挑战 .....	12
四 政治文化的冲突 .....	14
五 那么日本呢？ .....	21
<b>第二章 中国的崛起：质疑帝国主义秩序？ .....</b>	<b>23</b>
一 中国崛起的由来：革命还是开放？ .....	23

二	市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转型阶段 还是通向资本主义的捷径？ .....	26
三	前途未卜 .....	47
<b>第三章</b>	<b>俄罗斯：走出隧道？ .....</b>	<b>50</b>
一	苏联体制的基本特点 .....	51
二	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新形式 .....	56
三	今天的俄罗斯还有特点鲜明的选择吗？ .....	67
<b>第四章</b>	<b>印度：一个超级大国？ .....</b>	<b>73</b>
一	殖民地遗产 .....	73
二	国家民粹主义的成功及其局限性 .....	77
三	偏航和文化主义 .....	83
四	艰难地走向另类全球化的长征 .....	86
<b>第五章</b>	<b>南方国家：团结还能重建吗？ .....</b>	<b>91</b>
一	“万隆时代”（1955~1975年）的 批判性总结 .....	92
二	排斥非洲的根源 .....	100
三	南非，体系的薄弱环节？ .....	104
四	阿拉伯世界：偏航运动能否转向？ .....	109
五	从三大洲的视角来看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 .....	115
六	东方：新的南方？ .....	118
七	重建南方国家人民的团结 .....	119
<b>第六章</b>	<b>联合国的改革和多极化的全球化 .....</b>	<b>126</b>
一	联合国框架下的国家主权管理 .....	126



二	联合国作用总结（1945 ~ 1980 年）	131
三	经济和政治管理空间的冲突和契合	135
四	混乱的帝国：主权、社会公正及跨过 陷坑的发展	137
五	替代性选择：同时建设社会公正和国际公正， 确认各国人民的新主权	144
六	关于复兴联合国的建议	150
结 论		168
附录一 20 世纪的多极化		192
附录二 多极化地缘政治和社会体系补充读物指南		204

## 下编 第五国际

第一章	20 世纪人民大众的国际化	224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	224
二	万隆会议和斗争的首次全球化 （1955 ~ 1980 年）	228
三	大革命的悲剧	231
四	帝国主义的力量、作用、影响以及全球扩张 的永恒阶段	232
五	在选择前卫战略中捍卫后革命国家	234
六	激进周边地区的国家建设和/或社会 主义建设	236
七	毛泽东主义的贡献	239

<b>第二章 新时代 新挑战</b> .....	244
一 三大国际和万隆时代的历史翻过去了 .....	244
二 社会运动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	254
三 当今世界的真假冲突 .....	260
四 财阀统治，衰老资本主义的新领导阶级 .....	262
<b>第三章 怎么办？</b> .....	269
一 冲突性政治文化和共识性政治文化 .....	269
二 我们想要的世界：两种社会理论——两种 未来观 .....	275
三 如何施政？ .....	278
四 于多样性中求共性 .....	281
五 展开讨论：经过长期过渡实现共产主义 .....	287
六 中期目标 .....	289
七 奔向第五国际？ .....	293
<b>附录一 为帝国主义扩张效力的政治伊斯兰</b> .....	299
<b>附录二 《巴马科倡议》</b> .....	322
<b>附录三 《巴马科倡议》建议</b> .....	327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上 编

·····  
多极世界  
·····



## 第一章

# “三合会”：团结或者分裂？

从1945年开始，到因“二战”后社会秩序（福利国家、苏维埃主义、南方国家的国家民粹主义）的崩溃而受阻，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时期，其特征是出现了集体帝国主义。这个集体帝国主义的范畴可以定义为“三合会”（美国和它的加拿大外省、波兰边境以西的欧洲、日本，还可以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管理”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经济领域通过其服务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则是通过北约，其责任被重新定义之后实际上使它可以取代联合国。

但是，这个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都是以美国的攻势为特征的，它试图强迫“三合会”在根据乔治·W·布什总统任职期间设计、以“全球军事控制”为基础的各种关系上，接受美国的“领导”。

这种局面直接提出的问题就是它是否能“让人接受”：“三合会”的伙伴们会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领导吗？这种领导无论从华盛顿单方面的决定方式看，还是从因责任和利益缺乏平衡而形成“特许权”效率衰减的形式看，都是有问题的。或许人们会逐步对“大西洋主义”（及作为其补充部分的美日不对

等同盟) 提出根本上的质疑并导致“三合会”分裂? 必须指出,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将导致北南关系发生不同的变化。

眼前, 美国享有的战略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它的计划是唯一明确的并以公开的方式提出的计划, 是唯一一个根据华盛顿创意而占据舞台的计划。到目前为止, 这个国际共同体——“三合会”及其他同盟——的所有伙伴都只是被动地做出反应: 顺从、“反感”或尽力限制某些对自己最不利的后果。但是, 它们只能如此, 因为它们实在没有其他积极的战略选择, 完全处在一种各自独善其身的状态之中, 一事当前, 每个伙伴首要的考虑就是自身利益的保护, 如同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对它们各自政策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样。

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天翻地覆般变化着的舞台。已经是第一大贸易力量的欧洲正在着手政治一体化建设; 这或许能避免它重新回到欧洲内战的历史中去。已经成为强大经济力量并重新成为亚洲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正处在高速发展中。在美国这一方面, 也重新展现了其兴旺的势头。与此同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消亡, 让人想到资本主义可能是世界各国唯一的前景。在这样条件下, 势力和财富的各个极之间可能的几何组合就变得极为复杂了。

为了看清这一点, 有必要对美国领导阶级的计划进行分析, 揭示其力量的优势和劣势。然后我们再来看, 欧洲——或欧洲各国——(日本其次) 是如何应对挑战的, 以及使“三合会”伙伴的对策能够做出必须有效的不同选择的条件是什么。

这种分析能通过识别“三合会”内部可能出现冲突的领

域，从而揭示其冲突的本质。分析还将引发对所有涉及北南关系可能发生不同变化的讨论。

### 一 美国领导阶级的计划：在全球推行门罗主义

诞生于1945年的美国领导阶级的计划在今天有五个目标：（1）压制并控制“三合会”其他伙伴（欧洲和日本），使这些国家离开美国的怀抱难以有所作为；（2）建立北约的军事控制权，并使苏联原来在世界上的势力范围“拉美化”；（3）全面控制中东地区及其石油资源；（4）拆分中国，使其他大国（印度、巴西）处于从属地位，并防止形成能够参与全球事务的区域集团；（5）使那些不具有战略价值的南方国家边缘化。

计划中军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该计划是在波茨坦会议以后，美国根据其核垄断地位提出来的。美国很快就实施了一项全球军事战略，将全球划分为若干地区，并规定了“美国军事领导”下每个地区的监控责任。其目标不仅仅是“包围苏联”（及中国），而且同时还要让华盛顿拥有成为全世界所有地区终审官的各种手段。换言之，在全世界推行门罗主义，实际上是赋予美国独有“权力”，根据它确定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管理整个新世界。

军事力量是霸权主义者开展攻势最重视的工具。这种霸权一方面保证“三合会”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另一方面反过来也要求盟国必须接受按照美国的航迹亦步亦趋，如英国和日本；日本虽然对美国既无情感，也没有“文化”情结可言，但它知道它必须这么做。这样一来，欧洲政治家们向他们的听众

灌输的各种关于欧洲经济力量的演说，就一下子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深陷于商业利益的争吵而无暇旁顾且没有自己计划的欧洲早已经被制服了。华盛顿对此了如指掌。

计划意味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最高权力”被置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拥有被视为“合法”的政治手段；计划显示出对任何超国家权力的固执的怀疑。

美国领导阶级毫不避讳地声明，绝不会“容忍”出现任何有可能威胁其全球垄断统治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此，它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它认为主要的潜在对手有三个。

首先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解体便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俄罗斯领导阶级迄今对此似乎并不明白。它好像确信在“输掉战争”之后，它能够“赢得和平”，如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那样。它忘了，华盛顿之所以需要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对手重新站起来，恰恰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新的局势不同了，美国不再有强大的竞争者了。它的选择是彻底并全面地摧毁已经败下阵来的对手俄罗斯。普京对此明白吗？他能引导俄罗斯走出幻觉吗？

第二个是中国，它的经济总量和经济成就让美国不安，因此，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让这个大国分裂。

欧洲在这个世界新主人的全球视野中排在第三位。但北美权势集团似乎并不担心，至少目前是这样。一些国家（英国，还有东欧国家奴颜婢膝的新政权）对大西洋主义的无条件的奉行、“欧洲计划的流沙困境”、“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占主导地位资本的共同利益，造成了欧洲计划的模糊不清，使它沦为“美国计划的欧洲部分”。华盛顿的外交目的就是让德国继续跟



着它走；东欧的重新统一和被征服似乎就是为加强这个同盟：德国被鼓励重振其“东进”传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柏林通过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抢先承认而在南斯拉夫解体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在其他方面则要跟着华盛顿亦步亦趋。反其道而行之吗？德国的政治家们在作战略选择时好像犹豫不决并可能存在分歧。

与选择和所谓的大西洋主义者站在一起相对应的，就是加强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这个轴心将成为独立于华盛顿的欧洲体系的最可靠支柱。

舆论通常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这个国家的优势遍及所有领域，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甚至还包括政治和文化的领域。屈服于它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将是无法逆转的事实。我的看法与此正相反，我认为，在集体帝国主义体系内，美国并不拥有绝对的经济优势。美国生产体系远非是“世界最有效率”的。相反，如果放到自由经济主义者所设想的真正开放的市场上来看，它的几乎任何一个部门都肯定不能战胜其竞争者。逐年增长的美国贸易逆差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从1989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5000亿美元。这些逆差实际上涉及生产体系的所有部门。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箭、空客与波音之间的竞争也证明美国的优势是脆弱的。当在高科技生产领域面对欧洲和日本，在加工制造业生产领域面对中国、韩国及亚洲和拉美其他工业国家，在农业领域面对欧洲和拉美南锥体国家时，美国如果不借助违背自由主义原则强加于竞争对手的“非经济”手段，就不可能占上风！

北美经济是靠着牺牲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伙伴而寄生的。世界生产，美国消费（实际上它没有一点国家储蓄）。美国的“优势”是一种掠夺者的优势，它的赤字受到别的国家自愿或不自愿的担保。为了弥补短缺，华盛顿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不断地单方面破坏自由主义的原则、出口军火、追求石油的超额利润（这意味着对石油生产国实施定期打击，这也是中亚和伊拉克战争的真实动机之一）。反正美国的赤字基本上是由来自欧洲、日本、中国和南方国家（富裕的石油生产国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最贫困国家的买办阶级）的投资资金所担保着，再加上以向强加给世界体系中几乎所有边缘国家提供债务服务的名义抽取的服务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就是天天靠着这些源源不断的资金养活着，这些资金维持着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寄生生活。因此，美国的这种脆弱性对华盛顿计划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

美国的霸权主义战略是在新的集体帝国主义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这个战略的目标最简单地就说就是建立美国对整个世界的军事控制。这种控制是华盛顿确保它更容易优先获取地球全部自然资源的手段，也是制约它的盟国及俄罗斯、中国和总体上不得不接受附庸地位的第三世界的手段。全球军事控制是美国通过强力政治，来抽取“贡税”的最终强加于人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资本的“自然流动”来弥补美国赤字，正是美国霸权主义越来越脆弱的重要根源。这种战略的目的既不是“保证市场对所有国家平等开放”（这种宣传言论为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人所深信不疑），显然也不是为了到处推广民主！

欧洲尤其要在这样两个战略取舍中做出选择——世界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将其（“积蓄”的）资本的“剩余”部分用来为美国（因消费、投资、军费产生的）赤字埋单；或留下来给自己投资，振兴经济。因为这样的输血迫使欧洲国家不得不实行“通货紧缩”政策——传统经济学的用语在这里并不恰当，我宁愿说停滞——以便赎回输出的积蓄剩余。这便使得欧洲的复苏需要取决于美国，而欧洲的复苏却一直是因为“输血”而人为地保持着不死不活的局面。反过来，如果将这部分剩余的资本用于解决欧洲当地的就业问题，就能同时推动消费（通过重建被自由主义病毒破坏的经济管理的社会维度）和投资——特别是在新技术领域（及资助科研）——甚至提高军事开支（以终结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这种为了应对挑战而提出的主张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新平衡将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各国的冲突和社会的斗争便是如此环环相扣。换句话说，美欧之间的差异与不同伙伴资本优势部门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

欧洲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加强对共同货币（欧元）的所谓“非政治”管理，这对力图使欧洲大陆国家走出停滞的任何战略都是严重障碍。这种愚蠢的货币管理让华盛顿很高兴，它的货币（美元）是完全另一种管理方式（看不到任何一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是非常政治的！这种管理，加上华盛顿对全球石油资源可能的独家控制，确保我称之为石油/美元本位（oil dollar standard）仍然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工具，而将欧元置于次要的地区性货币的地位。

可能导致欧洲（或者至少某些重要的大陆国家）与美国对立的政治冲突，并不会导致根本性的分歧，尽管这些分歧的背

后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们的利益冲突。我认为，这种冲突另属于可以称之为“国家利益”和相当不同的政治文化遗产的冲突。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前面提出来的问题（“三合会”：团结或者分裂？）：鉴于国家利益和政治文化之间的不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趋势有利于“三合会”的团结，政治上则趋于分裂。

## 二 欧洲计划的流沙困境

到目前为止，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已经皈依到自由主义的旗下。这种皈依意味着欧洲计划的彻底消失，从经济上（欧洲经济联盟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被化解了）和政治上（欧洲政治和军事的自治不见了）被双重地稀释了。当前不存在欧洲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或者可以说是“三合会”的）计划。

“美国制造”的战争确实唤醒了公众舆论——整个欧洲到处都在反对最新的这场伊拉克战争——以及甚至某些国家的政府，首先是法国，还有德国和俄罗斯，此外还有中国政府。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政府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并没有受到怀疑。这次严重的对立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克制，既不服从华盛顿的需要，也不真的决裂并终结大西洋主义。

我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重要政治结论是，只要权力集团的政治联盟仍将以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为中心，欧洲就不可能走出大西洋主义。只有当社会和政治的斗争最终改变了权力集团的构成，并再次迫使资本家和劳动者达成历史性的妥协，欧

洲才能够与华盛顿有所差别，并有机会创建可能的欧洲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将同样能够——甚至是必须——在国际方面，在其与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关系方面，踏上另外一条与集体帝国主义特有的追求不同的道路，从而开始它参与“超越资本主义”的长征。换句话说，欧洲将向左走（这个“左”的术语用在此处是严肃的），或者它将什么也不是。

现在这个“欧洲计划”是作为美国大西洋主义计划的欧洲部分而产生的，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根据华盛顿实施的“冷战”精神设计出来的，既虚弱又对国内工人阶级感到恐惧的欧洲资产阶级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计划。

然而，计划本身的发展——其起源就是令人怀疑的——逐渐地使问题和挑战的重要条件发生了改变。西欧已经能够或有条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美国。一方面，“苏联敌人”已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计划的发展将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欧洲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重要的强烈对抗的对手黏合到一起了：大陆的三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重归于好了。依我看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积极的，并且富有更积极的潜能。当然，计划的发展是建立在吸收了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基础上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是一种被弱化了自由主义，它在社会方面考虑到了并通过限制资本实行“民主社会的历史性妥协”，以适应劳动阶级提出的社会公平的要求。80年代以后，计划便在效法“美国式的”、反社会的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框架下继续发展了。

最后的这一转变使欧洲各国社会陷入了多重危机。首先简单地说是经济危机，这是自由主义取向必然导致的结果。这是一种

因欧洲国家对北美经济需求的顺从而导致的日趋严重的危机，欧洲至今都还乐意为美国的亏空埋单，听任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其次是社会危机，它因大众阶层对自由主义取向必然后果的抵制和斗争的高涨而日趋加深。最后是政治危机的爆发——拒绝无条件服从美国的选择：对南方国家无休无止的战争。

### 三 欧洲人民与国家面临的三重挑战

欧洲人从原则上可以分为完全不同的三种人：

- 坚持自由主义取向并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美国的领导；
- 坚持自由主义取向，但希望有一个不再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政治独立的欧洲；

• 希望建设一个“社会欧洲”（并为此而斗争），也就是说，一种在欧洲范围内实行新的劳资妥协的温和的资本主义，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对南方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实行“另一种关系”（即友好、民主、和平关系）的欧洲。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整个欧洲的公众舆论，通过欧洲社会论坛（2002年佛罗伦萨会议、2003年巴黎会议及2004年伦敦会议），都普遍表明了对这一原则立场的支持。

这些不同倾向各自依靠的是什么力量，各自机会又将如何呢？

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是自由主义的，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它本身必然支持三种取向的第一种。托尼·布莱尔是我称之为“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的最紧密合作的代表。如果必要的话，皈依于星条旗下的政治阶级宁愿要“牺牲欧洲的

计划”——或者至少打消任何对欧洲计划抱有的幻想——将其禁锢在一开始的枷锁中：作为大西洋主义计划的欧洲部分。

由此，我相信，第二种取向是难以得逞的。然而它是欧洲重要国家——法国和德国政府的选择。它是否表示资本已强大到可以挣脱美国监护的雄心了呢？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有可能，但是从直觉上我会说不可能。然而，这种取向却是反抗它们的北美对手——已经成为全人类主要敌人的“结盟”取向。我之所以称之为“结盟”取向，是因为我相信，如果它们坚持它们的取向，它们将摆脱对资本（自由主义）的单边计划的必然顺从，并寻求与左翼结盟（只有左翼才能够支持它们独立于华盛顿的计划）。在第二和第三种人之间形成联盟并不是不可能的。就像当初的反法西斯的伟大联盟一样。

假设这个联盟得以形成，那它是否就应该并能够在欧洲范围内完全做到让所有欧洲人都不放弃对欧洲优先的考虑吗？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在欧洲还有并将继续有顽固地支持第一种亲美集团取向的人。那么，让欧洲分裂并最终放弃它的计划吗？我并不这样看，既无必要，也不希望如此。可能有另外一种战略：那就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将欧洲计划“冷冻”一段时间，并同时开拓联盟的其他发展轴线。

对此，我会最先考虑建立一个巴黎—柏林—莫斯科的政治和战略联盟，如果可能的话，一直延伸到北京和新德里。更确切地说，其政治目标是国际多元化并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而其战略目标则是共同建设足以应对美国挑战的军事力量。这三个或四个大国所拥有的全部资源，技术和财力上的，将因其传统的军事能力而得到加强，美国在它们面前将

相形见绌。美国的罪恶野心及其挑战是不可逆转的。而且这些野心是永无止境的。这一点必须予以证实。今天，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线，如同过去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一样，是首要的任务。

只要美国战略不被粉碎，任何一个欧洲计划都不可能有所进展。

#### 四 政治文化的冲突

是否有必要在此重复我曾经提出的，1990年以来“北美”和“欧洲”是怎么形成对抗阵势的呢？我在《混沌帝国》（我选择这个标题是为了表明我从1990年以来所思考的领域）一书中分析，竞争对手的冲突并不主要在“经济利益”方面，而在于政治文化的不同。

当人们说到“经济利益”时，应该将资本优势领域（金融触角深深扎根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跨国”巨头及其领先者）的“利益”，和人们所说的词义模糊的“国家（经济）利益”清楚地区别开来。之所以说有集体帝国主义，就是因为这些资本优势领域在整体上通过全球体系管理分享了共同利益。当然，每个跨国公司都在与其他跨国公司竞争，每个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当然都在竞争中全力支持本国的跨国公司。这些经常发生在跨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决定了结盟和冲突反复无常的变数，但是却不能简化为国家之间亲疏远近的变数。

我的国家概念拒绝把国家职能简单地看作“资本优势领域



意愿的执行人”。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如此或几乎如此。特别是在当前，由于战后（劳资）历史性妥协被打破而导致政治失衡的情况下。但是，这种变化并不会持久。由于其他不同于占统治地位资本所维护的社会利益的政治力量的重建，它已经受到了威胁。于是，人们重新找到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绝不会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尽管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家常常有这样予以简单化的倾向。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有通常的资本利益，它们是通过“国家”总体生产体系的战略和追求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些利益的捍卫吸引了大部分中产阶级跟随其后，并因此对选举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同时还存在着大众阶级——劳动阶级的利益。他们往往竭力表现出与资本利益的区别，并只以“国家”名义提出他们的诉求。不仅当大部分或将近大部分劳动阶级力图推行激进或不那么激进的“社会主义”选择时是如此，而且甚至在仅为获得他们认为有权获得的“一份蛋糕”而做出放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区别，我们已经对美国 and 欧洲作了比较。对于受萨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思想影响的美国工联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的选择并不是问题，即使从长远的前景来看也不是问题。欧洲的传统则与美国不同，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或在哪个时期。

这就涉及政治文化的问题。形容词“政治”用在这里是表明我的理论观点。我不谈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如文化主义者对“差异”的模式所做的那种讨论。我说的政治文化的意思是，它既是有关国家特有的国内社会斗争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些社会斗争与该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所

决定的国际冲突交织的产物，政治文化产生的因素是很复杂的。

根据这个概念，我对欧洲（或大陆的大部分国家）政治文化（一种或若干种<sup>①</sup>）下的定义是：（1）启蒙时代哲学的历史产物；（2）开创现代化进程的“资产阶级革命”（无论其激进与否）的历史产物，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最为激进的一次，既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人民革命）；（3）19世纪和20世纪引人关注的早期工人运动（包括所有“改良派”和“革命派”）迅猛发展的历史产物；（4）俄国革命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产物。这份路线图表明了事物产生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造就了欧洲特有的右派和左派的反差，同时也形成了基本的社会概念，并深刻地影响了自由和平等的冲突准则及世俗和公民的民主实践。

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完全用另外一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最初，它显然是由笃信宗教的移民所建立的新英格兰。因此，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全面分析在这里必须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宗教改革便没有后来的欧洲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说过，宗教改革是有关国家社会各阶级应对新生资本主义挑战的各种不同反应的表现。其中，最明显的是新的社会关系迅猛发展带来变革的受害者的反应。这些受害者——“贫困阶级”——产生了一种否定启蒙时代的宗教意识。因此，就其最核心部分而言，美国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启蒙时代的一种延续，而是与之对立的。我们知道，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不断发生

<sup>①</sup> 原文为单数或复数。——译者注

过“塞勒姆巫师案<sup>①</sup>”那样的事件。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家都面临着这类“道德危机”，并坚守在欧洲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正义防御邪恶”的假想中。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现在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正是这种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构成美国政治文化的第二种特别要素产生于由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浪潮所形成的劳动者阶级（城市工人和西部征服者）。这样相继而来的移民浪潮使每一代移民都无法凝结成像在欧洲那样的工人运动，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社群主义”。

美国政治文化的其他构成——奴隶制度及其带来的种族主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及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同样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与欧洲是不一样的，但是其海外移民（无论是否黑奴制的维护者都经常参与屠杀）除外。

美国政治文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的理念体系。它确定的自由理念尤其强调企业的自由，这也是很特殊的。与欧洲相比较，它贬低了平等的理念。美国的政治文化从来不理解非宗教化（laïcité），却容忍宗教的多样性；相比之下，欧洲在非宗教化方面走得更远。

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对于确保资本的绝对统治起到了绝妙的作用，而这种对资本绝对统治地位的保护在欧洲却经常受到限制。美国在这方面创造了一种无懈可击的政治体制，它完全符

---

<sup>①</sup> 1692年5月-1692年10月，美国马萨诸塞湾塞勒姆镇发生系列迫害案。几名少女声称被女巫施术，于是提出控诉，导致整个马萨诸塞对巫术威胁群体性过度反应，并设立特别法庭审判被控施行巫术者，多达150人被关押候审，甚至连总督妻子也被牵涉在内。随后公众舆论介入，对特别法庭给予谴责。总督解散了特别法庭并释放剩余的羁押犯，马萨诸塞州议会也撤销了对这些女巫的有罪判决并对已处死者给予赔偿。——译者注

合这种不容置疑的、内在的资本的绝对统治：总统制及“一党”两派（民主党和共和党），并由此来消除实行选举民主可能带来的危险。

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确定了各种权力，并发展出一套法律和它自己的民主的理念。为了对它的大体框架有个清晰的了解，对仍然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进行分析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文化从形式上来看远未被它的受害者和反对者的文化所“污染”。最初，只有个人的“权力”得到承认（即使“行会”的人格也是后来才得到承认的），当然，这是“白人”的权力（不包括妇女和能够被看作殖民地居民的奴隶）。因此，个人之间的“契约”高于法律，国家法律作用余地很小。一份平常的“契约”在美国可能需要200页的附则，而在法律高于一切的欧洲，两页足矣。与这些基本理念相伴而来的一种政治文化，就是将经济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严格地分开（在经济生活领域，通过实行私有制和有产者的自由来进行管理，忽视与其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措施，并由此导致“平等”的贬值）。于是，这种有限的政治生活就被简化为只实行“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多党制和选举制”的形式。它摒弃任何形式的更进步的，确切地说是可参与的民主。“市民社会”的理念传到美国后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它却退缩成为一片模糊不清的“超政治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最常见的是当它们建立在宗教、准宗教、族群或相类似的“社群”基础上时——被设定为像私营商业部门一样，但“更近似公共部门”（其本身与其理解成由公民组成不如说是由消费者组成）并因此在管理共同利益（特别是教育和卫生）方面更

有效。这些做法加深了不平等，特别是由于平等的愿望没有被当作重要的伦理价值而使不平等更为令人难以忍受。

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文化跟美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它们都完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围。在法国和欧洲大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的，并且以此规范对冲突的社会管理。国家被指定按照资本主义的目的来有序地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有目的有步骤的不同做法一开始就打开了启动可参与民主的可能性——如果社会斗争迫使它这么做——这种可参与民主的性质决定了它与资本积累逻辑的冲突更明显，因为“多数”的公民可以对抗少数的“有产者”，只要资本主义特有的逻辑承认他们是真正有选举权的公民。这种有目的有步骤的做法还打开了承认实际社会权力的途径，而这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中基本上是被忽略的。因为这些权力意味着人们所知道的立法机构和国家行政部门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仅仅要求国家避免对政治和公民的自由加以限制。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卫生）的公共服务理念是为了保障最大的平等，这种理念在社会管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事实上，这种方式比自由主义所实行的方式更为有效，将卫生事业支出（与美国相比，欧洲在这方面的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低得多）及其相关的成果（欧洲更好）作一比较就可以证明。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市民社会理念在此是有可能的，它对捍卫社会权力的民间组织（如工会）和政治性的公民组织都有重大影响。这种政治文化开辟了超越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的道路，而资本主义扩张逻辑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社会主义的未来就在眼前，并且在还是资本主义的现在就已经显示

出了潜在的力量。

由于华盛顿采取了将它狭隘的和倒退的看法强加于全世界的攻势，从此便开始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冲突。因构成美国法律基础的英国不成文法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法律，在欧洲和许多南方国家的其他地方普遍已经过时，从而更显其目标之狂妄。尽管如此，但它的目标仍然是：美国的法律必须被当作国际法来接受。正如莫斯科强行把社会主义构想简化为对苏联模式的模仿，这种野心现在早已经过时了。评估这场当代的论战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只需看一看政治和现代主流媒体的用语措辞就够了。已经消失的词是：国家、政治、政权、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更替、大西洋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中性词：治理、共同体、社会伙伴、贫困、协调、轮换。

美欧政治文化的差异能够抵挡得住旧大陆的美国化吗？从这个观点来看，欧洲联盟宪法的计划极为令人担忧。它已经铭刻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标记，承认了作为大西洋主义工具的北约的职能，此外，它还通过第 51 条款确认教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它敲响了非宗教化的丧钟，号召在宗教情感方面向美国学习，呼吁各种教派和天主教完整主义并行不悖，呼唤各种共同体主义的团结。蒙昧主义的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凸现表明了天主事工会（Opus Dei）的成功，其反动的思想意识影响了计划的编撰者们，特别是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他们企图抹去欧洲记忆中的启蒙时代、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三合会”伙伴之间将不再可能发生冲突，它们只有没有政治文化差异的国家利益的分歧。

依我之见，这正是美欧“文明”冲突之所在。在欧洲

(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冲突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但在美国则不存在。

## 五 那么日本呢？

人们还记得，二十多年来日本令人兴奋的发展使它被认为是继美国之后的霸权。日本发明了新的工作方式（“丰田主义”），日本在科技与经济发展上名列前茅，日本靠着它的储蓄盈余购置美国的产业！这样的发展给我留下从来没有过的深刻印象，几乎让我忘了旭日帝国在结构上的脆弱性。

首先，它的地理位置使它不得不听命于华盛顿<sup>①</sup>。它面对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军事大国苏联——即使在它真的不存在以后，也是一个潜在对手。它还面对着中国，这是个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会忍受置身于东京治理下的国家，这甚至是连韩国都不会接受的！

其次，即使在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日本工业和出口增长的成功给人极为深刻印象的时代，它也没有任何可能问鼎霸权。

它对美国贸易差额的盈余从来没有让我看出像个强权的样子，相反，倒像个弱者。这种盈余实际上是美国强迫日本实行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就是迫使附属它的盟友以这样的方式向其“竞争者”（和主子）提供资金，以缓解其不足的困境。就如同今天欧洲的盈余是大陆实行通货紧缩政策的结果一样，确切地说，这些政策完全是为北美利益服务的，并使得美

<sup>①</sup> 原文为：“成为华盛顿的囚徒”。——译者注

国可以继续实行其不付代价的扩张主义政策。日本、欧洲的盈余和美国赤字，正如一枚印章的两面，上面刻着：美国领导/伙伴们跟着配合。

最后是因为日本的政治文化使它的人民不可能承担起属于世界霸权的任务。并不是因为这种文化与民主的要求不会那么融合；考虑到保守党几乎是唯一的政党，选举实际上更多是个形式。因为，对国家事务进行政治管理所受到的局限性和特征表明，这都完全是服从美国主子的结果。加之明治以来，日本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从一开始起就不容许民众各阶层对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以保证体制的稳定。与经过激进革命产生的当代中国相比，日本没有表现出一点与亚洲民族相符的魅力。

自从世界局势发生了日本无力左右而只能接受的转折以来，日本模式已经被认为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人们知道，十多年来日本经济遭受到持续停滞的打击，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对抗措施，这使得无论是领导阶级还是民众都看不到隧道的尽头。未来的责任已经完全托付给“世界”了，首先是托付给美国的领导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象不出日本在可预期的未来，在世界体系重建中有任何积极的作用。日本或许仍将追随着华盛顿的军事计划。除非有可能——并在这个时候——它的各民众阶级自己通过更尖锐的斗争对它的体制提出挑战。否则，日本资本能够从其对美国的追随中得到的好处仍将是适度的和有限的，华盛顿或许会在东京开发自然资源和东南亚廉价劳动力市场方面做出某些让步。



## 第二章

# 中国的崛起：质疑帝国主义秩序？

### 一 中国崛起的由来：革命还是开放？

许多主流看法认为，帝国主义造成的不发达遗产正在被“急起直追”的亚洲变成为历史，这种追赶肯定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进行的，而不是与之决裂；各种迹象都有助于证实这种对未来的展望。事实上，在 20 世纪最后的 25 年里，亚洲的经济增长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还深深地陷在停滞当中。从发展的曲线图来看，可以让人得出结论，世界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因亚洲而更为“平衡”，从而标志着走向复兴。因此，资本主义正在失去它的帝国主义特征，即使不是在其他第三世界地区，至少在东南亚是这样的。而且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一地区现在正处于现代化中，将来会拥有重要的军事能力，并且中国和印度都是核大国。

这种演变表明，未来“必然”是个多极化的世界，由至少四个（在经济和军事上）力量相等或至少具有相等潜力的极组成，它们是：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如果加上前面提到的俄罗斯和印度，则甚至可能是六个。这些极和直接参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加拿大、东欧、东南亚、韩国）占据了全球人口

的绝大多数。因此，这个多极化体制将不会继承帝国主义的发展形式，帝国主义从多极（直至 1945 年）到后来的单极（包括形成“三合会”的集体帝国主义）都只占世界人口的极少数。

如此推理分析在我看来是不够的。首先，这种预见没有考虑到华盛顿为阻止中国计划所要推行的政策。况且，还不能想象欧洲能够和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大西洋主义决裂，而出于类似或特殊的原因，日本还在继续唯太平洋彼岸的保护人是从，“三合会”的集体帝国主义的生命力还远不能被轻视。其次，仅凭经济增长率来说明“成功”的考量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而若干年后的发展究竟如何还不能确定。亚洲可能的继续增长取决于不同相关方面的诸多内外因素，一方面要取决于各地统治阶级选择的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模式，另一方面要取决于外部（也就是说“三合会”的帝国主义力量）的反应。持久的增长能够明显——并且也是这样感觉到的——改善亚洲人民还很低的生活水平，从而保持民族的团结（中国和越南革命遗留下来的现实问题），或者在其他地方（印度和东南亚）已经实现这一点，需要的是经济选择和政治手段有计划的协调。但是，这样的协调不可能是当前实施模式的自然产物，这些模式广泛地受到资本主义，而且还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教条的影响。我们还要考虑到，预料的经济增长对能源（特别是石油）消费的巨大需求。因此，且不论全球生态平衡的观点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与帝国主义“三合会”的冲突已经日趋尖锐；而它们到目前为止一直独享着全球资源的利益。

主流看法将毛以后中国的成功，仅仅归功于市场的效果和对外开放。这种看法对毛时代的中国现实的分析过于简单。在

毛主义的30年（1950~1980年）当中，中国已经取得增长率两倍于印度和某些其他第三世界地区的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只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中国的成就显得更加出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的地区曾经做得更好。然而此处应该特别提请注意，没有此前所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这些独一无二的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发展的加速是随着消费增长率飞跃发展而来的。换句话说，正因为毛的时代长期坚持基础建设优先，新经济政策将重点放在直接改善消费上才有可能因先前的努力而获得成功。长期发展基础建设而导致经济失调成为毛时代几十年的特征，这并非是一种荒谬的假说。反过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起加强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政策也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中国还处在需要发展基础工业的阶段。

对外开放的问题，也就是参与国际分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所有的其他方面（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与世界经济管理机构合作），甚至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问题，用极端的论战措辞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开放或者封闭！——在这样的论战中获胜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卫道士们企图结束辩论。

必须知道，实行开放是为了能够从中获益。因为，为了促进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弥补过去落后的差距，必须借助更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先进（可以进口的）设备，并且必须通过出口来获得支付的能力。显然，在这个阶段，人们能够向世界市场提供的，能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必须知道，在这种不对等的贸易中，人们是受剥削的，人们——暂时——接受这种局面，是因为别无选择。但是，当这种选择的成功引起了秩序发生逆转的时候，危险便显露出来了；这种秩序是符合发展战略的

逻辑并环环相扣的。这种发展战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数量目标服从于发展计划的需要，而发展计划是加强国内社会稳定的保证，并因而也能够对外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自主。与自由主义提出的论断正相反，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应建立在优先扩大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基础上，对这些部门来说，拥有丰富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是“获益”的。如果中国不得不终止现政权所作出的选择，其增长率就将降低到和印度接近的水平，为现在的1/2。第一种选择，我称之为“断开”，它意味着拒绝服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逻辑，但无法做到自给自足；第二种选择就是根据世界体系一体化的需要做出配合，在现实中这种配合永远是被动的（即使当人们称之为“主动”的时候）。

从“三合会”帝国主义的发展前景来看，中心与边缘国家的差异，正在形成以新的、更高层次的重要垄断为基础的新的形式，使世界等级的集中化进一步加深而不是减轻。

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一直是帝国主义的阶段，作为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运而生的社会模式——社会主义选择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并且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所设想的完全不同。从这种角度来看，“市场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它的第一阶段。但是，它的实现还需要许多条件。我认为，对现代中国而言，土地问题是挑战的核心。

## 二 市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转型阶段 还是通向资本主义的捷径？

根本问题是我给自己提出的1980年以来的问题，就是从

中国及邓小平更偏爱“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开始，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引导着中国走到了今天。甚至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多年，从开始批判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时，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但是，对于所有超越这个体系，仍继续认真思考着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成的需要及其可能性的人来说，它必须是——或应该是——最为令人忧虑的问题，他们对资本主义超越人类历史从而构成“历史的终结”的作用表示怀疑。

历史常常比人们想象的或希望的更长。社会主义者曾经希望的，至少是在最初阶段所希望的第一次试验的浪潮，经历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潜力逐步耗尽而变了质，往往被颠覆，或者开始受到了怀疑。当然还会有第二波，但它不会是前者的翻版，不仅因为必须从失败中汲取一些教训，而且还因为在此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变了。毕竟，如果进一步来看，资本主义变革的第一次浪潮，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许多城市上演过，确确实实地是失败了；但是，它通过发生在欧洲西北部大西洋的一小部分地方的第二次浪潮继续发展，正是这第二次浪潮奠定了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社会主义未来问题的辩论仍然十分活跃，并且是核心的话题。很显然，这场辩论在各种角度下将——而且也应该——涉及提供分析和实行变革的社会现实不同，这种社会现实永远是很复杂的。我将仅就中国改革能够引起的思考来讨论这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想知道其他地方在不同的角度下提出

来的同样问题，并从其他经验引起的思考来进行研究，如越南和古巴的经验，或者原苏联世界的国家，或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第三世界激进的民粹主义。

我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会朝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稳定形态变革吗？或者，从可能的前景来看，它仍然是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吗？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指望得到最准确的“预见”。我是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问题的：当代中国舞台上的矛盾和斗争是什么？它所选择道路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什么是反资本主义力量的优势（至少是潜在的社会主义者）？在什么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能够取得胜利，并能产生什么样的或多或少是稳定的资本主义呢？在什么条件下，目前（长时期的）阶段能够向（更长时期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转变？

战斗的精神取决于将分析的能力用于为实行变革服务的意志，它不能避免作预测，而且还应该这么做，因为必须要对它所批判的及它所捍卫的路线带来的各种后果做出评估。但是，作为一个相信其可能的独立的观察家，不能过多地满足于“预测未来”。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要知道历史的进程如何转变，为此，必须要超越对改革的进程的了解。

### 中国领导阶级的选择

中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同样的重大事件，都是两国人民的历史分水岭。这些革命使两国人民开始大规模地、有意识地进入本国的历史舞台，虽然革命并不完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革命是“神圣的”，尽管反动知识分子竭力予以诋毁，甚至企图否定其伟大意义。

但是，我们判断人——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本质，必须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既然如此，提出的问题就必须涉及这种已做出的基本选择的未来走向。“市场社会主义”成为逐步形成资本主义结构和基本制度的捷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冲突和痛苦。这种办法与俄罗斯领导阶级所采取的办法正好相反，它直接否定了革命，随后的变革使俄罗斯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未来的资产阶级。因此，俄罗斯的办法属于“休克疗法”。我不知道历史是否会允许它摆脱这种办法，而建立起一种保证其阶级政权持续下去（一段时期内）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形式。这个问题我将在有关俄罗斯的一章中再谈。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路线的各种矛盾，它的长处和短处，即它能够提供的增长、发展、社会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它所无法提供的。此外，仅仅满足于说资本主义道路是以剥削劳动为基础的，以表示谴责，并不能让我们更深入地来进行讨论。资本主义道路以剥削劳动为基础是事实。但是，这很难阻止资本主义被许多受它剥削的人视为有价值的并且是合法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有活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其合法性、结构的稳定性及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享受得到了广泛的分配——即使是不公平的。

资本主义形成的结构、性质、形式及其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是“历史性妥协”的产物，是随着制度形成而产生的特定霸权集团的社会联盟的产物。通过这样的传承而形成的每一种（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历史道路的特点，

回过来又产生了适合我们提到的每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形态可能的特殊性。正是因为成功地走出了这些不同的道路，世界体系核心国家的资本主义是“稳定的”（但并不等于“永远”！）。

我注意到，在通常美国宣传的观念中，有一种将市场和民主相提并论的现象。在某些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特定民主形式的政治实践是平行运作的，并就此对民主的运用实行监控，防止它不可避免会有的（反资本主义的）“失控”。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资本主义就非常简单地放弃民主，以免情况更糟糕。

在中国，由于第三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和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特概念及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得民主问题更为复杂（这不是本书的主题。对此，我将另有论述）。在西方民主形式下，贸然地发动大部分民众阶级进行社会斗争，将使之回到无法实行的状态中去。中国必须开创另一种形式的民主，并与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设想的向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的阶段结合起来。否则，我只能看到缺乏合法性的专制政体和不稳定的“小民主”的交替出现，这正是当前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

当代世界到处盛行着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说法，还常常被与一种含义不清的特异咒语般的联想结合在一起，所有人都把它当作最大的政治机会主义来加以利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道路”——一部分人说它不是资本主义，另一部分人则肯定它是社会主义——要避开这些机会主义的工具化，也很难有十分确切的术语来表示。



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性质和看到的情况而言，其多样性并不足为奇。“莱茵式”资本主义（且不说法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不同！法德和解是被迫的！）的确与“盎格鲁-撒克逊式”（但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很不同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将讨论从对现实性的描述转移到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上来，政治文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斗争的产物。我不想重复我曾经阐述过的论据，但我将重点概括一下我对北美和欧洲的思想观念所做的比较。前者只承认两种基本的价值观：私有财产和自由（被理解为财产使用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后者承认平等的价值观，并且平等与自由的价值观的冲突必须得到有序的控制，即通过承认财产权受强制性制约的方式（法国大革命代之以博爱）。我甚至将这种差异放到了欧美矛盾的核心位置上，我这并不是从统治资本的利益冲突方面来看的，因为“三合会”（美国、欧洲、日本）的集体帝国主义已经接替了早期历史上的帝国主义。

同样重要的是，即使不是更重要的话，还有边缘国家（其本身在各个方面也有着不同）和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的差异。从形态上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极的意义上来说）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它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并且始终在不断深化。在这个层面上，未来与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内在的极化都不一样。我不想在此重复中心国家/边缘国家的差异正在形成的新的形态，这些建立在中心国家在关键领域（技术、天然资源获取、通信与信息、世界金融体系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的垄断基础上，取代了过去工业时代的简单

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兴国家”的说法属于观念上的笑话；问题在于，这些国家远不是在“追赶”，而是在建设明天的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

既然“文化”被想象成是一种跨历史的不变量，是所有基础理论研究者须臾不可离开的一种公设（布什和本·拉登的公设亦都如出一辙），那么，对文化方面的诉求——或者这么说，以及文化必然（或将必然）给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多样性，就成了各种表述中的老生常谈了，并且也成了为了达到辩解目的的机会主义了（但却是拙劣的）。我们只要也跟着追这种时尚，真正的问题——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变化的永恒性问题——就一下子被排除在思考之外了。同样庸俗的是将“常规资本主义”[如韦伯（Weber）的理想型]和“大众资本主义”做所谓的对比，人们声称这种“大众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财产分配即使不是公平的，至少也是在非常广泛的基础上的（如同所设想的，通过“遗产”累积以及其他许多属于精神会餐的空谈的办法，公民变成了既是劳动者也是股东）。抛开所有这一切——多变性和多样性，过去和将来，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在内在的、唯积累需求是从的内在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定义永远是一种建立在经济 and 商品异化基础上的社会（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

### 一种社会主义选择的要求

社会主义的定义首先是人类的解放，并从而建立一种社会全面协调的模式，摆脱对资本积累需求的异化的服从。这样，社会主义和民主就是不可分割的了。

我曾经在别处写过关于苏联阵营和毛主义中国的体制的性

质、它们最初的计划及其改革（或失控）的性质、对在“追赶差距”压力下实行转变所出现的问题应负责任的性质，以及第二、第三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我不想在此重复这些论述。我只想重申的是，我曾经提出，要防止减速引起的混乱，如同中央集权的计划化曾经有过的混乱一样，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对出现的问题做出（我认为是相适应的）反应，但是，这种混乱随后却被不当地视为“完美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完美的”社会主义，如果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这样来形容的话，那它必然也是世界性的，而且比资本主义还更具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不完整的和倾斜的，这是由于其内在的中央/边缘结构所产生的），“完美的”社会主义确切的组织及其相应机构的形式是不可能预先被描写出来的，但是其原则必须是能够引导人民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的，并通过提供一种永无止境的、不断深化的民主化进程而让人民充分行使权力的。在这方面，受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在于它在接受马克思时没有停步，而是以马克思为出发点）启发而具有创造性的乌托邦思想，以及解放的神学的乌托邦思想，比起一种所谓现实主义的平庸的社会学所能够提供的思考来，有更多值得讨论的。通向这种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是漫长的，远超过（并且也不同于）第二、第三国际的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社会主义”将是构建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但是这还需要一些条件，我对此有三点建议。

第一，在社会进步的整个过程中，应该建立、维护并加强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这些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可能，甚至必

然是复杂的：属于国有的、地方集体所有的，以及劳动者或公民集体所有的。但是，为了使它们在担负所有责任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商品交易所应有的尊重，它们必须被视为真正的所有制形式（即使不是私有的），而不是权力含糊不清的表达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冯·米斯（von Mises）和冯·哈耶克（von Hayek）所提出的将所有制和私有制混为一谈的简单化模式。这种压缩/简化源于将中央集权的计划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搞混了。这两位对手都是如出一辙。此外，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并不排除对私有制的宽容，承认它们也有一席之地。不仅地方的“小企业”（手工业、中小企业、小型商业和服务部门），而且也可能是“大企业”，甚至和跨国资本巨头也能达成和解。只要明确一个允许它们活动的特定范围。

因为“所有者”（国家、集体、私人）责任的行使必须得到严格规范。所以我在此提出的这个第二点建议，用词无法做到十分精确，它只能在既考虑到转变中每个时期的实际需要，同时又考虑到社会主义前景目标更长远的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才可能被明确下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性质（尽管所有制有集体性质）的积累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逐步推行（首先是平等，在转变过程中进行全面整合，公共服务被赋予最高尚的词义），有着两种不同的需求，它们的组合是有冲突的组合，应该通过调整来予以协调。

我的第三点建议涉及民主，它与解放的概念显然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民主并非是个一劳永逸的程式，只要将之付诸“实施”即可，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让我更喜欢用民主化这个词。民主化必须通过不断复杂和丰富的程式，对不可

逆转的需求做出安排，这些需求可以定义为明确的“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法规）和“实质性”的需求。我的意思是，这种民主化进程的行为能力在于在所有层次和所有领域的决策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

苏联体制过去是否能够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以自己的方式摆脱中央集权的计划化和自我标榜为“先锋队”的国家-党的桎梏？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属于历史的了。但是历史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也不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而是相反，是试图在历史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延长体制苟延残喘的时间。

现在的中国已经超出此处所提出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范畴了，并且接受——原则上——私人财产取代集体和公共财产占主导的前景。许多反对现行体制的批评家，特别是中国的批评家，断言这个体制已经“不可改变”<sup>①</sup>，这并非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只要平等地获取土地的原则仍然得到承认，只要它仍然得到有效的实施，我想，对于还能够转向不确知的改革的社会运行来说，我可以断定，这还不算太晚。这同样也是威廉姆·韩丁（William Hinton）的观点。我将在下一章中作进一步的论述。

### 核心是土地问题

中国人口在2000年已经达到了12亿，其中2/3（8亿）人口居住在农村。有预测认为，到2020年，城市化将会显著地减少农村人口的数字，甚至能够降低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

<sup>①</sup> 原文为“dèjà trop tard”，直译应为“为时太晚”。——译者

这样简单的预测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

按照每年 1.2% 的人口增长率，到 2020 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到 15.20 亿。此外，我们承认，中国城市地区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能够维持 5% 的较快的年增长率。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增强竞争性的需要，当然要求这种增长不能仅仅依靠粗放型的积累方式来实现（目前是靠数目较庞大的“工业和服务业的积累”），而且还要有部分实行集约型的方式，同时极大地改进劳动生产率（以每年 2% 的速度）来实现。这样，城市就业增长率将达到每年 3%，从而使城市可吸收的人口达到 7.5 亿。这个数字将包括目前的城市人口总量，但失业的或不稳定的及非正式的就业的人口（这部分人的总量也是不容忽视的）除外。这部分人的比例将会大大地缩小（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一种简单的减法表明，8 亿中国农民——和今天的这个数字一样，但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则从 67% 下降到 53%——应该继续留在农村。如果他们因失去土地而被迫迁至城市，就将使贫民窟里的社会边缘人口膨胀起来，如同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情况。

一种更长时期——40 年——的预测进一步地印证了这个结论：即使根据最乐观的假设——现代化和强大工业化的进程不断继续，没有因政治或经济的、国内或世界的重大破坏性事件及出现不利的局势而遇到意外的干扰，哪怕是短暂的——人们有望看到的也只能是农村人口比例在缓慢地减少，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这远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第三世界，也就

是说占世界人口 75% 的人的问题。

农民的农业集中了将近人类的一半人口——30 亿人。而这些农业又分成不同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享受到了绿色革命（饲料、农药及良种）的好处，然而很少有机械化，其产量已达到每个劳动力 10000 ~ 50000 公斤，还有一部分尚处在绿色革命之前，每个劳动力只有 1000 公斤左右。受资本赢利原则支配的资本主义农业几乎只限于北美、欧洲、拉美南锥体国家和澳大利亚，只雇用了上千万个农业劳动者，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了。但是，因机械化程度（几乎在世界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及人均面积，他们谷物类的同等产量已经达到每个劳动者每年 100 万 ~ 200 万公斤。

只要再有 2000 万个现代化的农场，并且让它们拥有其必不可少的大面积的土地（既然用农场取代农民经济，无疑也要让它们选择最好的耕地），让它们进入允许它们自组的资本市场，它们就能够满足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农民产品的城市消费者的基本需要。但是，数十亿没有竞争性的农业生产者会怎样呢？他们将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可避免地消失。这数十亿人曾经是穷人中的大部分，但是好歹能养活自己，更确切地说，其中有 1/3 的人是艰难地维持着生活的（世界上处在生活维持线以下的人口有 3/4 是在农村），现在他们能干什么呢？即使假设这 3/4 人口每年增长 7%，按照 50 年产生一次或多或少带有竞争性的产业发展，也只能吸收这支后备劳动力的 1/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因其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而它唯一提供的前景就是全球的贫民窟化，并让数十亿人成为“多余的”人。

统治资本今后要实施的战略不止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的“圈地运动”。当前正是新一场资本扩张（“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方兴未艾之际，它将要摧毁整个人类社会。一边是2000万训练有素的新的生产者（加上家属5000万人），另一边是数以亿计的出局者。资本扩张有其创造性的一面，但这并不代表它不需要如芝麻换西瓜那样的破坏。因此，我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走下坡的衰退阶段；左右这个体制的逻辑不再有可能保证一半人口的生存。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野蛮，它直接诉诸种族屠杀。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由其他的、更理性的发展逻辑来取代。

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论据是，欧洲土地问题早就通过农村人口的外流解决了。为什么南方国家晚一两个世纪还拿不出一种类似的过渡模式呢？人们忘了，19世纪欧洲的工业和城市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多余的劳动力还可以大批地移民美洲。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它们希望像人们所要求的那样具有竞争性，就必须一上来就解决现代技术不需要太多劳动力的问题。资本世界性扩张导致的两极分化，剥夺了南方国家后来采用北方国家模式的机会。

怎么办？

必须承认，维持农民的农业完全是为了21世纪的未来。这不是因为对过去罗曼蒂克式的怀旧，简单地说，是为了解决问题，即通过对资本主义逻辑的超越，进入向世界社会主义漫长的数以百年计的过渡。这就特别需要设计出调节“市场”和农民农业关系的政策。根据地方条件的特点和适应性所制定的国家和地区的调节政策，必须要保护国家的生产，以保障国家



必不可少的食品供给安全，使帝国主义的食品供给武器失去作用。换言之，让国内市场价格和所谓的世界市场价格——如它们所应该的那样——脱钩，通过缓慢但持续不断地逐步提高农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得到控制。当然，从开创的前景来看，农民农业的发展和现代产业化的关联是可能并且也应该被考虑到的，这种开创，就是摆脱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特有的过度消费模式，因为这种过度的消费模式很难想象能向几十亿人推广。

“土地问题”还远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它成为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的核心。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将对历史的进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中国在这方面拥有重要的资本——革命遗产，这使它有可能成为各种应该可行的“范例”中的一种。事实上，获得土地是人类一半人口的基本权利，并且是他们生存的条件。这种权利并不被资本主义承认，甚至在联合国宪章里都没有被提到！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和越南）却仍然得到承认。放弃对这种权利的承认，也就是说，赋予土地以商品的地位，如同所有宣扬资本主义的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所提出的那样，土地商品化将“加速实现现代化”，这是极大的幻想。

农业现代化是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之一。但是农业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所有人放弃对土地的权利，而让少数人得到好处。这条道路必然使少数人的生产有很大发展，但却付出更多人陷入困境的代价。这种增长的方式对于留在原地或住到城里贫民窟去的全体农民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们最终可能会长期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不顾一切为资

本主义辩护的人对这一实事没有兴趣。少数人的积累和富庶是他唯一认识的法律，“没用的”人被排除在外，即使是几十亿人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

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展示了另外一条鼓励全体农民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尊重所有人的土地权）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产生比资本主义道路更好的结果（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选择这条道路当然不是因为策略而轻易做出的，干预工具和体制形式可能给它带来希望得到的最大效果，但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到处适用（总体而言，在中国各地也是如此），也不可能适用于改革的每个阶段。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和中国人民公社模式的错误——与中央计划体制相对应——正是设立了这些所谓最终解决的程式。我在这一点上与许多中国农民组织和威廉姆·韩丁的建议相同，这些建议主张，在目前阶段应该支持多样化的自愿的合作社运动。

无论人们愿意与否，“土地问题”仍然是现代化所面临挑战的主要焦点之一。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反差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因为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断产生的，它对边缘国家社会已经并将继续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选择“农民的道路”，并与“市场社会主义”阶段形成的其他环节密切配合，是唯一合适的首选解决方案，它将使第三世界摆脱“不发达状态”及因此使数亿人遭受日益加重的贫困的状况，改变他们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无足轻重的状况。

### **革命的积极遗产**

中国革命的遗产具有并将继续——毋庸置疑——具有值得

关注的重大影响。中国在近二十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堪称“奇迹”——平衡的并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规模巨大的城市化（城市人口新增了2亿），从取得的成就总体来看，其具备吸取先进技术的能力，但“奇迹”的发生并非偶然。如果没有革命为此准备好了的条件，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我曾经在以前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中引用过这个观点，并且曾经和几乎所有我尊重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过讨论。只有美国的帝国主义布道者及其欧洲和中国追随者假装对此一无所知。中国改革更有争议和备受指责的是其社会后果——社会和地区的不平等、失业和大批乡下人涌入城市，但与人们在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经历的、从同样堪称“奇迹”（永远不会有前途）的国家的经历中所看到的，以及其他所有国家到处可见的灾难性的景象毫无相像之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实事，并因此而低估了自己的成就。但是，中国和世界体系中其他的边缘国家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是谁都知道的，第三世界也不可能忽视。

“中国是一个穷人不多的贫穷国家。”中国以只占全球6%的土地养活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这才是真正的奇迹。但把它的主要根源归于中华文明的古老却是不恰当的。因为，如果说直至工业革命，中国的技术工艺在总体上确实领先于世界所有其他主要地区，但是在一个半世纪中，其地位却一落千丈，陷入极为贫困的境地，一如印度和其他因帝国主义扩张而遭蹂躏的边缘国家。必须注意中国革命对其复兴的影响。因为，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扩张而造成同一类型处境的国家中，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我想要说的是巴西：“一个只有穷人

的富裕国家”。

从人口和可耕地面积来看，也有一些和中国同样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仅就我所知，越南、孟加拉国和埃及与中国是相类似的。印度某些地区，或者爪哇，和中国的情况有相同之处，但作为整个国家来说，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度尼西亚，则是不一样的。然而印度、埃及、孟加拉国和几乎整个拉丁美洲（古巴除外）一样，其无法比喻的贫困状况对任何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来说都是极大的震撼。但无论是谁，穿越数千公里，从中国的富饶省份到贫困地区，访问众多的大城市，都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衰败景象，而这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和贫民窟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它激进的农民革命及其对平等获得土地权利的保证。

中国革命使这个国家进入了现代社会。中国社会已经完全是现代的社会，这表现在中国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意思是，现代化打断了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人们又由此开始考虑他们的历史责任。在中国，和其他思想、意识形态及行为举止受现代化主导的国家一样，现代化永远是个未完成的过程。这种现代化进程解释了在中国看不到别处——伊斯兰国家，印度教的印度、次撒哈拉沙漠非洲——所表现出来恶性膨胀的神经质的类文化现象。中国人生活在他们的现实当中，而不是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怀旧当中，这些重新编织的关于过去年代神话的怀旧，在其他国家已经成为精神会餐的特点。他们没有意识到“同一性”（*identité*）的问题。

不过，即使根据事实本身，这个现代化进程虽没有产生民主，但也创造了条件，否则是难以想象的。相对来说，资本主

义体系中的一些边缘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这一跳跃（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都属于例外，由于其原因复杂，我不准备在此作进一步讨论）。然而，当前的特征却正相反，这一方面在总体上呈现出可怕的倒退，由此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破产。“旧世界自我毁灭了，新的世界还没有诞生，在黑暗与光明交织中出现了许多怪异的影子”，葛兰西曾如此写道。在这方面，关于所谓文化遗产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民主的主流话题，只是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因为这些讨论忽视了现代性造成的断裂，而赋予所谓的“文化”具有跨历史的不变的特征。席卷中国的现代性对其未来是非常重要的资本。我不知道，这种现代性在中国是否会足够快地产生出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并找到与之相符合的形式。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民主与社会斗争的衔接。

革命和投身于现代性比当代第三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多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国的大众阶级对自己很有信心，他们善于斗争，也知道斗争的代价。他们已经大大摆脱了屈从于人的姿态，对于任何一个诚实的观察家来说，屈从于人的表现在那么多的其他国家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实。平等已经变成了市镇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观，如同在法国（它也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一样，而美国却不同（它没有经历过革命）。这种深刻的历史变革，总的来说都表现出鲜明的战斗精神。日常所见的不计其数的社会斗争常常采取激烈的形式，而且并不总是以失败告终。国家权力对此很清楚，同时也采取镇压手段，努力避免聚集成跨地域的斗争战线（通过禁止大众阶级的自治组织），通过“对话”和欺骗手段减少危

险。大部分西方“人权”卫士对这些社会斗争不屑一顾。他们对为阶级的斗争而服务的民主不感兴趣，甚至某些人还为之感到不安。相反，所有人一贯为之辩护的，向我们喋喋不休地灌输的民主愿望，却是国家权力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道德，而试图减缓其毒性发作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愿望！

### 民族的问题

民族问题同样在关于中国的争论及不同改革路线拥护者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占有核心的地位。

中国 and 所有亚洲、非洲的国家一样，是 1848 ~ 1949 年西方和日本列强不断发动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这些侵略者懂得与反动的当地统治阶级——“大地主”、买办（这个词本身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来的）和军阀——订立联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使中国恢复了自尊和统一（除了至今唯一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国家太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地方主义，但是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个现实（我对此感到庆幸）。只有涉及藏族和维吾尔族的民族问题引起了争议（虽然我不同意所谓“民主卫士”赞美喇嘛和毛拉——并为之提供帮助——的观点，且不说喇嘛和毛拉的蒙昧主义，他们在历史上曾经以最野蛮的暴力手段剥削自己的人民，直至中国革命后，人民才得到了解放）。在民族问题上，帝国主义不择手段地利用了制度上的弱点。

我想稍微进一步地谈一下我的直觉感受。我曾经有机会和一些不同职务的中高层领导（也有些更高层的领导）就各种各样的问题交换意见。我的直觉（过于笼统了？）是与其说他们对权力感兴趣，不如说他们更关心发展经济的问题，但是，这

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一点上是非常清醒的，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这些人普遍都认为华盛顿的霸权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就民族和国家而言，而不仅仅因为是“社会主义”）。他们相当随便和经常地说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们的说法和我在苏联政治领导人（以及更不必说<sup>①</sup>那些前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那里听到的说法（似乎是出于自信）之间有很大差异，这总让我感到很诧异。后者总让我觉得他们完全不清楚华盛顿及其跟班的西方盟国的真实目标。戈尔巴乔夫1985年在雷克雅未克发表讲话，宣布——天真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对苏联敌对状态的“结束”，这种观点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此后不久我在北京偶然谈到这个问题。所有中国人都被这种愚蠢的讲话惊呆了，并且毫不犹豫地认定：美国霸权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中国人对他们国家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强烈意识。国家的名字——中国——是任何一个特有的“种族”也无从参照的；国家的衰落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把目光盯着外部世界的“模式”，在他们看来，这能够使它们发现，为了恢复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情。自1919年5月4日以来，这种模式就是日本模式（受它启发的是国民党），就是俄国革命的模式（由于它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号召全体人民进行革命的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而最终被接受）。现在，日本陷入了危机，俄罗斯一落千丈，欧洲自己只会一味仿效美国，中国的危险则在于，通过“美国模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文：a fortiori。——译者

式”无法实现现代化和进步，从而陷入它的竞争对手如昨日之日本的境地。中国是一个大国，总是要与更强的大国比较。

我并不想低估这种看法所包含着的极大风险。新生代沉浸在对“美国友谊”的幻想里。这更让人忘记了关键性的重要一点，这就是重建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以遏制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因为在追随华盛顿战略的欧洲领导阶级的背后，还有人民，欧洲领导阶级追随美国是因为他们只关心维护“三合会”新集体帝国主义统治资本的共同利益，而欧洲人民的现代观念并不是世界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希望他们接受的。在第三世界中那些穷途末路的买办政权背后，是昨天——在不结盟运动和亚非人民团结的年代里——曾经抵制过帝国主义的人民。由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坦赞铁路），是将南部非洲从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物质依赖中解放出来的独一无二的重大创举，中国医生深入非洲最偏远的乡村，为当时的中国赢得了巨大声望。让面临美国霸权主义野蛮侵略的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今天反对帝国主义战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必要的。这也是不再让萨达姆·侯赛因和本·拉登占据抵抗帝国主义舞台前沿的重要条件。

**所有伟大的革命都会伴随着倒退（reculs）、“复辟”和“反革命”，这不足为奇**

但是，如果这些倒退是重新拨正了时钟，那么它们并不能消除产生更多革命梦想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只有小革命（les petites révolutions）才会自夸“获得了100%的成功”，然而并没有自发地产生出值得记载的社会重大事件；假如这样也能称



之为革命的话，可以算上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够光荣）和所谓的美国革命，后者除了将最终决定权的政治权力从宗主国转移到各个殖民地手里外，对殖民主义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改变。

然而倒退总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它对俄罗斯的威胁是使得俄罗斯国家自身几乎消亡，直到现在还看不到恢复正常的迹象。它对中国的威胁是使得中国陷入没有前途的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泥坑。列举现实中这种危险已经非常明显的消极现象并不难。中国新生阶层中有人与当代第三世界买办资产阶级一样，并不缺少自私和庸俗。虽然他们并未（尚未？）占据政治舞台的前沿，但并不缺少影响决策的手段（其中包括行贿）。新生中产阶级中有的年轻人异乎寻常地呈现出相同的“美国化”，直接从表面上看这无疑是很浅薄的特征，但其背后隐藏着却是严重的非政治化倾向。在苏联，年轻工人曾被派出去学习生产飞机发动机。而现在这些新生中产阶级的子弟们去美国却是学习酒店“管理学”！

### 三 前途未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社会主义的斗争尚未胜利，但是也并没有（尚未？）失败。依我所见，终有一天，中国体制将放弃土地权，并将其归所有农民所有。到那时，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就能够改变改革的进程。政治领导阶级只能尽力控制这些斗争。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总体上并没有决心要为民主而斗争，它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亚洲方式”

的专制模式，只要这种模式能让消费者的欲望越来越大。为捍卫经济和社会权利而斗争的是大众阶级。但是它们能够做到团结战斗吗，能够创建适当的组织形式、提出切实可行的纲领并确定为其所用的民主的内容和方法吗？

这就是为什么在构思关于未来的故事剧本时，必须要考虑到三个群体的原因。与之相对应有三个场景，分别体现了三种计划：（1）国家分裂和沿海地区买办化的帝国主义计划；（2）“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计划；（3）国家和人民的发展计划，将互为补充和相互冲突的市场资本主义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社会主义逻辑纳入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前景中，使之成为这个面向未来的计划在目前的一个阶段。

放弃市场调控和无限制开放的主张——中国和外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是对帝国主义的战略有利的，它突出显示了非政治化倾向和大众阶级暗中不满情绪存在的原因，与此同时，中国民族与国家在对外关系上进一步的脆弱。它显然不能带来任何一种民主化的进程。而且，这种选择也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受“三合会”新帝国主义发展逻辑的控制并从属于它的边缘国家的地位。从第三种计划中分离出来的第二种模式，似乎很难用一种一目了然的简明方式给它定性：在对外关系上充分自主，再分配的模式维持在社会和地区团结所能接受的水平上。但是，事实上，这是性质不同的问题，而不是国家政策实施方法的能力大小的程度问题。真正的讨论是找出其最终之根本。进步的选择只能建立在优先扩大内部市场上，建立在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和不平等。因

此，对外关系要服从这种牵引逻辑的需要。与之形成对比的选择是，主要在经济发展的驱使下，不断深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里去。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的不平等，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日益加重。就这些方面来看，取舍余地只能是非常狭隘，除了选择“民族资本主义”，它有望使中国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新的强国，甚至是能迫使那些现在的超级大国放弃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但是，任何一种内在选择余地有限的政治权力都很难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住它的航向，特别是这种远景目标所产生的战略，很难不发生改变，它或者会倒向右边（并以服从帝国主义计划而告终），或者会倒向左边（向第三种模式演变）。

## 第三章

# 俄罗斯：走出隧道？

关于欧亚大陆（以从波兰到中国为界）在世界体系形成各阶段中所占地位，我曾提出过我的看法，并分析了俄罗斯帝国及后来苏联试图复兴所面临的挑战 [见《全球化的挑战》，哈马坦（l'Harmattan）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八章，《世界体系中的俄罗斯：地理或历史?》]。现在，我要分析作为后苏联的俄罗斯今后将要面临的挑战。近 15 年里俄罗斯所经历的转型，尽管似乎显得规模宏大，但本质上并不是一次“革命”（或者是一次“反革命”），而是反映出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苏联体制自身一些深层的趋势进一步加快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指出苏联已经不是（或不再是）1917 年革命的发动者所希望的“社会主义”了，并不能让我感到满足，而我要说的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我曾在《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对此作过概括），并注定会变成“正常”（即和其他资本主义一样的）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新的领导阶级（即使它本身来自前政权）的计划，尽管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那样，已有体制的现实远不能适应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计划。我将更深入地进一步研究苏联体制（作为世界体系中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一体化模

式)的特点,及其在新俄罗斯国家中已被破坏但仍有残存的特点。

## 一 苏联体制的基本特点

我将紧扣主要脉络来进行分析,这能使我抓住为什么苏联体制在最后阶段会变成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问题的本质。1917年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曾被寄予众多必不可少的厚望,但是,本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其作如今很时尚的清算式的批判而回顾历史,更不是让我们在此了解革命已众所周知但需要强调的主线,或是列宁主义,甚或是斯大林主义。选择这种有重点的分析,只有一个奢望,就是要弄清楚当前失控的性质及今后原苏联人民将不断面临的挑战的性质。

我认为,苏联体制有五个基本特点:行会主义、专制政权、社会稳定、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及其作为超级大国对这个体系的介入。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说教庸俗化了的“集权制度”概念,无论用在哪儿都显得平庸和空洞,无法说明苏联社会、管理模式及其传统的真实情况;这些传统仍然影响着当前的改革和转型。

1. 行会主义制度。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同时还由于国家权力实施政策的意志,以及加速工业化导致职工人数急剧膨胀的客观条件,工人阶级(曾被看作是“领导阶级”)失去了统一的政治意识。每个企业——或一个联合企业内的企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及其干部和领导都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集团”,并在体制中共同捍卫他们的地位。这些“集团”在

部长们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各部门的“谈判”（讨价还价）中、在联合企业相互之间日常关系中等各个方面相互对峙。退化为管理工作（就业和工作条件）和职工社会福利的工会，可以从行会主义体制中找到它合理的位置。

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行会主义在整个生产体系的再生产和扩张中起着关键作用。它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取代：（1）取代了资本主义最终影响投资决定的“赢利”原则；（2）取代了资本主义的价格永远是决定因素的市场准则。行会主义造成的事实是，“计划化”充斥着自以为在生产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上是“所谓科学理性”占主导的自负。

行会主义导致地方主义在竞争集团之间谈判/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更突出。这种地方主义并不是“民族”多样性（如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联盟那样）的主要依据。俄罗斯民族——在人数上和历史上均占绝对优势——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关系的性质。这可以从投资和社会福利分配的流向上得到证实，它们向边缘地区倾斜，而让“俄罗斯人”吃亏。在这一点上，我反对那些将苏联看作一种“帝国主义”体制、俄罗斯统治着其“内部殖民地”的无稽之谈，尽管俄罗斯民族有“优越”感（甚至表现得有些傲慢）。波罗的海国家可能将会知道，它们是用在苏联享受的优惠地位来换取在欧洲联盟内的从属地位！我们所讨论的地方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小地区（在它们所属的一些共和国内）的地方主义，这些小地区在全球体系内有着共同利益需要捍卫，这个全球体系能够确保其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在实际上永远比国家计划委员会合理化的推论所追求的体系更为不平等。

2. 专制政权。使用这个名词并不意味着减轻对体制的批判。不论是在代表制类型（选举仅仅是毫无悬念的仪式）中，或从性质上说更先进的，如1917年的革命者所设想的参与制类型中，人们都不难看到“民主的缺失”，工会和所有可能的社会组织都被驯化了，并因此而被禁止参与各个层面上的实际决策。

但是，这种观察并没有给予“极权主义”的伪概念任何有力的解释。专制政权在由行会集团代表们组成的领导阶级内部一直被争论不休。表面的专制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是确立在行会冲突的“和平”决议上的，它们懂得相互克制。

此外，对提到的这些冲突的专制管理，必然是覆盖各个地方层面的。体制的逻辑包含着一种权力层层楔入的金字塔结构，通过各加盟共和国，（永远是专制的）管理着从地方到联盟的各种利益。其中的地方利益往往并不必然具有“种族性”，但它容易引起联盟的分裂，并威胁到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首先就是俄罗斯），这些共和国今天已经成为中央政权面临的一种危险的挑战。

3. 社会的稳定。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苏联体制建立过程中伴随着的极端暴力。但这些暴力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主要的冲突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捍卫者在革命的出发点上与“现实主义者”不同，后者是在实际上而并非是口头上，对通过加速工业化—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的考虑给予绝对优先的地位。这种冲突是客观矛盾的必然产物，革命在出发点上是有差异的：因为革命继承的是一个“落后”（我不喜欢用这个词，宁可称其为“边缘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就必须“赶

上”（或者至少是缩小差距），同时又必须要完成“另一个任务”（社会主义）。我之所以强调这种矛盾，是因为我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超越资本主义，而不是让它在苏联重现。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诉诸暴力的原因，其受害者是共产党党员。

第二种暴力情况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而来的。这种暴力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在资本主义形成中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大量人口从农村往城市迁徙、无产阶级贫困化（住房拥挤等）。无论如何，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相比较，苏联在最短的时间内——几十年——完成了这一建设。而西方国家还另外拥有帝国主义统治地位，以及可以让“剩余”人口移民美洲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原始积累的暴力似乎并不比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更严重。其实正相反。因为在苏联，加速工业化导致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大众阶级的子女受惠不浅，这在其他由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里是没有过的。正是这种“特殊性”，不管怎样也是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愿望，赢得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甚至是“集体化”的农民对体制——尽管是专制体制——的支持。

还需要补充的是，我们不能忘记，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从外部对其实施的暴力行为：军事干涉、作为最野蛮代表的纳粹的侵略、经济封锁。

苏联体制尽管是个悖论，但它是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也确实是稳定的。社会的太平是通过权力——尽管始终是专制的——使用的节制，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及对“非法”脱离的容忍“换”来的。



毫无疑问，这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不是“永恒的”。但是，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有这样的优势，尽管各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都自以为是。苏联的稳定掩盖了体制的矛盾和局限，这种体制概括地说，它很难从粗放型积累过渡到集约型积累，如同它很难摆脱专制并允许政治民主化。但是，这种矛盾能够通过朝着我称之为“中左的”方向进行“改革”找到它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开放商业市场（但并不排斥集体所有制占主导的形式），实行民主化。这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这个在诸多方面显得天真并缺乏协调的尝试失败了，并从1990年起使制度倒向了“右”边。

4. 苏联体制的自成一体。苏联的生产体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不相通的。由此，我认为，主导国家经济决策（投资和价格）的逻辑无法适应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实行“开放”的需要。但是，正因为这种自成一体使得体制，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得以快节奏地向前发展。

然而，这个体制并没有“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世界”。任何一个体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按我定义的概念，自成一体并不等于“自给自足”。在向世界的楔入中，苏联占据的只是一个“边缘的”地位，主要是出口原料。

5. 军事和政治超级大国。由于苏联在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而不是失败——终于使它跻身军事超级大国的行列。正是打败纳粹的苏联军队在战后最短时间内结束了美国在核武器

和弹道导弹上的垄断。这些成就是它在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存在的原因。苏维埃政权额外地得益于它打败纳粹主义的胜利及其声称这也是“社会主义”胜利的证明所带来的威望，无论是否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现实（常常被看作是“真正的存在”）有何错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反苏宣传的断言正相反，苏联一向表现得“有节制”，既不“输出革命”，也不去“征服西欧”（华盛顿和欧洲资产阶级为使人们接受北约而借用的不存在的理由）。然而它为迫使帝国主义统治退出第三世界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为亚洲和非洲统治阶级（及其人民）开拓了实行自治的空间，这种空间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了。这并非巧合，众所周知，美国粗暴的军事化的霸权主义攻势正是从1990年开始的。苏联的存在使得世界——从1945到1990年——形成了多极化的结构。

## 二 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新形式

我毫不犹豫地用这样的表述方式来做这一节标题，是为了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我在用这后一种表达方式时和大家是一样的，因为主流话语已经给它做出了定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不应该属于任何严肃的思考；因为它只是一种（低级的）意识形态的修辞。“极端新自由主义”非常明确地意味着“温和自由主义”的回归，因为西方和东方都认为这一领域的极端主义已经破产。不过，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话语中，“自由主义”属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一种用来躲避对实质性问题进行检验的意识形态工具。“自由

主义”许诺要一次性解决“效率”（没有定义的）、“民主”“和平”，甚至是社会公正的问题！但是，以“自由主义”之名实施的实际政策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几乎是正好相反：经济停滞（对某些国家来说是倒退），战乱不断，不平等日趋严重。但这有什么关系，人们被劝说“再等等”……

苏联体制的崩溃，更加上第三世界民粹主义的崩溃，及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受之牵连而衰退，帮助了所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大批皈依其学说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在俄罗斯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我还注意到一种幻想，按照这种幻想，俄罗斯将因为奉行自由主义而同时有效地（最终）加速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如同德国和日本“输掉了战争却赢得了和平”一样。人们忘了——或者是假装忘了——华盛顿的目标是不容许一个强大的（即使还比不上强大的中国的）俄罗斯复兴，即使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予以摧毁。

15年的“改革”能够以在俄罗斯确立其“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告终，并由此真正地使国家走上自由主义的希望之路吗？现实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苏联已经解体，现在轮到俄罗斯受到解体的威胁了，没有任何一个现有机构（私人企业及其国家）进行必要的投资，以改进生产系统的效率（相反非投资性的则很多），而曾经被积极地付诸实施（特别是在教育上）的苏联体制遭到系统性的摧毁，并不象征着“美好的未来”。人们不明白，一个拥有这些特征能够保持其“稳定”的体制，怎么会听任其稳定性一下子就跌到不幸和完全无奈的境地。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新形式凸现了——而不是缩

小——已经到了衰落最后阶段的苏联体制的特征。

**作为当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附属的边缘的新俄罗斯**

“开放的”俄罗斯不仅仅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首先是石油）；它也不再仅限于此。它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体系没有受惠于官方的任何关照，不论是本国的私人企业还是外国资本都对此没有兴趣。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投资来帮助它们取得发展；它们只能以基础设施不断恶化的代价来苟延残喘。技术创新能力——及作为苏联制度基石的优质教育——受到了系统性的破坏。

谁为这巨大的倒退负责？

当然，首先是新领导阶级。它本身绝大部分是来自苏联原来的领导阶级，这个阶级毫无疑问因使它受益的私有化/抢劫而令人难以置信地一夜暴富。这个新阶级集结在一起还因为其采取许多非大众化的措施，故“寡头政治”这个词非常适合它。这里的寡头政治与拉美无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个阶级的财富有三个来源：石油收入（同时也取决于世界形势，即原油价格的涨跌）、拆分工业（私营工业企业并不被看作是更重要和更有效的生产基础，而只是因为寡头们允许它们存在而得以苟延残喘）、参与打开国家进口市场的佣金。年金和佣金永远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特点，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因此而受益的帝国主义积极推动这个国家沦入次要的边缘行列。这正是美国对俄罗斯（及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计划的主要内容：使它们沦落为去工业化的、次要的并因而也是虚弱的边缘行列，使原来的苏东（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拉美

化”。根据情况采取相应不确定的方式，对于有过革命经历的国家（俄罗斯和南斯拉夫）是在整体上予以摧毁，对于“保守的”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等）则采取更为温和的使其归属的政策。

当然，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当政者拥有共同抱负的前提下，帝国主义“三合会”不同合作伙伴之间也可能展开某种竞争。谁将是这种拉美化的主要受益者？美国还是欧洲（西欧）？目前形成的妥协是，东欧拉美化使德国成了主要受益者，而俄罗斯拉美化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北约（美国施展霸权主义的用武之地）、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鲁塞尔（其自由主义的取向使得国际贸易组织的自由主义得到了加强）实际上负责“管理”着这个不对等的体系。无论如何，集体帝国主义政治责任的管理仍然充满着矛盾，对此，我将另作分析，在此暂且不提。欧洲和美国的竞争正是在这种管理上展开的。华盛顿拥有许多不容忽视的王牌，其中最突出的是伦敦不可动摇的大西洋主义取向，同时还有东欧奴性十足的统治阶级的大西洋主义取向。而欧洲在这一点上则已经听任机会错过，它本可以通过与俄罗斯接近来加强它在与美国关系中的自主性。

寡头暴富导致了新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他们被形容为“新俄罗斯人”。他们从事的职业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是因寡头们的消费而产生的。相反地，原来普遍更有资格并肯定属于生产性的、专业型和技术型的旧中产阶级，则和大众阶级一起成为买办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此外，独享国家慷慨施舍的寡头垄断，也遏制了真正有创造才干的企业家阶级形成的可能性，它们受到当局和各种寡头帮派的围剿，由此更不可能“从

基础开始”（par en bas）构建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言论断言，这个体制下的“成功者”是最优秀和最有创造力的个人，而“失败者”则来自“最缺生产性的”工人，这是经不住认真推敲的。事实上，新俄罗斯所有的生产工人都已经成了“失败者”。相反，“成功者”只是个寄生阶层，是俄罗斯生产体系恢复的障碍。

### 不负责任的专制政权

新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形态排斥一切民主的进步。专制不再是一种“历史遗产”，而是新的买办寡头行使权力的必要形态。为此，1993年宪法确立了使国家杜马（选举议会）权力化为乌有的总统制。如人们所知，西方政府假装不在意；它们收起了对“民主赤字”的指责，只要制度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它们就同意那些为此而实行的专政！

新的专制有别于老专制之处并不在于此：它行使权力的特点总的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为寡头服务的专制参与帮派之间争斗，即使知道其所提供的服务是有代价的。此外，这种专制也在为世界性的卖方控制市场（oligopolistique）的外国资本服务，对市场操纵不作一点儿抵制，而这种操纵正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是北约的所作所为！最近普京和某些寡头的冲突并不意味着体制结构开始发生改变。普京的目标仍然是有限的：首先是加强圣彼得堡寡头小集团（新总统的基本拥趸）的地位而打击其他寡头小集团，其次——如有可能——使体制“合理化”，将专制的总统制国家官僚机构与其并未放弃为之服务的寡头阶级更清楚地分开。人人各司其职，但唱的是同一台戏。

“俄罗斯人民”要对这个失败负责任吗？毫无疑问，由于他们在苏联体制突然崩溃（有时候是摧毁性的打击，就如第一届民选议会的情况！）之后茫然不知所措，因而是有部分责任的。新的政党没有任何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使它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新“右派”的确善于使用蛊惑人心的华丽辞藻，并通过被收买因而为其效劳的媒体而进一步放大。实际上它们是由旧体制中不负责任的某些个人小集团转变而来的。但在一种足以证明俄罗斯人民高度政治化的、智慧的舆论面前，它们的吹嘘很快就失去了市场。因此，新“右派”很快就成了拥护新的官僚专制政权的奴仆。

共产党拥有虽占少数但比例较大选民（将近50%）的支持，尽管它因此还有希望，但却既不能开展改革（并摆脱其权力独裁的历史包袱），甚至也不能抵制新的专制政权的压力。相反，它安于现状，并承认俄罗斯人民所拒绝的新宪法。随后，它试图让人忘掉它愚蠢的懦弱，以及因这种懦弱在创导一种模棱两可的“民族主义”言论中所造成的许多重大错误。可是，初生的左翼政党不仅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种突破可以置新寡头政治的计划于死地，反而迅速地蜕变为远离大众阶层的知识分子小团体。

### 退化和衰弱的行会主义

面对迟钝和衰退的共产党，工会本来应该能够形成有效的轴心。因为工会至少保存了12年，并得到了数以百万计的会员的支持。

工会领袖们的重大错误就是，相信曾经束缚它们的旧行会主义能够保证它们“继续存在”。确实，客观形势很容易让人

做出这种错误的判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受到新寡头政治体制排斥的企业领导和干部在为了生存而生产的日常斗争中，仍然站在“工人一边”。某些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单方面地怀有一种幻想，认为只要实行他们极力推荐的三方（雇主、工会、政府）联合，就有可能形成某种积极的“历史性和解”。这些理论家发动了一场迟到的战争——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自己已经开始转向了自由主义——而且他们也不了解俄罗斯正在形成中的边缘资本主义模式，是排斥任何“社会的”管理形式的。

工会领袖们的怯弱及其满脑子的幻想并不能阻止社会斗争到处发展——罢工此起彼伏——并经常使政府做出让步，如在铁路员工的抗议威胁到国家生活的情况下。但是，这些斗争并没有达到对工会管理模式进行必要修改的目的，以及“新左派”的小团体企图在独立工会的基础上重造工人生活的目的，而新闻报道更关注的是那些成功的轶事。

这种有着诸多不利因素的三方联合最终以工会组织开始衰落而结束，这种衰落在近几年来更为明显。工会在苏联体制中曾经行使的社会服务功能遭到破坏，使得人们进一步对工会失去了好感。

### 不受控制的地方主义

标志着苏维埃主义衰老的地方主义已经走向毁灭性失控的阶段。旧地方主义是可控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由国家意志所致，而更多是由于苏联专制政体对接受规定的和解给予负责的关注。

相反，不负责任的新专制政体的小集团则相信，地方主义



只在它们谋求眼前利益时是有利用价值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失控走得太远了，如在车臣悲剧中所表现的那样。

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严重问题，毫无疑问特别是那些俄罗斯联邦的“非俄罗斯人”地区，没有人会忽视其存在。“外部势力”一直试图利用这些问题——其中当然包括美国及其伊斯兰盟友对车臣的利用——没有人不对此怀疑。但是，莫斯科却承担了破坏局势的责任。绝大多数车臣人拒绝“伊斯兰主义者”分裂的号召。但俄罗斯当局却放弃了对这些多数人的支持，并断然采取了“军事干涉”，毫不担心这种选择的严重后果。可以确定这是寡头政治的小集团（比方说那些对北线运输里海石油的输油管道感兴趣的小集团），及国家官僚机构（重造“俄罗斯人民的团结”并在面对“外部敌人和恐怖分子”时获得他们“无条件”的支持）的拙劣伎俩。还可以确定的是，恐怖分子对莫斯科及其盟友的袭击——并不能证明是车臣人所为——起到了和“9·11”事件相类似的作用，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布什政府利用了“9·11事件”。

在这件事上，普京政府同样没有表现出与叶利钦政府习惯做法的不同。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和第一次一样以失败告终，并且以同样的方式被前后两任总统所“利用”。

人们信任普京，因为他对各地方政府的领土结构进行改革，其目的是要扑灭地方主义的动荡的火苗。但是，改革仍然受到专制原则所左右（通过任命行政长官方式当选的地方长官增加了一倍），并放弃对有关地区人民的支持（这将会有风险，因为他们抵抗寡头政治压力的能力将因此得到增强）。已进行

的改革实质上并不有利于恰当地解决公开或潜在的冲突。

### 被淡出国际格局的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已经在 G7 中有了一个加座，G7 变成了 G8（或不如说是 7 个半）。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推动世界平衡的重要角色。表面上它拥有着可观的强大军事力量，其核装备和弹道导弹也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它的军事组织一塌糊涂，以至让人担忧，在必要的时候，即在遇到美国袭击的情况下，它将不能有效地得到使用。

不言而喻，对未来的世界体系来说，这种淡出本身就是个问题。一方面，某些欧洲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政治矛盾；另一方面，美国还在“三合会”的集体帝国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可能使大西洋主义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属于哪个“阵营”呢？或者，在美国与某些南方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毫无疑问，目前是不会有问题的：欧洲仍然是大西洋主义，尽管某些国家牙咬得咯咯响，心犹不甘。虽然俄罗斯可以像中国那样，和法国、德国一起拒绝授权华盛顿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这个姿态也并没有引起“敌友关系逆转”。莫斯科仍然被拴在美国的战车上，尽管有某些抵制——温和的——表示。华盛顿没有搞错，在有案可查的各种评论中，只有法国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军事存在，及其近来对格鲁吉亚局势的插手和在伊斯兰威胁问题上的骗局，到今天为止，已经逼得俄罗斯在国际重大游戏中出局了。俄罗斯如果要阻止美国计划（即使俄罗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成为附属的边缘国

家)，就需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南方阵线”的重建中发挥作用，并且，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但它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它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沉迷于和美国结盟的幻想，要与美国共同防御北京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可能产生的扩张主义。这等于俄罗斯支援了华盛顿竭力孤立其“主要潜在敌人”（北京）的战略。可以肯定，俄罗斯将不会因此而得到回报，相反，它对美国的帮忙只会让它自己受到削弱，并加快其向附属和边缘行列坠落的过程。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有利于美国的平衡（或不平衡）都是脆弱的，而它对伊拉克注定失败的干涉也早晚有一天以重新被质疑而告终。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俄罗斯外交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我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它是构建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的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 意识形态的迷失

苏联的意识形态充斥着对所谓“社会主义”的赞美，直到最后一天，从来没有放弃过。苏联政权甚至到衰败的最后时刻也知道要坚持1917年革命的合法性。人们可以对此愤怒，或甚至给予嘲笑。但是，这种赞美和苏联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比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空谈的差距更大。就像另外有许多普通人赞同自由主义的空谈而不管它在发展中带来的社会悲剧，“社会主义”的空谈直到最后一天还有其信徒，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过来说，新寡头政治专制有理由反对苏联的空谈。但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替它。对所谓构成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效率和民主的吹嘘，在俄罗斯并没有可信度，如果是在东欧则可能会

有。于是，“爱国主义”论调成了这个最终陷于绝境的政权的唯一救命稻草。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赞美是用来逃避现实的问题（社会的不平等、1917年成果受到破坏、新式经济管理毫无效率、国家的国际影响衰退），同时要求“整个国家在他们的领导人背后团结起来”，并表示他们正在“抵抗”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资本。所有领导现代边缘国家的买办阶级都试图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的形象，然而正是它们要对牺牲国家利益的衰退负责，并且事实上像传送带一样，将（外国的）国际资本的控制引到国内来。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爱国主义在俄罗斯当然是必要的，如同在别的国家一样——而且在面临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式的全球化挑战的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只有在形成为全体劳动者阶级服务、以自己为中心（当然同时也是开放的）发展道路的条件下，爱国主义才能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因素，而不是一种蛊惑人心的骗人的赞美，如同俄罗斯新政权奢谈的那样。

无论如何，俄罗斯新政权所采用的意识形态论调对它的人民并没有实际作用。这个政权对于其应尽职责无所作为就是证明，它在选举中越来越求助于大规模地公开作假。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与一个毫无合法性和可信性的政权在打交道。或者还可以说，这个俄罗斯新资本主义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个重心来稳定它的政权。

反对党的缺点同样也表现在意识形态词语的贫乏上。（共产党的）共产党员们赞同当局的“爱国主义”论调，但几乎没有一点更具体的内容。有点像伊斯兰国家中那些受到伊斯兰

主义浪潮“威胁”的人，他们在政治伊斯兰<sup>①</sup>所选择的立场上会喊得更响，他们相信用这种方法就能够免遭祸害。另外一些反对党祈求于“欧亚主义”，也就是既反对美国又反对欧洲的一种民族主义，提倡靠拢亚洲（中国、印度、伊朗）。毫无疑问，这种靠拢是建设有选择的全球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但这并不是需要一种类意识形态的理由，这种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它几乎完全不赞成现代普世主义，虽然现代普世主义起源于“西方”，但在今天，它已经被帝国主义体系的现实所扭曲，特别是它以西方为中心也是值得怀疑的。

毫无疑问，从重建社会主义角度，为了向前发展而以批判左派苏维埃主义为起点，所做的严肃的决策选择，在俄罗斯是有有利条件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些观点并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而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 三 今天的俄罗斯还有特点鲜明的选择吗？

我前文描述的俄罗斯形势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来说，可能是太悲观了。实际上，俄罗斯新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创造保持其稳定的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反过来便应该是使人乐观的理由了。在莫斯科常听人说，俄罗斯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如同1917年前夜。这或许是能够扭转发展方向的激

---

<sup>①</sup> 政治伊斯兰的概念使用非常混乱，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看法，在许多情况下，它具有宗教激进主义、激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政治复兴主义、哈里发主义、宗教民族主义、伊斯兰行动主义、“穆斯林政治”等概念的内涵。——译者注

烈的转变。地区和世界的前景将会如何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呢？

目前世界上现有体制的选择所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简单而明了的，并且在被引用时也能够得到广泛的理解。在对内方面（“国家的”）：（1）“混合经济”，一方面让国家拥有指导总体发展方向的手段，另一方面为私人产业和市场提供能够鼓励其积极性的足够的空间；（2）工人-雇主-政府三方社会谈判的制度化；（3）通过鼓励参与制民主的积极性，深化代表制民主。在世界方面：（1）在承认不同利益的存在及合作者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就多种经济管理问题（商业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货币管理）进行谈判；（2）承认各国人民主权原则，并通过支持民主化进程使之得到加强，使之成为多极化世界的政治基础。这些原则的全面实施将有可能开创“世界向社会主义长期转变”道路的初级阶段。

当然，这些原则对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或俄罗斯，德国或刚果）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各自客观情况的不同，它们对具体词义只能有自己的理解。

对于俄罗斯来说，它需要做的是：（1）大型企业的重新国有化，特别是在石油和能源、采矿工业及银行领域（剥夺寡头的所有权）；（2）在工商企业中实行（工人和领导者）代表人数对等的新的管理形式，不论它形式上是公有的（国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及工人集体所有的），还是私有的；（3）重建并加强公共社会服务、教育（曾是苏联的亮点）及科学与技术研究事业；（4）废除 1993 年宪法，并通过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5）支持多种形式的民众广泛参与的

参与制民主；（6）在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举行正式谈判，以建立一种尊重合作者自治权的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空间，并能够重建使所有合作者受惠的相互依赖关系；（7）重建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面裁军之前，一旦得到实施，届时美国也将不得不遵从）；（8）为启动“大欧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建设，鼓励就商业、技术和财政交流进行谈判；（9）鼓励实行以加强建设多极化世界的保障制度为目标的、积极的、独立自主的（特别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从目前预见可选择的全球化前景来看，各合作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仍将取决于彼此不同的特殊情况。俄罗斯的地位将既是一个原料（石油和矿产）生产和出口的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复兴的工业强国，它并不一定要依赖在所谓“开放的”世界市场上提升“竞争力”给它带来的运气。与此相比较，中国的地位是一个新的工业大国，其生产将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而其出口则只是次要的（与世界贸易组织竭力推行的原则正相反）。这种选择似乎意味着中国将和亚洲及非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在承认所有农民拥有土地权（在此我再次强调我曾在前文对此问题所做的分析）的基础上，恰当地解决土地问题。当然，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同样也认识到土地问题不可能像世界体系中发达的中心国家那样，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决。但是，此处提出的问题，其具体情况与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特有的情况很不一样，其相应的解决方案也大相径庭。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Evgueni Primakvo）政府确实曾经推动此处所说意义上的复兴，并且似乎态度坚决，同时他所采取的最初举措也非常谨慎（这并不难理解）。如同戈尔巴乔

夫想做但不知道怎么做的那样，普里马科夫打算构建一种“中左”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但是，普里马科夫首先成了共产党无能的牺牲品，尽管当时他很能干，理解并支持创新。其次，他也是国际上敌对势力的受害者，在这个敌对势力中，首先是美国，而且同时还有欧洲，它并没有放弃对原苏联（甚至包括正在加入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东欧）“拉美化”的幻想。

这种失败的后果就是为美国在中东、中亚及世界范围内开展攻势的最初胜利打开了方便之门，并进一步迫使普京体制屈从于美国赤裸裸的压力。因此，对俄罗斯来说，正如对整个世界来说一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或者美国的计划遭到粉碎（并且这是从国家到世界所有层面上获得有选择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或者美国的计划（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取得进展，使所有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进步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场斗争中，对人民负责永远是第一位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也一样。加强社会斗争和民主诉求，放弃幻想并着手重造开放的、能够让大众阶级信服的新左派——共产党和工会继续努力为民众眼前的政治愿望服务，并且拿出像对待“顾客”那样的态度，这些都成为俄罗斯可能复兴的积极征兆。

欧洲并非没有一点责任。欧洲必须和俄罗斯联手。它必须放弃仍然作为“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的一个合作者，将自己绑在美国霸权主义计划上的幻想。为此，它必须走出我前文分析的深陷其中的“流沙困境”。

普京现在可能已经明白，美国及其欧洲追随者的目标就是摧毁俄罗斯，而不是帮助它复兴。但是，形成他权力基础的体制使他不可能有效地抵抗“三合会”帝国主义的摧毁性的攻



击。因为这么做就会失去剥削和压迫俄罗斯人民的寡头势力对他的支持。而寡头势力也不会让他那么做。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悲剧。由于俄罗斯当局对那些被视作“朋友”的地方专制政权的支持，莫斯科成了它们的英雄，而它们只是下贱的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30年来，继承苏联的当政者们因为对民主的顾忌而不再敢采取有风险的举动，美国和欧洲因此而获益匪浅。瓦文萨（Walesa）正是这样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复兴运动”（团结工会也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领导人的，他是华盛顿和罗马教皇的朋友，他的真实计划是破坏团结工会抵抗资本主义进攻的能力<sup>①</sup>。东欧国家人民对民主制度的渴望就这样被操纵并误入了歧途，比欧洲大多数左派更轻易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帮凶。它们这么做并没有对原苏联左派必要的重建有所帮助，而是完全相反，使混乱局面不断地保持下去。

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有可能结盟，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学的几何学将对未来全球化走向带来严重的影响。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更有可能性的欧-俄合作，另一种是“俄-美联盟”的进一步发展，其基础是俄罗斯选择充当为美国提供石油的主要出口商。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这一联盟显然因“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而得到加强。

事实充分地表明，这是一种完全不对称的伙伴关系，只不过是美国摧毁俄罗斯计划的另一种方式。它远不能为俄罗斯提

---

<sup>①</sup> 团结工会执政后并没有将工厂交还给工人，而是将它们关闭或者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西方的大资本家，从而给了波兰工人运动以致命的一击。

供生产体制现代化的帮助，这种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寡头利益及其屈服于将俄罗斯变成原料独家供应商的转型计划紧密相关。此外，它还使美国更容易向莫斯科正被排斥在外的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这种情况不可能成为构建另类的全球化的因素。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欧-俄合作，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是可以想象的，如果这种合作不仅仅是向欧洲出口俄罗斯石油，同时欧洲还对俄罗斯生产体系的全面现代化给予积极支持的话。自1990年以来，欧洲一直有可能主动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使合作双方在面对美国时的自主地位得到加强。但是，像往常一样胆小、害怕得罪美国的欧洲并没有这么做，从而倒为美国对莫斯科的攻势开了方便之门。俄罗斯石油被优先用于满足美国的需要并换回美元。而优先考虑卖给欧洲并用欧元交易的合作，则会大大减轻欧洲对华盛顿的依赖，后者从中东到里海，或到几内亚海湾对石油供应商实行广泛的控制。欧洲不得不接受这种对苏联遗产的极不公平的势力瓜分：俄罗斯和中亚归美国，而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归欧洲！

现在重新考虑俄罗斯的联盟政策不算太晚。反对寡头垄断势力的力量在俄罗斯得到加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欧洲，它们的外交都在华盛顿的攻势前遭到挫折，这终需进行反思。欧亚大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关系的靠拢并带动旧世界（特别是非洲）其他国家是必然并且可能的，并能使华盛顿在全世界推行门罗主义的计划彻底破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毫无疑问，这需要有耐心，但关键是要有决心。

## 第四章

# 印度：一个超级大国？

印度居民已超过十亿并正在超越中国，特别是其经济增长率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快就将跻身 21 世纪崛起的大国。我对这种预测表示怀疑，并将在此对这种怀疑进行论证，在我看来，足以使印度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

我质疑的关键理由在于，我认为，事实上，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这个挑战需要从根本上改造它所继承的因殖民地资本主义而形成的社会结构。毫无疑问，独立后的印度的领导阶级打算接受这份遗产，并在基本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为其嫁接上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通过研究这个计划的成功及其局限或失败，我将提出“全球自由主义”的主流话语从一开始就将其排斥在外的问题，即无论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被认为实际上已经买办化，它都属于边缘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如果不经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也不会发生，就不可能跻身现代化强国。

### 一 殖民地遗产

英国的殖民统治从根本上将旧印度改造成成了一个附庸的资

本主义农业国家。为此，英国系统地建立起在各个方面都明显是属于农业土地私有制的形式，并将大多数农民排斥在外。这些形式下的农业土地私有制导致在这个国家的北方地区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阶级，以及南方地区地位不算太差的相对富裕的中农阶级。大部分农民被迫沦为贫穷农民，实际上失去了土地。农业发展所选择的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绝大多数印度人民陷入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生活为代价的。

土地管理结构的普遍形式并不是私有制——如同人们本能地想到和相信的那些被欧洲中心论所曲解的现代精神——而是明显具有一种政治共同体特征的所有制。这在旧印度就是村民集体的所有制，它管理着土地所有权（其基础是明确的不平等的原则，这与其种姓等级制度有关），并服从最高政治共同体——国家（它向其权力治下的共同体征税）。英国人鼓励这个政治管理结构中的官员按照“私有财产”的等级在不同层级上行使他们的权力，这样便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特有的模式当作“普世”的模式强加给他们。如同其他欧洲人在美洲及亚洲和非洲殖民地所做的那样。今天世界银行的官员并不具有这样的知识，能够让他们理解其所极力主张的唯一的普世的发展道路（土地私有制）只不过是一种例外，也就是说，总体来看，它在世界上极少地区取得的成功掩盖了它在“世界其他地区”无法行得通的事实。

印度各种派别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对这种遗产表示极大怀疑，并写进了更为激进的土地改革纲领（“耕者有其田”，实际上也就是说土地属于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国大党从来不打算这么做。独立后的印度对农民所做的土地改革的承

诺只是一种假象而无实际意义。当时只有共产党执政的一些地方政府做得更多些，如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在印度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不可忽视的，人民也因此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改革倡导者的支持。

但是，如果说这个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基本问题不久前还是在共产党内，随后又在其他一切“进步”力量（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和民粹主义分子）内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甚至在它于20世纪末取得表面上的完全胜利前）终于使人们接受了土地私有制是“不可避免的”错误观念，以及西方道路（通过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吸纳农民而使农民消亡）是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土地改革的要求因此而已是“过时”的观念。世界银行取而代之的是“绿色革命”观念以及所谓“市场支持下的土地改革”形式。其实施结果却总是走向失败——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及农业生产者深深陷入对统治资本的依附（事实上这正是这些政策真实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印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sup>①</sup>。人们也知道，由世界银行从巴西到南非实施的市场支持下的土地改革已经变了样子。不幸的是，由于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天“革命的”左派已经大面积地染上了妄想症。至于试图重建“正宗”原有社会秩序的传统主义者，事实上却在避免对这份只对少数受益者有利的殖民地遗产进行

<sup>①</sup> 参见斯里拉德·斯瓦米那坦（Srilata Swaminathan）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面临21世纪挑战的农民和工人的斗争》，印度学术出版社（Les Indes savantes），2005。

谴责！这个国家的“印度教徒”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伊斯兰<sup>①</sup>的捍卫者（特别是在巴基斯坦）一样，事实上正是各种形式的、附庸的边缘资本主义不断在世界上扩散所需要的。

在印度，这种殖民地遗产强化了根深蒂固的种姓意识阻碍社会进步的效果（在某些方面还更为恶化）。“低等种姓”（今天以“达利特”<sup>②</sup>的称呼而为人们所熟悉）及与此类似地位的人（“部落民”）占印度人口的1/4（约2.5亿人）。由于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特别是土地权，他们成了一群“准奴隶”，是“其他人”的集体财产。他们的低等身份有些类似希洛人<sup>③</sup>之于斯巴达人，其他人可以根据需要为了某一事在某一时间随意役使这个可自由支配的劳动群体，而仅仅付给他们极少的口粮。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使得“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加反动，权力越来越被少数特权阶级掌握并有利于他们，同时，也有助于减轻甚至消除那些处在少数剥削者和具有达利特身份的被压迫者之间的多数被剥削者的可能的反抗。

当然，英国殖民当局避免对这种社会结构提出质疑，但却装作“尊重传统”的虚伪样子（当英国人感到有必要的时候就

---

① 政治伊斯兰（l'islam politique）是指伊斯兰世界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由于具有多元性，很难简单地概括，主要特征是将伊斯兰教作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重新解释部分教义等方法，把民众的宗教热情引入政治轨道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政治伊斯兰便初露端倪，但一直到70年代末才因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而形成高潮，并呈蔓延之势，在中东及伊斯兰各国形成一种具有多元性而非完全一致的运动。——译者注

② 达利特（dalit），不入种姓的贱民，社会地位极低，这是他们对自己的称谓。——译者注

③ 希洛人（“hilotes”，又作“ilotes”），又译黑劳士或赫罗泰人，是历史上古希腊斯巴达的国有奴隶，有简单农具并可支配小部分产品，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译者注

不尊重了，如他们在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时候)。同时，殖民政府还为了自身利益操控局势，通过教育让某些达利特成为合作者。人们可以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延续了这种传统，它一直是被严厉质疑的目标；除了在 V. P. 辛哈<sup>①</sup>领导的并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左翼联盟政府短暂的执政期间。当然，右翼的印度教徒对此是没什么可说的！美国今天——通过“保卫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中介——试图以同样方式来操控达利特的反对，并试图将其遏制在不妨碍全面实行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

这种形势可能是正巧碰上了因斗争的激化而转为毛主义农民尤其是纳萨尔主义 (Naxalism)<sup>②</sup> 起义的时机。当然，从它没有完成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使之稳定下来的意义上说，这些起义是失败的。不过，起义已经从对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所有制结构和种姓组织进行谴责的阶段向前大大地跳跃了一步，而这正可能是未来革命动员的前奏。近 20 年来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达利特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毫无疑问，至少部分地是由于纳萨尔主义的原因。

## 二 国家民粹主义的成功及其局限性

独立后印度国大党历届政府实施的国民计划是完全反映它

---

① V. P. 辛哈 (V. P. Singh)，印度全国阵线领袖，1989 年印度大选国大党失利，R. 甘地辞职后组成了印度独立后的首个少数派政府，但由于内部分裂及在议会的少数派地位终在执政一年零三个月后垮台。——译者注

② 纳萨尔主义：由共产党—解放运动（毛主义）发动的贫穷无地农民的武装起义。因（1967 年）在纳萨尔巴里邦揭竿而起而得名，这个运动涉及印度次大陆 1/3 的农村。

所处时代的特点的产物，这个时代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和非洲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胜利为标志的。各种政党和政治力量是在为了获得独立、实现现代化和发展，此后是为了执政而开展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们享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是各自的发展计划均因目标不清晰而受到影响，这种目标的不清晰也是民族解放运动本身的特点。这些计划都标榜反帝国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非常理解民族解放是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它们仅仅就到此为止，并且相信能对全球主导体系——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做出必要的调整，使亚洲和非洲各国能够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出现在世界上，从而逐步克服它们“落后”的不利条件。但它们并没有成功——尽管取得了一些绝非是无关紧要的成功——而且很快又碰到了它们战略设想上的局限。

关于时代的辩论——在印度和亚洲及非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正反映了对战略的设想。难道它是向“建设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必然阶段吗，用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它是自己准备向左跨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在明确的国家层面的问题之外，执政者的计划也包括了或多或少比人民反帝大联盟更有实际意义的“社会问题”，但是，在领导阶层中，那些可能甚至是被迫接受这种大联盟的人未曾想过任何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关系。除了情况各有不同之外，从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所有这些合法政权都具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的“民粹主义”特征，一方面它们希望整个社会（或多数人的）享受到发展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渴望掌握社会发展进程，担心被统治阶级有可能脱离它们的控制自由地



组织起来。

共产党经常明确地表示认识到现实体制中的这种矛盾和局限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将不在这里（而在别处）对此进行讨论，其中除了受到苏联影响（及其主张的立场，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由）的共产党外，大部分亚洲和非洲的共产党最终都成了令人怀疑的国家民粹主义计划的支持（多少带有“批判”的）力量。发生在毛主义和苏联之间的分裂往往使得这种重新团结起来的势头变弱了，特别是在亚洲。在这方面，印度各共产党总体上〔不论是印共（马）还是毛主义的印共（马列）〕与国大党的国家民粹主义计划保持着距离；除了印度共产党，它现在也因此而被边缘化了。印度各共产党在社会中有着特别强大的地位，比如说，这是阿拉伯各共产党无法与之相比的，后者实际上是无条件附属纳赛尔的民粹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及布迈丁主义联盟的。

尽管存在局限性，尼赫鲁（Nehru）和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印度国家民粹主义的计划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方面并非是微不足道的。

殖民统治从一开始就是有步骤地在印度实行去工业化，使得提前进入并正在工业化中的英国受益匪浅。印度独立后，工业化受到了优先考虑。至少在尼赫鲁时期最初的那些计划中，设计完美的工业化进程就将印度私人大工业资本吸引到公共部门的企业中来，使得这些企业得到发展，填补了殖民化遗留下来的生产体制的缺陷，工业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加强了基础产业。

宏观调控（les macropolitiques de régulation）的实施被认为

是为这个现代化计划服务的。为了保护印度工业不受帝国主义资本控制的世界市场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对价格和对外贸易进行控制、实行补贴政策、制订有关外国企业的章程、引进技术是优先考虑的目标。仅次于此的需要调控的是社会目标——收入的再分配，尤其是减轻大众阶级的极端贫困状况。伴随着加速工业现代化计划的实施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尤其是食品生产），这是建立在人们称之为“绿色革命”（用以代替被放弃的土地改革——“红色革命”！）的基础上的，原则上要保障国家食品供应自给，所有出口收入全部用于工业所必需的进口。

这一计划所选择的生产和技术关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基本逻辑毫不怀疑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计划的本质在总体上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但是，人们会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各种经验（包括中国的经验）与此也相差无几，尽管——这一点上——与公有制是相斥的。如果从印度的计划更激进的意义来说，其生产体系和世界主流体系脱节的程度远不像在苏联或中国那样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后两者的工资和价格——基本上是计划的——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比较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因此，毫无疑问印度计划的特点——如同其他非共产党的民族民粹主义国家（比如阿拉伯国家）——与殖民化统治遗留下来的社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这种紧密关系充分地表现在它对“绿色革命”的青睐，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绿色革命”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农村统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的地位。

印度和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模式之间的这些差异造成的结果

明显不同。印度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长率在那个时期并不“坏”：远远胜过殖民统治时代，在其强劲扩张时，一直处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平均水平之上。但是，大体上仍然远低于中国的水平。而且，中国的增长带来的是大众阶级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而印度则没有这种情况，它的增长完全只惠及新生的中产阶级——他们只是少数人，尽管30年来印度人口从占世界总人口的5%增长到15%——然而大众阶级的悲惨生活依旧，甚至进一步的社会边缘化了。

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并不了解这些基本事实。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同意许多“未来学研究者”做出的“乐观”结论的原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正处在不断加速增长的过程之中，它将成为和中国一样的现代化强国。中国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激进的革命给它带来的优势，而印度则对殖民统治给它留下的不利条件没有任何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优势远远超过印度的原因，这种增长受到投资分布结构更有利于生产体系整体发展的支持，同时其利益的再分配也更有利于（或比较有利于）大众阶级。但是，如果中国不得不更多地实行“自由主义”经济，而印度继续坚持它15年来极端自由主义的选择，人们将会看到两国的增长率不会是加速而是相反的放慢，中国将和印度一样，甚至两国的增长率也都会一蹶不振。我认为，两国都面临着挑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也就是说让所有农民获得土地和生产权利，这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实现（拥有多长时间还是个问题），但在印度则一直被拒之门外。

此外，印度独立后取得的政治成果也不能忽视。

印度不像中国，它是个多民族国家，而英国强加于人的殖

民族统治也正是利用了印度人民（及国家）的多样性。多亏了民族解放运动：它在这一方面的成功在殖民地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实现了十来个主要民族的团结，国家最后由一个唯一的“民族”组成。尽管这个民族的名称“婆罗”（bharat），来自婆罗多（bharatva）概念，我们可以翻译成“印度人”（indianité），从“科学”（或类科学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此后印度确实是一个民族了，这一实际存在的现实得到它所有成员的承认。时至今日，这种共同归属的意识已经超过了对地方特性（其中包括语言）的认定。民族解放运动唯一的失败就是穆斯林希望共同参与缔造印度新国家的愿望未能实现。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终于达到了破坏印度国家计划的目的，人为地强行建立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无论如何，留在印度的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15%）事实上是自然地融入了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他们有时候似乎“有问题”（作为印度教文化主义者可以利用的问题，他们也并没有借此挑起是非）。印度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是其成功的原因，即使印度教文化主义兴起也最终没有成为问题。将穆斯林占“少数”而印度人占多数的政权和社会的表现，与穆斯林占优势的政权和社会（比方说还有少数的基督教徒）的表现作比较，可以说明积极的政教分离在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种民主的进步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是看不到的。

毫无疑问，人们对这个总体积极的评价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出不同差别。对锡克教徒请愿活动（最终导致了英迪拉·甘地的死）的镇压、克什米尔的困境，表明这个体制在正确管理

“民族问题”（当然还可以用别的称呼）方面能力还有局限。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北部“印度—雅利安”和南部“达罗毗荼”的主要民族，德里政府都能找到恰当的问题管理方式，并因此使得联邦的团结（其实在宪法词汇里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中央集权性）得到巩固。

当代印度的经验表明了民主选择的不容置疑的优越性和认为专制管理更有效的辩护理由的虚伪性。尽管在印度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属性及其现实的实践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国大党和各种共产党）的积极作用，这种选择或许是对社会利益和不同地区管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而地区的多样性也许是对特权阶级的限制——并导致民众对霸权集团少数人计划的支持。

在国际方面，独立后的印度全力支持当代“南方阵线”及源自万隆亚非会议（1955年）的不结盟运动的稳定发展，甚至它与中国的边境冲突也没有对它公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造成影响。

### 三 偏航和文化主义

在印度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国家民粹主义计划被侵蚀是必然会发生，原因均在于其局限性和固有的矛盾。这种侵蚀和伴随而来的权力合法性的逐渐丧失，给了受买办统治阶级支持的蒙昧主义力量发动攻势的机会，同时中产阶级（它们的发展速度放慢，甚至困难越来越多）发生了普遍的分化，这些都受到了美国的帝国主义舆论的鼓励（和操纵）。

在印度，这些蒙昧主义梦想有一个名称：印度教特性（hindutva）。这个词表明了对印度教的宗教归属的优先确认，并将其定义为体现了国家各民族的“真正统一性”。印度教特性的概念是不能用来给国家作注解的。当然，对确认“印度教教徒”的质疑，并不等于对土地所有权，特别是种姓等级制度领域的殖民遗产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印度共产党不断论述的那样，蒙昧主义梦想实际是为买办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充斥于类“民族主义”，甚至类反帝国主义言论中的“特殊性”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特殊性为重新回到“社群主义”（communautarismes）（在此是反穆斯林的）的实践中去创造条件，这种“社群主义”曾经被当时的殖民政权在面临统一的、具有现代思想的、民主的和非宗教化的民族解放愿望高涨时利用过。

在这一方面，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倒退，与其他社会，特别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受到国家民粹主义计划侵蚀的倒退没有任何区别，都对社会边缘化的牺牲者造成了打击。印度与伊斯兰的政治在这里有着类似之处。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偏航在印度似乎并不一定会像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里那么强烈。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印度共产党对国大党的独立的印度计划保持了距离，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实际上都无条件地聚集到了类似民粹主义计划的旗下。因此，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共产党都进入了倒退阶段（尤其表现在选举上）的时候，印度的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却一直拥有着民心——甚至还越来越高。

在印度，伴随着倒退而来的是社会斗争重新激进化。纳萨

尔主义者（naxalistes）的攻势便是证明，尽管他们对印度社会中主要实际力量的关系判断错误，但他们还是在广大的地区（将近印度的1/3）重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觉悟。同样可以证明的是达利特急剧地参加到政治和社会的战斗中来了，这种参与毫无疑问也是农民激进化的一种表现。还可以证明的是中产阶级整体表现出对民主，甚至是政教分离的追求。共产党本身，特别是毛主义共产党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激进化现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几乎是排他性的合法性的崩溃，并没有赢得对右派的“最终胜利”（只是暂时的）；这种合法性曾使得国大党获益匪浅。我们看到，在被V. P. 辛哈领导的左翼选举联盟击败后，右翼第一届政府给了共产党一个位置，这更多像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标志。毫无疑问，左翼脆弱的联盟并不能避免右派在选举中卷土重来。但是，从“印度教一买办”这边来说，第二次遭遇这种经历则完全是一次失败。这个政府完全听从帝国主义支配投入攻势（加快经济“自由化”）。最近的选举（2004年）表明右派计划遭到了当头棒喝。这个计划被印度人民多数票否决，说明受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主子推动的“印度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与社会灾难有着密切关系并对此负有责任。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其他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所没有的。

印度左派还远没有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正如人们在别的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国家民粹主义本身是早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但是与这一时期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管理形式的衰弱的同样结果，却构成了当代印度的特征。由此，我认为，民主欠缺的组织形式和“由领导集团高高在上指挥”的斗争形式

(共产党本身对此并不陌生)的可信度都已经丧失。与当代世界总体情况一样,“追求可参与民主(所谓自发的)的民众运动和政党及正式组织”之间的冲突是印度的特点。迎接这一挑战必须是一种另类的建设,尽管这是困难的。

#### 四 艰难地走向另类全球化的长征

主流的自由主义理论不仅重视“经济自由主义”及随之而来“非另类”的全球化模式,而且还认为,所有具有企业精神的个人赞成这种选择就是“进步”,并因此而“获利”。仅仅认识到这种无稽之谈与事实不符是不够的,必须进行认真的理论思考。构建一种属于真正的另类全球化的另类进步社会是困难的,路途遥远。

对于印度来说,完成这一构建必须充分回应——即使是逐步的——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在承认全国所有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在尽可能平等的条件下,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这意味着废除种姓制度及给予其合法性的观念。换言之,印度应向中国那样完成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或者至少开始着手一场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有力改革。当然目前农民的斗争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发生的频率、所涉及地区的不断扩大及斗争的意志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他们也确实存在着混乱,目标各不相同并往往是矛盾的。所组织的最好的斗争是中等农民阶级的斗争,他们每次都能或取得胜利,或迫使政府做出让步,他们根据资本主义和市场本身的逻辑提出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涉及的是



价格管理及获得资本投入（intrans）和贷款的条件。因此，这些斗争经常是由富裕农民领导的，在目前阶段，他们也同样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国家为之服务的买办阶级压迫的受害者。从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贫穷和无地农民——包括达利特——的斗争总体上仍然停留在个人愤怒情绪的爆发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显然不仅需要重新认识他们的“思想”，而且，还要帮助建立适当的农民组织，这显然是形成有效战略的条件。

第二个挑战：建立劳动者的统一战线，将相对各领域固定和不固定的劳动者团结在一起。这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特别是对所有那些被边缘化的国家而言，其特征是新的贫困化（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动荡、悲惨的生活每况愈下）所造成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应该认识到劳动者阶级的组织今天遇到了空前挑战，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共产党在内——曾经“发挥”了某种作用，因此形成原“左派”政治力量的社会基础。过去在资本、国家和劳动者阶级的某些部分（尤其工会）形成的社会和解是值得怀疑的，在面临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进攻时，新的社会结构已经使旧的组织和行动方式失去了效果。工会、共产党和大众运动的活跃分子有责任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开创争取民主进步的新形式，最终建立着眼于长期的共同发展战略。

第三个挑战：维护印度次大陆的团结，在加强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包括印度人民在内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形式。除了策略上的选择以外，帝国主义的战略永远只是几个可数的“大国”的目标，挫败帝国主义的战略，使得弱小国家也能更

好地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

第四个挑战：以建立“南方各国人民阵线”（首先是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团结）为轴心确定外交政策，当然，现在的情况与促成“万隆时代”（1955~1975年）不结盟运动组成的情况已不再一样了。目前的首要目标就是破坏美国的全球军事监督计划，挫败华盛顿阻止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相互靠拢的伎俩。

阻碍印度向上述方向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是强大的。它们组成了占人口1/5的“霸权集团”——大工业资产阶级背后的商人、金融家、大地主及大量的富裕农民和中产阶级、高级官员和技术专家。这2亿印度人受惠于沿用至今的国家计划。毫无疑问，在当前极端自由主义胜利的时候，在下层中产阶级上升的社会推动力突然遭到打击，在受到地位不稳定，甚至即使不是贫困化也是贫穷化威胁的情况下，这个集团出现了分裂。这种情况给了左派一个施展策略的机会——如果善于利用的话——有可能削弱反动力量的协调性，更确切地说，反动力量的买办阶级取向是世界帝国主义的纽带。但是，在左派陷于衰退的情况下，它也给右派带来了机会。

人们常常谈到这个“2亿人的国家”——仅此便相当于欧洲几个大国的市场规模！——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然而却没有看到另外还有8亿极度贫困的印度人，他们正在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这种反动的论调除了令人厌恶（是以灭绝穷人为前提的！），也是完全荒谬的。“少数人的特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垄断了国家资源，而大多数劳动者则被剥夺了这种权利。

这个由少数人形成的集团绝对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劳资间历史性和解。将“边缘国家的福特主义”

和发达的中心国家的特点混为一谈的说法，来自对这两种模式一厢情愿的理解上的错误：西方的福特主义让大部分的劳动者阶级享受到了资本扩张的好处，而边缘化国家的资本扩张只对“中产阶级”有好处。印度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今天的巴西和中国的情况与此相类似。

印度统治集团实施的是与其所实践的民主政治相配合的管理，这种管理丝毫不减轻其反动阶级的本质。它反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然而，这个统治集团是完全“融合”到占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中去了。时至今日，没有政治力量不对这种逻辑表示怀疑。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印度的国家计划”是不稳定和脆弱的，它将没有能力按期实现它所规定的目标：使印度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这种脆弱性反映在印度政治阶级最常见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其根据往往是出于短期的“现实政治”。在美国“全球（军事）控制”和“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尽管其中有合作者但也是心有不甘——的计划面前，印度政治阶级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能力想象并实施必要的防火墙。这个防火墙就是建立由印度、中国、俄罗斯及所有同样受到新集体帝国主义扩张而产生的买办化威胁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战线。这同样也意味着寻求与欧洲更有计划的接近，尽可能使它对华盛顿领导的计划保持某种距离。印度领导人——即使是通过政府行为坚决打击了右翼印度教徒/买办阶级——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相反，他们固执地将与中国的“冲突”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把它看作是潜在的军事敌人及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危险的竞争

对手。他们甚至相信能够“利用”与美国可能的接近在亚洲形成重要的联盟。当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有类似的理由：巴西、南非，甚至包括中国。

针对新集体帝国主义发展的防火墙意味着重建南方国家人民阵线。但这同样也远非容易完成的任务。南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最明显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和买办阶级”（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伊斯兰政治的责任）偏航所产生的——占据了当前的舞台并成为印度政治阶级在短期内的策略考虑。

这种机会主义从长远来看，不仅破坏了进步的另类国家建设及其为其提供支持的另类全球化建设的条件，而且也失去了对忽视印度团结的脆弱性的警惕，及帝国主义以摧毁它为目标的可能阴谋的防范。对此决不能抱有幻想。即使今天华盛顿外交政策选择——暂时并出于策略上考虑——“支持印度及其统一”，它的长远计划仍然是消除这个大国成为强国的可能性。或者，屈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进一步强化离心倾向。因为这种屈从突出了发展中“地区”的不平等。难道班加罗尔<sup>①</sup>（受惠于新技术扩张）的“幸运”不是已经显示出一个独立的卡纳塔克邦将比在印度国家内的卡纳塔克邦享受到全球化的更多好处？

---

<sup>①</sup> 班加罗尔是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府，素有“科技之都”和“印度硅谷”之称，是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第五章

# 南方国家：团结还能重建吗？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联合国认定为“发展的20年”。这20年确实如此，仅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几乎到处都与以前（殖民时代）一直有过的或许多后来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也给三个大陆带来了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动荡。

这一时代同样还呈现出亚洲国家和新非洲国家的强大团结。这种团结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经济诉求方面，迫使当时的国际组织（甚至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重视，而且同时还表现在它们的政治态度上（支持仍然还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斗争，拒绝加入北约的补充军事联盟，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称之为“多极化”的时代，尽管是不平衡的。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得到了“重视”。全球化的时代至少部分是“谈判”的时代。

这种团结现在显然已风光不再了。为什么？有必要重建吗？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被考量的这一时期（“1955~1975年的万隆时代”）做一批判性的总结，然后分析新时期挑战的性质，并据此探寻人们希望在多极化时代重新创建团结的目标及其发展的条件。

## 一 “万隆时代”（1955 ~ 1975 年）的批判性总结

1955 年，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在万隆聚会。他们所代表的新政权经历的时间都很短；并且为完成争取独立的历史任务的战斗尚未结束：第一次越南战争刚刚结束，第二次战争就已露端倪；朝鲜战争在保持原状的情况下停战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正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去殖民化甚至还未被考虑到；巴勒斯坦的悲剧也还处在刚刚开始阶段。

聚会万隆的亚非领导人彼此之间远非一样。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倾向，他们对要建设或重建的社会未来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尽管如此，一个共同的计划使得他们相聚一堂，并使会议具有意义。他们共同的最低纲领就是结束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化政治。此外，他们一致同意，重新取得政治的独立仅仅是手段，最终的目标是获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同时，万隆的到会嘉宾之间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国家考虑的是在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下可能的“发展”问题，而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考虑的是脱离资本主义阵营并寻求重建——和苏联，即使没有公开提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

不打算“脱离体系”和“决裂”的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发展”的战略和策略上看法相同，但在程度上不一样。他们想的是建立独立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在全球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这表明了和西方主流国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

“冲突”（激进派认为必须结束外国垄断资本对民族经济的控制）。

此外，出于对重新获得独立的防卫考虑，他们拒绝参加全球性的军事游戏，并拒绝为美国霸权主义试图包围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基地。然而，他们同样考虑到，拒绝参加大西洋军事阵营并不等于必然要受到其对手苏联的保护。这就是由万隆精神而来的国家集团和组织的“中立主义”“不结盟主义”。

亚非国家的联合受启发于联合国内部阿拉伯—亚洲国家集团的创立。万隆必须加强这种联合并鼓励这种斗争。三年之后，在被解放了的阿克拉（加纳），夸米·恩克鲁玛宣布“非洲必须联合起来”。但是，在获得独立之后，先是恩克鲁玛主义者的泛非主义遭到失败，继而在刚果问题上形成的两个阵营（1960～1963年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洛维亚集团）也表现十分虚弱，非洲的联合只是停留在1963年非洲团结组织（OAU）的建立这样一种最低程度的形式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里，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首脑会议，“不结盟”由此便形成了集合了几乎所有亚非国家的不结盟运动的组织，其立场必然地从支持解放斗争和拒绝军事条约为宗旨的政治团结阵线，逐渐转为“向北方国家争取经济权利的辛迪加”组织。不结盟国家必须在这个框架内联合——除了古巴之外——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反抗美国霸权的拉丁美洲国家。77国集团（全部第三世界）成为南方国家新的广泛的联盟。在1973年十月战争和石油价格重新调整之后，1975年开始的为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战斗，是围绕着这场演变而展开的，同时也敲响了这场演变的丧钟。

万隆精神和不结盟无论在政治计划方面，还是在经济斗争的计划方面，都不为西方甘心接受。但是，西方强国真正仇恨的是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激进的领导人（纳赛尔、苏加诺、恩克鲁玛、莫迪波·凯塔）——他们几乎都在1965~1968年的同一时期内被颠覆，在这一时期，发生了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侵略——这表明不结盟的政治观念并不为大西洋联盟的各大国所接受。正是这个在政治上被削弱的“不结盟阵营”后来经受了自1970~1971年起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

今天，人们所讲的“发展的意识形态”已经遭遇了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危机，但它却经历过“伟大的时代”，准确地说是1955~1975年之间。不结盟的政治经济学，尽管经常是不明确和模糊的，但仍然可以给出以下几个定义：

- 发展生产力和产品（特别是工业品）多样化的意志；
- 确保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和起控制作用的意志；
- 相信“技术”手段可以构成人们能够复制的，并且是可控的“中立”的条件；
- 相信发展过程中民众的首创精神并不是第一位的，但国家行动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
- 相信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来说与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交换是不矛盾的，即使暂时会发生冲突。

1955~1970年间资本主义扩张的形势为这种计划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战后40年的发展，效果是如此的事与愿违，以至人



们试图放弃“第三世界”这一几十年来用于指代所有采取发展政策的国家的习惯用语。今天，人们没有理由将新近工业化的第三世界，有些是具有竞争性的（即所谓的“新兴”国家），与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外的国家）的第四世界对立起来看。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施的发展政策的目标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它们所用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它们都有以加速实现现代化和通过工业化实现社会繁荣为目标的国有化计划。人们对这样的共同之处并不难理解，只要简单地想一想，在1945年，亚洲（日本除外）、非洲（包括南非）及拉丁美洲——虽然略有差别——的几乎所有国家还都处在没有可算得上是工业的贫乏状态——除了这儿或那儿有些采矿业，绝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管理制度古老落后（美国的庄园寡头统治、受东方伊斯兰保护的君主制度、中国等），或者是殖民地式的（非洲、印度、东南亚）。它们除了各种极大的差异之外，所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目标都是实现政治独立、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工业化。

如果说它们一旦能够做，就什么都想做也未必。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确存在着很多差异，因此，试图据其不同的模式将它们重新分别归类也是合理的。但是，人们在标准的选择上是有风险的，除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倾向外，至少还有人们所认同的理念，或更确切地说，是在那个时期所认同的理念，以及刚才提及的经验历程、内外条件的可能性和局限。相反，通过强调将这些国家统一起来的共同目标，我想远距离地来看待这些分类，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并考虑到它所引导的目标，对之进行重新审视。

实现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建立，保护它不受阻碍它建立的竞争的冲击。其形式可根据情况——国内市场的大小、可供使用的资源——而改变，或者多少是根据理论上的论断，或者是根据意识形态，优先发展消费型的轻工业，或者是能够加速第一产业发展的物质生产 [依据苏联的论断，理所当然地会提出“工业化工业”（industries industrialisantes）的论断]。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技术只能依靠进口，但是并不是必须要为此而接受外国资本对所建设施拥有所有权。这取决于人们对谈判的掌控力。而金融资本应当要么是受邀进到本国投资，要么是借贷而来的。其形式——国外私有财产，由国家储蓄而担保的公共财力，以捐赠和信贷的形式而存在的外部帮助——也会因对手段与成本的评估而有所调整。通过工业化促进增长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有进口需求，它必须是通过——在初期阶段——知名的传统产品的出口来予以补偿的，不管是农产品还是矿产品。这是可行的。在总体的增长阶段，如战后时期，对几乎所有可能产品的需求本身持续增长，不管是能源、矿产品原料还是某些特定的农产品。尽管交易期限变动不定，但并不会因为它们恶化而抵销出口总额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现代化尽管是以工业化为轴心，但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和通信建设、教育和社会服务的目标，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提供合格的条件与劳动力适当地为工业化服务的。坚持这些目标，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并使之现代化，这是人们在那个时代民族主义的言论中经常听到的。原则上说，这种言论是“跨种族的”。

当然，今天“国家干预”和“私人利益”之间如此频繁的冲突——前者总是遭到否定，因为本质上它与人们追求的市场自主有冲突，而后者正符合市场自主的趋势——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普遍现象。这种冲突甚至不被人注意。相反，所有执政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国家干预是建设市场和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激进的左派——就其意识形态本身而言受启发于社会主义者——当然是积极主张逐步消除私有财产的国家干涉主义的扩张的。但是追求不同目标的民族主义的右派也并非不是国家干涉主义者：按照他们所提出的构建私有利益的要求，强有力的国家干涉主义也是合情合理的。今天在主导话语中充斥着各类无稽之谈在那个时代是不会得到任何响应的。

诱惑是巨大的，今天的这一历史进程如同世界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历史进程一样，它应或多或少可以起到完成国家原始积累的某些作用，并由此创造以后的发展条件，现在人们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它以市场向世界开放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竞争为特征。但是我并不听信这样的诱惑。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并没有“自发地”创建出这种或这样的若干发展模式。这种“发展”不为它们所认可，它是当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我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直接和自发的倾向与反对这种倾向的理念之间的矛盾，前者的社会管理模式特征永远是受目光短浅的只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主导，而后者则因反对前者而使得各种新生政治力量生生不息。当然，这种冲突并不总是激烈的；资本主义也在不断调整，并没有停留在其发展的原点上。

在这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主导力量和推行万隆“发展”计

划的力量之间的冲突或多或少是激烈的，因为国家干涉主义的实施被认为是要么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要么是对它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支持取代，因此与主流资本主义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国有化和对外国资本的排斥上。与此相反，温和派愿意就有争议的利益进行调解，并尽最大可能地实行和解。在国际方面，这种区别很容易地被解读为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东西方冲突。

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持有这种现代主义的观点，即使它是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但这绝不表明它们受到——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煽动，而且也远没有受它的引导。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独立的时候并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30年之后，从最好的假设来看，也仅仅是萌芽状态。但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并成为人民反抗殖民化的主导力量。这种意识形态所支持的计划，我称之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一名称初看起来有些奇怪）。“资本主义”就其概念而言是实现现代化，并要求复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本质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城市化、分级教育、国家公民概念。毫无疑问，发达资本主义特征中的其他社会准则，如政治民主，也是极为缺乏的，这可以从原始积累时期发展所要求的情况来判断。这一范畴内的所有国家——激进的和温和的——都选择了同一种程式，一个政党、如同闹剧的选举、祖国的领袖—缔造者，等等。在“没有资本家”的时候，即没有企业家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技术官僚——也会造出一个来。即使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这些社会准则也往往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对其直接利益的考虑要优先于其更长

期的建设。在民族解放运动激进思潮风行的时候，怀疑便成了排斥的同义词。这个激进思潮的风行自然便构思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这可以从苏维埃理论中看到。“追赶”发达的西方世界是其首要的目标，通过它特有的动力，这种计划便变成了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各种民族解放运动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激进的所谓“社会主义”，一种是温和的。对立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种倾向的支持者是农民、城市平民社会、中产阶级、既得利益者等社会阶层；另一种则是依靠政治和组织（大城市的共产党、工会组织、教会）传统。

即使我们从民族解放运动即“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衡量，结论也是有争论的。原因是当过去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时候，全球化围绕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展开，各国社会却相反地发生了分裂。或许是民族运动的意识形态无视这种矛盾，停留在“追赶历史差距”的资产阶级理念的禁锢之中，设想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并不否定脱节）来完成这种追赶。毫无疑问，根据前殖民地、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特征，这种分裂的结果是严重的。在非洲，人为的殖民地划分没有尊重各民族原来的历史，因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边缘化而导致的分裂使得种族主义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尽管从民族解放中产生的领导阶级想努力超越它。当危机不期而至时，财政盈余的增长不复存在，其所支持的新建国家的跨民族政策也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领导阶级本身也四分五裂，并失去了建立在实现“发展”基础上的合法权，建立新的社会基础的企图往往难以摆脱地带有种族主义的痕迹。

如果我们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考量，其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此处也应当了解激进的民粹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涉及一种进步主义的看法，强调社会巨大变化、缩小收入不平等、城市人口的充分就业、某种穷人版的福利国家等。从这个观点来看，举例来说，像坦桑尼亚这样一个国家的成就，与扎伊尔、科特迪瓦或肯尼亚形成强烈对照，在这些国家里，极端的不平等在40年来非常突出，无论是在经济强劲增长时期，还是之后陷入经济萧条的时期。

但是，按照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才是标准。从这个观点来看，效果反差极大，并形成了亚洲、拉丁美洲主要国家集团与所有非洲国家之间的鲜明对照，前者变成了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出口国，而后者总体上仍然局限于初级产品的出口。前者成了新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我的分析中是未来的周边国家），后者从此被称为“第四世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中注定是要被边缘化的。

进步都是在万隆的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范畴内实现的，和它们同样取得进步的拉美国家则是走的另一个极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考虑内外因素如何具体地发挥作用（或者促其实现，或者使之滞后），是不可能了解这一重大事实的。在下文中，我们将仅就几个大的教训进行探讨，以从中领略当代第三世界的演变。

## 二 排斥非洲的根源

总体来说，非洲受阻的根源在于特殊的内部条件和资本主

义扩张的逻辑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因为这些互动非常不为人所知，通常的解释——无论是由《国际经济》传统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还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仍然只是表面上的。

前者强调的现象与体系的整体逻辑是脱节的，如政治阶层的腐败、经济基础的脆弱、极低的农业生产率、种族的分裂，等等。这样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主张，在更大程度上融入世界资本主义。非洲确实需要“真正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所以应该通过有步骤地提高商业化农业的水平来消除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束缚，等等。这是很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他们所提议的改革是在这样一个体系内实施的，而这个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举例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在当前的高科技发展阶段，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将会产生巨大的人口过剩，在工业化过程中，他们不会在工业生产中就业，就像19世纪在欧洲发生的那样。历史不能重演。

后者强调的是另一种并非不切实际的现象，如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融资能力因其所依赖的原材料价格问题而步步恶化的事实。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同样有理由求助于西方大国不断的政治干涉，甚至经常是军事的干涉，历来对社会进步怀有敌意的西方大国，总是应反动和腐朽力量的请求前来援助的。但是，这些理由在逻辑上和内部冲突并没有结构上的联系，而这样将“外部世界”与“民族”对立起来，就把矛盾回避了。

我对失败的分析涉及殖民化，及与新殖民主义合作的领导阶级追求其所推行的计划的责任，并考虑到帝国主义全球地缘战略的因素。

殖民地一旦被征服，当然就必须得到“开发”。在这一点上，世界资本主义逻辑和非洲社会原先历史的逻辑会同时发生作用。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我们能够得出殖民化的三种模式是：（1）一种将小农纳入热带农产品世界市场的压榨型经济，它受制于垄断控制的市场需要，使农业劳动报酬减少到最低，同时付出土地浪费的代价；（2）围绕矿产采掘形成的南部非洲的有保留的经济，它通过强迫移民维持着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准确地说，这些移民便是来自传统农业的“后备劳动力”，这让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3）掠夺型经济，特许公司只需对采摘的产品征收一种不需要任何付出的什一税，便可以活得很滋润，这种经济下的地方社会条件既不可能形成“压榨”，也没有矿产资源需要组织大量的后备劳动力。

这种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模式的结果对非洲人民将是灾难性的。殖民化延误了——一个世纪——非洲农业革命的起步。在这里，剩余价值可能就是农民劳动与自然资源的剥夺，没有现代化的投资（既无机器，亦无肥料），没有实实在在的劳动报酬（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环境下不断重复的劳动），甚至也没有保证资源再生的自然条件（对耕地和森林的掠夺性开垦）。同时，在世界分工不平等的时代中这种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模式，也排斥了任何当地资产阶级的形成。相反，每当这种形成出现萌芽的时候，殖民当局就会立即将其扼杀。

民族解放运动的脆弱，以及摆脱了殖民化国家的脆弱再现了这种殖民地的形态。但它们已经不再是殖民前的原来非洲的产物，原来的非洲已经消失在动荡的历史中。世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从中发现它的合法性——这在通常的种族主义话



语中有充分的展现。对独立的非洲及其腐败的政治资产阶级、经济观念的缺失，以及农村共同体结构之顽固性的“批评”，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当代非洲的特性已经在 1880 ~ 1960 年间就铸成了。

毫不奇怪，新殖民主义继承了这些特点。自认为对非洲独立负有使命的各政治党派并不一定像表面上看来那样是实践者，甚至他们中也有人接受新殖民主义的选择。这些党派就像被打造出来的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样，是脆弱的。因此，宗主国的责任仍然是主要的。因为，尽管殖民社会是脆弱的，但当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具有能够走得更远的潜能的精英分子的时候，这些宗主国便齐心协力地来破坏这些能让非洲摆脱旧轨的机会了。

这种失败的特征在著名的洛美—科托努协议的有限性上有充分的表现；这些协议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欧洲联盟联系在一起。它们延续旧时的分工，将独立后的非洲置于原料生产者的地位上，而此时——万隆时代（1955 ~ 1975 年）——其他的第三世界正在着手进行着工业革命。在历史转变的决定性时期，它们使非洲失去了关键的 30 来年的光阴。当然，非洲领导阶层对非洲大陆的衰退也负有责任，特别是他们利用人民的软弱，站到了反对自己人民愿望的新殖民主义阵营一边。

归根结底，非洲领导阶层和帝国主义全球战略之间的勾结是失败的最终原因。从这些勾结所起的作用中，人们可以看到战后（1945 ~ 1990 年）帝国主义战略关注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在地缘战略方面。当时的苏联曾努力破坏对手的这些布局，试图与非洲解放运动建立起同盟，特别是与它们中最激进的运

动建立同盟，如在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南非。而西方大国则以对这些国家的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腐败政体的支持作为回应，实际上是无条件地支持。

在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一点上，非洲在大国的考量中不再仅仅是矿产和石油的来源地。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在为监控从几内亚、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海湾石油地区而制定的新的进攻战略中的作用。这是华盛顿为了保障比中东更近并更不易受到破坏的石油通道而必须要采取的监控。当然，为此目标而实施的战略无耻地利用了非洲偏离航向的悲剧（其中就有种族主义），让各国人民陷入绝境。完全是厚颜无耻的操纵。

非洲的被排斥，也等于是非洲人民的被排斥，为的是让大陆的自然资源被纳入体系之内，因此，非洲的被排斥在今后也都是既定的计划。

### 三 南非，体系的薄弱环节？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只有一个国家有着现代工业化的模样：南非。因此，在结束了种族隔离之后，这个国家的黑人的胜利被作为整个大陆“复兴”的开端而得到敬意。确实如此吗？

南非是一个用通常的分类很难界定的国家。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缩影，集各种不同的特点于一地。它有一个从习俗和生活水平上属于“第一”世界的人口——白人。城市里的黑人和混血的人口则属于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的第三世界，

而具有“部落”身份的农民都被封闭在“班图斯坦”（Bantoustan）<sup>①</sup>（今天已经成为前班图斯坦！）里，与非洲“第四世界”里的农民聚集地没有什么两样。

起初，荷兰殖民者只想建立一种殖民地，把非洲人看作是没有用的入侵者。后来，受这些国家矿产资源吸引的英国帝国主义认识到了黑人劳动力可以解决廉价劳动力的问题。正是这些英国人，而不是布尔人<sup>②</sup>，在19世纪末发明了种族隔离政策，将过剩的、无法养活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任何投资用于加强粮食生产）人口“储备”起来（一部分属于联邦内的，另外两部分属于保护国，巴苏陀兰<sup>③</sup>和斯威士兰），以迫使这些人从事开矿所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布尔人控制了这个制度的管理权，给了它一个名称（种族隔离）并将已经被视为法律的种族主义的实践系统化。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领导阶级继续推行通过由国家保护和扶持的工业化提高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计划。在这一点上，种族隔离极其有用。廉价劳动力并不会引起生产的销售问题：非生产或稍涉生产的少数人收入增长，以及为了保证工业效率而进口必需品所需要的出口的增强，都可能产生需求。为与资本主义发生冲突的种族隔离而辩护的自由主义学说将真正的问题搁置一边。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败是由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

---

① 又称“黑人家园”。指白人统治时期南非政府为境内黑人居民指定的地区。是种族隔离政策下南非政府企图将黑人排除在政治体系外的主要行政措施。——译者注

② 即荷兰裔南非人，或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后裔的南非人。——译者注

③ 即莱索托。——译者注

水平来衡量的。从这个观点来看，边缘国家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第一类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并且已经具有竞争力，或至少能通过相对较少的调整而具有竞争力，如亚洲的一些国家（其制度可能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和南美的某些大国（特别是巴西）。第二类是已经实现工业化但还不具备竞争力的国家，以及那些为具备竞争力而必须对其生产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并且要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国家，南非和一些工业化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是尚在前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发展——当它发生时——还建立在初级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石油的出口上。第一类国家形成了现代边缘国家的核心。

从这一点来看，南非的情况是少有的，这是一个同时有着上述不同类型的特点的国家。它的工业缺乏竞争力，因此它的工业（非矿产品）出口很困难，只能被局限于狭窄的市场。从全球体系来看，南非几乎只是一个初级产品的出口国。现在种族隔离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这一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国家还必须清除其历史污点的遗迹。种族隔离（它不具备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工业的能力）的失败必然是和黑人工人阶级在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的有效斗争、跟其一些组织（非国大、共产党、南非总工会）的政治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失败因为无谓的、毫无必要的参与种族隔离的实践，即给予非生产者的白人以额外补偿而后果严重。

通过妥协而废除种族隔离只能是缩了水的“民主化”程式。大多数黑人并没有“承袭”一个兴旺的国家，其结构只是稍作了些改革。或者，这是人们希望由此“推动”黑人工人阶

级参与竞争的步伐。换句话说，这是在西方积极支持下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做到的，而工人阶级为了资本的利益必须要做的。人们认为，对工业劳动者做出有限的让步就能收买到劳动的热情，而同时对改善前班图人失业农民的境遇却毫无或几乎毫无考虑，寄生阶层少数人的经济特权仍然受到保护！

通过妥协结束种族隔离是不会考虑土地改革的，没有一个地主被迫让出土地或以其开价之外的价格出售土地。大多数非洲人都接受这个原则，并在面对这样厄运时，乐意相信土地改革不再是进步的必然要求。与其重新创造出一个“前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不如加快传承下来的农业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开放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和拓展“竞争力”。这个理由仅仅是立足于工业和城市的扩张能够让所有人就业。但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工业的现代化本身是服从“竞争”的需要的，它最终会导致大批人被解雇。“储备大军”成了该体制中新贫民的等待区<sup>①</sup>（“倾销场地”<sup>②</sup>），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重新恢复与其名义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因此，土地改革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发生改变，它动员“无土地者”提出明确的要求——这在津巴布韦引起强烈反响——并无情地揭穿了非国大领导层认为“不存在土地改革要求”的谎言！但是，基本法在这一点上至今没有做出修改，只允许“恢复”能够在法庭上证明其土地是“被偷走”的“地主”（或者其后裔）的权利。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的概念——属于罗尔斯

① 原文为“aires de garage”，是准备再次出发或维修车辆的停车场。——译者注

② 原文为“dumping areas”，词义同上。——译者注

理论<sup>①</sup>所谓平等的正义的讨论范畴——不会想到今天这种体制的牺牲者的利益，必须要建立社会正义，因为这种体制是不会照顾确实存在，或是虚构的祖先“遗产”的不确定的“权利”。

可选择的办法是建立起能够支持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真正民主。这个艰巨任务的实现当然是长达30~50年的计划。这需要竭尽全力地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同时用长远眼光对人口的分布重新做出调整安排。根据这种精神，在被白人农场主霸占的农村地区，为了非洲农村无产者的利益，实行土地改革，支持黑人农村家庭扩大开垦面积，是必不可少的。所谓南非白人的农业“成功”是建立在对工薪微薄的劳动力的剥削之上的，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在土地方面——的浪费之上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占多数的黑人工人的工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特别是在教育和健康方面。为此，必须要减少少数白人庞大的个人的非生产消费。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按照新的分配方案重组现代工业部门。不过在此应该明确，如果优先考虑的目标（完全有可能很快）是变成建立一种有“竞争力”的出口的话，这种必要的重组将有可能无法完成。真正的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我所称的“分离”，不论喜欢与否。

---

<sup>①</sup> 约翰·博德利·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 1921~2002），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8）、《道德哲学讲演录》（2000）、《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2001）等著作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有评论家将其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相提并论。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最大特色，是对“公平”意义下“正义”的政治价值的强调。——译者注

目前的南非尚未走上重建的可选之路。正如海恩·马瑞斯<sup>①</sup>指出，所有人都在试图“保住”遗产（“模具的固化”<sup>②</sup>）。因此，民众斗争注定会增强，并如朗格·泽塔<sup>③</sup>所说，使得国家仍然停滞为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 四 阿拉伯世界：偏航运动能否转向？

阿拉伯世界表现出鲜明的可以称之为“融入世界的失败”的特征，尽管和东南亚或拉美国家比较，它们表面上是同样的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程度）。这一失败是经济上的：令人怀疑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没有一点竞争力，农业和食品生产经常受到衰退的打击。而同样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失败，阿拉伯国家与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趋势反向而行，阿拉伯人民似乎广泛地对用“伊斯兰教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抱有（虚幻的）希望。

当然，人们可以简单地对这种悲剧性的偏航直接解释为：它是屈从于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和“infitah<sup>④</sup>”——对外开放、对内放开）需要而引起的社会灾难的后果。无论如何，阿

① 海恩·马瑞斯（Hein Marais），作家和新闻记者。著有《南非：有限的变化——变化中的政治经济》等。——译者注

② 原文为“reinforcing the mould”。——译者注

③ 朗格·泽塔（Langa Zita），南非国民议会环境事务和旅游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④ “infitah”，埃及总统萨达特执政期间实行的对外资门户开放的政策，是当时埃及经济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举措。其实质是在经济上减少国家社会主义式的控制，贸易与投资向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同时，改革国营企业，鼓励发展国内私营经济。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后，埃及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对埃及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译者注

拉伯世界还处在当代历史前期万隆斗争最激烈的阶段，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民众性和合法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制度，也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就。这些进步似乎使运动过早地具有了抵制现代化的意识，而这个现代化是从19世纪初就开始表现出来的（19世纪下半叶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sup>①</sup>、“纳哈达”<sup>②</sup>——复兴）。问题在于这场改革的突然中断并向蒙昧主义逆转的趋势。

要正确解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对阿拉伯世界及其占统治地位宗教（伊斯兰教）的形成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只有阿拉伯人民能够发现并实行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改革，当代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在今天所表现出来的挑战才会被注意到，但是今天的阿拉伯人民显然没有重视全面的改革。

我对偏航的历史根源的解释，来自对“纳哈达的失败”和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时期之成就局限性的原因分析。据此，我对试图回应挑战的有政治谋求的伊斯兰作了批判，并努力证明各国人民面临着困境。这种有政治谋求的伊斯兰并不是一种“宗教运动”（将其置于神学讨论的试图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这是一种将“宗教感情”用于（并操纵于）权力斗争的政治运动。谋求政治的伊斯兰表现为激进的反西方（反“欧洲”，甚至反基督教），但是从来不是反资本主义的。对这些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在此只能请读者参阅我们将要提

①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现代埃及的奠基人。在担任埃及总督期间实行发展农业和工业、重视教育、改造军队等政策。——译者注

② 纳哈达（Nahda），宣扬伊斯兰复兴、反对现代西方世界生存空虚的穆斯林运动。——译者注



及的著述，如果我试图对这些结论做些概括的话，就离本书的主题太远了。

在对过去 25 年阿拉伯各国变革的分析中，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主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失败的。然而，在民族主义快速发展的前期，通过建立在社会变革（土地改革、教育进步等）基础上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已经为这种融入做好了准备；社会变革同时也缩小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扩大了中等阶层的社会基础，并由此加强了社会凝聚力和对社会现代化计划的支持。国家的积极干预——国有化是最突显的表达——在实施这个“在相互依存的谈判中实现追赶”的计划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它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当然，这个计划本身远未消除严重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使计划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也比当时人们一般想到的更快地失去了发展的潜力。这一计划的历史局限表现在，体制内民粹主义的政治管理方法，没有组织和创建权力的民众各阶级的非政治化，在 19 世纪纳哈达兴起以来的连续几十年里，禁止开展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国家与宗教关系的问题），而这在右派内部，以及右派和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已经形成不同划分（主张“封建”和“自由”），总之并不存在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

此外，国家计划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明确在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语为“qutri”）的框架下，阿拉伯民族主义只能逐步地意识到它所具有的泛阿拉伯（阿拉伯语为“qawmi”）的

一元意识，甚至是在新月沃地<sup>①</sup>，这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甚至有着更古老的起源。一元的视角——显然本可能解决许多问题并且给继续发展提供新的活力——却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即使在如马格里布或新月沃地这样的地区范围内，因为它仍然立足于非民主的原则，通过征服而将各国视为一个纳税单位，一个特殊权威人物的“下属省份”。根据这个逻辑，解放式的征服找到了它的合法性并试图对一个原先就存在的阿拉伯民族行使权力，而这个民族只能期望着救星出现以确保其存在。需要补充的是，阿拉伯资产阶级的国家计划曾被外部主导力量——西方列强有计划地击败。西方国家的这种敌对绝非是因为阿拉伯民族运动和苏联的结盟，恰恰相反，结盟是对敌对的回应。西方国家仇视阿拉伯国家的真正理由，是担心在欧洲南翼有一个现代化的、单一的、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国家，它将成为其世界体系中不得不考虑的伙伴。以色列就曾被当作不断侵略的军事工具，这种不断的侵略在颠覆阿拉伯民族政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地缘战略的考虑就是西方列强对阿拉伯世界资产阶级持有敌意的原因。在此，该地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在于其处在当时苏联的南翼的地理位置。这种战略同样也说明了阿拉伯世界失败的原因。反过来说，地缘战略的考虑迫使西方帝国主义支持，或至少是允许东亚资产阶级

---

<sup>①</sup> 新月沃地（Croissant fertile），美国东方学者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推广的术语，指西部亚洲“两河流域”（伊拉克）连接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的弧形地区。因土地肥沃，形似新月，故名“新月沃地”。是人类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译者注

的发展，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东亚地区在战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所取得的“成功”。人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万隆会议后不久，美国动员它在该地区的忠实盟友——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积极推动召开“伊斯兰教会议”。其目标就是在宗教基础上分裂亚洲和非洲人民，当时，那些不结盟的国家对此是很清楚的。“会议”成为一个避风港，并在其中形成了谋求政治的伊斯兰运动。

不管怎样，今天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自由主义认为，所谓“开放”的新政策已经来到，“过去的积习”已经结束，真正的所谓“良好”的发展已经启动。实际正相反，新政策打碎了发展势头，分裂了阿拉伯世界并加剧了其内部的对立，并最终使这一地区陷入复兴无望的毁灭性的社会灾难之中。

阿拉伯国家的重新买办化——这是“三合会”战略的真实目的——包括了经济、政治和战略等不同的方面。“三合会”战略努力使这一地区按照特殊的重新买办化逻辑，分裂成三个不同的次地区。

海湾石油地区直接处在美国军事占领的打击之下，因此在政治和财政上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它已经从阿拉伯世界中分离出去了。至于马格里布国家，则陷于与欧洲关系的未知后果的谈判之中。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些计划仍然还是极为模糊不清的。马什里克（Mashrek）<sup>①</sup>阿拉伯地区是美国一以

<sup>①</sup> 又译马什雷克，指从埃及西部边界到伊朗西部边界的地区。包括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译者注

色列目前正在实施的所谓“中东计划”的目标。这涉及在这儿建立一种完全一体化的经济，参与者有三个——以色列、被占领的将来要被当作如同班图斯坦那样失去主权的地区，以及约旦，今后还要加上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这个计划基本上是为以色列拓展经济扩张的空间，保护以色列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能力，以应对许多更有竞争力的国家。关系到被占领地区和阿以和平的马德里和奥斯陆协议以单边的方式表明了这种意图，但是，这违背了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国和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力的决议，这些原则在联合国有关决议中也被反复重申过。实施这些政策仅仅是力图巩固军事当局在被占领地区有步骤地建立起来的班图斯坦的地位，并摧毁这些地区的生产（通过剥夺其农业的水资源、征用其土地、摧毁其村庄、迫使其经济向以色列国库交纳附加税、破坏其交通设施和社会服务等）。通过这些措施，占领当局强迫阿拉伯就业人口大量地转变成每天迁移的工人，为以色列经济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在政治方面，美以计划并不打算承认有主权的，特别是在海关、税收和货币政策上自主的巴勒斯坦国。也不承认联合国决议重申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力。

不管怎么说，这个计划仍然是脆弱的，因为，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会不断地斗争下去。此外，该计划还使得埃及在本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作用边缘化，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埃及当局将会永远接受这种状况。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计划还将同样重要的伊拉克未来的问题搁置起来，或者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目前，这个计划还没有涉及已经被完全边缘化了的阿拉伯的第四

世界（毛里塔尼亚、苏丹、索马里和也门）。

总体上来看，这个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计划从来就没有过将阿拉伯世界从困境中解脱的目标。它只是针对危机管理的眼光短浅的政策，而不可能是别的；也不是要建立超越危机的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此外，石油利润滚滚而来的繁荣年代（1973~1984）是建立在消费的幻觉上的，而生产基础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得到加强。当然，这种幻觉也使决定性的政治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当时的“门户开放政策”（infitah）表面上看具有合法性，并得到舆论的广泛赞同。然而，我们应该预计到，幻觉必定是短暂的。恢复进攻态势以后，美国强行操纵并迫使海湾国家处在被军事占领的受保护国地位，控制了它们在金融市场上的命脉，并对利比亚实行毁灭性的封锁（最近刚刚解除）。这些危机管理政策带来的经济倒退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濒临“第四世界化”，也就是说，在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与撒哈拉沙漠非洲和某些亚洲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伍了。

## 五 从三大洲的视角来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所有当代（“后哥伦比亚的”）美洲国家都有着从其形成中继承下来的某些共同特征。由重商主义的大西洋的欧洲所造就的这个大陆，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其人口来自19、20世纪的移民浪潮，拉丁美洲与亚洲和非洲是不同的。

重商主义的历史一页翻过去后，独立的美洲各民族的命运走上了不同道路。美国成了新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中心，其门

罗主义（1823年）的特征，表现在为了自身利益控制其周边地区剩余大陆的野心。通过与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寡头中实力阶层结盟、从事移民活动的地方买办小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主导全球卖方市场（欧洲和北美）的资本，这种不对称维持了整整两个世纪并不断加深。它形成了以巨大的不平等——远比人们所知道的严重——和“土著人”（墨西哥和安第斯国家的印第安人）、黑奴后代受殖民奴役同时存在为特征的内部社会结构。

美洲人民从来不接受地方统治阶级带给他们的悲惨命运，两个世纪以来，他们没有停止过斗争和革命。部分受过教育和有知识的阶层也拒不接受华盛顿的束缚；当这部分人与本国人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便极有可能形成反帝斗争，并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潜在使命。墨西哥革命（1910~1920）和晚些时候的古巴革命，以及阿连德的智利“社会民主”试验成为美洲最辉煌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试图实行完全类似亚洲和非洲不结盟的“发展模式”（西班牙语为“dearrollista”）。这种模式同样是很早就被所谓“附属地（dependencia）”学校里的左派们所批判过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批判，而且还使格瓦拉时代的武装斗争具有了合法性。玛尔塔·阿内克尔<sup>①</sup>曾对过去50年的历史做了精辟分析。拉丁美洲——其人民和先锋分子——与万隆会议的亚洲和非洲很接近。但是不同的是，旧世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和发展计划同时属于政府——产生于

<sup>①</sup> 玛尔塔·阿内克尔（Marta Harnecker），智利作家和社会学家。

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人民，而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府则表现出作为解放运动反对者的姿态，它们是华盛顿的忠实盟友和附庸。古巴是个例外，只有它投身于不结盟阵营。在哈瓦那革命胜利后，三大洲是人民的阵线，由其革命组织所代表，而不是各国的政府。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展模式”像万隆会议下各国民粹主义一样，以同样的原因和方式走向衰败。但是在这里，这种发展模式却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和承认的）残暴军事独裁的最后阶段中得到广泛采纳，它的崩溃必然会导致有问题的独裁政权的崩溃；并由此引起人们对继承民主的暧昧：因为这种民主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胜利密切相关的。如同人们所知道的，由于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悲剧，使限定于多党制和选举的民主选择在民众各阶层中已经贬值了。然而拉丁美洲人民意识到挑战的真实本质，仍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墨西哥新萨帕特主义运动、巴西卢拉领导的劳工党、委内瑞拉查韦斯领导的党及基什内尔（Kirchner）阿根廷革命便是证明。同时，这也并非偶然，拉美与亚洲和非洲日益明显的接近，并有可能在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内形成一个20国集团（以巴西、南非、中国和印度为首的）。

拉美人民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巨大的。这个挑战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和社会的，也有内部和外部的。应对这一挑战意味着需要在三个不可分开的方面同时取得进步：（1）通过扩大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内的民主使民主化得到深入发展；（2）着眼于被统治阶层的利益保护社会进步，减少不平等；（3）面对华盛顿的控制野心巩固国家的独立。然而，当代拉美至今没有

和实施使三个方面必须同时取得进步的战略。人们知道，在过去的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民粹主义者的试验（由贝隆首创，巴西和其他国家竞相实施）成功实现了社会的进步（阿根廷最明显，其他国家则有限），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无论如何还没有实现民主。人们知道，在独立和“外国资本控制”的意志都表现明显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施行军事体制的时候（当然并不都是这样）。人们知道，某些民主的进步是付出了相当的社会萧条的代价的，但并不是衰败的萧条，也永远不是以民族自治的倒退为代价。在巴西，F. H. 卡尔多索<sup>①</sup>比其他的更多地象征着这种选择。作为先锋表率卢拉的巴西、查韦斯的委内瑞拉起初是谨慎的，将来是否会在上述三个方面，勇于面对挑战并具备能力取得进步？

拉美和其他地区一样，内外的挑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没有投身社会变革的合作伙伴，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多极化，对拉美国家来说，社会变革就是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束缚。

## 六 东方：新的南方？

在前文各章中，我唯一提到的，已经成为不折不扣资本主义国家的前东方国家只有一个：俄罗斯。在关于“三合会”的第一章中，我曾思考过“真正的欧洲”的问题，它的边界只停止到德国东线，这样就把欧洲联盟的新成员国和候选国都排斥在外了。

<sup>①</sup> F. H. 卡尔多索 (F. H. Cardoso)，巴西社会学家，巴西前总统。



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我所分析过的所涉国家“拉美化”的理由，所以事实上这个选择是“西方的”欧洲国家政府最终必然会做的。我通过这样的表述是说明，在这样的欧洲联盟里，“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和东欧及东南欧之间的经济关系完全如同美国和拉美的经济关系，是弱国从属强国的不平等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欧洲联盟的作用如同北美自由贸易联盟（Alena）将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整合为一体的扩张计划一样。不管每个地区制度的形式如何不同，甚至可能是一些“愿望”，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幻想。因为，“市场的开放”除给东欧带来严重的社会倒退外什么也没有。

可以肯定的是，讨论有关国家的人民面临这种新的挑战时可能发生的反抗是很重要的，同时，讨论对欧洲计划本身所希望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

## 七 重建南方国家人民的团结

万隆会议的时代已经消逝。所有边缘国家重新买办化已经来临。然而，这个重新买办化是在万隆计划开展之后实际产生的不同结果的基础上，在新的情况下发生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所设想的结构调整，就是简单地让边缘国家根据有利于中心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进行单方面的调整，而我们需要的是相互的调整，是明确的世界发展不平衡的各主要地区的相互调整，是建立在集体谈判的基础上的调整，是在考虑到两极分化所带来的不平等后果的情况下，根据各国和地区发展战略的需要，对全球相互依存关系进行协调的集体谈判。

然而，符合主导逻辑的调整过程却成了有利于它永久化的政治条件。在那些最富机遇的第三世界国家里，这些调整过程加强了从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实际获得好处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在那些刚好算得上是第四世界的国家里，它们却造成了对符合民众愿望的国家凝聚力的破坏。这种倒退使国家分裂中几乎是必然发生的社会动荡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由于社会统治集团的分裂和国家合法性丧失，国家分裂形成了按种族或伪种族的地区分裂。非洲已经有了几个这样的例子。最后以分裂而告终使得边缘化进一步加剧，但它只对于有关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个悲剧，而并没有“威胁”到“世界秩序”。

然而，并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即使这是困难的。这就是首先要从根本上建立起真正的民族、人民和民主的阵线。而且还必须要在世界体系的层面上启动各种改革，建设真正多极化的世界，减轻在当代世界中对凝聚力的制约，这种凝聚是符合大众心愿的民主选择。

迎合自由主义全球化需要的政权的买办化因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广泛地失去了合法性。其结果是，重造（remake）人民团结在政府周围的万隆会议精神在今天已经成为梦想。重建团结首先应该是有关国家人民的事业。因此，只要迫使政府（必要时撤换它们）走出自由主义的桎梏，奠定建设新的积极的南方阵线的基础，就能够重新燃起希望。

即使一些南方国家显示出，至少在表面的形式上是按照民主选举的原则来实行管理的（几乎并不多），而实际上，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民主，而且有的有时还是令人感到十分丑陋的。但这种专制政权是有利于那些少

数买办的，而这些买办的利益是和全球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扩张联系在一起的。

替代性的选择是通过民主化进程建立南方国家人民阵线。尽管这个必要的民主化过程是困难的，也是长期的，但它肯定不是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来实现的道路，这种傀儡政权将国家资源交由北美跨国公司任意掠夺，是非常脆弱的、不可靠的，并因其在美国入侵者的庇护下上台执政而缺乏合法性的。总之，美国的目标并不是在世界上鼓励民主，尽管它说的很多，但实际上完全是虚伪的。

#### 作为南方国家及其人民团结立足基础的联盟之指导性路线

从某些南方国家所持的立场及形成其发展道路的思想意识中，人们能够勾勒出可重现“南方阵线”的指导路线。这些立场既涉及政治领域，又涉及全球化的经济管理。

- 在政治方面：谴责美国的新政治原则（预防性战争）并要求从亚洲、非洲和拉美撤走所有的外国军事基地。

华盛顿选择其最需要打击的地区是阿拉伯的中东地区——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为此它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美国重新进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阿富汗、中亚及原苏联的高加索国家）。这些目标的实现将使美国能够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由美国武力强加于它们的傀儡政权。从北京到新德里（Delhi）和莫斯科，人们越来越发现有些美国制造的战争，最终形成对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威胁，这种威胁不逊于对其直接受害者，如对伊拉克的威胁。

重新回到万隆会议时的状态——当时美军在亚洲和非洲没

有军事基地——应该是人们今后关注的目标，即使在当时情况下，不结盟国家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建立保护国制度的问题保持了沉默。不结盟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类似法国和德国在安理会上保持的缄默，同样也使得入侵者在外交和道义上更加孤立。

外国军事基地和军事威胁的问题不仅仅是在亚洲和非洲存在。巴西的亚马孙地区同样是觊觎的目标，因此，美国在哥伦比亚的永久性的军事存在肯定会使巴西感到不安。对古巴的威胁，以及美国将加勒比海地区视为其“后院”而肆无忌惮，更是为南方国家回到团结一致上来提供了另一个理由。

• 在世界体系的经济管理方面，人们同样可以勾勒出南方国家集体防御的可选择的指导路线，因为所有南方国家在此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

#### **回到国际资本流动必须得到监控的思想上来**

事实上，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为“自由主义”新的信条的资本账户的开放，仍然只有一个目标：使大量资金更方便地流向美国以弥补其不断增加的亏空——它本身既是美国经济缺陷，也是其全球军事控制不断发展的产物。这样轻易地资本流失对南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并且由于投机性的袭击（raids）而可能带来严重破坏。根据资本账户开放需求的逻辑推断，让所有国家一下子都实行“弹性汇率”（change flexible）所能带来的运气是应该受到怀疑的。对它们来说，为了确保相对稳定的汇率，需要建立区域组织体系，这应该成为不结盟国家和77国集团内部探讨和辩论的目标。此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主动建立了汇率管理，从而胜利地度过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不得不对之予以承认。

### 必须控制资本国际转移的观念重新回来了

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国家决不会考虑对所有外资关门的，如同它们中某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样情况。相反，直接投资是它们所要的。但是，接受方式再次成为批判反思的对象，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界里，对此并非是无动于衷的。与这种调整密切相关的是国际贸易组织（OMC）希望强行推广的知识产权及工业产权的概念，这种概念今后将成为挑战。人们知道，这种概念远非是有利于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透明”竞争的，而是正相反，它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垄断。

南方国家中许多国家重新认识到，它们不能放弃发展农业的国家政策，这种政策既重视保护农民地位的必要性，同时保护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地位因为国际贸易组织在此领域推广“新的竞争”而正面临加速崩溃的毁灭性后果

事实上，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使美国、欧洲与极个别南方国家（南美洲南锥体的国家）得以向第三世界倾销它们的剩余农产品，但却毫不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产品在北方国家市场上遭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由此，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受到了威胁。不过，这种自由主义的战略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加重了农村向城市贫民窟移民的问题，也激起南方国家农民的反抗，使这些国家的政权今后再无宁日。

仅从欧洲和美国不仅对农业生产者，而且还对他们的出口实行农业补贴这一角度来看，农业问题常常引起很多争议，特别是在国际贸易组织的舞台上。欧美农业补贴是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唯一的问题，只要对此作出约束，就能够立即解决我们前

面提到的大部分担忧。但是这种约束也有一些奇怪的模糊之处，因为它鼓励南方国家采取比北方国家政府事实上所采取的更加自由的姿态来保护自己，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但是世界银行从什么时候起在南方国家面对北方国家时保护它们的利益呢？）。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将他们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毕竟，如果我们要捍卫我们收入重新分配的原则，北方国家就同样也有这种权力！）与它们注定要对北方国家对农产品出口倾销所给予的支持分开。

**债务已不再仅仅被视为不可持续的经济，它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质疑**

以恶劣和非法债务的单方面废除为目的的愿望，是要引入一项从来不曾有过、可称之为债务国际法的法律。事实上，一次普遍的债务审计（audit）就可以看出这种不合法的、恶劣的，甚至有时是无耻的债务所占的显著比例。然而，仅仅凭证券所支付的利息，就能够达到债务总量，以至于还债规定——这是具有法律根据的——实际上取消了未还债务，同时也使整个这个过程十足是抢劫的原形暴露无遗。为此，外债应该像内债一样通过正常的、文明的立法来予以规范的概念，应该成为以推动国际法进步并加强债务合法性为前景的运动的的主要内容。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恰恰是因为在此领域内没有法律的声音，才使得问题只能通过野蛮的强力关系来解决。这种关系使一些国际债务拥有了合法性，而如果它们是内债的话（债主和债务人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司法范畴），这种债务的债主和债务人就有可能被当作“犯罪团伙”而告上法庭。

最后，与文化差异相关的问题必须放到本书所论述的新的

国际视野中来讨论。文化差异是一种事实，但也是复杂而混乱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异，虽然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并非必然等同于未来的构成中的差异，而这是不仅应该被承认而且还要努力追求的。专制政权和买办政权往往用历史遗留下来各具特色的差异（谋求政治的伊斯兰、印度教、儒教、黑人文化、沙文主义的种族特性<sup>①</sup>等）来蛊惑人心，这使它们在回避文明普遍化挑战的同时，事实上使占主导地位的跨国资本得以操纵一切。此外，在对待这些历史遗产上的强烈的唯我独尊，也使得第三世界产生分裂，在亚洲是政治伊斯兰和印度教的对立，在非洲是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徒的对立。重新建立南方国家统一政治阵线是摆脱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分裂的办法。但是，怎样来推动因共同贡献而丰富的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进一步得到发展呢？这场辩论不容忽视。

<sup>①</sup> 原文为 *ethnicités chauvines*。——译者注

## 第六章

# 联合国的改革和多极化的全球化

“三合会”的领导阶层认为，联合国已经“完成了使命”，联合国大会已经不起作用，并且实际上已为八国集团和北约所代替。这是真正有力的一记打击，是对国家（准确地说是南方国家）主权的否定，甚至是对国际法的否定。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这里或那里经常出现的甚至往往也为“三合会”国家所维护的“多极化”的概念，仅仅表明了它们“重新保持大西洋主义平衡”的意愿，而不是别的。

真正的多极化应该包括对其他一些原则的承认：尊重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当然，确定其内容的概念本身也需要得到修正，不是根据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需要，而是相反，从推动进步的角度，通过协调上述需要与全球所有国家的民主化的需要进行修正。这种修正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国际机构，其中首先就是联合国。

### 一 联合国框架下的国家主权管理

长期以来，联合国结构呈现出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两个方面重合的特点。从长的时间段来看，这种重合是资本主义全球



化的产物，显示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特点，但是，由于体系的变革，这个重合在今天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它的使命早就该结束了。事实上，这个世界—体制的哲学是建立在两个原则上的：国家（就“民族—国家”的性质而言）的绝对主权，多中心主义。

开创这一体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仅仅是特定于天主教旧世界的场域内，其统一性因宗教改革的爆发而被打破。直到《维也纳条约》（1815年），它才得以在全欧洲普遍推行，并在1920年因国际联盟（SDN，简称“国联”）的成立而实现了第一次在全球的不完全推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两种胜利而告终，民主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亚非人民对殖民主义的胜利。联合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这一双重胜利影响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管理制度，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国际组织的层面上。它形成了那个时代三种主要的“社会的历史性妥协”：在西方是福利国家，劳资妥协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得到在以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从未有过的尊严，在获得自由后的亚洲和非洲国家里，则是事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我所说的各种国家民粹主义。

同时，这种双重胜利也打开了国际关系中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政治管理之路，并由此提升了联合国的作用。今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说，正是“冷战”的两极化和否决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使联合国有可能发生“瘫痪”。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因否决权而强化了的两极化，却使得这一体系的边缘国家（亚非拉）有了曾经失去的回旋余

地。因此，某个时候，由于我们所讨论国家的人民提出尊重主权的要求，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也会被迫做出“调整”，并接受（或参与）它们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计划。在万隆时代（1955~1975年），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不断发展的主导趋势，即使不是受到绝对的至少也是温和的抨击。联合国的飞跃和辉煌正是在这一时期，这绝非偶然。

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确定了一种多中心的全球化观念。由此我们理解，建立在谈判原则上的全球化组织形式，是所有方面的多样性真正得到尊重的唯一保证，当然包括文化和语言，但同样也包括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平等的历史产物。多中心主义尊重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无论其“大”或“小”，承认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有权以某种方式形成自身一个中心，并因此而承认相互依存，承认全球化。这意味着，必须学会适应所有合作伙伴在“自我为中心”的愿景下提出的合法要求。全球化就是“谈判”，即使不能做到完全的平等，至少是在想着缩小不平等而不是使之继续发展。一方面是实际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和平、民主和相互依赖的发展的普遍要求，两者如何协调是一种挑战。

因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而形成的国际秩序建立在三个相互补充的原则上：尊重国家主权、禁止战争、禁止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在国联（SDN）框架下，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并不涉及所有的“国家”，某些国家的被殖民化向来被认为是“正常状态”。同样，国联显然也没有明确地禁止对战争的诉求。《联合国宪章》之所以扩大了这些原则的运用范围，正是因为它们曾经被

法西斯国家拒绝过。在 1945 年“二战”胜利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加强了禁止战争诉求的原则。各国有权捍卫自己的主权不受任何入侵者的侵犯，但如果它们是侵略者，那么它们从一开始就会受到谴责。国家之间的所有冲突都必须通过谈判的政治方式予以解决，并有可能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必要时，只有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授权组织军事干涉。同时，这种军事干涉还必须在时间和规模上受到限制。此外，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承认国家主权的原则扩大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殖民化的观念毫不留情地受到谴责。

在这个框架下，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同样依旧是国家的专属权限，没有“人民”（个人或组织）可以主张权力，这种权力是将它们排斥在外的。这曾经是，并仍然是海牙法院的规约。针对某些罪名（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设立一个具有裁判资格的国际法庭的观念是最近才形成的，却始终被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和其他某些国家所摒弃。

通常的主权观念在绝对的意义上仍然被理解为禁止任何国家“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只要看上去治理是“稳定”的，各国的代表就只能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理解下的世界秩序也含有人权绝对属于各国内部事务的观点。表明这些权力的联合国声明并不具有法律价值，也不带有任何超越各国行政当局的司法权。只有欧洲后来走得更远，它创建了欧洲法院的雏形。

基本社会权利（生命权、生存权、教育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工作权）和劳动者的权利一样，完全属于国家的立法范畴。根据第三世界（77 国集团和不结盟国家）的要求，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权利被写入联合国总宣言（但用词模糊）。比起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多边调整的民主计划，这份宣言更多地体现了在1960~1970年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的民族和民粹主义的观点。

整个这个法律体系，它的基本概念和实践，表明了民主的诉求本身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民主的进步被视为值得追求的目标，它的实现就不会让位于经济发展之后，而应该是第一位的目标。这种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理念，不仅仅在非洲和亚洲承认一党制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如科特迪瓦、肯尼亚、马拉维、扎伊尔等地）的地方占有主导地位。它同样也对拉丁美洲“发展主义”（desarrollismo）<sup>①</sup>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在国际上被“民意”认为是合法的。它成为这些国家政府的具体政策和作为捐赠人的机构的实践的理论基础，当时这些捐赠人的行为从来不受“民主条件”的制约，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

① 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张。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附这些中心，属于它们的外围。中心经济的多样化决定外围经济的单一化和不平衡地畸形发展，因此，必须进行国际经济关系的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外围”国家的工业，使其提高到“中心”国家的水平。主张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加强“外围”国家相互贸易的政策，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要打破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提高和储蓄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不只靠拉美经济的自发机制，必须发挥国家的力量，通过制订发展规划，达到更有效、更合理地利用有限资金；为提高经济增长率，要靠外资来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但必须有国家去保护和促进拉美本国投资的增长，并对外资进行适当管理，以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收支平衡。这些主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要求发展和实现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为他们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的斗争提供重要根据，同时，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myy.cass.cn/file/200512194056.html>。——译者注

## 二 联合国作用总结（1945～1980年）

联合国的鼎盛时期处在这个时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更准确地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到1975～1980年之间，这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也正是人们所说的“发展的十年”。随之而来的问题和危机并不是联合国而是它所处的世界体制所造成的。

对这个时期作——积极的——总结并不难：不论是在这个体系的中心国家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获得自由的绝大多数边缘国家，经济“增长”率都是现代任何时期中最高的，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的自豪的现代国家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联合国伴随着这些惊心动魄的变革得到发展。在政治方面，国家主权和多中心主义的双重原则制止了过去帝国主义时期司空见惯的粗暴干涉，但是，自北约自己承担起治理全球的责任以来，这种粗暴的干涉又重新抬头了。在经济管理方面，谈判的原则得到了确立，在各自领土范围内，自主的民族国家按照各自的意愿组织了自己的生产体制和财富分配体制。毫无疑问，“悲观主义者”将会说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谈判（比如说，其中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很少有结果，除了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声明外。无论如何，国家仍然是至上的——在内部事务方面——并因此而拥有实际谈判的权力，这就使它们的领导阶层可以借之做其想做的事情。

在维护和平方面，由联合国实行的这些原则，直到海湾战

争（1991年），确实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联合国使反对（英国、荷兰、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的）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具有了合法性，并积极支持多中心体制的构建。与随后到来的时期相比较，这是个只有少数“内战”的时期；如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某些大国为了从中攫取利益往往是火上浇油，正是联合国的体制使它们的阴谋（如比夫拉战争<sup>①</sup>的情况）难以得逞。毫无疑问，联合国有时也会被人操纵（如在朝鲜战争中）或保持中立（如在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或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联合国当然是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合法地位的，不过根据的是一些非常有争议的限制条件（规定犹太复国主义不得实施分割计划），但后来它又试图限制特拉维夫扩张主义者的野心：谴责1956年的三方入侵<sup>②</sup>，并通过第242号决议对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给予谴责。

每年的联合国大会总是一大盛事，受到全世界重量级政治家的关注。这就可以说，即使一部分国家和另一部分国家所表明立场并不总能够达成有效的妥协，但是彼此的立场却可能得到全体成员国的重视。

---

① 比夫拉（Biafra）位于尼日利亚东部，盛产石油，居民主要是伊博族。1967年5月，伊博族军宣布脱离尼日利亚，成立“比夫拉共和国”。同年7月，中央联邦政府发动进攻，10月攻占“比夫拉共和国”首府。1970年，比夫拉军队投降，尼日利亚重归统一。——译者注

② 即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重兵入侵埃及的西奈半岛，随即英法于10月31日派遣军队大举进攻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等重要城市。入侵遭到埃及有力抵抗。11月1日，埃及政府提出“总体战”，全面反击三国入侵。当时联合国发表了一系列提案和谴责决议，并于12月15日派出联合国紧急部队进入埃及监督停火和撤军。英法联军和以色列军队被迫于12月22日和1957年3月8日先后撤出埃及。埃及反抗入侵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译者注

联合国并非自然消亡，它在1990~1991年曾因美国在其“三合会”盟国的支持下决定要结束它在多中心管理和维护和平上的责任而遭到致命打击。联合国还曾因华盛顿的决定而受到过致命打击——后者要在全世界扩大推行门罗主义。

但是，鉴定这个体制的局限性并没有太多的困难，这个体制一方面沉溺于发展的幻想，另一方面存在着民主赤字。

诸多发展的概念是基于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范式的假设，这一范式是建立在经济管理与政治权力实践的共同作用之上的。经济发展的概念本身属于一种具有“追赶”特性的资本主义扩张逻辑，它自己假定“技术是中性的”，并且资本主义历史所产生的分级结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但愿这种模式至少使国家一直起调节者的积极作用，偶尔代替缺失的资本家阶级（或买办）；但愿它——在不同程度上——给社会所穿的外衣，没有给它赋予社会主义的性质，而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经常是被过于仓促地赐予的（这就是我更愿意将其定为民族—民众主义的原因）。

现在事后看来，由于当时发展取得的成功，使其造成的幻觉更加突出了，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新自由主义将这一“失败”工具化，则肯定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后来强加于人的幻觉，在本质上更具有毁灭性：他们认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能确保“更好”的发展。不顾事实地美化出来的幻觉并不符合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即使就其体系内追赶之意的狭义而言，发展也永远是受到强制性约束的，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了的资本之扩张的主导性逻辑，接受与之产生冲突的发展战略，它便不得不要受到约

束)，与最近 20 年来变革的停滞（落入陷阱的发展被没有效力的慈善话语——“反对贫穷的斗争”——所代替）和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也严重地不相符合。

此外，人们还看到这一体制并没有对民主给出任何注解，除了纯粹的空谈。今天，各国人民——尽管程度不同——比在福利国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或国家民粹主义时期更加渴望民主。我确信这种变革是积极的，即便我们所讨论的民主需求仍然是帝国主义强国容易操纵的目标。在那个时代的精神中，绝对的主权是国家的主权，国家被视为其人民独一无二的代表。同样，在那个时代，各地领导阶级常以“国家建设”需要的名义来为拒绝民主作辩解。

随着形势逆转，逐步减缓的经济增长终结了曾使大多数社会阶层受益的好日子（尤其是中产阶级，但就使青年一代在社会中地位得到提高而言，同时也包括各大众阶级）。“国家的”话语一下子失去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曾使之不必考虑民主权力，甚至是基本人权问题。

归根结底，由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和支持多中心主义的政治行动，联合国对这些国家战后计划的施行确实做出了积极贡献。而承担责任的各种政治制度，尽管是不民主的（或者充其量还不够），总体上也不像今天人们常说的那样“令人讨厌”。鼓吹现代化、对世俗化持开放态度、推动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程度不同的……），这些专制政体常做出“开明专制”的样子。人们所熟悉的那个时代最令人厌恶的政权，实际上是由只要能做就会毫不犹豫去做的帝国主义的反对者建立起来的或得到其支持的：如扎伊尔的蒙博托、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南美



的独裁政权等就是证明。以后的历史——及在阿富汗对塔利班的支持（在那里蒙昧主义独裁政权接替了开明专制的独裁政权，并被很快地认定为“共产主义者”）——证明了国家民粹主义被腐蚀而出现的倒退。

由于没有对那个时代的成就进行客观的梳理，今天对联合国行动的批评往往是非常肤浅的，举例来说，强调“联合国官员”的“平庸”。如果将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的国家或多国（如欧盟）机构体制做一比较，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 三 经济和政治管理空间的冲突和契合

确定一个社会产生的维度总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个社会的协调取决于这些不同方面因素的契合程度。这种契合有时在相对来说比较重大的地理空间的层面上是有效的，或者反之，则是产生离散的作用，特别在微观的社会层面上更是如此——如在乡村。人们所说的这种契合并不排除出现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它们出现在与具体的社会现实的需求相关的各自特殊的逻辑之间。相反，这些矛盾的发展正是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动力。此外，我们所说的契合总是相对的，这是在基于这种契合的特定社会很难绝对地或几乎是很难做到自给自足，但通常属于“社会体系”的意义上而言的。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儒教的空间决定了社会总体上的共同文化（宗教和哲学）领域。以同样的方式，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社会之间的商品交换的空间，它们把许多社会相互关联起来，并因此而或多或少地相互依存。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这种

空间由整个世界组成，赋予社会再生产的经济部门以“经济—世界”品性。但是在以前，我们同样可以找出很多的商品交易的空间，举例来说如“丝绸之路”所代表的空间。

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形成的模糊界线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简练，并赋予相关社会一种表明其身份的明显的一致性。人们可以称其为“市场”（表明经济的一种有争议的简称）、国家（政治权力的管理空间）和社会（文化认同）的契合社会。

资本主义首先是在旧大陆的特殊地区——西北欧的小 1/4 部分——获得成功。该地区的特点是经济再生产的条件（封建领地的自给自足大量地减少）和政治管理条件（封建领主的政治权力同样大量减少）同时具有很高的分散性。在构成封建制度的基层组织中，更广泛的空间依旧保持着不高的密度：共同的“基督教民族”既不配合其头领（罗马教廷）的实际权力，也不与皇帝或国王为伍；商品交易事实上是有限的（此外，这种“远距离的”交易——“丝绸之路”——与本地的商品交易相比是占优势的）。因此我明确地认为，各个时代的这种“朝贡”家庭社会的（封建）形式是一种“边缘”的形式，与中心形式不同，后者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是在更加重要的空间中存在着经济/政治的契合。在我看来，在朝贡世界的边缘地带出现新资本主义的早熟形式，不是纯粹偶然的。

最初，这种新的凝结形式、商品交易的加强是发生在我称为资本主义起源时的混乱时期。政治管理和经济再生产是破裂的。贸易网络与封建旧政权和行业同业公会相悖，并同时并存于这两个方面。自中世纪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欧洲地图呈现出各公国拼图的样子，各领域、自由城市彼此越来越依赖于避开政

权的商业网络。这种模式与中央朝贡模式形成对比，后者的特点是商品经济服从政权，成为完美的资本主义形式诞生的障碍。初期的混乱将被克制，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市场/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契合得以重建。通过准备土地而创造了独立于旧制度的君主制度的联合省，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生了当代世界组织的优秀“模式”。

对主权（国家、民族、人民）的确认是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结构的产物。资本积累的管理空间（市场）、政治管理的空间（国家）与单一文化确认的空间（民族）的契合，是资本主义成熟期发展的特点。当然，这种三重契合仅仅在中心资本主义“大国”中存在。但是它已经变成了所有其他国家的范式，尤其是为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和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革命所用。这种对主权的确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晚才有了充分的表达，展现了联合国几十年的辉煌时期。

今天，这种模式已经进入最后的瓦解时期。在新的挑战条件下重归混乱：这超出了今后将被废除的资本主义的挑战。

#### **四 混乱的帝国：主权、社会公正及 跨过陷坑的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变革是无可争辩的重要事实，它不仅涉及当前的“技术革命”（信息、太空与生命技术），还对工作组织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对其广泛性和意义的讨论不是本书的主题（我将在附录二中介绍有关读物）。无论如何，

这些技术革命事实上呼唤所有涉及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管理的有关概念：“市场”和公共干预的各自职能、民主实践和社会公正、权力功能和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

人们是否可以简单地认定这些主导力量对新挑战的应对对策是“对的”，或者不管怎样也是“无可选择的”？这当然不是我的观点。相反，我认为这些对策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为在社会公正下的发展前景连同人民的主权设置了陷阱。这些对策是与社会和国际力量关系的不平衡相关联的，追求的是世界化的资本之主导环节的利益——受到“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自由主义论调的启发，除了产生“混乱的帝国”外，不会有别的。它们由此形成了寻求全球化的军事化和有利于美国霸权主义计划发展的条件。

当代的混乱与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混乱并不一样。历史上“市场/国家”契合的结构伴随着高级资本主义方式的发展，形成了当时社会的真正进步。今天，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已经衰竭，除了野蛮的失控不再有任何作用。挑战迫使人们想到“超越资本主义”，并因此而集中分析经济（“市场”即资本主义）、超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世界层面上，这种冲突都涉及现实的各个方面。

今天我们面对着唯一一个有关未来的计划，它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有步骤地以暴力（包括军事方式）的方式所设定的，它本身就是为世界化的资本之主导环节服务的。这个计划——“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计划，它出现于其自然发展的现阶段，与其内在逻辑相符——与“自由主义”所说的市场（“竞争和透明”）占主导、通过“公民社会”代替

国家（“官僚的”甚至是“专制的”）而升级的民主、和平的保证（以结束残忍的“恐怖主义”为唯一条件）毫不相干。这个计划是世界化的资本之主导环节（“三合会”帝国主义的跨国组织）的计划。我曾将大多数人所面临的未来视为“世界层级上的种族隔离”。反对亚非拉人民的长期战争因此被当作一种实现未来计划的必需途径。从这个视角来看，显然联合国本身再起不到任何适宜的作用：它或者成为借来进行反对“南方国家”战争的驯服工具中的一种，或者不得不消失。

美国霸权主义计划属于“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逻辑。它意味着“美国国家利益的主权”高于其他所有被限定为“合法”手段的政治举措。当然，过去的帝国主义并没有什么与此不同，与无可置疑的历史先例如出一辙，同样的理由被用来减轻当前美国“权势集团”的责任——及其罪恶行为，为其寻求谅解。但是，准确地说，这本来是人们希望看到的自1945年以来历史的变化。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法西斯强国对国际法的蔑视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所以，联合国是建立在宣示以禁止战争为特征的新原则基础上的。然而，这个打开文明进步道路的美好创举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领导阶级的正视。华盛顿当局在联合国的协调中总是感到不自在，并且现在粗暴地宣布它曾经不得不隐藏起来的主张：美国甚至不接受高于它所重视的捍卫“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国际法概念。美国不是唯一要对失控负责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始作俑者，它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火上浇油（通过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过早的承认），继而与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和阿富汗战争导向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欧洲是否会从伊拉克战争开

始调整它的立场，还不得而知。无论怎样，只要欧洲接受北约作为全球化管理工具来取代联合国，回归多中心主义原则和复兴联合国的作用就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摆上华盛顿宣传机构议事日程的，是所谓不可忽视并因此而决定未来的“文明”（实际上是宗教）的冲突。通过有步骤实施的方式——在尊重差异的借口下推销共同体主义，攻击世俗主义（“土老帽”<sup>①</sup>），颂扬被后现代主义与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同等对待的宗教蒙昧主义，有步骤地推行令人恶心的种族权力<sup>②</sup>（在原南斯拉夫和其他地区），甚至厚颜无耻地进行操纵（恐怖主义组织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向对手发动攻击，特别是在阿富汗、车臣、阿尔及利亚），借口“恐怖主义”（当它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时）宣布虚构的战争——美国终于露出了对冲突的真正面孔。这就是资本主义野蛮失控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其计划的发展。

人们不会感到惊讶，在这样的条件下，尽管统治权力的代表人物说得很好听，社会公正与和平还是如同发展一样被带入陷阱。作为对自由主义混乱的回应，必须要进行的辩论涉及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民主问题。人们用一大套注定要背离真正问题的空话来取而代之：关于“善治”（同时还有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平庸进展！）的空话取代了对权力的现实的分析，在尊重不同权利的虚伪借口下推行共同体主义，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有关所谓文明冲突的话语

<sup>①</sup> 原文为 *ringarde*，有“老土”“俗气”等意。——译者注

<sup>②</sup> 原文为 *ethnocracies*。——译者注

(被用来取代有关政治文化冲突的真正争论)。人们知道, 这些言论是由世界银行(我认为它好比是七国集团的宣传机构)中转提出来, 然后强加于联合国(我们必须承认它还是有所抵抗的)。至于许诺的和平, 它走向了持久的战争(所谓反对“恐怖主义”!)、华盛顿及其盟国的到处入侵(“预防性”战争)及国家和社会因实行自由主义疗法而分裂导致的国内战争! 这个被强调、被肢解的民主观念, 在伴有“市场法律”至高无上的教条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视野的话语中, 将政治权利(多党制、公正选举等)和社会权利截然分开。问题的复杂性、解决的难度(即使以渐进的方式)以及民主诉求在不同方面的关联远未引起注意, 这种过于简单的“回答”只会造成思想混乱, 并导致令人生疑的实践。因实施“双重标准”(人们积极地捍卫某个国家民族的权利, 包括以军事干涉的方式, 却忽视了另一个国家民族的权利), 整个这一体系在越来越多的个体、运动和组织, 甚至在所有国家人民的眼里, 就有失去其合法性的危险。

在这个框架下, 主导体制趋向给予国际商法以最高基准地位, 并同时优先于各国在贸易法领域及劳动法、社会法、民法, 当然还有国际公法和私法等领域的立法权。在这种精神下, 世界贸易组织制定了一整套的原则程序, 直至确定一个奇怪的裁判体制(解决各种纠纷的机关), 这是建立在对权力分离的基本民主原则的否定之上的。由商界组成的少数群体充当了整个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最高主人, 并同时宣称自己是最高的立法者和超越国家之上的执法者, 以及唯一对其自身行为进行评判的“法官”。人们重新回到了由最富有的商人

董事会负责威尼斯管理的体制上。

在国家层面上，这些实践败坏了民主的可靠性和合法性。把被当作绝对规则的市场法律（并同时赋予国际商法以我们所知道的最高权力）与民主原则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只要看一下阿根廷的严重情况就可以明白了，这可能是这种结合最极端的例子了。这种类型的退化具有导致反民主态势得以加强的危险，尽管认为它们可以有效地应对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不现实的，但这种态势的蔓延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并不少见：此时的新民粹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为新法西斯主义）收起了彼时真正的或想象的所谓“共同体主义”的同一性（以受沙文主义误导的“民族主义”的名义，或以受政治操纵下的“宗教特殊性”的名义），这种退化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来。

在世界层面上，北方国家的垄断地位已经借助于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商法得以巩固，并通过（知识和工业）产权法和贸易许可证，以及“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包括投机）等手段得以实现。北方国家垄断地位的加强同样缩小了所谓“新兴”国家设想在开放市场竞争原则之基础上“追赶”的希望，同时也扩大了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的边缘化，并将之完全排斥在外。这些变革强化了世界层面上财富和权力的集中。

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是危机的根源，按照这种信仰，“市场”可能是“自由”（可以理解为不顾社会遗产和环境的“个人的”自由）最文明的表现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并必须服从由市场单方面决定的逻辑。



于是，社会契约和社会保障的不同模式为了这种顺从带来的利益而被摧毁了，并为针对特殊的和排他性群体的私人契约所代替。在公民社会的许多组成部分中，这种演变很不公平和难以接受。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并不赞成“国家干预的减少”，而是相反，提倡权力的极度集中，通过名目繁多的被看作是“技术的”（也就是说“非政治的”）“自治”（有些是私人性质的，尽管其干预具有公共的特点）组织远离议会和公民的监督。同样，一种盛行的社会关系“法治化”精神，实际上是表示将越来越多的权力转移给“法官”。各种分权模式最初是为了成为接近公民权利的体制，现在又重新成为新的中心，这里成为不负任何责任的特殊利益的集中之所。处在危机中的政治就这样成为各种利益的杂色拼花布，人们对他们提出保证协调一致解决问题的担忧却被遗忘了。这种变革强化了这样一种预设，即“不存在选择的余地”。选择一种不承担责任的黑暗的政治体制，选择就成了“听天由命<sup>①</sup>”。人们忘了，即使是民主定义本身，也明确包括在各种不同的道路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从这种总体倒退的角度来看，联合国不再有特别需要它承担的任务了。联合国失去了它的本质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将社会权利纳入个体权利总和之中来支持民主，另一方面是推动建立一部真正的国际法，后者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阶段中妥协谈判的产物。

---

① 原文为“prophéties auto-réalisatrices”，直译为“自动实现的预言”。文中称选择不承担责任的黑暗的政治体制，等于放弃选择，故意译为“听天由命”。——译者注

## 五 替代性选择：同时建设社会公正和 国际公正，确认各国人民的新主权

民主是现代性的产物，被定义为人类——个体和集体的——存在的证明，只有这样的存在才能为缔造他们的未来负责，因此，民主“永远有替代性选择”。

于是，真正的替代性选择是：承认社会化，在所有层面上，从国家到世界，或是只通过“市场”的功效来产生，或者相反，通过民主（在丰富和完整意义上的）形成（经过长时期和多个阶段）社会化。因为，各国人民在渴望社会进步和生活管理民主化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得到尊重。而资本主义在国家和世界层面上都越来越不能有效地满足这种渴望。

自由主义的失控摧毁了普世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同时也表现出了资本主义模式的衰败。资本主义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中也曾是普世主义的，但毕竟由于其内在的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因素，而一直是断裂的。作为资本主义这种政治文化的对应，替代性选择（社会主义）同样是普世主义的，而且很可能超越资本主义断裂的普世主义。未来的这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空想；它已经出现在今天各民族的真实意识中。21世纪真正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冲突并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撞”，而是偏向野蛮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

面对统治力量过度膨胀的野心，人们更需要一个能够保护

全世界各国人民受到有尊严的对待的新法来与之抗衡，这是他们积极并有创建性地参与未来建设的条件，同时，这个新法还能够提出一种法律工具，这一法律工具应该是既足够广泛且又多维的，它将考虑到人类的权利（男人和女人，作为绝对平等的生命）、共同体和各民族的权利，以及管理各国关系的权利等方面。

对这一法律的考虑提出了许多复杂问题，它们反映在下面的基本问题中：为什么必须实行社会化？通过“市场”的排他性制约，就可以尽可能地为所欲为？或者将市场和民主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由市场支配的领域就必须得到明确和限定。这就是“市场的社会调节”。此外，民主必须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得到体现；并且为了支持它的发展，应该考虑到改革现有的机构或者创办新的机构。

在这个框架下，同样应该同时确认社会公正和国际公正两个原则，以这两个原则来构成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替代性模式的轴心。这需要明晰一套明确的议案，它们涉及有效权利的明晰，适宜的机构机制的落实，以使这些原则在现实中得到体现。

社会公正——在国家—民族范围内是首先要实现的——是保障各民族权利的所有协调纲领的基础。“国际公正”（或“全球公正”）是确保各民族权利进步的协调性纲领的另一个范畴。在最初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承认，对国家主权和对人权的同时尊重可能会引起冲突。尽管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仍然是国际法的基石，国家主权还必须被解释为该国人民的主权，不能把它们限制为唯有政府的权力机构才能代表。

在下文中，我将提出一项协调全球化的机构组织改革的纲

领，它与其多极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样能够支持社会进步中开放式民主重建的形式。

这个纲领关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必须是在其框架下制定国际法的机构：没有别的可以接受的机构来完成这个工作。这无疑意味着组织改革，这些改革是在这样一种视角下进行的，清除措施和途径上的约束，允许真正的社会力量成为贴近政府的代表，而政府至多只是不完全的代表。这需要国际法的准则——建立在对主权尊重的基础上的——找到它在总体的严密协调中的位置，决定着个人和人民的权利，如在自由主义圣经中闭口不谈的经济和社会的权利。

主权和民主的冲突不可能用西方公民社会提出的“干预权”来解决，西方公民社会这个天真的社会是帝国主义统治资本骗人的帮凶，这些统治资本除了——通过干预——追求自己目标的实现外并不干别的。另外，这里所谈及的干预并不是新鲜事，而是5个世纪以来统治资本每天都在做的。在前后不断为其合法性辩护的言论（“异教徒”的基督教化、殖民教化的布道，今天则是民主的“十字军”！）的掩饰下，干预已经像现代灾难一样，在它的牺牲者生活中司空见惯，甚至也不排除种族灭绝（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都有计划地实行过；此外，阿根廷人和智利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也实行过）。帝国主义干预远不是“有助于”各民族的进步，它们总是在试图加强地方反动势力的权力。“干预”在1945~1980年经历过倒退，正是这个倒退在当时使得亚洲和非洲人民取得了前进（相对和有限的）。干预原则的再度兴起并没有带来民主的普世化，而是使其步入歧途的原因。我呼吁毫无保留地谴责“干预权”。

我们所说的矛盾必须通过动员有关社会内部进步力量的其他方法来解决，并得到多极的全球化的改良机构（首先是联合国）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积极和有效的，根据形势的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形式：采取经济制裁、支持反抗（如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做的，直至提供武器装备）。道路是曲折的，成功也未可知。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必须要为联合国承担保卫和平的职责创造条件。这些条件首先就是裁减军备。多极世界是裁减军备的世界。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明确清晰地说明我们所说的裁减军备的含义。裁减军备首先是最强的国家要做的，其中又以美国为先。不要忘了，伊拉克曾经受到打击，不是因为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因为它不拥有。美国的狂妄自大在于它并不隐瞒使用一切武器的企图，如果它觉得“有用”的话，也包括核武器（在这方面美国统治阶级能够“说服”国内舆论并毫无困难地加以操纵）。美国的狂妄自大、受威胁国家军事武装的合法性，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虚伪都应该被昭示天下。有一种天真的论点，认为穷国最好是用好它们的资源，要不然就是假装不知道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施加的实际威胁。毫无疑问，买办统治阶级购买武器并不是要对付“帝国主义敌人”，该阶级是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海湾石油国家购买美国军火几乎成为一种向美国国库捐钱的方式。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所希望的裁减军备必须考虑到拆除提供轻武器（以及杀伤性地雷）和维持伴随混乱帝国发展的可怕的国内战争的网络。但是不能一叶障目：北方国家对抗南方国家的持久战争是由华盛顿及其盟国决定的。今后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的拆除是全面裁减军备的先决条件。

重建多中心和多元模式的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既在地区层面又在世界层面上的机构重建，它向脆弱地区的人民展现一种进步的前景，这些人民缺乏参与世界化竞争的优势措施。因为所设想的多极世界必然也将是地区化的世界。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不管它是涉及欧洲联盟和东欧的人民，还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各国人民。地区机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Alena）和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非加太国家和欧盟签订的《科托努协定》及其后来的 APER、Euromed 计划、Cedeao、Comesa 和其他的非洲地区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必须根据国际公正和全球非极化模式的需要进行讨论。在什么程度上，这些要实现的地区模式只能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传送带？在什么条件下，它们能够成为建设替代性的全球化的因素？

根据这些变革的需要，可以设想，这些地区不会是一些简单的经济组织，更不会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希望的经济组织。它们同样必须被构想为如同政治空间一样，并能确定有可能推动劳动阶级和处于劣势的次地区的社会地位得到加强。

改革纲领有助于对各国人民的主权——逐步代替各国的国家主权——的尊重，与构成其条件的民主结合起来。这个计划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人文主义回应，并不是“乌托邦”。相反，这是唯一可能的现实计划，就这样一层意义而言，它指导下的最初的发展，还可能回答当代社会中已经强烈表达出来的需求，应能得到进步的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建立在民主和社会公正原则上的人民主权，需要动员一切富有创造性想象力的力量，并承认其多样性的贡献。

当然，文化的差异性事实，尽管全球化不断推进，它仍将存在。民主原则包含着对不容任何侵犯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的尊重。对待差异性的唯一正确态度就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否则，差异性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机会主义政治的工具。文化主义的成功正是对差异性非民主式管理破产的产物。在文化主义看来，这里所谈及的差异性是“第一位”的，应该赋予其“优先权”（比如依照阶级的不同），因为它们是“跨历史的”，也就是说是在历史不变的基础上的。这种观点往往也是宗教文化主义的观点，因此有陷入蒙昧主义和狂热崇拜的危险。

对于“承袭自过去”的差异性，应该承认并尊重其要求，即使这些要求并不能适当解决今天的问题，在上述差异性之外，还有另一种关系到未来的、更有意思的差异性，它是在为应对挑战而实行的社会变革的前景下产生的。这种差异性是在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道德学派”的基本原则上的多样性的产物。真正的民主和多元主义是在对多样的替代性选择的承认的基础之上的。

经济和社会伦理为公正合理的法律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在哲学讨论中十分重要的议题，可以鉴别不同的思想流派所依赖的基础的原则，比如功利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某些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受启发于它）、被称为“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根据罗尔斯<sup>①</sup>的说法）、各种社会主义、各

---

<sup>①</sup>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美国著名法哲学家、伦理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正义论》（1971年）、《人民的法律》（1999年）和《作为公平的正义》（2000年）等。——译者注

种解放运动的神学等。经济和政治学的分析和建议归根结底——即使仅仅是暗示——最终还是由此处提及的伦理原则所决定的。应该对这些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并在此框架下形成差异性的融合，而这种差异性本身又成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手段。

## 六 关于复兴联合国的建议

根据人们希望联合国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的作用，下述建议分为四个部分。

### 1. 关于联合国政治作用的建议

- 重建名副其实的联合国的全部重要责任——保证各国人民（及各国）的安全，维护和平，制止任何借口下的侵略（如在伊拉克战争中虚构的借口）。这个原则必须重新得到明确声明。

根据这个精神，必须对美国政府、北约及七国集团的声明予以毫不含糊的谴责，这些大国通过这些声明赋予自己并非属于它们的“责任”。

这种谴责必须通过制订相关问题的政治计划来完成，这些相关问题关系到成为帝国主义大国非法干涉牺牲品国家的未来（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这些政治计划必须明确提前规定外国军队的撤离。为了让通过备受谴责的干涉而创建的事实上的那些国家合法化，推动联合国“以非正常的方式”重新介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的介入必须“有助于”入侵者的撤离。

- 重建联合国的这一重要作用显然会导致机构的某些结构



改革。

但是，必须警惕。有一些“批评”及由此产生出的一些仓促的建议，不是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角度而是从服从帝国主义“三合会”的角度出发的。

从“民主和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其他的批评很可能并没有更多的价值。在此，我特别想到了反对否决权的指责：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如果法国不是这一权利的受益者之一，美国就能使它对伊拉克的入侵“合法化”。安理会可能要进行的改革（它的扩大是吸收印度和巴西加入，以进一步保证世界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在提出来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赋予联合国大会以更重要的地位，并最好确定其决议（根据假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尚待进一步明确）对安理会所采取的行动所应具有的影响力，或许应该成为这一思考的轴心。

- 重建联合国的这一中心作用并不是回到对国家作为其人民的代表的“绝对”主权的肯定。而是表明对各国人民主权的绝对尊重。

- 重建联合国的这些作用必须要在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重大危机和因某些大国——首先是美国——实行的“混乱扩散”战略而广泛导致（或助推）的危机的道路上，取得有效的进步。

根据这种精神，必须规定：

- 在（1967年以前的“边境”绿线所界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布置联合国的干预力量。以色列不得抵制严厉的经济制裁，如同强加于别的国家的制裁；

- 在被占领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布置

联合国的维和力量，应当和在所谓“国内”战争牺牲品的非洲国家一样地来实施。

这些安排构想应该与有关的可能的地区组织（欧洲联盟、更广义上的欧洲、非洲联盟）保持密切的联系。

- 联合国必须积极参与“全面裁军计划”的制订。这一计划绝不能因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的实施而受到限制，按目前的态势，《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强化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的垄断，有利于那些最经常的使用者！裁军必须从大国的裁军开始，由联合国监督并取代不久以前由两个超级大国实施今天已经荡然无存的“两极”监督。

全面裁军必须规定拆除所有布置在国家边境以外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美国试图继续实施其“全球军事监督”而布置的境外军事基地。

- 联合国必须积极参与确定可能的“人道主义干预”及其实施模式。

考虑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不幸状况，及其可能陷入野蛮（种族文化灭绝、“种族”或“宗教”清洗、种族隔离）之中，必须进行这样的干预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这种干预不能交由帝国主义大国支配，从而有利于它们加以操纵，使用“双重标准”等。

- 联合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在确定何为“恐怖主义”行动上承担主要的集体责任。联合国确定消除恐怖主义实践的行动条件，监视实现这些行动的规定。“反恐战争”的指挥权不能交给大国，特别是美国。

## 2. 关于各国人民权利和制定国际法的建议

- 此处指导我们建议的原则来自更高的对国家主权概念的

观察，国家主权必须得到重新确定。

对主权原则的尊重和对民主诉求的满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发生冲突。但是，这种矛盾是不可能通过其中一个的废除来解决的：不管是废除人民的权利（受到旧有主权概念的维护）或废除主权（为了方便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和操纵而废除）。这种矛盾只能通过所有国家社会取得真正的进步而跨越。这涉及一个必须接受并且只能按它的节奏发展的过程，这就是民主需求的发展过程。为了支持这种进步，国际组织对此必须介入，并使之在权力的行使中发生的真正转变更快地表达出来。联合国是坚持不懈开展辩论的绝好场所。

已有的与人权有关的全部声明、公约和协议，在对人权广泛的定义中已经取得了进步。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事实上已经成功地增加了两个联合通过的公约，明确地承认了狭义上的人权概念的转变，从仅限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转向更广泛的视角，包括了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这两个公约就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公约于1968年在德黑兰得到通过。这种进展在1986年联合国大会有关发展权利的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发展权利宣言》被正式确认为人权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努力还必须坚持不懈地继续下去，这些文件从目前状况来看存在着不足，尤其是因不断地引起争议，而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或者是所谓的不适用，特别是当明显涉及“三合会”大国的经济、社会和集体利益时。另外，各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已经成为“私人”俱乐部（例如致力于各国人民权利的莱

利奥·巴索基金会<sup>①</sup>) 深入思考的目标, 并且得到部分半国家组织(如不结盟组织)的有力推动, 但是实际上仍然没有作为个人和各国人民优先的和普世的权利而得到广泛的承认。甚至全球所有农民(占人类的一半)获得土地及其维持人道与生存条件的权利,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认识, 然而根据同样的逻辑, 提高农民权利是无可厚非的。

同样在这个世界背景下——联合国代表的世界——还必须继续努力明确各种权利, 而对这些权利的承认至今仅处在初级阶段, 或者至少尚未完成。属于这一权利大家庭的还有在原则上确定和在实际中规定的男女平等的权利。这涉及“集体的”权利并由此表达了各种“身份认同”——其中包括文化、语言和宗教——同样必须成为深入讨论的目标, 以能够明确其定义和实行范畴。在任何情况下, 对这些不同权利的承认都不应该强求各国社会都是“共同体组织”(甚至从而否认了“相似权利”和各种共同体外的个人的权利)。换言之, 此处所讨论的各种权利绝不能成为对世俗主义原则的质疑。

许多“现实主义者”仅在条文确保有效实行的情况下才对权利宪章给予少许重视。他们或许是低估了权利的重要性, 这种权利可能变成强制尊重的有效武器。人们可以通过建立一种世界法院制度予以支持, 关于这一点,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讨论。

- 在制定国际商法问题上, 联合国必须行使特殊的责任。

---

<sup>①</sup> 莱利奥·巴索基金会, 全称为“莱利奥·巴索国际人民权利与解放基金会”, 英文为: Lelio Basso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Rights and Liberation of Peoples。——译者注

全球化了的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比任何时候都表明了制定国际商法的必要性。然而，这个特殊的法律领域绝不能超越个人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其在各国国家层面上的表达形式。因此，在这一领域由国际共济会协会（AMI<sup>①</sup>）的计划所作出的选择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而且，这部法律的编撰绝不能委托给只代表着统治资本集体利益（“跨国集团俱乐部”）的合作者，如在世界贸易组织（OMC）的各种计划中出现的那样。尤其是上述合作者因为是其事务裁判法院计划的唯一主人，而自认为是立法者、法官和当事人。人们很少无理地践踏权利与公平的基本原则！即使并非如此，如同实际情况一样，接受美国法院（其公正性更加受到怀疑）和这个国家的法律（特别是早期的）的事务调节来控制实践，仍然是不可接受的。

国际商法的制定，必须经过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参与的透明的讨论，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商界，而且同样还有相关的劳动者（上述提及的企业的劳动者，及忍受着已经付诸实施的法律的严重后果的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和国家。引导这场讨论的只能是联合国（和作为一种代表的国际劳工组织），而不是别的。

• 联合国绝不能朝夕之间就建成“世界国”，也不能成为“世界政府”，更没有在各种领域拥有广泛权力的超国家的权威。

承认这一点并不排除人们还走在用较长时间才能够达到这

<sup>①</sup> 法文全称为：“Association Maçonnique Internationale”。——译者注

一目标的路上。从这一视角来看，必须警惕各种前卫的建议。今天，人们看到试图将“公民社会”（用华盛顿的方式加以定义，并被描述为形态更高的）与联合国结合在一起的各种建议遍地开花，某些建议还希望在这种结合中给予“商界”代表以更重要的地位！相反，劳动者群体——相对少数亿万富翁的人类大多数——却总被联合国这一“改革”的捍卫者所忽视。他们甚至希望缩小国际劳工组织的权力，尽管这是无足轻重的权力。遗憾的是这个组织的行政机构似乎也是这个社会倒退计划的同谋。

关于建立由各国议会代表（它们并不总是存在，而且很少真正地代表人民）组成的“世界议会”的建议，并不一定是无足轻重或不现实的。在此意义上的变革可能已经开始，即便是人们知道被看作是支持改革的民主绝不能在世界层面上走得更快，当然它在相关国家层面上则是可能的。

### 3. 关于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建议

• 所谓“无节制”（*dérégulée*）的全球化，如同它在当前的状况那样，实质上是全球化形态中的一种，它完全被世界化的统治资本（“跨国集团”）及其政治零售商（七国集团）所控制。对于这种形式，它既不是“不可避免”和“别无选择”的，甚至也是可以不接受的，应该用世界层面上进行调节的制度化形式来予以取代，而作为对这种调节制度可能的支持和补充，各国人民最终将不得不接受国家和地区层面上的调节，甚至可以接受在现代世界不同的经济管理水平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任务是很艰巨的，即使联合国在这些方面发挥了作用，人

们短期内取得了一些进步，仍然需要长期的稳步推进。但是它们必须允许开始有利于各国人民和劳动者的改革，而不是给予藐视。

- 考虑到国际债务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讨论联合国在世界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时，应该将国际债务作为讨论的重要基础。

主流观点将产生债务的唯一责任归咎于举债国家无法为之辩解的行为（腐败、政治决策的轻易性和不合理性、极端的民族主义等）。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债务国家举债都是债权国家努力为盈余资本寻租而有步骤实行的政策造成的——由于最近 20 年深重的经济危机，这些盈余资本无论在生产投资上，还是在富裕国家，以及那些被认为可能吸收它们资本的国家里，都没有找到出路。为了避免剩余资本的贬值，便编造出虚假的出路选择。极短期的“投机性”资本运动的爆发便是这些政策的结果，如同它们在第三世界和东方国家的“债务”中进行投资。特别是世界银行，同时还有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许多大型私人银行，如同跨国集团一样，成为“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人们却从来不提。“腐败”是由债权人（世界银行及其他私人银行和跨国集团）和南方与东方有关国家的负责人作为双重共谋嫁接到这些政策中去的。首先要对“债务”有步骤地进行审计。这将暴露出上述大部分债务在法律上是不合法的。

还本付息的压力不仅对于南方最穷的国家，甚至对那些不是最穷的国家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被裁定支付其出口的 7% 作为赔偿，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这样的负担

是无法承受的，这个国家的生产机器将不可能“适应”。今天，同样是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毫不犹豫地提出要调整第三世界的经济，以符合偿还其债务的需求，它们要承担的债务却是5倍或往往是10倍之重。事实上，还本付息是今天掠夺南方国家（及东方国家）财富与人民劳动成果的一种方式，一种能够让全球最穷的国家向北方国家输出资本的特别漂亮的方式。这是一种特别野蛮的方式，它让统治资本摆脱了企业管理中的忧虑和风险，不再受制于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力。只要让别人还本付息，就全都有了。对有关国家（而非“债权人”资本）来说，就是让人民不用工作。而统治资本则解脱了所有的责任和烦扰。

债务必须进行“分级”。它们可以依照下面三种方法中的一种进行分类：

不正当的和不道德的债务：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的举债，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武器以应对非洲人民的反抗。

值得怀疑的债务：这部分债务大量地由北方国家的财政大国（包括世界银行）提出建议并可能通过腐败行为而产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一样都是演员。这些债务中的大部分都没有被用来进行投资，产生这些债务的计划只是一种掩饰（这就是同谋的债权人）。在这些情况下，从与此相符的任何一种正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债务无论如何都是纯粹和直接的不合法的。在某些情况下，债务虽然投资了项目，但却是投进了荒谬的债权人制订的计划（尤其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也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应该受到起诉。但是这个机构在财务上是“不负责任”的，它本身比自由主义关于“风险”的法律



和话语做得更为高明。

最后是可以接受的债务：当债务确实用于指定目标时，可以认为债务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不正当的和令人怀疑的债务应该单方面地放弃（在审计之后），而且依此名义已经交付的款项，在依照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利率明确金额后，同样应该由“债权人”返还。这样，人们将会看到，事实上，北方国家才广泛地是其南方受害国家的债务人。

向“极度负债的贫穷国家”（Pays Pauvres Très Endettés, PPTE）提出的债务管理反映出另外一种逻辑。所有债务被视为完全“合法”的，既不用检查也不用审计。建议折射出“施舍”的——不可接受的——唯一原则。这涉及“减轻”“最贫穷人民”的负担，但要借助向他们强加额外苛刻条件的机会，使其最终进入成为类似于“由外国直接管理的殖民地”的范畴中。

但是，在提出的审计和采纳容许核对账目的措施之外，还应该考虑到，为了将来不发生类似的情况，必须制定债务国际法（现在已经完全有了雏形），并建立解释这一领域法律的真正的法院（这将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仲裁委员会的期望）。

• 重建联合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充分的责任，意味着重新定义这个国际大家庭主要机构（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国际劳工组织）或外围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职能。

在这些领域内确定的主要优先目标如下：

• 重新激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确定其新（或更新

的) 职能: (1) 制定能够实行转移调节和保障所有利益相关的合作伙伴的全球范围的“外国投资法规”; (2)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件进入市场的条件进行谈判。这些建议重新质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都已使其牺牲品的整个边缘化, 所有这些权力都被转移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人们希望将之拉出局限它的由跨国集团俱乐部严格规定的轨道, 这个组织必须彻底地进行反思。

- 重新激活国际劳工组织, 并非是在该组织现任领导机构所提出的那种意义上的激活, 恰恰是完全相反, 是加强劳动者的代表性和权利意义上的复活。

- 重新谈判世界货币体系, 确保交易稳定的地区性安排的制度化, 成立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将与现有的同名组织有很大的不同) 在相关地区体系之间相互关联的管理上负有责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的现实情况下, 它对占主导地位的外汇(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 之间的关系并不负责, 像一种集体性(“三合会”) 的殖民主义的货币权威管理着属国的财政, 为了流动资本的利益, 为了用还本付息进行榨取, 通过“结构调整”, 以满足其资源掠夺的需要。

- 建设名副其实的资本世界市场, 以引导投资投向生产性投资(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 并作为必要的补充, 还应发挥阻止所谓“投机性”资金流动(在这方面可以考虑托宾<sup>①</sup>税) 的作用。构建这个市场是对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功

---

<sup>①</sup> 托宾 (James Tobin), 生于 1918 年 3 月 5 日, 美国经济学家,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在“金融市场理论及其与消费、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及价格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获得 198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能的质疑。

联合国在经济管理领域当然不可能比它在世界政治领域做得更多。但是它同样可以推动构建一个世界化的经济（和政治）政府，即所谓的财政政府。

地球自然资源的管理无疑成为这条路上最好的切入点。

自然资源的获得，原则上永远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但是事实上后者却曾经且仍旧常常受到戏弄，不仅在殖民地形态中（国家主权沦丧），而且也受人们通常借用“地缘政治”的术语分析实力关系的影响。这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获得，源于北方各国社会对地球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预先设定各国人民消费模式不可能普及化，特别是由将“全球层面上的种族隔离”强加于牺牲者的全球化方式所决定的。意识到这一问题严重性的生态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能够让世界权力体系（以里约热内卢会议和京都会议为代表，其会议总结已经成为2002年8月约翰内斯堡会议的议题）以适当和有效的形式接受资源获取的民主管理模式。全球化的军事化同样也必然是与霸权主义大国控制地球自然资源的目标密不可分的。

上述资源的开发基本上都是“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所为。它是建立在资金赢利的短期选择上的，其决策者——跨国集团——也不了解其他方式。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由市场进行管理的所谓理性，事实上从人民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看是不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识到市场和人类利益的矛盾，但是却往往没有指出其具体的和实际的严重后果。

应该对自然资源合理（“可持续的”）和民主（在地区层面和世界体系层面）管理的替代性选择进行讨论，从迄今为止

仍然一直受到争议的各种建议开始，如对因获得资源和开发资源而得到的收入确定世界统一的税费标准，同时，为了有关人民的利益对这种税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以有利于弱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阻止资源浪费。通过这个办法，将逐步形成一种世界化税费标准的雏形。这一主题涉及许多资源（矿产、石油、水等）。建议先从两个领域开始讨论，分别是石油和水。

- 联合国对水的管理牵涉到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没有水便没有生命，水和空气一样是必需的。在对水的各种利用中，我们在此只关注消耗着绝大部分水资源的农业利用。

世界上不同的农业社会对水的依赖表现各不相同，表现出极为不规则的方式。有许多地区能无偿地获取“天赐”之水。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地带，则必须去找水：在全部农业用地上，人们都是从深井汲水或从远处江河引水并通过灌渠来安排用水。在这些地方，水是一种生产成本，远不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应对这种水紧缺的情况，难道不应该对这种资源确定一个价格吗？

同意制度经济学及构成其学术基础的商品异化理论所坚持的理由，同意在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背景下遵守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就只能同意或是一些人劳动报酬一成不变的低下，或是停止生产。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广大地区农业消亡。

然而，人民、民族和国家还存在。它们在地球表面占据着属于它们自己的空间，但这些空间并没有享受到同样的自然条件。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予以重视。制度经济学假装不知道这些重要事实，用一种全球化想象的世界的理论来取而代

之，这一世界是由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和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条件的商品化及其向全世界的扩张所界定的。这种状况让资本单方面的野心合法化而根本不关心社会的现实。如果为资本原教旨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者持同样的逻辑，他们将会得出结论，自然资源（此处为水资源）的最佳利用需要根据地球资源不平均的分布，进行一次规模庞大的世界人口重新分布。在这种情况下，水就将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与此同时，水也是特定民族——国家——特殊的共同财产之一。对这个民族来说，如果这种财产是相对稀少的，就应当合理地利用它。用水费用必须在全体居民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分摊，也就是说，通过市场调节，通过一种可接受的补贴和征税体制的方式。这种体制的方式源于协调，即由内部社会条件和这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模式所决定。这些协调包括：农民和食品消费者之间的协调；社会计划所确定的发展需求和计划实施中某个发展阶段（在这种精神下，可以构想“自然”不具备竞争力的出口补贴）可能的出口需要之间的协调。这种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只能是相对的和历史性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属于我们称为“各国人民和人道主义权利”的范畴。对于水而言，这个权利几乎还不存在，因为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原则上是自由使用的。用于水管管理的协议，当它们存在的时候，仅仅是特殊国际协定的产物。在这个领域内推进一项各国人民和人道主义的真正的权利是今后亟须解决的问题。资本利益所制定的并且是为此而创建的目前已有的国际机构（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担忧的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并不是一种在人民对水这

一人类共同的资源缺乏管理权时可能的替代，而是正相反。

#### 4. 关于国际司法制度化的建议

• 现在已经有一些国际法庭了，其中有的还建立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其他一些是为揭露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在最近产生的。

由这些国际司法机构组成的法庭的有效性仍然还是很有限的，既受到其有限力量的约束，也受到部分大国（首先是美国）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的制约。

第一个首先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是：制定一份机构地位状况的全面图表，对有关机构的不足提出评论分析，指出那些人们希望逐步完善的法律空白。

此外，还有一些“舆论法庭”，它们虽然不享有法律地位，但是却担负了一种用于动员公众舆论的重要实用职能（审理战争罪的拉塞尔法庭<sup>①</su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机构坚持活动并具有重要影响，它们所履行的使命值得继续下去。但是这不能阻碍力求建立国际法庭的运动，众所周知，这些国际法庭承担解释这一权利的任务。同时，权利法典编撰的工作当然也需要继续下去，有关法庭将应该使其得到尊重。

作为对上文有关联合国责任建议的必要补充，一整套国际法院的建立必须围绕着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而构想并提供建议。以加强联合国行动的法律地位为目标的这些建议涉及三种法

<sup>①</sup> 即国际社会法庭。1966年由著名的英国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贝尔纳·拉塞尔创建，其秘书处即以其名字命名。国际社会法庭的宗旨是对各种军事犯罪进行独立调查并做出审判。国际社会法庭成立后，曾对美军在越南的战争罪行进行审理，还曾组织“伊拉克特别法庭”（由比利时天主教大学罗文拉涅瓦学院教授乌塔拉提议设立），审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译者注

院，并且是有希望建立起来的。

- 第一种要考虑的司法机构涉及世界管理的政治层面。

如果超出其边界的国家行动和干预，不管其借口是什么，必须服从联合国的裁决，建议成立一个属于这个组织的法律机构，由它来说明这些干预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海牙国际法庭的确有此管辖权，但在当前条件下却没有执行权。例如，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时的尼加拉瓜向海牙国际法院控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它的港口布雷，海牙法院认为起诉合法，并要求停止军事干涉且向受害者支付赔偿，但是这个判决只是一纸空文，只有安理会能够予以执行，但美国却在那里拥有否决权。1986年6月27日，海牙法院判决美国向尼加拉瓜支付170亿美元的赔偿金，但尼加拉瓜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同样，海牙法院最近对位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耻辱墙”做出过裁决，其理由是无可指责的，但它也仅仅是遵循联合国大会的一个没有执行权的仅限于提出一些建议的声明。为了扩大其权力，必须要对海牙法院的管辖权进行修订。人们可以想象，受伤害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大会，不仅可以求助于法院，还能保证对它有利的判决有结果，即使在受到质疑的干涉行动的发起国家的反对下。

否则，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美国）将永远不会因为它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受到审判，即使这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毋庸置疑的，或者，如果确有其事，除了应该受到制裁以外，还能够将其公之于众并受到各国人民的谴责。

- 第二种值得考虑设立的司法机构是为了巩固联合国承认的个人和国家人民的权利。

对此，可以借鉴欧洲法院的经验，在欧洲法院管辖权的范围内，受害者——个人或集体——可以直接向它提出申诉，而不必获得他们所属国家的预先授权。但是，人们能够——甚至必须——扩大国际法院的权限（其中包括社会权利），并可以为此考虑为联合国个人和人民权利法院设立不同的法庭。

- 第三种需要设立的是有关商业的司法机构。

这里也可以考虑在联合国商业法院下设立管辖范围不同的法庭，其中包括一个刑事法庭，它将审判经济刑事犯罪活动。博帕尔<sup>①</sup>的情况表明跨国公司至今仍然可耻地逍遥法外。

同样在这一框架下，该法院法庭可被授权审理有关对外债务的诉讼。

## 5. 落实各种建议的行动计划

上述各种建议显然过于雄心勃勃，而仅实现其中一部分也需要假以时日。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使已经取得的进展得到巩固，没有必要推迟开始行动的计划。

我不认为呼吁各国政府今天就“联合国改革”进行谈判有什么作用。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会自己去做的。但是今天占优势的力量关系是那些没有多少机会让这些改革——如果继续推动其实现——走向正确方向的力量关系。相反，存在着这样的担心，这些改革成为占主导地位、正在努力使国际组织边缘

---

<sup>①</sup> 1984年12月，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印度公司设在博帕尔市的一个杀虫剂工厂发生有毒气体泄漏事件，几天内死亡人数高达8000人，受伤人数达50万人。以后陆续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达2万人，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中毒事件。然而美国联合碳化及其印度子公司——联合碳化印度有限公司却只被判赔偿4.7亿美元，人均赔偿金仅500美元。后来联合碳化被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并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联合企业。——译者注



化和驯服它的帝国主义战略的一部分。应该预计到必须组织行动反对在这种精神下产生的改革，而不是支持它们！

我认为应该另辟蹊径，首先就是求助于公众舆论。根据这个精神，我建议（按照与我们相关计划的每个领域）成立若干特别国际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能够对在社会、国家、地区和世界的各种论坛上许多被认为不清楚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借助由通信网络和合作网络建立起来的反馈中心，具有诸多选择性的世界论坛能够帮助协调。

一旦取得足够的进展，委员会的工作就能够——必须——受到世界范围内众多运动的关注，这些运动都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围绕于一个目标。这样就将有助于弥补当今世界所特有的力量关系的失衡。

## 结 论

建设真正多极化的世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远比“另一种全球化”<sup>①</sup>运动想象的要严峻得多。而且挑战是多重的，所以我们的结论也是多重的。

首先，应该将各种困难予以分类，分出哪些是应该（或必须）在初期阶段（短期内）克服的，哪些只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逐渐地得到克服。此外，这些挑战只有在我们将之置于“超越资本主义的长期过渡时期”（或者间接地说，是“向世界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同时应该考虑到上述挑战的程度，它们并不类似于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当前的各国政府（或在可预期前景中可能替代它们的政府）都有他们自己对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从我们的计划——建设真正多极化的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挑战并不一定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的”挑战。然而，人们不能无视官方理念来进行讨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理念启发了他们采取的或在将来要采取的行动。持不同政见者本身——另一种全球化运动——并不持有同样的挑战理念。人们

---

<sup>①</sup> “Altermondialiste”，最早见于2003年6月法国埃维昂八国首脑会议期间，负责协调抗议活动的8个反全球化组织强调用“另一种全球化”（altermondialiste）来代替以往惯用的“反全球化”（antimondialiste）。当时欧洲舆论认为，一词之改表现出反全球化运动的“历史性进步”。——译者注

更不能忽视有关“现实”的分析和各种社会计划的差别及其冲突。

我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目的，就是希望厘清各种短期和长期的挑战。

就当前而言，就是粉碎华盛顿的军事计划。我认为，这对于处在边缘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获得必要的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否则，任何社会和民主的进步，在建设多极世界的方向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将是极为脆弱的。然而短期来看，在面临这种挑战时，当前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特别是国家的政治作用和政府的主张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过于庞大，美国计划无疑注定要失败，但肯定会让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

美国计划的受害者——南方国家人民——的反抗，将随着美国逐渐陷入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战争的泥潭而变得更强烈。这种反抗将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并有可能唤醒美国舆论，如同在越南战争时一样。最好能尽快地结束这种灾难，这是国际外交能够做到的，尤其是当欧洲知道承担它的责任时。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另类的全球化”表明了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选择和“三合会”集体帝国主义在极端大西洋主义或“重新平衡”的框架下管理世界事务的质疑。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现在就应该开始而不要再等待。我无法想象短期任务（让美国计划失败）和长期任务（建立多极化世界）的目标是可以一个个地来完成的。这些任务是重叠的。总之，每当各国人民认为其利益受到威胁，或者他们能提前取得突破时，就会毫不犹豫地介入社会和民主的阵地中去。绝对没有任

何理由要求投身于其中的这些斗争是以美国失败为目的的。相反，各地方社会或民主的进步将加速华盛顿计划的失败。

在我们所提出的道路上的进展当然不会很快，所以也没有必要确定阶段性目标，在开始时需要稳健。但是，从长远来看，为了保证实际效果，唯一要做的是考虑其阶段性战略。我认为，这就是要有向世界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的观点。因为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够达到建立真正的多极世界的目标。

总之，多极化世界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于我而言这不是一种概念。这是一种逐步推进的建设，从来不会完美而且总是在不断变革的。无论是不同的合作伙伴（世界所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制度，还是它们在参与全球化中表现出的平衡（或失衡），从可见的或更长远的前景来看，都不会达到改革的“极限”（这种表达是否有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对于首要目标（让华盛顿计划破产），本书各章的分析强调存在着众多需要克服的障碍和困难**

当前世界的特征是北美霸权主义计划在世界层面上的展现。如大家所看到的，今天唯一占据整个世界舞台的就是这个计划。不存在像两极格局时期（1945～1990年）那样以反对服从美国监控为目标的反计划；已经走出最初暧昧的欧洲计划本身进入逐渐消失的阶段；曾经在万隆时期结成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共同战线的南方国家（77国集团，不结盟国家）已经放弃了雄心；单枪匹马的中国似乎只有保护其国家的计划（本身也暧昧）的雄心，而且在改造世界方面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是积极的合作伙伴。

“欧洲计划”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要使华盛顿回归理性。事

实上，这个计划仍然是“非欧洲的”，几乎只是“美国计划的欧洲部分”。当前的“制宪”计划是欧洲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双重选择上的计划。可能存在的政治文化的冲突，实际上呼吁结束大西洋主义，因与社会—自由主义结盟的左翼多数（用选举的术语来说是欧洲社会党）的选择而消除了。社会和自由主义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词，因为自由主义从其本质上说是否定社会的，甚至是反社会的。

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华盛顿计划的三个战略对手。这三个国家的现任政府或许对此有着愈来愈强的意识。但是，它们似乎相信它们能够控制好不与美国治理发生直接冲撞，甚至相信在它们相互发生冲突（如俄罗斯担心中国向西伯利亚扩张，中国和印度的冲突）时能“利用与美国的友谊”。“反恐共同战线”——它们都表示同意——搅乱了牌局。华盛顿的两面手法正在于此：一方面，美国支持车臣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如同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其他地方支持伊斯兰主义运动一样）；而另一方面，美国为拉拢莫斯科、北京和新德里打出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旗帜。但是，这种两面手段似乎起到了作用，至少今天看来是这样。

欧亚（欧洲、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靠拢肯定是被寄予希望的，若能成功，这肯定会吸引其余所有的亚非国家，并孤立美国。而且已经有迹象表明在此方向上的努力。但是我们还看不到其结果是让欧洲终结对大西洋主义的选择。

“世界的历史”长期以来就是构成“旧世界”（欧洲、亚洲、非洲）的各个巨大社会的互补和冲撞的历史，而后哥伦比亚时代的美洲则是已经成为主导力量的美国的“孤立主义”扩

张的舞台。自1945年以来，这股力量显示出了它的世界使命，先是被迫与它军事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苏联（不对等地）共享该使命，随后在“社会主义”崩溃后则明显的没有了对等对手了。面对美国的挑战，旧世界各个极之间切实认真的靠拢有可能形成新的稳定的平衡吗？

我提出的分析对此是有很大的保留的。我强调的是在这一体系的两个主要合作伙伴——陷于大西洋主义的欧洲和中国——中存在着结构上的脆弱性。而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脆弱性一点儿也不比人们看到的少。

但是，我的结论并不因此就认为美国单边主义的领导世界的计划是必然的。在欧洲主要国家、俄罗斯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建立政治同盟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成功，将最终使华盛顿的野心破产。这样，多极化将形成可能的和必不可少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背景。得以平衡的和真正的多极世界最终将是社会主义的，或者不是。

我还要对为使华盛顿计划破产需要克服的障碍的形势做个补充，这涉及日本和美国。很少看到日本人民觉醒的迹象。美国人民的觉醒同样更少见。

南方国家在必须要让美国军事计划破产的行动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吗？当然人民是美国计划的受害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目前唯一能使美国野心不能得逞的美国计划的积极反对者。即使——准确地说，至少部分是这样，鉴于他们是唯一积极的反对者，并且也是如此感觉到——他们在斗争中采取的方式还有待改进，需要在其正义斗争中采取措施推延北方国家人民达成团结。另一方面，我对南方所有地区统治阶级和政

权的“普遍买办化”提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对这些现政权或可能接替它们的政权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它们显然是“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教、印度教或族群主义的）。这些政府显然是既为华盛顿肆无忌惮的傲慢感到震惊，又为其人民对美国表现出来的敌视（如果不是说仇恨的话）感到担忧。但是，它们除了接受这个属于它们的命运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不过，南方国家一般都不再如同万隆时代那样有属于自己的计划。毫无疑问，人们称为“新兴国家”的国家（中国、韩国、东南亚、印度、巴西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阶级正在追求着似乎是它们自己认定的目标，并且它们的国家正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着。这些目标被概括为在全球化体系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增长。这些国家拥有——或相信拥有——一种谈判权，能够使它们从这种“利己主义”的战略中得到的好处，比它们与比之更弱的国家结成一个什么“共同战线”而得到的好处更多。但是，它们以这种方式所能够获得的好处只是它们感兴趣的特定领域，并不能对体系的总体结构产生影响。它们不会形成一种选择，也没有给予这种模糊（虚幻）的建设“民族资本主义”的计划以牢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应明确定义为真正的社会计划。南方国家中最弱的国家（“第四世界”）甚至还没有自己类似性质的计划，可能的“替代”物（宗教或族群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还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同样，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唯有北方主动提出“为了它们”（应该说是“防备它们”）而推行的计划，如欧洲联盟和非加太国家协议（及后来接替《科托努协定》的《经济合作伙伴协定》），或者涉及中东地区甚至是“大中东地区”的美以计划。

## 一旦转换点角度，视野就会有所不同

从长期来看，整个世界不会崩溃，就像利己的实用主义的格言（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sup>①</sup>）所说的那样；大政治的特性就是从长远考虑。在此，社会力量、国家和国际各种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变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显现出来了。

因为不存在几近超自然的力量一样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法律”。也没有史前历史决定论。资本逻辑的内在趋势遭到不承认其后果的力量的抵抗。真实的历史是资本扩张逻辑和深受其害的社会力量的抵抗逻辑之间的冲突。

举例来说，战后（1945～1990年）时期周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资本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进行工业化的附加条件的产物，而对这种工业化，全球资本也做出了调整。举例来说，作为资本世界化的产物，民族国家效率的损耗，在未来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相反，民族国家对这种世界化的反抗却可能引起未预见得到的一些进程的世界性扩张，根据情况，也许是更好也许是更坏。举例来说，与资本逻辑相冲突的（因为资本逻辑在本质上是短期的）对环境的担忧，可能会使正处在重大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做出调整。人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只有理解到历史并不是受“纯”经济法则无可挑剔的表现

---

<sup>①</sup> 原文为“après moi le déluge”，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的名言。——译者注



来左右的，应对这些挑战的举措才是有效的。这种应对是对这些法则表现出来的趋势进行社会反抗的产物，这些反抗则在这些法则的运作框架下界定了它们的社会关系。“反体制”的力量——是人们对这种单方面的、总体强制执行的这些所谓法则（事实上，资本主义特有的利润法则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制度）的有组织的、协调的和有效的拒绝的称呼——造就了真正的历史，同时也造就了资本积累的“纯”逻辑。它们决定了扩张的可能性和形式，而这一扩张的背景也是在它们的压力下形成的。

这里推荐的方法是不要预先提出可能造就未来的“秘诀”。未来是各种社会和政治关系变化的产物，而这些变化则是无法预先得知的斗争的产物。然而，人们可以从有助于形成协调和可能的计划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并由此帮助社会运动避免“解决方案的走样”，否则，在走样的情况下，运动就有陷入困境的危险。

对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所提出的挑战，人道主义的应对计划绝非“乌托邦”。相反，真正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必须迅速团结那些强大的、能够带来必然结果的社会力量，这是唯一可行的、现实的计划。如果说有“乌托邦”，从这个词的平常和消极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从一种体制管理计划蜕化为市场调节的乌托邦。

为了确定这种人道主义选择的条件，必须从了解各种不同的愿望开始，这些愿望表明了社会动员和社会斗争的原因，可以将它们分为五类：（1）政治民主、尊重权利和知识自由的愿望；（2）社会公正的愿望；（3）尊重不同族群和共同体的愿

望；（4）更好的生态管理的愿望；（5）在世界体系中占有更有利地位的愿望。

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回应这些愿望的运动的先驱者们很少有相同之处。举例来说，人们可以想象到，赋予国家一个在世界等级体系中更高的地位，是领导阶级与执政者的主要担忧，这样一种更高的地位涉及财富、实力和自主性，这一目标有可能得到全体人民的同情。从完全的意义上来说，尊重——也就是说真正的平等待遇——的愿望，可以动员妇女等——可以是作为女性的妇女，或者是作为被歧视对象的文化、语言或宗教群体的女性。受这些愿望所鼓动起来的运动可能是超阶级的。相反，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公正的愿望，如人们所希望的定义（如同这一愿望所动员起来的运动希望的那样）——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更贴切和有效的法律，或一种社会关系体制和完全不同的生产体制——则几乎是必不可免地要进行阶级之间的斗争。这里可能会涉及农民的要求或者要求土地改革的农民群体中的一个阶层的要求，即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有利于佃农的立法、更有利的价格等。还可能涉及工会的权利，劳动立法或者要求国家为劳动者利益进行有效干预直至国有化、工人参与共同管理的政策。同样也可能涉及主张减轻税负的专业人员群体或企业家的要求。可能涉及为全体公民说话的要求，如为教育权、健康权或居住权，以及在实现上述权利的基础上，要求适宜环境的管理等各种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民主愿望可能是有限和明确的，特别是当它鼓动运动与一个不民主的政权进行斗争的时候。但是，它也可能是有包容性的，是能够使全部社会要求得到推动的杠杆。

这些运动目前分布的情况毫无疑问地表明了现实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分布情况是变化不定的，因为有问题地方，总是潜藏着寻求解决方案的运动。但是必须说明，想象着能将这些在现实中运作的各种不同力量结合起来，协调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使社会走向更公正和更民主，这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无序和有序都是自然的。还必须说明，忽视当政者对这些运动做出的对抗反应，同样也是天真的。这些政权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为应对它们在本地区和国际上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制定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它们采用的逻辑与作为上述愿望基础的逻辑是不同的。

我对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sup>①</sup>（《帝国》）所做的批判体现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追随的是曼纽尔·卡斯特<sup>②</sup>开创的道路，涉及正在形成中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1998年巴黎法亚尔出版社），但他们忽视了上述网络事实上受限于“三合会”国家社会中的几个环节，也仍然是遵循着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逻辑。没有边界和结构的“多元群体”的模糊概念符合北美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历来平庸的论调，几乎只是非概念的“人们”（“人民”）的一种同义词，而这个词仅将社会视为其成员个人

①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美国学者，著名的德勒兹（Deleuze）专家，毕业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英文系，任教于杜克大学文学系。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意大利前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现为著名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著有《颠覆的政治：21世纪的宣言》、《愤怒的异类：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等。——译者注

②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196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后任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著有《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和《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Grassroots*）等。

的总和。但愿如此无稽之谈受到“公民社会”（又是一个近似非概念的模糊概念）的某些重要环节毫无保留的欢迎，但愿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著作中表现的像“替代性世界主义的宣言”一样的狂妄无知，得到严肃的、毫不妥协的批判。“运动”只有摆脱这类幻想，摆脱这种惊人的天真，才能前进。

这就是说，社会运动的偏航及其工具化和被操纵的可能性同样是存在的，并可能导致其瘫痪，或者迫使它们向本不该属于它们的前景发展。

存在一种世界管理的全球政治战略。其目标是通过支持社会组织的各种国家形态的分裂，使潜在的反体系力量最大限度地支离破碎，尽可能地像斯洛文尼亚、车臣、科索沃和科威特一样！对身份要求的利用，甚至是操纵，在这里是受欢迎的。共同体、族群、宗教或其他的身份问题因此成为当代的中心问题之一。

民主的斟酌原则意味着真正尊重民族、族群、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它绝不能被扭曲。除了实行真正的民主，多样性的管理，没有其他办法。没有民主，多样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手达到目的而利用的工具。然而，历史上的左翼政党在这方面往往是做得很不够的。当然并不总是这样，另外也远不如今天人们经常说的那样。举其中一个例子：南斯拉夫曾经几乎是建立在真正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共存的典型；但罗马尼亚显然不是！在万隆时期的第三世界中，各个民族解放运动常常能成功地团结起来反对不同族群、宗教共同体的帝国主义敌人。第一批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阶级实际上往往是超族群

的。但是，那些懂得以民主的方式管理这一多样性和已经获取的成果（如果有的话）的政府，却是很少见的。他们对民主倾向的淡漠也导致对其国家其他社会问题管理的令人惋惜的后果。当危机来临时，需要面对危机却陷于困境的虚弱的领导阶级往往在求助于共同体的拢合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拢合是被用作扩大对群众的“监视”手段的。然而，即便在许多公认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共同体的多样性也不是都得到合适的管理。北爱尔兰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文化主义的成功与多样性的民主管理的不足是相辅相成的。我想通过文化主义来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差异是“原生态的”，必须得到“优先”考虑（比方说相对于阶级差异的关系而言），甚至有时候被认为是“跨历史”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历史不变的基础上的（这种情况往往是宗教的文化主义，它们毫无困难地滑向蒙昧主义和宗教狂热）。

为了在众多的身份主张中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标准。反对社会剥削的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张，以及最大限度地全面实现的主张，都是进步的。相反，所有体现出“没有社会纲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不重要！）和“非反民主”（同样也是因为这并不重要！）形态的主张——更何况（*a fortiori*）它们与民主概念（被指控为“西方的”）格格不入——都显然是反动的并且实际上是完全为统治资本的利益服务的。不过，统治资本很清楚这一点，它支持这些要求——即使当媒体利用其野蛮的意图检举本是其受害者的人民时！——并利用甚至操纵这些运动。

以人道主义取代世界范围内的种族隔离，既不能沉浸于怀

古之幽思，也不是基于对承袭于过去的多样性的肯定。它只有面向未来时，才是有效的选择。超越被打断了进程的和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创建一个新的建立在人民、共同体、国家、个人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后资本主义全球化。

问题在于延续至今的多样性，既然它们事实上存在着。但是我们在关注这些多样性时，忽视了其他更为值得关注的多样性，而未来的开创必然在其运动中产生。这种多样性概念来源于不受束缚的民主概念，以及永远与之伴随的没有结束的现代化进程。围绕着有创造性的乌托邦思想，能够凝聚人民为争取平等和公正而斗争，而这种斗争也总是从多重价值体系开始寻找它的合法性。作为必要的补充，社会分析体系本身受到不同的社会理论的启发。为了有效地向既定的方向发展而采取的战略不能由某个组织来垄断。未来创建中的这种多样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受欢迎的。

取代全球范围种族隔离的替代性选择，就是实行多中心的全球化，这将确保减少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对于曾经受到两极分化极大的破坏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少一点不利的关系。

走这条道路显然需要组织复杂的谈判，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调整的制度，以能够实施名副其实的发展计划。如同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这意味着对市场准入和资本准入的机构、货币体系、自然资源税、去军事化程序进行讨论。

从兼顾全球化和地方与区域自治的（我称之为与新的挑战密切相关的一种脱离）的角度来看，这一立场为的是认真地修正联合国体系民主化的概念，它能够有效地致力于裁军目标

(有可能通过参与地区重建的国家和地区来实现),着手建立一种全球化的税收制度(与地球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通过开始建立一个能够兼顾普世主义(个人、集体和人民的权利,政治和社会权利等),以及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要求的“世界议会”来完善联合国这样的国家间组织。

当然,若要有幸看到这个“计划”整体上向前推进,则必须首先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聚集社会力量并形成计划,而且这些计划要能表达出进行必要的改革的意愿,而这些改革在自由主义和两极分化的全球化背景下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不管是涉及部门的改革(如行政改组、税收、教育、参与式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改革),或从更一般的意义而言的社会及其政治与经济管理民主化的观点来看,这些初步阶段是无法回避的。没有这些阶段,让世界走出无序和危机并使其“加速发展”的全球改组的念头事实上将必然成为乌托邦。

从后一种视角来看,势必要采纳一些立即行动的建议,围绕这些建议就能动员起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首先是在地方层面上,即使它们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让斗争全球化”)。对此,我想到人们能够在所有领域很快落实庞大的一系列调整的形式:经济(举例来说,征收资金流动税、废除免税天堂、废除债务),生态(物种保护、有害产品和方式的禁止、对某些不可再生资源消费实行全球性征税),社会(劳动法、投资法、人民代表在国际决策机构中的参与权),政治(民主和个人的权力),文化(拒绝文化财产的市场化)。

我提出的中期纲领并不仅仅是从保护弱势者(阶级和民族)的角度出发改变市场调整的形式。没有一个政治环节是不

重要的。指导这种设计的中心思想涉及裁军和制定一个新的有关个人、人民及国家的国际法。

总之，对挑战与回应它的各种选择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或者是无情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导致种族隔离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者是从构建替代性的、多中心的全球化视角出发，开始真正的谈判。

### **真正的多极化世界只有在下列三个条件 得到满足时才能得以实现**

1. 欧洲真正地在社会的“另一个欧洲”的道路（且进入向世界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上得到发展，并开始放弃其过去和现在扮演的帝国主义的角色。这显然意味着不仅仅是简单地走出大西洋主义和极端新自由主义。

2. 南方国家（人民和国家）成功建立“共同阵线”，这是让运动有余力的条件，即不仅让民众阶级拥有服务其利益的“特权”，而且还要超越这一步改变执政政权的性质，让“民族、人民和民主”的集团取代占统治地位的买办集团。

3. 在国家和国际的权利体系的重组方面，在建设尊重国家主权（从国家主权渐进到人民的主权）和尊重个人与集体的政治与社会的所有权利上取得进展。

回到本书提出的各种分析上来，我们可以估量现阶段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的斗争还存在着的差距，并由此判断需要克服的障碍的性质。

欧洲各国政府并没有踏上应走的道路，现有的社会和政治



的民众运动则远没有应对挑战的措施。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欧洲应停止“将其资本余量投放到纽约金融市场”，因为这将使美国能够克服其主要的障碍（储蓄不足），并得以继续其霸权主义攻势。这意味着需要对欧元进行管理，而不是通过现行协议所设想的一种对“欧洲”货币的政治管理，依我看来，没有欧洲政治权力，这种管理是不可能的，对这种欧洲政治权力而言，只要大西洋主义力量和追随自由主义同盟的力量仍然占据主导，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称为石油—美元标准的垄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石油美元货币单位（oil dollar standard）将美元作为唯一真正的国际货币与对大中东和几内亚湾的主要石油生产地区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的——关联起来]。因此，欧洲不得不配合华盛顿的对俄、对华、对阿拉伯国家和对非洲的政策。它就是这样做的，而且“社会运动”常常帮助它这样做，错误地提出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特有的民主赤字有关的问题。民主赤字的确存在；但是，在追随美国的背景下（美国真诚希望别的国家实行民主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欧洲舆论并不会帮助它们消除赤字，而只是做由华盛顿组织的舆论宣传的应声虫（在诸如中国的政治自由、新疆和西藏的命运、指控俄罗斯试图重建苏联的“野心”等问题上，或在所有涉及揭露阿拉伯和非洲独裁的问题上）。对于美国的无耻和操纵的手法，应该用一种有利于人民团结的巧妙的战略来对抗，这些人民同时也是华盛顿的权力和野心的受害者。我们离此目标尚远。铭刻着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双重选择标记的“欧洲宪法”计划的可能被通过，这似乎表明社会主义者向“社会自由主义”进一步靠拢，这一点儿

也不是好的开创。政治文化冲突远没有突显出来，欧洲左派有可能在这样的冲突中更新换代，并且有逐步受到“欧洲思想的美国化”侵蚀的危险。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选择了“低姿态”。当局对其自身充满信心，并相信能够控制，无须最终决定持一个或另一个阵营的立场。此外，目前中国利用它向美国出口的巨大顺差所赚取的美元来支付其进口所需。因此，中国支持美元作为计量单位。在其国内，工人斗争并不是不存在，情况远非如此，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农民的抵制（“半组织的”）还是成功的，尽管权力具有独裁的特征，却在使土地私有化的趋势日渐削弱。但是，反过来，正如我曾经指出的，“美国模式”对新中产阶级的吸引力对这个大国政治文化的变革正在形成某种危险。

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前景依然灰暗。不满情绪很大，而悲观主义更是显而易见，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对过去苏联的怀念，或是还抱着对“民主”（“西方”类型）的幻想，而这种幻想的危害是具有毁灭性的。没有一个后苏联的左翼政党显得有所突破。经常出现并有时还跑到舞台前面的“社会运动”被华盛顿的走狗们没什么困难地玩弄于股掌，如同人们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能看到的那样。

南方国家的障碍也少不到哪里。粗暴的镇压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舞台上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此方面，拉美确实是无可争辩地优于其他地区；人民对民主的热爱制止了有可能很容易就重新实行的独裁。但是，这种与新自由主义掺杂在一起的对民主的热爱今后仍将是脆弱的。在亚洲和非洲，因缺乏最起码的民主根基而最终产生了对过去的怀旧之念。不要忘了，作为

最大动员力量并受益于大多数人善意的中立的“社会运动”是宗教和种族原教旨主义的反动运动。同样经常存在的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斗争（往往表现为暴力冲突），跟进步的（特别是妇女运动）和民主的运动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做到消除怀旧意识的幻想。

有迹象表明，仍然有些政府对自由主义秩序提出质疑。我曾经指出过其中的一些主要迹象，它们涉及对资本流动的监控和对外国投资的调节，以及“三合会”将其观点强加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企图反复遭到失败。虽然必然的决裂已经开始，但是，要走的路仍然还很遥远。让农业问题走出世界贸易组织的议程，成为复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还未被纳入议事日程，当北方国家在墨西哥的坎昆提出了农业出口补贴问题时，南方各国政府却在热衷于邻里之间的打架。这些农民组织中有许多本身对此几乎不再考虑。为争取三大洲所有农民获得土地权力的全球性运动甚至尚未开始。通过在这一领域制定相应的国际法来废除外债更没有得到很多考虑，甚至那些揭露——公正地说——不公正罪恶的很多组织对此也没有考虑，这些不公正的罪恶在它们看来正是由于债务利用中的优先权而产生的。最近的斗争浪潮中最好的政府，如巴西的卢拉政府，也是令人惊讶的羞羞答答。查韦斯的政府对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进行彻底改革的意图是否能获得成功呢？

南方阵线显然还不存在，尽管有迹象表明有可能重建。目前的一些在过去形成的机构是根据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来设计的，即它们作为自由主义世界化的中间阶段。这些机构并不是应对真正挑战的合适工具，几乎只是装潢门面而无所作为，如

同我们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看到的那样。南美的南锥体共同市场作为这种类型的一种模式，表现出能够致华盛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死地的能力，然而却受制于其“共同市场”的半自由主义的选择取向。最近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形成的“20国集团”（在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的推动下）也是模糊不清的。巴西由于其现代化的大庄园、廉价的劳动力和方便其发展的巨大的土地存储，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实行农业市场化的最受惠的国家，它与亚洲国家在此方面没有共同兴趣！

另外，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假如公众舆论（特别是西方的公众舆论，而且应当感谢它们）做到了使各国人民权力受损的某些最极端的形式（如国际共济会协会）受到削弱，它们也不能让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通过的商业权利优先于各国人民权利的原则颠倒过来。而当考虑到联合国的改革时，从其正好与我们的建议相反的意义上说，它是这样：这一改革目标是削弱这一组织的作用，并使之更加驯服！

与前文提到的足以引人深思的悲观主义的评价相比较，我认为，世界“运动”已经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世界不是拿来卖的”“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已经在整个世界赢得了公众舆论同情的正义斗争的号令。

我们所讨论的“运动”是多元的，这一多元性肯定是拥有力量的，尽管它使优先考虑的战略同时实现的可能变得更加困难。在国家、地区和世界层面上，赢得某些具体问题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在实现“另一个世界”的战斗中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这表明需要有深入的系统化的斗争、对质疑目标的选择及组织行动恰当的战役。仅仅增加这一体系之受害者的权利主

张——这是完全合法的——即不是一种替代性选择，这需要政治协调，甚至也不是一种能够使之取得进展的战略。然而，“运动”受到停滞不前的严重威胁，也没有人试图让这种原则的选择具有合法性。

这一多元性首先是目标的多元性，其次是社会（“阶级”）利益的多元性。“运动”今后动员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中重要的部分群体——尤其是在这一体系中心国家里的。它们的组织始终是指向一个单一的目标（妇女地位的提高、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需求、保护文化上的“少数民族”和其他被压迫民族、权利进步等）。这些组织可能是在（“持续进行的”）过程中设计的，或者是为了一场特定的斗争建立起来的。它们基本上往往是“跨阶级”的。应该对这种社会阶层参与的积极转变感到高兴，时至今日，这些社会阶层往往满足于使用它们的投票权和代表制民主的手段（为政党和当选者进行游说和参与）。其中很多运动所具有的保护“个人”（及个人的创造自由）和强烈的道德维度，并不是像某些传统的工人运动所通常认为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是一种政治实践的进步，从长期来说，有利于所有的被统治阶级。

然而，这些“新”运动并没有使得为所谓“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大众阶级的运动消失。为就业、工资和劳动保障而斗争的工人运动，为农产品的利润价格、获得土地及有措施保障正当的耕种权利而斗争的农民运动，仍将是可能改变社会力量关系的斗争的轴心。因此，工会和农民组织是运动的基本组织。但这并不总是像应该得到认可的那样而被认可。因为在汇聚了各种运动的“大集市”（论坛）上，前台往往是被中产阶

级所占领。毫无疑问，统治阶级借以表达主张、组织行动的各种“传统”组织，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挑战。我曾经强调指出过，因资本主义变革而产生的劳动组织和经济生活管理的变革，迫使工人和农民运动的组织和斗争的形式发生变化，其中的这些变化形成了替代性的世界论坛的工作纲领（可以参考第三世界论坛的网站）。但是，这些要求并不能证明其他运动对所谓“传统”的工会和农民组织抱有轻视是合理的。

对于所有运动来说，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动员能够——作为“专家”——分析问题形势的支持者的“智力”资源的能力、提出战略和战术的能力、与媒体沟通的能力、引导谈判的能力。对这些能力的动员在此当然同样意味着对基于已经变化了的过去的经验传统的“修正”，因为社会的客观变革已经超越了过去。但是，成功——或者失败——同样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形势，取决于权力体制内冲突所具备的可能的尖锐程度。这就是“运动”表现出一波波周而复始的飞跃和衰退浪潮的原因。不断地分析这些形势仍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一般而言，“战斗精神”正在发生着变化。有人说，战斗的“激烈程度”少了，“持久性”弱了。对此，我不苟同。从尊重舆论多元和民主实践（对“领袖人物”的“不信任”）角度来看，是要求更高了，我对此深信不疑，并认为这一变革是积极的。

运动的扩张凸显出了那些重要的“没有声音的”群体，也就是说，处于最不利条件的人，很少受到代议制民主机构关照的人。这些“没有声音”的人（如没有“身份”的移民，或

者——从习俗道德来看——那些“不正常”的人) 为了表示出他们的存在, 往往需要来自其他背景的“知名人士”或积极分子的支持。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即使彼此关系的管理总是很成问题。

“社会运动”并不只是动员起“进步的”社会力量。也有一些完全反动的、有权势的运动, 它们并不是为了建设“另一个世界”(其中也包括多极世界)而努力。在美国, 工会几乎一直在捍卫着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 它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关系不亚于苏联工会与其政府的关系。还是在美国, “爱国者协会”和“宗教团体”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成员。在欧洲, 社团主义和类宗教运动成功地展开了蒙昧主义攻势。在某些边缘地区, 原教旨主义、类宗教或族群主义的运动居于前沿阵地。

各种运动在突破国家边境的问题上遭遇到巨大的困难。只有那些——天真地——相信“地球村”或泛指“芸芸众生”的人才会对此感到奇怪。问题和挑战对于地球上的每个国家来说都是特定的。中国农民的利益——他们要维护已经获得但受到威胁的获得土地的平等权利——和其他地区“有竞争力”的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大的相干。即使在欧洲, 纯粹的工会协调也是难得一见, 由于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决定性影响而几无可能。

如何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呢? 我认为, 除了围绕优先的战略目标开展全球性的行动外, 别无他法。为了便于讨论, 我在此举几个例子: (1) 发动一场反对美国战争(所谓预防性战争)的行动, 并要求撤销其所有基地(“让美国人回家去”);

(2) 发动一场争取土地权的行动，对这一权利的承认于三大洲 30 亿农民而言是生死攸关的；(3) 发动一场建立产业转移协调组织的行动；(4) 发动一场取消第三世界外债的行动。其他建议也是欢迎的。这些行动中没有哪一个会涉及“所有人”，其重心在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但是，所有行动都应该既在直接有关的国家，又同样在其他国家得到强烈的共鸣，以具体地向前推进各国人民的新国际主义。

在我看来，影响“运动”的主要威胁在于天真地相信人们能够“无须去努力夺取政权而改造世界”的危险。的确，强大的社会运动曾经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成功地“改变了社会”。1968 年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近例。1968 年改变了许多事情（在西方国家），并且是以积极的方式：女权主义的权益主张得到飞速发展，个人民主的责任得到深化，其中不乏积极意义。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表明它能够吸纳这些变革，而并没有质疑其剥削和压迫的基本模式。今天，从曼纽尔·卡斯特到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的著述，都试图给这种呼吁披上一种“科学”外衣下的合法性，这种呼吁最终是什么也别做，因为一切都将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针对这种情况，社会运动被要求变成力求变革社会关系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权力体系的政治力量，这样的社会运动进展的需求仍然是辩论的中心。但愿这意味着，发明“另一种政治安排方式”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此形成的建议过于含糊不清，只是空话。

今天，各种社会论坛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选择。它们可能成为推动全球各种不同的进步力量聚集的坚持建设各种阵线的



场所。为此，我在此建议确定共同的平台，其目标在于既拒绝新自由主义，也拒绝美国监督下的全球化的军事化。这一开放且广泛的同盟体现出了这样的视野，能够把重点放到积极的替代性选择的建设上来。于我而言，这个同盟自然是不包括反动的社会运动的，这就要求结束在对待左翼的一些重要环节上模棱两可的态度。否则，各种社会论坛将成为“大集市”，对之没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占主导的制度当然鼓励这种“玩民主游戏”的选择，事实上，这是一种虚弱无力的民主，没有能力产生出严谨、有效的替代性的政治战略，由此，它对政府当局是有帮助的。

## 附录一

# 20 世纪的多极化

旧的世界体系一般来说几乎一直是多极化的，尽管这种多极化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是普遍和相等的。因此霸权更一直是强国追求的目标，而非现实。只要存在着霸权，它们就总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19 世纪多极世界（延至 1945 年）的合作伙伴几乎只是当时的这些“强国”。在当代的“三合会”中，或许存在着对这一时代的怀旧和回归这一“大国平衡”样式的情结。但这并不是地球上大多数国家人民（占 85%！）所希望的多极化。

由俄国革命开始，其后部分地由亚洲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所促成的多极化世界属于另外一种性质。我没有分析“两极格局”和“冷战”的传统话语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这些传统话语并没有给那个时代南方国家的进步以应有的位置。我分析的是在主要文明冲突话语中的多极化，这种冲突超越了走样的意识形态用语，涉及资本主义及其超越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间的冲突。边缘国家人民的愿望——消灭因资本主义扩张而产生的两极分化的后果——必然属于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观念，不管它们是否引起过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下文中强调阅读一些指向于这一冲突所

引发的强大政治团结的材料，反过来说，这些政治团结决定了 20 世纪下半叶特有的多极化概念。

## 伟大革命的悲剧

一些“伟大的革命”因为面向未来，高瞻远瞩，显得与众不同，是其他革命（“普通革命”）不能相比的，“普通革命”是满足于当前变革的需要。

现代历史上仅有三次重要的伟大的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及其他几次类似的革命（如 20 世纪头 10 年的墨西哥、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以资本主义秩序取代旧制度，以资产阶级政权取代贵族政权；它同样也是民众的革命（并且特别是农民的革命），其要求也对资产阶级的秩序本身提出了质疑。民主和激进世俗的共和国，本意上是鼓吹全体公民小产业的普遍化，它并不是出自资本积累（建之于不平等）的简单逻辑，而恰恰是对这种逻辑的否定（并且它具有表明经济自由主义是民主敌人的清晰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已经有了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萌芽，显然当时的法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巴贝夫主义者是其证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还可以加上越南和古巴的革命）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同样远远超越了解决自己国家眼前问题的客观需求。

因此，所有伟大的革命都不得不经因超前而产生的反弹。在短暂的激进之后便陷入倒退和反动的复辟。这些革命在维系稳定方面一直都面临巨大的困难（法国大革命的稳定

用了一个世纪)。与此相比，其他的革命（如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是由此开始了体制稳定和平静的发展，这种革命是仅满足于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需求纳入新生的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因此，这些“革命”是如此明显的与旧势力妥协，缺乏对未来更远大的理想，称为革命实在是勉强。

虽然这些伟大的革命“失败”了，但是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创造了历史。通过它们的计划所确定的先锋的价值观，它们使具有创造性的空想得以继续深入人心，并最终使现代化的最高抱负得以实现，这就是让人类成为人类历史的积极主体。这些价值观与另有所建的资产阶级秩序的价值观恰成对比，后者鼓励消极的调整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客观需求，并倾其全力支持为这种皈依提供依据的经济主义的异化。

## **帝国主义永远是资本主义世界性 扩张运动会上的重量级**

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发展从一开始且在每个阶段都是两极分化的。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这个不可少的特征，由于在近代思想，包括伟大革命本身所特有的先锋的意识形态表述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至少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而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几个国际（Internationales）的马克思主义也仅仅是部分地幸免于这个普遍规律。

了解帝国主义这一现实的巨大影响，并从中得出它所导致的世界变化的一切战略后果，对于所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受害

者的社会与政治力量来说，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首要需求，不论是在中心国家还是在边缘国家。因为摆上帝国主义议事日程的与其说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加快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变革）条件的成熟，不如说是来自边缘国家的反抗对它的帝国主义秩序提出的挑战。假如说 1917 年的俄国造成了这个体系的“薄弱环节”，或者说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革命后来转移到了东方（其中包括中国），但这都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西方的崩溃是不可指望的，列宁曾对此寄予希望。因此，我们所说的革命的国家社会面临着双重的和相互矛盾的任务，既要“追赶”（这意味着要借助于与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方式），又要“做另一件事情”（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任务的结合曾经到处都存在过；从它们有可能随着追赶的进展而对共产主义的渴望日渐增强的意义上来说，这本来也许能够更好一些。这种现实的矛盾一直是后革命国家社会历史变革的客观条件形成的核心问题。

在这些情况下，由“革命政党”（确切地说是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创导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的形式，曾经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束缚，即运动要形成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革命，其“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必须解决其唯一所欠缺的：建设一个“发动革命”的组织，这意味着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强调同质性（后来则是“坚如磐石”的）和几近军事化的纪律。我们所说的政党保持了这些组织形式，尽管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发动直接革命的进攻的观点已经被搁置一旁了。它们被用于服务另外一个优先的目标：在国内外保护苏维埃国家。

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中——就其性质而言，是帝国主义体系中的“暴风雨地带”——一种革命的形式仍然被摆在议事日程上。但是它的目标基本上仍然是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或者是本质上，还维持着资本主义现代化所特有的社会关系），还是更多？不管是中国、越南和古巴的激进革命或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非激进的革命，挑战仍然是：“追赶”并且/抑或“干别的”？而这一挑战清晰地表现在另外一个同样被视为优先的任务上：保卫被包围的苏联。

### 先锋战略选择的核心是保卫后革命国家

苏联，再晚点是中国，面临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和西方强国有计划地实施的孤立战略。我们是否有必要提醒一下下列情况？在美国短短的历史中，有 1/3 的时间，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主义大国的战略目标是完全绑定在摧毁它的两个对手上的，而不管它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华盛顿将盟国拖入这个战略并使其降为从属地位，不管是其“三合会”其他中心（欧洲和日本）的盟国，还是在边缘国家里的盟国，并逐步以买办阶级政权来取代受人民召唤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所产生的政权。

因而我们认识到，在革命暂时还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的时候，一般是优先保护革命后的国家。在列宁继而是斯大林及其继任者时代的苏联，和毛及后毛时代的中国，所实施的政治战略，亚洲和非洲国家—民粹主义国家所施展的政治战略，以及

由共产主义先锋（不管它们曾遵循的是莫斯科路线或北京路线，或曾是独立的）所提出的政治战略，都是根据捍卫革命后的国家这个核心问题来确定的。

苏联和中国既曾经历了大革命的艰难曲折，又曾面临着世界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扩张的后果。尽管苏联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但这是它们经历中的共同点。在两国经验中，优先考虑的是“保卫后革命国家”，为此目的实施的国内措施与优先考虑这一目标的对外战略同步展开。于是，各国共产党都根据这种选择来划分阵线，不仅表现在它们的整体战略导向中，甚至也表现在日常的具体策略中。这可能除了使革命者的批判思想迅速失去魅力外没有任何结果，在这些革命者的批判思想中，有关“革命”（永远是“急迫的”）的抽象话语缺乏对社会现实矛盾的分析，并因保持着反潮流的几近军事化的组织形式而得以维持。

拒绝画线站队并有时候敢于直面后革命国家社会现实的先锋队，尽管没有放弃列宁最初的假设（“立即革命”），然而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假设已经越来越脱离现实。如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的共产党。有不少积极的革命组织也是这样，它们有时候效法于毛主义或格瓦拉主义。这样的例子很多，从菲律宾到印度（纳萨尔派），从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其南也门的追随者）到拉丁美洲（格瓦拉主义）。

### **激进边缘国家的国家建设抑或社会建设**

亚洲和非洲公开反对帝国主义秩序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

动也互有冲突，和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革命一样，这些革命同样也面临着“追赶”（“国家重建”）和为大众阶级而进行社会关系变革的矛盾的要求。在后一层面上，“后革命”（或简单地说“获得独立后”）的国家体制肯定不如共产党政权那么激进，鉴于此，我将我们所说的亚洲和非洲的这些体制称为“国家—民粹主义”体制。此外，这些制度有时参考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验中调整过的组织形式（一党制、政权的非民主专政、经济的国家管理）。它们的效率普遍因模糊不清的意识形态选择及其接受与过去的妥协而受到削弱。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批判性的先锋队（在我们所讨论的国家中的历史共产主义）的体制反过来被劝说支持苏联（很少是中国），并从这种支持中得到好处。形成反对美国及其欧洲和日本同伙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阵线，这对亚洲和非洲人民来说肯定是有利的。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共同阵线使得无论是有关国家领导阶级的主动精神，还是其民众阶级的行动，都有了足够的自主余地。苏联解体后突然发生的情况便是证明。甚至在这之前，选择“西方”的领导阶级（萨达特便是一个主要的例子）所拥有的条件，助长了认为这种转变将是有利的幻想（在埃及的情况是，认为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拥有90%的牌，它和美国的友谊能够使局势向有利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方面“转变”，等等），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相反，它们的让步却有利于帝国主义进攻战略的施展（具体地说是加强了华盛顿—特拉维夫轴心）。

相反，苏联强加给其结盟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中站在大众阶级一边的政治力量的条件却是值得商榷的。人们可以



想象得到，在这个反帝阵营中，这些政党对其运动拥有完全的自主权，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阵营参加者具有利益和社会计划冲突的矛盾。因为，领导阶级在这个框架内最终继续一个从性质上来说是从资本主义的计划，尽管是“民族的”，而满足民众阶级的利益则要求超越这个前景，另外历史已展示了这种前景的狭隘界线。与此完全相反，苏联的国家选择助长了对其执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的幻想，这些选择削弱了民众阶级的自主表达。这种选择被解释为发明了所谓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在万隆时代要对政权利益和民众利益做出区分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政权刚刚从粉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旧形态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走出来，有些是从真正的与这些运动相关的革命（中国、越南和古巴）中走出来。它们仍然还是“贴近”民众的，并享有一种强大的合法性。

阿拉伯共产党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种根据“非资本主义道路”思想画线的悲剧性结局。绝大多数阿拉伯共产党实际上都接受苏联的指导性建议：最好是变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国家—民粹主义体制中的“左翼”。这种支持几乎不带有批评，实际上是无条件的。1965年，埃及共产党在幻想着可以复兴纳赛尔的社会党的希望中自动解散；叙利亚的哈立德·巴格达归附了这样的思想，即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只能是抹去了其资本主义特性的国家建设，二者均是这种选择的例子。我曾在其他场合讨论过这个核心的问题，特别是在埃及出版那个时代的许多支持者的回忆录的时候。我的结论是阿拉伯共产党总体上并没有走出其“民族—民粹主义”计划的基本范围，忽视了“民

族—民粹主义”最终还是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范畴的。这种选择并非形势所迫和“机会主义的”；它是结构性的，展现了我们所讨论的共产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缺陷，它们所传递的意识形态的模棱两可，及其对民众阶级的忽视，而“民族—民粹主义”被认为是捍卫当前和长远的社会利益的。这种不幸选择的结果是，已经达到其历史局限的民族—民粹主义体制一进入其合法性受到侵蚀的阶段，各国共产党就失去了可信度。“左翼”共产党也没有被作为超越国家民粹主义的选择，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真空，为政治伊斯兰悲惨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毫无疑问，某些阿拉伯共产党曾经拒绝这样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国家政治。“泛阿拉伯主义<sup>①</sup>”（Qawmiyin）及其在南也门追随者的例子，和其他一些以“毛主义”为核心的例子便是证明。但是前者并没有走出列宁最初的假设，即“立即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主义和印度的纳萨尔派抱有一样的愿景。它们曾经鼓励的热情高昂的运动的失败经验性地（a posteriori）表明，列宁的设想是由于悲剧性的简单化而产生，并且最终也是错误的。

南非共产党的经历同样是悲剧，它在同样性质的偏航中以其自己的方式迷失了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党得到了大多数非洲民众阶级的支持，而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聚焦了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根据莫斯科的意见，该党自行解散了，

<sup>①</sup> 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语为 Qawmiyya，英文为 Pan-Arabism）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原指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外来侵略者斗争中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并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联邦的政治主张和运动，以后也指中东各阿拉伯国家谋求政治上协调一致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泛阿拉伯主义逐渐趋向世俗化和社会主义，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和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介入。——译者注

并将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全盘交给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结果现已众所周知了。

与此相反是印度共产党人，他们中大多数受毛主义的影响，对议会保持着批评性的距离，并拒绝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如同我在关于印度的一章中所提到的，这无疑是它们幸免于灾祸的原因，并且在面对新的挑战时比其他党保持更好的态势。

同样相反的是，我们要指出，拉丁美洲重要的左派力量受古巴影响疏远了与官方共产党的关系。在此期间——在服从（dependencia）第一需要（première mouture）的旗帜下——发生的论战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并且至少是部分地说明了对民主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这个大陆的特点。

## 开启关于向世界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的争论

列宁在对真正的挑战和革命条件成熟的估计中所犯的错误已为人们所知，我们应该超越 20 世纪共产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开创性的方式开启有关面向 21 世纪的积极的替代性战略的讨论。

在此，我不想重复我在别处已经提出的论述，仅将主要论点概述如下：

- 我们必须思考应对资本主义世界向社会主义世界“长期过渡”的挑战的战略。
- 在这个长期过渡期间，在社会斗争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因素及与之相矛盾

的、开始产生并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两种冲突逻辑的交织和矛盾是长期的。

-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所有地区朝向这个方向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还是买办统治下的边缘国家。当然，这些发展的阶段性的战略必然是由具体和特定事物所决定的，尤其是在中心/边缘这样的对比的情况下。

- 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力量已经在向这些方向努力，尽管通过这些力量表现出的民众利益曾经是混乱的。所谓“替代性的全球化”运动便是实际的证明。然而这些运动传递着不同的替代性选择，一些是进步的（在上面所述意义上），另一些是空想的或者甚至坦率地说是反动的（以类法西斯主义应对挑战）。在讨论的真正意义上将之政治化，构成我称之为进步力量的“求同存异”的形成条件。

- 自由资本主义的牺牲者在全世界占据多数。社会主义必须要能够利用这个新的历史机遇。而且只有了解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已经彻底并且持久地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社会主义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已经不再只是过去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旗帜，它可能成为代表绝大多数劳动者未来的旗帜，尽管他们的身份各有不同。重建劳动者——包括在体系内享受某种稳定生活的人和被排除在体系外的人——的团结，成为共产主义复兴这一创造性思想的主要挑战。在边缘国家，这种重建同样意味着组织广泛的使所有农民有平等的获得土地权利的运动。由于人们常常最终忘了农民仍占人类总数的1/2，而任何资本主义的方式都解决不了这个

重大问题，这样的复兴是必不可少的。

• 目标能够得以实现的有效行动的战略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社会进步、民主化和多中心世界体系的建成。伴随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选择而提出的政治民主使民主明显地失去了一切公信力。反过来说，这种选择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已经不再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它取代了由于大众阶级民主权利的发展而对其程式进行的创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社会进步也就没有民主的前进。最后，考虑到国家差异（及特别是形成这些差异的政治文化）的现实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造成的不平等，开拓人们所追求的社会和民主进步的空间，必须要建立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体系。其首要的条件显然就是搞垮华盛顿的全球军事控制计划。

## 附录二

# 多极化地缘政治和社会体系

## 补充读物指南

本书是以所讨论问题的地缘政治维度为轴心的。作此选择，我是慎重考虑的。事实上，我认为当代“社会运动”对这些地缘政治问题并不感兴趣。后者是“政治”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运动一般都相信，“政治”就是“邪恶”，不会带来什么好的东西，“改造世界”应当远离政治。有些人试图给这种观点赋予“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我认为应该放弃这种念头。如果“政治”是邪恶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废除它（而且这也不可能），而是改善它。

读者当然可以与我所采用的——事实上也是普遍使用的——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保持距离。我历来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并因此而涉及政治）特有的逻辑，与支配着正在成形或建议的全球化形式的逻辑之间密切的关系。

本书只关注地缘政治的问题，后者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只在文中隐约见到。我想增加一部分内容，它们在此只是一个延伸补充阅读。

### 关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1. 提示：有关“纯经济学”（想象中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

的经济学)的批判,及与此相反的,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我称为历史中的“亚限定”(sous-détermination)]政治经济学需求的批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读本;通过市场而形成的社会化(与由民主形成的社会化相反)的界限辨别。

- 纯经济学或当代世界的魔法(《当代形态批判》)(*Critique de l'air du temps*, 第八章, L'Harmattan 出版社, 1997)。

- 关于历史中的决定或亚限定(《当代形态批判》, 第三章)。

- 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病毒》)(*Le Virus liberal*, 第9~20页, Le temps des caries 出版社, 2003)。

- 低密度民主,由市场形成的社会化或由民主形成的社会化(《自由主义的病毒》,第50~62页)。

2. 提示:从内在的资本主义维度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

- 帝国主义扩张的相继阶段与源自这些阶段的“中心/边缘”关系的主要特征(《全球化的挑战》)(*Les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第四章,第111~114页, L'Harmattan 出版社, 1996)。

- 正在建构中的帝国主义新阶段;五个新的中心垄断集团(《全球化的挑战》,第四章,第114~117页)。提到的分析回避了“新兴国家”这一令人迷惑的概念,这些国家实际上只是明天的边缘国家。

- 价值形式的区分,一般的价值规律,以及在资本主义的

世界扩张的相继阶段出现的“世界化的价值规律”（《全球化的挑战》，第五章，第131~134页）。

- 在其发展的相继阶段中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在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中的统一与变动；《当代形态批判》，第二章）。

- 一个“‘三合会’国家的集体的帝国主义”的新近形成，及其经济与政治管理的工具。[《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Au-delà du capitalisme sénile*），第四章，PUF出版社，2001]。

##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型与对主导话语的批判

1. 对涉及劳动、价值、技术革命与“认知”资本主义、金融控制和“世袭”资本主义等后现代主义论题的批判。

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的程度，及其对劳动和价值规律的影响，已经产生出了卷帙浩繁的著述。占主导地位的议题宣称“横向的”（“成网络的”）社会关系替代了原先的等级关系，“知识”已经变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因此而使得“原先的”涉及劳动与价值的理论（当然是马克思的理论）今后将可能失效。这一思想运动的创始人毫无争议地是曼纽尔·卡斯特，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近来也重新拾起了这一议题。

我所提出的对现行资本主义的变革的分析是另外一种样子。首先，因为它使主导话语表现的对于事实的观察相对化了，事实上这些主导话语只涉及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社会的环节。其次，对于生产体系效率中知识之重要性的承认，并不是



新出现的。最后，总是存在着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这种社会关系，完全摧毁了所谈及的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影响。

我的分析强调正在发生的变革的其他主导方面的特征：五个中心垄断集团，在某些新“经济”环节中出现的“死资本/活资本”比例倒置。由此特性出发，我提出一种对全球化的价值规律的内容和劳动剥削形式的新的界定。

主导话语同样强调这一体系的金融控制，并宣称这一控制体现出一种持久的质变，基于这种质变，将会产生出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所谓的世袭资本主义。我的分析将金融控制视为转型之危机的一种特征。使用世袭资本主义为的是，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民众资本主义”古老神话的自命不凡的表达形式。

- 《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第四章。
- 《当代形态批判》第五章。
- “全球主义或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隔离（Globalism or apartheid on a global scale）”，见 Immanuel Wallerstein（ed.），《长时段中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 in the Longue Durée*），Paradigm，2004.

- 《技术革命与认知资本主义》（*La Révolution technologique et le capitalisme cognitif*），将要出版。

2.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转型所揭示出的问题，我同样提出：

- 对全球化概念进行批判；回想前现代时期全球化的原有形式（《全球化的挑战》，第一、二章）。
- 对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术语进行批判：公民社会、治理、共同体、贫穷、一致同意、更替等。

## 关于当代“三合会”内部的矛盾

1. 美国的霸权：既成事实抑或只是其领导阶级的愿望？是一种真实的经济力量的表达，还是相反是一种补偿严重缺陷的手段？全球化的军事化、接连的“防御”战争和“混乱帝国”（从1990年起我们使用的表述）。我们对美国人民能有什么期待？

- 《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第五章。

- Bill Fletcher, 《美国工人能拥抱反帝国主义吗?》(Can US Workers embrace anti-imperialism?), 见 J. B. Foster (ed.), 《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 MR, 2004.

- PNAC, 《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Washington, 1997.

- 《国家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2002.

2. 欧洲计划的消失（欧洲计划还是美国计划的欧洲部分?）；政治文化根源与潜在力量。

- 《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第111~117页。

- 《自由主义的病毒》，第62~106页。

-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Judaïsme, Christianisme, Islam), 见《社会界限》(*Social Compass*), Vol. 46, No. 4, 1999, 第545~560页。

- Marie Thérèse Bitsch, 《欧洲建构史》(*Histoire de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omplexe, 2004.

## 关于社会主义的展望与对真正 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1. 除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想象的变种之外，人们可能还承认，社会主义产生于这样一种确认，即集体选择不能“自发地”产生于个人选择（如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证明的），它们必须通过民主的深化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建构，它们只有与肯定平等的不断增强的前景相一致，才具有意义。社会主义因此是解放与平等的同义词，需要施行政治与经济的民主管理。

对此界定，我与其他人 [参考 Tony Andréani, 《社会主义来了（抑或是未来）》（*Le Socialisme est (a) venir*, 两卷, Syllepse 出版社, 2004] 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一概念需要对社会主义的能使之在世界范围内通过“长期的转型”来实现其建构的战略阶段进行辨认，而在“长期的转型”期间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其他产生于社会主义逻辑的生产方式的形式与价值以冲突的方式相互交汇。

在这种展望里，一个能够将市场的民主调节与计划（它被认为产生于与由技术官僚指挥的愿望形成对比的民主讨论）手段相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或者如 Tony Andréani 所说的“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可能被设想为转型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下文中，基于中国现行的经验我们将再回到这些展望上）。在此，有关“遥远的社会主义”和“市场”有可能占据位置的讨论是开放的。这一讨论显然对异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此外，对社会主义的展望除了“世界性的”意义外，没有其他意义。“在经济上最先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15%）的人民所特有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隔离”的展望没有什么区别。另外，“社会主义的需求”直到目前在当前体系的边缘国家中，通过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为指导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化等方式，得到了非常有力量地表达。

“承袭”而来的文化差异问题和涉及对于转向于未来之建设的社会主义想象的多样性的问题，同样需要被重置于这一背景下。

- 《全球化的挑战》，第二章（解放战略）和结论（回归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在谈到革命或没落 [《阶级与国家》（*Classe et Nation*）的结论，Minuit 出版社，1979] 中，早在1979年我就已对替代性选择做过概述：资本主义结束于动乱中或超越于它的得到控制的转型。

- 《当代形态批判》，第四章（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当时共产主义被理解为拥有一种新文化，并是其产物），以及第五章（价值法则的衰弱——这一衰弱的矛盾性意义，这一衰弱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建设的可能性，或者是潜在地意味着资本主义向一种新型的“朝贡帝国”的建立，成为世界范围内种族隔离的基础）。

- 辨识现代性的挑战（《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附录一）。

- 区分承袭的差异性与涉及未来建构的差异性《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附录七）。

- 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见下文有关苏维埃主义和中

国经验的内容)。

-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所面临的新挑战的核心：全球农民获取土地的权利、劳动统一阵线的建构、边缘国家人民团结的建设、各国人民主权的建设（见下文）。

2. 有关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之经验的批判不能不考虑相关国家（俄罗斯、中国、越南、古巴）所特有的历史条件。

### 俄罗斯

- “俄罗斯：地理或历史”（《全球化的挑战》，第八章）。
- “关于苏维埃主义批判的 30 年” [《知识路线》 (*Itinéraire intellectuel*)，第七章]。

- Moshe Lewin, 《苏维埃世纪》 (*Le Siècle soviétique*)，Fayard 出版社，2003。

- Boris Kagarlitsky, 《今日俄罗斯》 (*La Russie aujourd'hui*)，Parangon 出版社，2004。

- Engel-Guez, 《大联盟》 (*La Grande alliance*)，Flammarion 出版社，2003。

### 中国、毛主义、市场社会主义

- 《毛主义的未来》 (*L'Avenir du maoïsme*)，Minuit 出版社，1981。

- 《全球化的挑战》，第七章。

- “中国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南方选择》 (*Alternatives Sud*)，第 8 卷，2001 年第 1 期。

### 越南

- Marie Lavigne, 《越南经济》 (*Économie du Vietnam*)，L'Harmattan 出版社，1999。

• Cuong Le Van (éd.), 《转型中的越南经济》 (*L'économie vietnamienne en transition*), L'Harmattan 出版社, 1998。

• Philippe Langlet (éd.), 《越南当代史引论》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du Viet Nam*), Les Indes Savantes 出版社, 2001。

### 古巴

• Rémy Herrera (éd.), 《革命的古巴》 (*Cuba révolutionnaire*), 第4卷, 第1册, L'Harmattan 出版社, 2003。

涉及欧盟有关东欧政策的批判分析, 在我看来实际上不存在。不过, 欧盟扩张的逻辑在其主要的方面与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的逻辑是类似的。西欧左派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令人担忧。

## 关于“南方”不同地区的世界融入

### 热带非洲

有关非洲“欠发展”特征的分析。

• “黑非洲的欠发展与独立” (*Sous développement et dépendance en Afrique noire*), 见《第三世界》 (*Tiers Monde*), 1972, 第13册, 第52期。

• Philippe Hugon, 《非洲经济》 (*Économie de l'Afrique*), La Découverte 出版社, 2003。

关于非洲融入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现行计划 (欧盟 - 非加太国家科托努协定、经济合作协议、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等)

• Samir Amin (éd.), 《非洲: 有计划的被排斥或复兴?》

(*L'Afrique, exclusion programmée ou renaissance?*)。

• Jacques Berthelot, 《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与土地问题: 反对南方的主要陷阱》(*L'OMC et la question agraire: les principaux pièges contre le Sud*), FTM 出版社。

### 南非

此书中所介绍的概括分析的补充:

• Hein Marais, “南非洲的地区一体化” (*L'intégration Régionale en Afrique australe*), 见 Samir Amin (éd.), 《非洲: 有计划的被排斥或复兴?》。

• Langa Zita, “南非是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 (*L'Afrique du Sud est-elle le maillon faible de l'impérialisme?*) 载 Samir Amin (éd.), 《非洲: 有计划的被排斥或复兴?》。

### 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

回归至我对政权独裁的批评 (“马穆鲁克体制”), 19 世纪伊斯兰复兴运动 (Nahda)<sup>①</sup> 的失败和政治伊斯兰。

• Samir Amin 和 Ali El Kenz, 《阿拉伯世界: 社会挑战和地中海视野》(*Le Monde arabe, enjeux sociaux, perspectives méditerranéennes*), 第一章, L'Harmattan 出版社, 2003。

• 政治伊斯兰, 《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 附录六。

有关“欧盟地中海对话”计划的批判。

• Samir Amin 和 Ali El Kenz, 《阿拉伯世界: 社会挑战和地中海视野》, 第三、四章。

---

①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旨在复兴伊斯兰教精神并以此来解决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宗教与社会运动的统称。因其主张复兴伊斯兰教初期的本来精神, 又被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译者注

###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 Diana Hochraich 等 (éd.), 《危机后面对全球化挑战的亚洲经济》 (*Après la crise, les économies asiatiques face aux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Karthala 出版社, 2003。

• Ahmed Rahid, 《中亚复苏》 (*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 Zed 出版社, 1994。

###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

有关发展主义和联邦属地的讨论为很多重要的著作提供了素材。该大陆左派从中汲取的政治行动的结论也很重要。

• Marta Harnecker, 《21 世纪初的左派》 (*La Gauche à l'aube du 21<sup>e</sup> siècle*), Laucht 出版社, 1999。

巴西工党和委内瑞拉查维斯成功夺取政权、墨西哥新萨帕特主义运动, 以及印第安人民的动员等都是可圈可点的进步。与挑战同时并存的是什么呢? 一个“拉丁美洲新起点”起步时的长处与弱点。需要提及的亮点是: (与亚洲和非洲相比) 民主要求已扎根; 能够推进替代由美国主导的共同市场扩张的地区化的起步 (通过南美共同市场对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在这一大陆也存着脆弱因素: “欧洲文明”和与之伴随的对消费主义模式的拥护, 在当选机构 (巴西国会中大庄园主的强势存在) 和司法机构 (成为委内瑞拉改革的阻碍) 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动政治势力的力量。

• Coral Wynter, “委内瑞拉的革命进程”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 Venezuela*), 见《链接》 (*Links*), 2004 年第 26 期, 澳大利亚 Chippendale。

• Pablo G. Casanova, 《新科学与人文科学、政治科学院》



(*Las nuevas Ciencias y las humanidades, de la Academia a la Política*)。

• Felipe de J. Perez Cruz, *El Neo liberalismo en Brasil*; et Atilio Boron, *El Alca, mas alla de la economia*, in *Cuadernos de Nuestra America*, No. 33, 2004, La Havane.

### 与“种族主义”突然出现相关的问题

• 《国家竞赛中的族群》(*L'Ethnie à l'assaut des nations*), L'Harmattan 出版社, 1994。(关于南斯拉夫与埃塞俄比亚)

## 关于现行冲突与有可能产生的联盟的立体结构

### 1. 尊重国家主权和各国军事力量的平衡。

如果没有主要军事力量(首先是美国)有组织的裁减军备,这一尊重需要通过“扩散”来实现。有关“干涉权力”的批判。有关人民主权与民主基础的新问题。

• Samir Amin、Jean de Maillard 和 François Rigaux 等,《贸易权利、人民权利和国际法的偏航》(*Droits marchands, droits des peuples; dériv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正在出版。

2. 新土地问题,土地改革和土地权;以前的辩论(马克思-维拉·查苏利奇,第二国际-考茨基和列宁,1950~1960年间非洲的辩论);所讨论议题的必要更新。

• “亚洲与非洲必需的土地改革”(Les réformes foncières nécessaires en Asie et en Afrique), 将要发表。

• Samir Amin (éd.), 《面对 21 挑战的农民与工人斗争》(*Les Luites paysannes et ouvrières face aux défis du 21<sup>e</sup> siècles*), 第

一部分，Les Indes Savantes 出版社，2005。

3. 将“稳定”环节与非“稳定”环节相互关联的劳动者统一阵线建构的新问题，

- 《面对 21 挑战的农民与工人斗争》，第二部分。

4. 有关南方人民团结建构的新问题。

“设置面向南方人民团结的新基金”（Laying new Foundations for the Solidarity of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见《社会科学调查》（*Social Sciences Probing*s），第 15 卷，第 3~4 期，2003，德里。

5. 其影响模糊、需要予以估量的几个进步。

在 2003 年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在坎昆召开的会议中，南方国家对美国和欧盟（由 Pascal Lamy 作为代表）带着所有他们特有的傲慢而做出的“提议”提出了质疑，它涉及南方农业开放“竞争”（每年生产大约 1 吨粮食的非洲农民被迫与年产量为 1000~2000 吨的美国和欧洲农业生产者竞争）的问题。但这些南方国家仅仅是在此提出了与农业出口补贴有关的问题，这只是些从属问题，并没有敢质疑问题的本质所在，也没敢要求将农业与粮食产品放到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议程之外。

- “WTO 为世界饥荒提出的食谱”（WTO Recipe for World Hunger），见 *Ahram Weekly*（《Ahram 周刊》），第 657 期，2003 年 10 月。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主导的“20 国集团”浮现出来。从巴西和南非大庄园主们是有竞争力的农业 - 出口者的角度来看，这一集团的目标仍旧模糊。南方国家的农民一般并不拥有同样的利益。而且，应当赋予食品安

全的政治优先被巴西和南非忽视了。

6. 未来冲突的多样立体结构。南方“风暴地区”。

帝国主义的长期性及其形态的更新是和边缘国家统治阶级买办化的长期性及其形态更新相伴随的。新兴国家这一买办新集团聚集了相关工业的老板、技术官僚和官僚主义者，中产阶级和受益于扩张的富裕的农民中的一部分群体。这一集团将大多数农民与工人排除在外，并因此而是“不稳定”的。这就意味着，民主的时刻——往往是没有方向的——被残暴独裁的摇把所打断。这助长了毁灭性的“原教旨主义”的偏航（宗教的和族群主义的）。替代性选择：建构国家、民众和民主集团；规定根据它们的需求对全球化进行调整。

- 《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第 117 ~ 123 页。

7. 同样可以参阅第三世界论坛网站：<http://forumtiersmonde.net>。



.....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下 编

.....  
第五国际.....



资本主义是个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资本主义挑战。但是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把各民族团结起来、实现国际化”始终面临着严峻困难。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今天究竟是什么样的障碍妨碍我们整合受资本统治、剥削和压迫的各阶级各民族的形形色色的斗争，其根源又何在。

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以劳资对立的阶级冲突为基轴。这一观念决定了：1. 投身于反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民众阶级国际”宣称代表“无产阶级”；2. 这个无产阶级追求能使自身得解放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前景。因此，该无产阶级国际发端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达中心地区即19世纪的西欧便不足为奇了。不过，对上述事实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新特点等其他事实。

世界体系内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政治与社会条件上千差万别，这是由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特点所决定的，特别是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扩张必然导致的中心和周边地区的对立，换言之即资本主义扩张在任何阶段都固有的帝国主义本质；二是众多以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彼此之间不断竞争的“中心”的存在。纵观周边地区的社会形成过程可见，产业无产阶级受到中心地区的积累需求的制约，始终无法在组织生产的整个过程中趋于集中<sup>①</sup>；农业界同样被卷入并囿于帝国主义的扩张逻辑

---

① 大资本的集约化、标准化将产业工人设定为机器或零部件，使得大机器生产无法形成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译者注

辑，沦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牺牲品；许多其他社会阶层和团体也不同程度地遭遇同样命运。

无论是统治民族还是被统治民族，其在历史形成上一贯各具特色。因此，确立了资本的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利益所建立的霸权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受害者为应对挑战而建立或尝试建立的霸权主义集团也因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历史进程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它们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形式各异的表达、组织与斗争传统。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都是客观存在。最后，科技革命引发了生产力进步并决定着进步的内容。生产力进步又导致了劳动组织方式的改变并迫使人们以各自的方式顺应资本主义的剥削需求。

劳动阶级和被统治受剥削的民众处于分裂状态，他们的反抗乃至试图改变力量关系对比、使之有利于本阶级的斗争<sup>①</sup>缺乏统一性，由此可见现实的复杂多样，因此不能把政治行为者简单地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简单化处理或许能激发论战，却无助于制定并采取有效的策略。针对似乎已成为主要对手的反抗斗争很难自发地整合，相反它暴露出目前存在的一些利益冲突，如城乡劳动者之间的冲突<sup>②</sup>、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等是妨碍斗争整合的潜在消极因素。

利益的不统一和斗争的不团结常常被统治政权成功地利用来服务于他们的再生产战略。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弹性，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制度那么僵硬，这恰恰体现了它的无

<sup>①</sup> 主动进攻的成分更多。

<sup>②</sup> 如围绕食品价格发生的冲突。



比强大。这种说法，姑且不论真假，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需求在复杂多样且变化万端的条件下都有本事称霸而已。

在资本及其领导下的霸权主义集团成功推行全球战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常常推波助澜，具体表现：在帝国主义制度的中心地区，某些政治力量在赚取了劳动阶级的支持后又跑去为统治阶级的全球战略摇旗呐喊。殖民和帝国主义统治就是这样摇身一变而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人们昨天为殖民和帝国主义找的一套说辞是“文明的使命”，今天则是输出民主和捍卫普天之下的人权。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就常干这种勾当，称得上是社会殖民主义或者社会-帝国主义。今日，欧洲信奉大西洋主义的社会自由分子也一样。有时，伴随着帝国主义内部冲突的加剧，民族主义也甚嚣尘上，可惜没什么收获。而工人阶级或至少是工人阶级政党则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冲突面前，在资产阶级背后紧密团结在一起。

被统治的周边地区在特殊局势下爆发了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解放的运动。有些运动是合法的，并且从消灭剥削和压迫的长远前景来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些运动暗含的危险和假象也不少：它们加强了解放战线中剥削阶级的代表性；该阶级要么已经在解放战线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要么有可能逐步壮大到对未来构成潜在威胁，万不可等闲视之。

这里谈及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制度始终摆脱不了的一个重大问题，该制度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不断制造帝国主义中心和被统治周边的两极分化。面对挑战，我们必须通过民族斗争予以应对。在当今所谓的自由主义计划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各民族究竟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将在下文中论述。

# 第一章

## 20 世纪人民大众的国际化

###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

全球化资本主义加盟者的再生产条件形形色色，缺乏统一性，这是妨碍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取得斗争胜利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几大国际正是为了克服这一障碍而建立的。

回顾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历时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共产国际史并从中总结教训，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的挑战、争论的焦点以及各国的战略行动选择。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完全是为了克服当时西欧各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分裂的恶果已在 1848 年的欧洲革命<sup>①</sup>中暴露出来。新的社会主体叫作“无产阶级”，由一小撮集中在大工厂和大矿山的工人及大量手工业劳动者组成，是中西欧资

---

<sup>①</sup> 1848 年欧洲革命是一场几乎遍及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革命始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随后逐步扩大，几乎蔓延全欧；革命旨在推翻封建制度，消除异族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虽然大多数国家的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动摇了欧洲的君主制度。——译者注

本主义扩张的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他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表达了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愿望，可惜遭到反革命的无情粉碎。新生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1/4个欧洲即西北欧地区和美国，这意味着第一国际的影响实际上仅限于上述地区。

第一国际本着超越其时代的先进民主思想，对多样化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条件进行了规范。它集合了性质和身份都不相同的组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政党、工会和合作组织、民间团体以及马克思、蒲鲁东、巴枯宁等“要人”。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影响范围、对挑战的分析、战略建议、对未来的看法以及动员理论等五花八门，不仅相互不同甚至彼此对立。我们不难指出当时某些观念存在历史局限性，比如：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家长制占据上风；再如，以欧洲为中心而忽略世界其他地区，等等。同样我们也可以就这些相互冲突的理论如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人自发主义等再展开一场辩论，分析它们的性质、合理性和潜在的真实有效性，看看它们对革命方向的分析 and 判断是否准确等，但这显然不是本书的目的。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的这些创造性空想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得到了充分而强烈的表达，马克思将巴黎公社描述为“冲天”。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最初的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讲民主，尊重多样性，这对今天而言非常重要。

第二国际建立的原则基础和第一国际截然不同。当时，不断加速的无产阶级化催生了各种新型的工人政党，加入这些政党的工人较多，它们对劳动阶级的影响也较大。从英国工党主义——德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这些政党在很多方面各不相同，但至少在一开始有一个共

同的目标：用社会主义秩序取代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二国际内出现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该”党将是“该”阶级的专门代表，该阶级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唯一历史主体，该党则是“正确路线”的潜在掌握者。而所谓的“正确路线”，恰如历史所证明的，不过是走温和改良或者革命的道路。恩格斯和考茨基、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无疑认为上述选择标志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有所进步，这个判断可能只对了一部分。新一代领袖诞生后，对上述主流道路所蕴涵的危险始有察觉，如不久以后有人指出第二国际有点冒进。尽管如此，有关政党对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民主管理还是有其局限性，原因就在于上述选定的“一党一国”的基本道路。

此外，第二国际的政党从整体来看有向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看齐的倾向。第二国际极少关注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问题，反倒常常通过所谓的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客观上带来了积极效果、即把落后地区的人民带入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行列等论调而为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洗脱。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所固有的帝国主义性质表明：这种观点站不住脚，第二国际的偏航无异于支持资产阶级的线性唯经济论<sup>①</sup>，所以完全称得上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从诞生直到“二战”后倒向大西洋主义及随后的社会自由主义，始终具有这一特点。资本家领导阶层认为，向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看齐能增加投靠平行的民族主义的可能，至少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此。正如人们所言，第二国际的

<sup>①</sup> 我断言马克思主义与之没有丝毫关系。

政党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制造的沙文主义中。

第三国际成立的目的是纠正第二国际的上述偏差并至少部分实现了目标。它支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所有周边地区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倡导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农民结盟。这一变化还反应在毛泽东主义扩大了上述的国际化号召：它建议把受压迫的人民吸收进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并肩作战。1943年，第三国际正式解散，1948年，又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名字重组。第三国际和1955年万隆会议<sup>①</sup>不结盟运动以及1966年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相结合，强化了把反资斗争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化的观点和实践。

因此，第三国际不仅保留了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而且进一步突出了它的一国一党特征，党是独一无二的“正确”路线的持有者，是中介——负责表达工会和作为传送带的群众组织的诉求，等等。

同时，第三国际还遇到了一个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保卫首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随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至于该使命如何随着苏维埃制度自身的演变而演

---

<sup>①</sup> 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国家会议，也是亚非国家首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发起的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了会议。会议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讨论了民族独立与民族主权、反帝反殖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等在内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会议在对各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万隆精神。万隆会议被视为亚非人民觉醒的标志，从此后，亚非国家作为新兴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译者注

变并最终产生负面结果，则不是本书的讨论范畴。

第四国际是为了纠正第三国际的上述偏差而建立的，但是它在组织形式上缺乏超越第三国际的创新之举，反倒是只想回到第三国际的出发点上。

## 二 万隆会议和斗争的首次全球化（1955 ~ 1980 年）

1955 年，亚、非两洲的政府及人民在万隆表达了如下愿望：承认此前的被统治民族的民族权利，在此基础上重塑世界秩序。这意味着承认南方<sup>①</sup>人民的“发展权”，该权利是在当时协商形成的多极框架中实现全球化的基础，帝国主义不得不面对现实，被迫调整自己以顺应新的时代需求。由于万隆会议的成功<sup>②</sup>，南方国家在教育、卫生、现代化建设、减少社会不公以及实现工业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总结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认真思考它的不足，特别是“民族 - 民粹主义”政权的民主赤字<sup>③</sup>问题，这些政权给民众提供了自我组织的机会，但从未兑现。

万隆制度和“二战”后另外两个标志性的制度相辅相成：其一是苏维埃和毛泽东主义制度，其二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诚然，各制度之间存在着竞争乃至冲突关系，尽管冲突受到了有效遏制，不会越过地区性武装冲突的界限，

① “南方”指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南方人民”指南方国家的人民。“北方”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北方人民”指北方国家的人民。——译者注

② 万隆会议取得了成功，而非有些人不断叫嚣的失败，把万隆会议视为失败是不加思考的结果。

③ 民主赤字是指政府的政治治理与民意有差距。——译者注

但也由此构成了对彼此的补充，在上述背景下谈斗争的全球化才有意义。这是资本主义史上首次遍布全球所有地区并深入各国内部的斗争，所以称得上是首个全球化的斗争，它为今后出现更多的全球化斗争开辟了方向。

各种斗争和确保社会稳定治理的历史妥协彼此影响、相互依赖，这一点可由上述三大制度发展势头同时削弱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得到证明：苏维埃主义垮台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难以以为继：该模式为了应对“共产主义挑战”而推行社会政策，并在社会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因为这是应对“共产主义挑战”的唯一手段。此外，我们或许还记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曾于1968年引爆欧洲。<sup>①</sup>

始于万隆时代的南方的工业化进程是南方人民取得斗争胜利的必然结果，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性质截然不同。工业化的成就无疑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与北方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实际情况却是，帝国主义在被迫适应周边地区发展需求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先前的对立，即帝国主义国家与被统治国家也就是说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的对立逐步让位于新的对立；对立的基础在于“帝国主义中心的五大新垄断”：帝国主义中心地区控制着新技术、自然资源、金融资本流动、信息和通信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优势不断集中，从而形成了五大新垄断。<sup>②</sup>

当时南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以下

① 指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革命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译者注

② 请参见萨米尔·阿明在 *Le Capitalisme sénile*（《衰老的资本主义》，2003年）一书中有关“二战”后的论述。

关键问题：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效应，所以周边地区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显然无法拥有和中心地区一样的发展潜力。那么，周边地区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前途将会如何？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换言之，周边地区的资产阶级是否只能接受不平等的发展命运而别无其他选择？它们是否将因此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买办？在此前提下它们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否终将会走入死胡同？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够利用一些回旋余地来发展本国的、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从而弥补与中心地区的差距？这种可能性将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制约到何种程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成了泡影？

对于上述问题，教条主义的、不容置疑的答案层出不穷，但是无论统治阶级还是民众阶层都没能在事前做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恰当的防范。“二战”结束以后，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把南方的所有资产阶级统统叫作买办；毛泽东主义宣称唯一可行的解放道路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特别是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分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万隆会议将证明这一判断过于仓促，因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粹性质的霸权主义集团也能引领类似的革命。我个人早在万隆会议之前就参加了相关讨论。<sup>①</sup> 伴随着帝国主义中心地区即美日欧三边世界垄断寡头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万隆时代的一页历史翻了过去。自1980年起，南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似乎再次面临沦为买办的命运并被迫进行单向调整，即：

<sup>①</sup> 1950和1951巴黎出版的《中东》杂志刊登了讨论引起的反响，该杂志特意为万隆会议而发行，持“积极的中立主义”立场。



周边地区被迫顺应中心地区的需求。而万隆时代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中心地区反过来调整自己以顺应周边的现象。但是这种倾向在印度、巴西等所谓的“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刚刚再次出现一丝扭转迹象，就为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我们应重点分析上述道路在南方国家的发展潜力及其矛盾和局限性，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才能制定有效战略，对地方和全球范围内的斗争加以整合。

### 三 大革命的悲剧

大的革命运动的远见卓识一直影响到遥远的未来，这是它们与其他的普通革命运动的区别之所在，后者仅限于应对当时的变化、解决眼下问题。

我认为，当代只有三次大的革命运动，即：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20世纪10~20年代的墨西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革命是20世纪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旧制度、以资产阶级政权取代贵族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一场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革命的种种诉求也质疑了资产阶级秩序本身。激进的民主和世俗共和国，自称以普及小资产为理想，实则并非只出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逻辑，而是对这种逻辑的否定，它明确表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宣称经济自由主义是民主的敌人。从这一意义上看，法国大革命已经包含了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萌芽，只是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显然还不成熟，

巴贝夫主义者的存在可以证明这一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该目标也远远超前于两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无助于两国解决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越南革命和古巴革命也是同样的情况。

因此，所有大的革命都因为超前于时代而经历了反弹。短暂的革命高潮之后往往会出现倒退和反动复辟，大革命的成果几经周折才能巩固，法国大革命的巩固就历时一个世纪之久！其他革命如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则不同，这些革命一结束就平稳步入资本主义新制度，新制度仅限于满足记录新生的资本主义框架中业已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诉求。因此这些“革命”几乎不能称为革命，此外，它们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向旧势力妥协并缺乏对未来的长远规划。

尽管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创造了历史，意蕴深远。大革命展现了其前卫性价值观，使得创造性的乌托邦继续其精神征服，并最终实现现代性的至高理想，即：使“人”成为自身历史的积极主体。大革命的价值与在其他地区所确立的资本主义秩序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后者鼓吹人类要消极调整自身以顺应资本扩张的所谓客观需求，并全力推动支持这种论调的异化的唯经济论。

#### 四 帝国主义的力量、作用、影响以及 全球扩张的永恒阶段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都伴随着两极分化效应，这是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一大本质特征，遗憾的是

我们一直未予以充分重视。原因在于，欧洲中心主义主导着现代思想，大的革命运动理论，尽管先进也未能幸免，如几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除个别外，都包含较为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了解帝国主义的上述现实并从中得出关于世界演变的战略性结论，是所有深受资本主义扩张危害的、无论是中心还是周边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首要任务。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条件发育得较为成熟、可以提上日程的是通过周边地区的反抗来质疑资本主义。反之在中心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朝着该方向加速演进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所以说1917年的俄国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并非偶然，随后以社会主义名义所进行的革命转向以中国等国为首的东方也非偶然，而列宁曾寄予厚望的西方的垮台却落了空。由于上述原因，革命后的上述各国同时面临着两项使命：一是“弥补与中心地区的差距”，二是“做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其他事情”。第一项使命意味着借用类似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二项是“建设社会主义”。在如何把这一对互相矛盾的使命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各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体而言表现尚可，但是可以结合得更好一些，也就是说在弥补差距的同时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追求。不过这对真实存在的矛盾无论如何都是关键的塑造因素，决定着革命后的各国社会在怎样的客观条件下发展演进。

第三国际有一种观点，即：运动将引发革命。该观点束缚了“革命政党”即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行动方式和组织形式。当时，人们认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革

命“迫在眉睫”，党只要添补一个尚不具备的条件，即建立一个组织来“干革命”即可，这意味着在当时的背景下，党强调的是步调一致和纪律严谨，遗憾的是步调一致随后变成了一言堂。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有关政党放弃了立刻发起革命攻击的观点，但还是保留了原来的组织形式，只不过用于实现其他优先目标，比如从内外两方面保卫苏维埃国家。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出自同样的逻辑。

有一种革命形式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周边地区早就提上了日程，使周边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风暴区。但是革命的基本目标却不清晰：是摆脱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还是有更多其他追求？之所以不清晰，是因为有不少民族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在本质上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固有的社会关系。难道对中国、越南、古巴的激进革命和亚洲、非洲和拉美其他地区的非激进革命而言，当时面临的挑战都是“弥补差距”并且“兼顾其他”吗？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面临着另外一项同样十分迫切的任务：保卫重重包围下的苏联。

## 五 在选择前卫战略中捍卫后革命国家

苏联和不久以后的新中国都遇到了主导资本主义和西方列强系统部署的孤立战略。应提醒大家注意，在美利坚合众国短暂历史的1/3时间里，这个世界资本主义霸权都围绕摧毁苏、中两个对手来制订其战略目标，管它们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华盛顿还成功地把它在三边世界的其他两个中心即欧洲和日本及周边盟国都发展成了跟班，用买办阶级逐步取代

了出自民族解放运动的、肩负着大众使命的阶级。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立刻发动革命”还提不上日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保卫革命后的国家。无论在列宁、斯大林及其继任者领导下的苏联、毛泽东主义和后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还是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民粹主义国家，当局均围绕如何保卫革命后的国家这一关键问题来制定政治战略；无论隶属于莫斯科阵营、北京阵营，还是独立自主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分子，大家所提倡的政治战略如出一辙。

苏联和中国在沐浴大革命风雨的同时还遇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扩张。两国都逐步用当下十分迫切的“缩小经济差距”的目标取代了最初确立的共产主义目标，这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所有制”的根本原则，代之以国家管理。两国的情况如出一辙，尽管所走的道路不同。在两国的经验中，当务之急都是“保卫革命后的国家”，为此两国都同时采取了里外两手应对措施，在内政外交领域都把捍卫国家政权作为优先，共产主义政党在整体战略和日常政策的制订上都围绕上述目标。在此背景下，革命的批判思想很快褪色，只剩下有关“革命”<sup>①</sup>的空洞说教而缺乏对社会矛盾的实际分析，并且保留着近乎军事化的、斗风战浪的组织形式。

有些先锋队分子拒绝向当局看齐，甚至有时敢于直面后革命时代的社会现实，他们没有放弃列宁最初做出的“革命迫在眉睫”的假设，也没有意识到该假设在现实中日益难以成立，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的政党就是典型的例子，不少积极行动

---

<sup>①</sup> 共产主义政党始终认为革命迫在眉睫。

的革命组织也可归入此列，其中的一些组织受到了毛泽东主义或格瓦拉主义的影响。从菲律宾到印度的纳萨尔派<sup>①</sup>，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及其在南也门的效仿者到拉美的格瓦拉主义，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 六 激进周边地区的国家建设和/或社会主义建设

在亚、非两大洲，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也遇到了下列这对彼此矛盾的使命，即如何加快国家建设、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和如何调整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民众阶级。在第二个问题上，后革命时代的政权或简单地说独立以后的政权显然没有共产主义政权激进，出于该原因，我把亚非两大洲的有关政权定性为“民族-民粹主义”。其中某些政权受到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启发，借鉴了后者的某些组织形式，如一党制、独裁政权、国有经济等。不过这些政权的意识形态选择模糊不清，对过去迁就、妥协，因此它们借鉴的东西普遍不如原来有效。

在上述背景下，苏联把这些政权视作重要的先遣队请来拥护自己并诱之以利。中国也偶尔为之，由此形成了反对美国及其欧洲和日本同伙的反帝联合阵线，该阵线无疑对亚非人民有利；随着统一战线的建立，相关国家的领导及其民众阶级分别有了自由决策和自由行动的余地，随后即苏联解体后的突发事

<sup>①</sup> 印度的一个极左共产主义团体，拥护毛泽东主义，因起源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村而得名，主要活动于印度中东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译者注

件佐证了这一点。在苏联解体之前，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算走“西方道路”，向民众灌输转向西方如何如何美好的迷魂汤，结果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惨下场。埃及的萨达特就是极好的例证：这位领导人指出，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握着90%的牌，与美国修好能使局势朝向有利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方向“转变”……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投降为帝国主义展开攻势战略提供了便利并强化了华盛顿—特拉维夫轴心。

值得商榷的是苏联的做法，它强迫盟国中代表民众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共产党服从它。我们本以为在这一反帝联合阵线中，群众政党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甚至能看出联合阵线的社会构想与民众阶级的利益存在冲突：领导阶级孜孜以求的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构想，尽管该构想具有民族性；民众阶级的利益诉求则是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存在局限性。事实却截然相反：苏联的道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民族资本主义构想挺灵光的假象，甚至还削弱了民众阶级的自由表达，为此还发明了所谓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法。

也许在万隆时代（1955~1975年），我们难以区分当局利益和群众利益：当时的亚非拉政府大多刚刚脱胎于打败了“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还有一些诞生于和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的货真价实的革命运动，例如中国、越南、古巴等，因此仍能贴近群众且具有高度的合法性。

在阿拉伯国家，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地方一样接受了苏联当局的建议，力争成为本国政坛的左翼，即反帝的民粹主义者。它们对苏联的支持虽然微不足道却是毫无保留。典型

的例子是：埃及共产党于1965年自动解散，徒劳地希望当局允许它复活纳塞尔的社会党；叙利亚的巴格达什<sup>①</sup>转去支持以国家建设为唯一要务的主张而忽略该主张的资本主义特性。我在其他地方表达过对该问题的看法，大家可参见当时埃及出版的有关活跃分子的回忆文集。对阿拉伯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我当时的结论是，整体而言，他们的构想在本质上还停留在民族-民粹主义的框架内，没有意识到其最终的前景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其选择从本质上来看并非权宜之计和机会主义，而是结构性的，暴露出阿拉伯世界的共产主义存在先天不足，即：它所传导的意识形态模糊不清而且忽略了民众阶层，尽管其标榜捍卫民众阶级当下和长期的社会利益。这一不幸选择的后果是，在民族-民粹主义山穷水尽、合法性下降后，共产党就丧失了民心。而共产党左翼并未超越并取代民族-民粹主义，结果政坛出现真空，为政治伊斯兰的灾难性扩张开辟了道路。

在阿拉伯世界的部分国家，也有个别共产主义者拒绝无条件服从苏联，例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及其在南也门的追随者和一帮毛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迫在眉睫”的最初假设，在这一点上，他们认同拉美的格瓦拉主义和印度的纳萨尔派。受他们影响爆发的种种运动虽然勇气可嘉但均以失败告终，这表明，列宁主义的主张是对事物的简单化，这一点实乃可悲！历史最终证明该主张并不正确。

<sup>①</sup> 巴格达什（Khāled Bagdash, 1912 ~ 1995），成立于1930年的黎巴嫩-叙利亚共产党领袖，近东阿拉伯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言人。——译者注



## 七 毛泽东主义的贡献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带有强烈的工运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当时的主流理论一样，它认为历史呈线性发展，所有的社会都要先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之后才有望发展社会主义。它认为，殖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埋下了种子，从这个意义上看，殖民具有“积极”意义。它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些地区即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地区发达、一些地区即受支配的周边地区欠发达，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是必然现象，两者都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内在结果。

然而，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固有的、对全球范围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均有重大影响的两极分化效应，迫使我们考虑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两极分化是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里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可能倒向殖民主义的根源——这些阶级自身的发展就得益于本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按照中国的说法，两极分化把周边国家变成了自然会不断反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风暴区”。当然反抗不是革命的同义词，而只具有革命的可能性。此外，1968年“五月风暴”等事件表明，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也不乏否定和放弃资本主义模式的尝试。出于该原因，我们现在不能走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该战略对现时代而言过于极端。当前，要制定超越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世界战略，必须把资本主义中心和周边地区的各种斗争都整合

起来。

起初，列宁与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拉开了一定距离，并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俄国成功领导了革命，他相信俄国革命最终会在欧洲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连锁反应，然而他的愿望落了空。于是列宁转而认为把东方的反抗运动转变为革命更加重要。但这一全新的设想最终形成系统的理论，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俄国革命由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阶级的政党领导，这自然要求它必须和由社会革命党所代表的“着军装”的农民结盟。革命引发的激烈的土地革命满足了俄国农民的夙愿：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但是这一历史性妥协本身就包含有一定的局限性：市场会一如既往地凭借自身力量不断地分化农民阶级，日益拉大该阶级内部的差距，即所谓的“富农化”（koulakisation）。

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它从一开始或者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和中下层的贫苦农民建立了稳固的联盟。而且，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大量吸收对国民党的软弱和背叛深感失望的资产阶级人士，因此，中国革命的结果和俄国革命截然不同：在激进的农民革命中，“土地私有”的观念本身都受到质疑和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确保所有农民对土地的平等使用”，这是中国革命的优势所在，除越南以外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拟，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它是土地私有化的主要屏障，防止了资本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破坏性扩张。中国当今的很多讨论所针对的都是这一问题，大家可参见我

的相关著作<sup>①</sup>。不过，民族资产阶级大量加入中国共产党难免对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一定影响，即加强了毛泽东所谓的偏离社会主义的“走资派”倾向。

革命后的中国当局在政治、文化、物质和经济领域都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成就，工业化的实现、现代政治文化的激进等就是证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解决了“农民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央帝国”在1750~1950年这关键的200年间不断走向衰落的根源。<sup>②</sup>中国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还避免了苏联的惨痛失误：实现农业集体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使用血腥的暴力手段，对党内的反对派没有进行恐怖镇压，邓小平虽然受到排挤，但后来又平了反……中国坚持不懈地追求“相对平等”的目标，即在工农之间、工农内部以及工农和领导阶级之间进行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这一点可谓史无前例，尽管不可避免地历经了起伏进退。中国在发展战略中系统阐述了上述目标<sup>③</sup>。该目标和苏联截然不同。正是由于这些成就，中国才有了后来的、即从1980年开始的、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成就。把中国和没有爆发过革命的印度加以对照就更能说明问题，对照的目的不仅在于阐明两国在1950~1980年间发展道路的不同，更在于表明两国所选取的不同的道路可能通向不同的未来。正是由于这些成就，后毛泽东时代、通过改革开放把本国的发展置于全新

① 参见萨米尔·阿明于2005年在巴黎出版的《走向多极世界》（*Pour un monde multipolaire*）中有关中国的章节；萨米尔·阿明：《中国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Théorie et pratique du projet chinois de socialisme de marché*”），载《南方的其他选择》（*Alternatives Sud*）2001年第8卷第1期。

② 该问题可参考萨米尔·阿明下列著作：《毛主义的未来》（*L'avenir du maoïsme*），1981年，第57页。

③ 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才免于遭受苏联解体式的毁灭性动荡。

尽管中国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并未“一劳永逸”即不再倒退地解决更长期的发展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在1950~1980年间的发展战略已“江郎才尽”，难以为继，不得不施行改革开放等政策，尽管是有控制的开放。但正如后来所证实的，开放本身包含着逐步向资本主义演变的风险。其次，毛泽东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制度包含着相互矛盾的倾向，即在加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削弱了它。

毛泽东意识到了上述矛盾，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sup>①</sup>予以纠正，使局势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炮打司令部》<sup>②</sup>针对的就是领导阶层中的资产阶级政治倾向。毛泽东认为搞好这场“修正”运动要依靠年轻人<sup>③</sup>。而事态的随后进展证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文革”的一页历史翻了过去，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此士气大振，转入反攻。当然，“姓社”还是“姓资”的斗争并未就此完结：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漫长，资本主义道路则刚刚起步。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是追随资本主义的扩张步伐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构成了当今文明的真正冲突。不过在“姓资姓社”的斗争中，中国人有一套制胜的法

<sup>①</sup> 1966~1974年。

<sup>②</sup> 司令部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炮打司令部》全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角上写的，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大字报旨在攻击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指责他们持资产阶级立场。——译者注

<sup>③</sup> 1968年的欧洲人就是从这里受到了很大启发，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参见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宝，这是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主义的遗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反应，农民对土地公有制和平等的土地使用权的竭力捍卫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主义的关键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利害关系和重要挑战，提醒我们在分析这一挑战时，重点考察中心和周边地区的反差——这是“现实存在的”、以帝国主义为本质并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特征，从中总结出可供汲取的教训，用以指导包括占支配地位的中心地区和受操控的周边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斗争。下面这句中国话说的好，能十分贴切地概括上述结论，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指除外部势力的走狗或买办外的世界各国的领导阶层，要努力扩大活动空间，为自己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内赢得充分的活动余地，从“被动的”行为者提升为“主动的”行为者，即从被迫调整自己以顺应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的单边需求提升为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民族要解放”，指历史上有进步倾向的阶级集团要发展并实现现代化；“人民要革命”，指做牛做马的民众阶层向往社会主义。这句话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制订行之有效的行动战略。这句话意味着，从全球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远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其间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这种观点是与第三国际的“短暂过渡”观的决裂。

## 第二章

# 新时代 新挑战

### 一 三大国际和万隆时代的历史翻过去了

“二战”后出现的三大主流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反攻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在本质上具有了新特点。我们应把阐明这些变化及其现实意义作为讨论的重点。已有不少著作专门论述这些问题，本书不对其结论予以讨论。在此我谨就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谈几个有必要提起注意的观点。

第一，当下发生的包括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空间技术和核技术等在内的技术革命以及其他变化和新兴周边地区的加速工业化一起，带来了劳动组织方式的转变和由此导致的社会阶级与团体的分层。在此背景下，社会和政治行为者日渐增多并日趋复杂，彼此之间可能发生新型的冲突或者结成新型的联盟。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下列问题：谁是社会转型的新主体？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何在？他们怎样看待挑战并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是哪些冲突分裂了他们并妨碍其整合？只有辨清上述问题，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为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制定提供建议。

第二，中心 vs 周边不是工业化国家 vs 非工业化国家的同义词。中心、周边的两极分化效应表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本质是帝国主义，两极分化效应还会凭借帝国主义中心的“五大新垄断”而持续乃至深入下去。在此背景下，新兴的周边国家即使加速发展也不可能消灭帝国主义，虽然它们已取得了立竿见影且毋庸置疑的成功，特别是中国，当然还包括其他南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扩张只会带来中心和周边的新对立而不是超越它。

第三，帝国主义列强争霸、各自扩张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正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美—欧—日三边世界狼狈为奸的“集体帝国主义”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三边世界为大本营的垄断寡头的共同利益多于可能使其彼此对立的利益分歧。帝国主义的“集体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经济领域，三方有共同的世界体系管理工具：世贸组织——三边世界的殖民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体殖民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三边世界的宣传部、经合组织和欧盟<sup>①</sup>；在政治领域，有 7 国集团或 8 国集团、美国武装力量以及以北约为首的附庸工具，要是再加上靠边站的、俯首帖耳的联合国，这一安排不可谓不完美！

第四，美国通过全球军控计划来推行其霸权主义战略，该计划意味着废除国际法，允许华盛顿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等。美国霸权主义战略的开展和集体帝国主义的形成功相辅相成，美国主子以此来加倍弥补自身的经济不足。

对当下的资本主义转型，人们还有一些其他思考，我简略

<sup>①</sup> 欧盟成立的目的是防止欧洲脱离自由主义。

介绍一下这些思考的主要结论。

第一，人们指出，目前的科技革命取消了对劳动管理的垂直分级，代之以由个体组成的“网状组织”。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基于科技的主导作用，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个人将接替或者说正在接替先前的阶级或国家等历史主体而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

第二，继第一点后，人们补充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终将被超越。国家曾经是相对稳固的帝国主义集团凝聚权力的框架，但在现行的后帝国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众多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冲突取代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中心”无所不在又丝毫不存在。

第三，人们强调，新“承袭制”资本主义具有“金融化”的管理特点，该特点不会昙花一现般地只存在于当前的“过渡”期，而是建设中的新制度的稳定特性。换言之，过渡期过后会出现一种新制度，不过新制度是什么性质还有待商榷。

坦白地说，我对这些主题持强烈的保留态度<sup>①</sup>。下面我不想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辩论，只想就我们期待的政治方法提出几点观察，为推动构建基于“于多样性中求共性”的替代道路尽绵薄之力。

### 1. 日薄西山的资本主义，人类的敌人

全球自由主义计划企望把社会管理简化为不受任何束缚的经济市场管理，并认为此计划不仅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会大受欢迎。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取消或放松市场管制能够带来稳

<sup>①</sup> 参见 *Le Capitalisme sénile* 《日薄西山的资本主义》。



定，实现供求平衡；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这种普遍的平衡富有效率，即：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激发创新活力；二、符合社会最优，即：普遍的进步能让所有人受益。传统经济思想无论表述得多么复杂，而且越来越复杂，实则始终停留在这一幼稚的水平上。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严谨的科学分析，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从最庸俗的意义上理解“理论”一词。该理论认为，只有上述的社会管理方式才是最“合理”的，甚至有可能造就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美好世界中最为完美的一个。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流行的自由主义不过是资本家的持续空想，即：设想世界绝对服从并且只服从资本金融利润的单边逻辑！该空想不会转变为现实而只会导致混乱，因为它必然导致牺牲者的反抗！该理论进而设想把经济管理非政治化或曰去政治化，也就是说，把国家的角色削弱为保证秩序的“守夜人”。而真实的历史——而非超越历史的经济学假设，来源于经济再生产需求和国家需求的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可能是互补关系，也可能是冲突关系。所以国家必然是各种或一致或对立的社会利益的妥协之地。妥协始终具有历史性，即：带有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特点。

全球新自由主义荒谬不堪却所向无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为何荒谬，而在于它何以无敌？这一系列落伍观念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原因就在于在此前的历史阶段曾经治理全球的“妥协性”制度大势已去。我所谓的“妥协性”制度指“二战”后的三大制度模式，即福利国家制度、苏维埃制度和民族-民粹主义制度。伴随着这三大模式的衰落乃至瓦解，鼓

吹社会应全面服从资本单边需求的构想获得了卷土重来之机。与此同时，新秩序的牺牲者因丧失了可靠而合法的参照而手足失措，陷入慌乱。人们毫不掩饰地要求牺牲者接受命运的安排，听，占据舆论前沿的聪明人正在喋喋不休地叫嚣：“工薪者要明白，他们得同意减薪。”我们何曾听到过相反的论调，“资本家要明白，他们得同意削减利润”！由此可见，这种倒向资本一方的失衡正进一步成为事实。

实际上，全球新自由主义计划已经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避免的恶果：社会的倒退、两极分化、民主实践的失信<sup>①</sup>、政治动荡与混乱、贫困化<sup>②</sup>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等。与主流论调相反，我断言，所有当权阶级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所推行的计划都不可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受害者和敌人已不再局限于劳动受到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扩大到了生存受到威胁的全人类。我用“衰老”一词来形容到达该阶段的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制度，可谓日薄西山，垂垂老矣，它和占人类总数一半的农民的关系及其不断扩张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都证明了这一点，<sup>③</sup>除了给可能出现的“另外的世界”让路外，该制度再无任何未来可言。当然，“另外的世界”有可能更好，也有可能更坏。

追逐资本积累使“圈地运动”肆虐全球，最终破坏了占人类半数的农业社会，而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把失去土地的农民悉

① “民选”政权软弱无力。

② 有关贫困的各种说辞无异于毫不掩饰地承认事实！

③ 哪怕是非常短命的自由资本主义都处理不好农民问题，并且都会导致对资源的破坏。

数吸纳到以营利为目的的工业和服务业当中，结果是“贫民窟世界”加速形成，挑战的严峻性不容低估。<sup>①</sup>

同理，由于追求资本的积累，不可再生资源迅速耗尽，生物多样性加速衰减，保障地球生命再生的生态平衡日益面临严峻挑战。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资本主义文明的毁灭性扩张不可能长期持续。维持美国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倾全球资源为美国一家服务并引发能源危机，而能源危机刚刚露头就招来了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入侵。美国总统提醒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容协商。”请大家继续阅读下面这句话：“我们会继续灭绝妨碍我们扩张的印第安人。”

由于追求资本积累，加之商品性的劳动力贬值<sup>②</sup>，以妇女为主的非商品性人口被越来越多地用作劳动力供给，我们还能列举更多资本主义扩张的破坏效应远超其创造效应的案例。由于追求资本积累，科技进步难以转化为财富。

上述演进表明，今后将有多个主体推动历史朝我们希望的方向转变。抗议斗争与抗议活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这表明，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主体正不断增加，社会运动蕴涵着不可战胜的巨大能量；但另一方面抗议斗争和抗议活动经常处于分散状态，这表明，社会运动在当下依然软弱乏力，运动诉求和斗争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替代路径。应整合斗争和运动，稳扎稳打，探索出一条能有效替代资本主义的新道路。

由此可见挑战之严峻，只有携手并肩组成联盟，在联盟的

<sup>①</sup> 参见萨米尔·阿明：《面对21世纪挑战的工农斗争》（*les luttes paysannes et ouvrières face aux défis du XXI siècle*），巴黎，2003年。

<sup>②</sup> 商品性的劳动力贬值根源于通货膨胀，是追求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译者注

带领下取得胜利，形成霸权集团，取代在当今资本主义框架内发号施令的霸权集团，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只应对眼下和局部的挑战而不具备超越资本主义的长远目光，很难采取有效行动。制定任何有效的斗争战略都要善于确立两个目标，即：短期目标和更为长期的目标。也就是说要分阶段推进，逐步采取行动；只确立实现社会主义等远期目标是不够的，而且有使革命动员受到打击的危险。还应该确立具有现实意义的当下目标并着手行动，通过动员革命力量来确保斗争获胜。此外还必须尽快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景的可信度和合法性，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苏维埃制度垮了台；中国放弃毛泽东主义，选择了人所共知的道路；万隆时代辉煌一时的民族—民粹主义政权进一步偏航。在社会主义纷纷失利的背景下，连“社会主义”一词本身都彻底丧失了可信度和合法性。出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革命政权和由获胜的民族解放运动组建的政权一旦步入庸俗、可耻乃至罪恶的歧途并喋喋不休于空洞的谎言，社会主义的希望就告破灭。而社会主义希望的破灭立刻遂了资本主义的心愿。在上述背景下，于20世纪90年代即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阶段复兴的社会“运动”，即使未将资本主义视作历史的终结，至少认为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超越；对它们的所作所为，如对帝国主义充耳不闻，对帝国主义扩张损害别国利益、肆意践踏其权力视而不见等，我们不会感到奇怪。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必须超越现阶段。是时候了，我们应该采取激进立场。是时候了，我们要明白新自由主义的野蛮进攻只能暴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嘴脸。

## 2. 社会论坛的出现

在上述背景下，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一批在组织和表达方式上都十分多样化的“社会论坛”。而战后分别代表三种社会再生产模式的社会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运动所信奉的政治信条的破灭无疑加剧了局面的混乱。混乱的原因在于：尽管从某种角度来看，所有或者近乎所有的运动都是“抗议”运动，但矛头并不一定都指向灾难的制造者——帝国主义。

“运动”业已在“道义上”取胜，“世界不是用于买卖”、“另一种世界有可能出现”，诸如此类的呼喊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明确的战斗口号，且业已赢得全球范围内的民意。

有关的“运动”丰富多彩，这恰是它的力量所在，尽管在此背景下，围绕一个优先战略目标将之整合起来变得更加艰难。要力争在创建“另一个世界”的斗争中取得进步而不倒退，唯一的办法是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某些地方先行取得突破。这要求我们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讨论，确立目标，采取恰当的行动来组织战役。

多样性首先体现在目标上。在多样化的目标后面，是社会各阶层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地区，社会运动正在动员起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作为中产阶级的核心，围绕特定的目标创建了各类组织：例如提升女性地位的组织、环境保护组织、保护文化少数群体以及其他被压迫者的组织、促进法律进步的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可能是长期性的，也可能是为了某个既定战役而专门建立的，通常原则上都是跨阶级的。此前，这些社会阶层往往只限于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和院外游说、参加政党等代议制民主方式来参与

社会事务。所以，他们的上述转变可谓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不少这类社会运动强调捍卫个人和个人的自由，并强烈关注道德领域，故此常被某些传统工人运动扣上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帽子，实则并非如此，其诉求标志着政治实践的进步，从长期来看将惠及所有的被统治阶级。

但是这些“新”运动并未取代由民众阶级发起的、以争取所谓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运动。在有望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围绕就业、工资、劳动安全和农民阶级围绕农产品价格、土地和农机具的使用以及必要的土地改革等而展开的斗争仍将是斗争的主轴。所以说，工会和农业组织仍然是基本的社会运动组织。然而，这种观点并非人人赞同，因为占据各种社会“运动”论坛前台的往往是中产阶级。确实，被统治阶级赖以表达诉求和采取行动的传统组织已远不能适应新的挑战，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组织和经济管理方式都发生了转变，工人和农民运动的组织和斗争方式必须随之做出相应改变，这也是“另立世界论坛”（Forum Mondial des Alternatives）<sup>①</sup>的工作计划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运动就可以歧视工会和农业组织等所谓的“传统”组织。

天真地相信“不试图夺取政权就能够改变世界”是“社会运动”面临的主要威胁，尽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有力的社会运动“改变了社会”的案例。最近的典型例子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该运动在西方世界引发了诸多的积极改变，如女性诉求的激增、个人民主责任的深化等。但是资本主义业

<sup>①</sup> 英文为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译者注

已表明：它能够吸收这些演进而不动摇自身的剥削和压迫本质，可是今天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著述却企图袖手旁观、放任自流的主张赋予貌似科学的合法性，因为它们认为“一切都会凭借自身力量自然而然地发生”。

反过来，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推动社会运动成为改变社会力量对比、进而改变权利结构的政治力量。这意味着用“另外的方式施政”，但问题在于人们的主张过于模糊，其结果流于空洞。

### 3. 多样性：必要的问题

社会运动的多样性无疑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至少是现代史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就是社会力量对比发展演变的产物。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自互相对立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不断斗争。对社会运动的上述历史定位过于空洞，没有意义，必须从本质上明确运动的目标、战场的选择、同盟者或非同盟者的构成等一系列因素，否则讨论社会运动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一判断是理性的，之所以提醒大家这一点，是因为目前有人把社会运动的多样性奉为基本价值，称其有积极的意义，禁止人们对随便哪个运动做出无论怎样的评价，理由是什么运动都有存在的权利——这一点本身或许无可置疑，除该运动本身外，任何人不得对它“说三道四”。这种论调无异于搁置争议、否定辩论、拒绝“施政”。我们不否认每项运动都有自己的战略和目标，这是它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同意人们进一步得出的下列结论，即：把各种运动团结起来制定集体战略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有可能损害人类的基本自由。我们是

否可以把这种论调称做“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e)!

下文的分析旨在推进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政治辩论。如何在多样性中求共性、从而使受压迫的阶级和人民取得进步?和谁求共性?哪些运动能够围绕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并朝向目标前进?类似辩论必然是政治性的,即:不任由运动只受自身逻辑支配;也必然是具体的,即:针对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国情。

## 二 社会运动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进步的社会运动和反动的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始终有进步和反动之分,法西斯运动无疑是反动运动的最好例证。运动旨在调动哪些社会阶级或阶层?最受哪些阶层欢迎?仅凭这些标准不足以判断一项运动是进步还是反动。况且有些运动从表面上难以判断效力于哪些利益集团。例如,很多运动涉及的是经济和社会利益,但乍看之下与经济和社会事务毫不相干;有的运动表面看来致力于宗教事务,实则不然。

要认清各种社会运动如何置身于现实的社会冲突之中以及服务于谁的利益,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深入分析。为此我提出下列这套评判标准。在我看来,这套标准能够回应冲突博弈,也可以在我们探讨如何制订进步联盟战略时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标准起初很简单,即:一项运动只有毫无保留地支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才具有积极改变社会的意义。这意味着,它制定的经济增长或曰发展政策要充分包含就业、提高劳



动者的收入水平、建立惠及全民的有效公共服务体系等社会目标。但我还要为该标准补充两个条件：第一，社会进步目标要经由大力发展社会管理手段、加强民主管理来实现。加上该条件，我们就可以把将未来寄托在有特殊威信的政治人物身上的公开反民主运动排除在外。第二，如果一项运动以没有“超国家”框架就不能实现社会和民主进步为由牺牲社会和民主进步，那么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框架内，该运动极有可能被迫无限期推迟本在可预见的未来成功开展的行动。这种立场显然很成问题，典型例子是让各地的斗争靠后，让欧洲舞台优先。

依据上述标准来审视宏大而模糊的、泛称为“世界社会论坛”的种种运动，或许不用太犹豫就可以把其中大多数视作“进步”，尽管“进步”的程度显著不同。所有为新自由主义扩张的牺牲者伸张权益的运动，例如工会，所有捍卫公民的普遍或特殊权力如妇女、移民、环境保护等权力的组织，都可以称作“进步”，无论它们持激进、改良还是温和立场。

与此同时，我们要求一项运动把社会进步、深化民主和尊重民族自主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即：把三者协商全球化中联系起来而非割裂开来，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应对当今挑战的政党。我希望诞生几个或若干这样的“政党”，并且不会给它戴上诸如“先锋”之类的帽子<sup>①</sup>，任何这类帽子都纯属多余，只会毁了它们。

包括进步运动在内的所有社会运动都希望保持独立，这不仅不仅是它们的权利，也是人们的期望：有效的斗争须建立在独立

---

<sup>①</sup> “先锋”往往是自封的。

自主的前提下。在保持独立的同时，不排斥它们凝聚成左翼新政党，以整合各种力量，统一斗争策略，选择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共同应对挑战。保持独立和携手组成新政党并不矛盾，但是某些世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却认为新政党的诞生将为论坛敲响丧钟，因此谈“党”色变。相反我认为组建新政党或者说社会斗争“再政治化”只会进一步加强社会进步力量；反之若论坛陷在所谓的非政治化中裹足不前，则会丧失潜在的积极作用。

进步运动追求“另立新世界”的进步前景，其对手即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跨国大资本的运动则恰恰相反，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对手的运动方式、运动主题和运动地点。

原则上，对手常常把受压迫的民众阶级从真正的战场诱骗至其他的“冲突领域”。世界各地为华盛顿或布鲁塞尔效力的“智库”可能就打过这种主意，这是一种狡猾而奏效的战略，很多社会运动就是这样“应对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些运动充其量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我不排斥同样的战略，但这不意味着我赞同某种历史“同谋”观。

我的观点很容易用一系列我马上就能定义为“反动”且符合这一称谓的运动来证实，尽管它们远远地躲开了真实的社会冲突而活跃在其他领域。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在美国，“新笨蛋”（nouveau con）和成千上万被他们组织起来参与“社会运动”的“国民”以及“邪教”及其电视布道者是大规模反动社会运动的典范。这些运动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原因很简单：它们挑明了自己的目标：捍卫华盛顿的帝国主义，捍卫私有财

产，捍卫社会论坛中整体而言可称为无耻的种种立场<sup>①</sup>。然而这些运动却不认为自己是俯首帖耳的大资本的跟班，有时甚至宣称“反垄断”……如果他们继续用类似的谎言来麻痹成千上万的“选民”，那就走不了多远！因为自有国家实践以来，人们就识破了这点。

一旦被“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的部分民众相信了类似的空话，真正的悲剧便拉开大幕。政治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sup>②</sup>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是这些反动社会运动大军的基本构成。尽管主张贴上上述标签之一的运动或政党在表现形式上五花八门，但基本出发点都是支持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所以统统可归入反动力量阵营。多样化的社会运动或政党给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领袖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视一些运动为“恐怖主义”并大加谴责；视另外一些为“温和”并宣布认可，可谓随心所欲，游刃有余。<sup>③</sup>

我没有把政治伊斯兰教称为反动，因为它可能是一项宗教运动。总之人家并非那类庸俗地玩弄政治手段、利用宗教动员来实现政治目的的运动。相形之下存在着货真价实的、坚决的进步宗教运动，解放神学<sup>④</sup>就是其中最鲜活的例证，它指引下

① 例如憎恨同性恋。

② 此处佛教应指达赖集团所领导的藏传佛教集团，中土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应不在其列。——译者注

③ 我将在附录一中专门分析在政治伊斯兰教和美国的入侵下中东人民所面临的挑战。中东是华盛顿部署全球军控计划的核心地区，作用非同一般，因此受到美国的格外青睐。

④ 解放神学是一种激进的基督教神学思潮，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解放神学是把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拉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可谓当代拉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解放神学坚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视社会主义为唯一出路，反映了拉美底层人民的愿望——译者注

的运动坚决参与所有为民众阶级而战的社会斗争，所以说出现同样性质的“伊斯兰左翼”并非不可能，尽管它尚未诞生。艾哈迈德·塔哈<sup>①</sup>曾试着提出“fiqh al tahrir”（阿拉伯语，“解放神学”的同义词），但刚一开头就被伊斯兰主义者自己扼杀在了摇篮中，塔哈本人也被处以绞刑，更可悲的是，没有任何自称伊斯兰的派别认为应该提出哪怕最为微弱的抗议。

上述有关政治伊斯兰教的思考，如作适当变动，或许同样适用于政治印度教或政治佛教。在印度，亲自由主义和充当买办的右翼既支持国会中没落的旧政党，也拥护政治印度教。在中国，在布什集团的操纵下，达赖喇嘛摇身变成了带领“好人”反对“魔鬼”的化身，其蓄意编造的谎言受到许多进步组织最友好的对待。

反动的社会运动不仅以宗教作伪装，而且披着华丽的、纯属捏造的种族外衣。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sup>②</sup>、科索沃人、波罗的海沿岸人等，就像其他人特别是非洲人一样，就是这样精心策划出笼的；他们不再属于出自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国家，而属于某个“部族”、种族或准种族共同体。这些“民族主义”并非全部名副其实，因为未见它们积极应对美国支配下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相反却站到了对所有跨国大资本、华盛顿与北约的武力外交动议予以无条件支持的阵营中。他们的“民族主义”只针对左邻右舍，甚至效力于企图加

<sup>①</sup> Mahmoud Taha (1909~1985)：苏丹宗教改革家，曾尝试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革并因此于1985年被当局以宗教背叛罪处以绞刑。

<sup>②</sup> 南斯拉夫的解体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理性设计的结果，是所谓全球化的地缘战略的需要。——译者注

深人民内部的分化从而削弱之的帝国主义战略。借口遭民族主义分子反对的政权未能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sup>①</sup>而支持民族主义分子的“诉求”显然无助于摆脱困境。这些运动所宣扬的、反民主的“一族”统治只能通向帝国主义而没有任何其他可能。

社会运动鲜有多维性，其活动领域往往受到创始法规的严格界定。一个工会、一个女权组织、一个生态协会始终是保持相应职能的组织，不会演变成其他性质。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权就这些运动的前途提出一些毫无恶意的问題。例如：如果不摆脱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逻辑是否还能实现男女平等？面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金融周期律，生态计划是否还有意义？

总而言之，社会运动有各自的活动领域，往往难以在战略上达成一致。该背景下，行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即进步与否都成问题。很多有“民主政治诉求”的运动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却导致了社会的倒退，例如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爆发的玫瑰革命（格鲁吉亚）、橙色革命（乌克兰）等所谓的“革命”。并不是说这些运动对当局的批评毫无依据<sup>②</sup>，而是说它们把伸张民主诉求（至少表面看来如此）和彻底投靠全球自由主义混在了一起，结果甚至都没来得及推动民主事业就轻易地落入了美国中情局的手中。所以千万牢记，不要把社会进步与民主制度相剥离。从上述的悲惨经验中我们遗憾地得出如下结论：这些运动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运动，尽管披着“民主”的外衣。

诸如此类的“民主运动”远未到穷途末路。原因很简单，

<sup>①</sup> 这种指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sup>②</sup> 有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即在当代亚洲和非洲，还有很多政权存在着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面对该局面，人们转向美国的权势集团，误以为它能有效地促进“民主”，何况还有其欧洲盟友从侧面加以佐证。某种奇怪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埃及：亚洲和非洲的买办资产阶级本鲜有民主观念，却突然信起了“自由民主主义”，对于这一有利于“政权更迭”的转变，华盛顿自然举双手欢迎。实际情况却是，埃及的技术官僚不断衰落而政治伊斯兰不断上升。这些自由主义分子早就打定主意支持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并四下表明它们赞成华盛顿的武力外交。

### 三 当今世界的真假冲突

劳资冲突，即被统治、被压迫和被剥削者与统治、压迫和剥削者之间的冲突是贯穿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冲突。这是现代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区别所在。但我们不能把展现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所有“冲突”都简化为这对基本冲突，甚至不能指望冲突的历史主体真正理解乃至愿意理解将劳资冲突与自身利益相结合的重要性！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即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中，劳资冲突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地区对应着受统治的周边地区，这并不意味着中心和周边地区的社会分别由同质的集团构成。相反，这两种社会也分别贯穿着劳资这对基本矛盾，矛盾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就在于分析上述各种矛盾是如何相互结合并作用于社会的，并以此为出发点，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和全球性的

长远角度出发，分析它们可能推动社会朝哪些方向演进，演进具有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

表面上占据前台的冲突未必像它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有意义，在此，我仅列举其在当今的三种主要表现：

第一、所谓的“文化冲突”实则是一种政治战略，由美日欧集体帝国主义系统地发展而成，并由美国的权势集团演变为理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牺牲者一方的社会运动也打出了同样的主题，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使帝国主义战略加倍奏效。

第二、当今世界有两类三种斗争：第一类是追求民主、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与压迫的斗争；第二类是劳动者、民众阶层反抗剥削的斗争和被统治的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三者始终密不可分。然而，今天有些社会和政治力量正将三者拆开，并宣称此举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我断言，倘若如此，有关运动就会受到统治资本的操纵而无法推进民主事业本身。而且，在美国和欧洲，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天真地认为本国之所以插手他国事务，是真心实意地推行民主，所以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这套所谓的“民主”说辞在亚洲和非洲根本行不通。

第三、老生常谈的“文明人”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冲突不过是为掩人耳目，即：掩盖帝国主义及其意欲统治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美国的权势集团至少花了20年来制造恐怖分子这个“新敌人”。它发明了一套说辞来证明“私人”组织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手段并受到某些“流氓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还有效地制造了一批“恐怖分子团伙”：美国中情局支持宗教激进主义极端团伙，可能是“及时登场”的“9·

11”事件的同谋<sup>①</sup>，该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出台的法律条文实则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准备好。

自1492年以来，西方列强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亚非拉三大洲的干预不过是为了巩固其帝国主义统治，无论它们以何种借口来掩盖干预动机。今天它们以输出民主或反恐为借口，昨天则是披着“文明使命”的外衣，前者的动机并不见得比后者高尚。时下在“大中东计划”框架下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再次表明，美国和北约的任何干预都无法立足，哪怕是打着执行联合国某项决议的幌子，也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哪怕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动机；更遑论发生在世界的哪个地区，包括欧洲，如：南斯拉夫。今天，欧洲民主力量的责任并非难到不可实现，无非是：要求北约解散、撤除美国的军事基地、要求美国立刻撤出它所控制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出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sup>②</sup>虽然欧洲民主力量的责任很重要，但是南方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力量切不可因此而忘掉自身的责任。

#### 四 财阀统治，衰老资本主义的新领导阶级

积累的逻辑就是不断对资本进行集中，资本主义理论大肆鼓吹竞争的有效性，实则不尽然。竞争始终存在，不过仅存在

<sup>①</sup> 即使不是主动的、至少是被动的同谋。

<sup>②</sup> 参见萨米尔·阿明《巴马科倡议》（2006年1月18日），即本书的附录三。



于数量日益减少的垄断市场之间，且既不“透明”也不“完善”<sup>①</sup>。不过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至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于资本统治权的高度集中，我们此前所认识的资产阶级的存在和组织形式早已不复存在。

以前的资产阶级由稳定的资产阶级家族构成，家族企业的一些经营特点代代传承。资产阶级由漫长的时光打磨而成，性质稳定，有利于“资产阶级价值观”取信于民并在全社会弘扬。在相当程度上，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受到社会的认可：该阶级提供了服务，因此似乎值得优先享有安逸和财富。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民族属性，对本民族的利益十分敏感，无论“民族”这一可供利用且常被利用的概念多么含糊和有怎样的局限性。然而，新的领导阶层，即经过大约最近30年的发展而出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领导阶层，却突然脱离了上述传统。这种转变的本质何在？或许我们可透过安然公司（Enron）的丑闻<sup>②</sup>及其他类似的事件更清楚地看到答案。这些案例表明，欺诈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而根源在于：在“新”资本主义主流管理逻辑的驱使下，人们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弄虚作假，甚至系统地伪造信息，这些问题比以往的任何问题都严重。有些人把资产阶级的上述变化定义为金融化，另一些人则认为这

---

① 实际上完善和透明的竞争从来就不存在，而且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真实透明的竞争越行越远。

② 安然是一家美国公司，曾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和电讯公司之一，业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雇员2万余人、资产上千亿美元，连续6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然而这么一个声名显赫的公司却于2001年被怀疑并揭穿多年来进行财务造假，甚至达到了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地步。造假丑闻致使安然公司于2002年破产。“安然”就此成为公司欺诈和造假的代名词。——译者注

体现着充分恢复财产权的积极股份制甚至大众股份制的扩张。这些不无褒奖的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支持上述变化，但却忘了提醒大家——它本该这么做，最大的改变在于资本的集中程度以及与之相伴的权利的集中及其集中程度。

资本的大量集中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 19 世纪末期起，希法亭、霍布森和列宁所定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早已成为现实；规模极其庞大的、后来具有了跨国性质的公司始现于“二战”前的美国，之后获得飞速发展，欧洲紧随美国之后，所以说资本集中在美国的诞生一直早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其他国家；美国式的白手起家、自我奋斗<sup>①</sup>理论是与欧洲流行的家族保守主义的决裂。人们崇拜“真实”的竞争，虽然它并不存在，这便是为什么人们早在 1890 年就制订了《反托拉斯法》的原因！尽管美欧在政治文化上存在上述种种不同，但是双方的新资本主义领导阶层在存在方式上发生了同样变化。

新的领导阶层人数十分有限，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新人，其领导地位主要来自成功的金融运作，而非对当代所特有的科技飞跃的贡献，特别是证券界。他们的躐升和先前的领导阶层明显不同，后者的地位出自数十年的逐步积累。“新人”的大量涌现还有一个新特点，即：新的领导阶层极不稳定。尽管受到人们毫无理智的大力吹捧，但他们的天真志向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无论是在负责生产的企业层面还是负责金融监管的企业集团层面，权利的集中比资本的集中更加触目惊心。权利的集中

<sup>①</sup> 以洛克菲勒和福特等为代表。

强化了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相互渗透，这固然是新现象，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当权阶级，即便号称民主，实则是为资本服务。反过来，资本主义富豪也总是邀请当权者来分享利润。权力的相互渗透似乎有同质化倾向，这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它通过改变思想论调来表现自己。

传统资本主义思想强调所有财产特别是小型财产<sup>①</sup>的优点，认为财产的稳定能够带来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新学说却大力鼓吹“成王败寇”，虚张声势地倡导成功，其目的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个人，甚至由此洗脱本该由社会制度承担的责任，而全然不考虑其他因素。请大家注意：这种带有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的学说是否类似于犯罪团伙看待内部关系？尽管以达尔文为参照并不十分恰当。这里“赢者”几乎是常有理，哪怕使用了近乎违法的手段——若没有触犯刑法的话，并且对共同的道德准则置之不理。

在这里，所谓的“裁决”其实是商界和监督与审核部门串通起来，沆瀣一气，且与当局心照不宣，互相勾结。在现实的反衬下，关于透明的一套说辞不过是低劣的宣传。

众所周知，美国企业的融资方式是发行股票和证券，求助金融市场，指望银行支持并通过特殊政治渠道寻求国家扶持，有人说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上述的局面。这种解释只对了一部分。因为，欧洲和日本的模式均不同于美国，例如德国实行银行-企业财政一体，法国的特点是国家干预金融机构，日本和德国一致，但是在欧洲和日本也存在上述现象。不过，欧洲的

<sup>①</sup> 实则是中型或者中等偏大型财产。

有关制度正在不可避免地朝美国看齐。

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高度集中，其集中程度之高是30年前根本无法比拟的。经济与政治两种权利相互勾结，彼此渗透，最终形成了权利本身，这正印证了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论断：资本主义不会缩小为市场，而是相反地成为垄断寡头、国家等超越市场之上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初期，例如由富商治理的威尼斯共和国时期或者法国的柯尔伯时期<sup>①</sup>、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sup>②</sup>，经济和政治权利相互勾结，能量巨大，这种情况于19世纪和20世纪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然而今天的新资本主义几乎重新了资本主义初期的情景，可谓回光返照，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可谓日薄西山，时日无多。

当代资本主义在积累逻辑的驱使下已经演变为“合谋资本主义”。英语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一词不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即自由主义美德的虔诚信徒所抨击的东南亚和拉美的“欠发达和腐败”的资本主义的专利，今后同样适用于当代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该领导阶级的所做所为类似我们所知道的“黑帮团伙”，尽管该词带有极端和不敬的

---

① 柯尔伯时期是指柯尔伯治下的17世纪的法国。柯尔伯是17世纪法国著名国王“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头号重臣，以重商闻名，他积极进行财政改革，大力制订并实施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把重商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在他治下，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大发展，法国经济十分繁荣，是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法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译者注

② 伊丽莎白时代是指伊丽莎白一世治理下的16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在位时间为1558~1603年。在她治下，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大发展，经济十分繁荣，国力十分强盛，她在位的45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盛世，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译者注

味道。

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抵制这种偏航，因为它根本无力质疑资本的集中。它出台的整治措施让我们不可思议地联想到 19 世纪末的《反托拉斯法》（Le Sherman Act）<sup>①</sup>，但众所周知，该法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针对“裙带资本主义”现象，美国社会从本国传统出发，加倍借助道德主义和法官政府进行打击，安然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在该事件中，纽约检察官埃里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在精心准备的电视秀中展示了戴手铐的亿万富翁，为此大得人心。在美国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未来《沙宾法案》（Sarbanes Oxley Act）等法律将赋予法官更多的干预企业生活的权利。但是我们断言，干预最终将流于形式，以干预者与干预对象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而收场。

欧洲的历史经验使它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欧洲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不信任道德主义和法官政府，更倾向于通过立法途径进行治理；其金融模式投机成分较小，没有陷入唯经济是从、任由金融证券市场主宰的模式，也就是说经济并非操纵在一小撮寡头势力手里。尽管如此，欧洲还是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欧洲有关金融市场的开放会使美国的养老基金进入和掌控欧洲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并从中获利，特别是法国，该国 50% 的上市资本由美国控制，由此可见追随美国并没有好处。欧洲之所以做出看似荒谬的选择，实则在于大资本不想冒犯美国“大哥”，这是惯例，因为“大哥”是资本

---

<sup>①</sup> 即《谢尔曼法》：19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这一反垄断思潮的推动下，美国于 1890 年制定了旨在反托拉斯的《谢尔曼法》。——译者注

主义秩序的终极捍卫者。这种无异于“宁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阵线”的选择并不罕见。

长期来看，如果欧洲左翼力量凝聚起来，把自身的政治文化发扬光大，一定能够对盲从美国的现象提出质疑，但是未必会进一步质疑资本主义的某些本质特征。可能还要等到左翼重组、带来民主进步之时，才有希望质疑现有的高度集中的寡头政权模式。不幸的是欧洲左翼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正在沦为寡头政治，只顺应以下两方面需求：第一，追捧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实际上已经沦为“低强度”的民主——您有投票选择任何人的自由，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由市场而非议会说了算！第二，种种专制的政权管理方式或者选举闹剧。

## 第三章

# 怎么办？

### 一 冲突性政治文化和共识性政治文化

我们的政治文化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即承认冲突不仅是现实的反映，而且含有推动社会前进，使人类摆脱束缚、获得解放的积极意义。

这种政治文化在充斥着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俄国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欧洲现代史上有着明确的体现，“左翼”和“右翼”就是按照人们在这些重大时刻面前所持的立场来划分的。赞成启蒙运动就是左翼，比如洛克和 18 世纪的法国；反对启蒙运动就是右翼，从最初的柏克<sup>①</sup>、德博纳<sup>②</sup>、德梅斯特<sup>③</sup>海德尔直到以赛亚·伯林<sup>④</sup>为旗手的反共产主义者，再到美国的“新笨蛋”以及后现

---

① 彼得·柏克（Peter Burke, 1937 ~），英国史学家、思想家，曾激烈批评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② 德博纳（Louis Gabriel Ambroise de Bonald, 1754 ~ 1840）：法国反革命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③ 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 ~ 1821），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曾长期从政，是反大革命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④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 ~ 1997）：生于俄国。英国哲学家、思想史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和评论家。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坚决捍卫自由主义，攻击政治极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译者注

代主义者，右翼的例子比比皆是。赞成还是反对法国大革命决定着是左翼还是右翼。赞成工人运动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就是左翼；反对则是右翼，其中包括保守右翼、随后的种种法西斯主义以及当今的自由主义共识论。俄国革命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对它的立场决定着左右翼的分野。

在斗争的白热化阶段即革命时期，例如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等时期，左右翼的分野不容置疑，两派的对立十分尖锐，可谓势不两立，知识分子多属于左翼，他们选择加入民众阵营，和他们并肩作战。在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复辟时期，左右翼的分野逐步淡化、日益模糊，致使左翼失去坐标，陷入慌乱，文人最终选择了背叛，跑去为当局效力，倡导改良主义而脱离激进主义，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粉饰太平的建议；舆论也倒向或者说归顺于以“共识”为特征的政治文化，所谓的“共识”实则是只捍卫占主导地位的资方的利益，从本质上看属于右翼。“共识”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在承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携起手来；“共识”使意大利、德国等地的大中间派联合政府在目前非常具体的政治构想上靠向社会-自由主义，其根本目的是把潜在的替补力量从左派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对抗色彩逐步消退、左右翼分野日渐模糊的时代，这一点毋庸置疑。

审视社会运动不能忽视它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说要看该运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前进的时代，包括革命时代，还是一个后退的时代？

这种冲突性的政治文化源自对社会贯穿着基本的矛盾、即



阶级斗争的承认。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冲突也是最基本的矛盾。左翼的行动目标是把人类从资本主义所固有唯经济论的商品异化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最终消灭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这种立场只能逐步实现。其中，女权运动以削弱对劳动者的极端剥削为目标，同时追求某些带有创造性空想色彩的目标，例如彻底消灭剥削。最初，启蒙运动哲学将其所开创的现代性定义在解放理性的基础上，并宣称：人类历史是由个体和集体共同创造的，换言之，即个体的人和集体的人都能够创造历史，这是和在帝制时代的“基督教”欧洲等地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思想的大决裂。传统思想认为：只有上帝、自然界或者祖先才是历史的缔造者。肯定个人的历史主体地位是我们的看法，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建设性空想的想法，它与信仰上帝并不矛盾，当今的解放神学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解放神学把神化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信仰从对宗教的保守解释中分离了开来。从启蒙运动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人们终于逐步意识到解放只能通过社会秩序的改变和阶级冲突来实现。

“解放”的含义和意义无疑将随着解放进程的展开而不断得到丰富，该进程往往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沿着最初所设想的方向前进。我以女权运动为例来加以说明，女权运动很早就有应对生态挑战的含意，不过这一点很晚才显现出来。今天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其扩张逻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生态的破坏。今天我们知道，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只能使大约20%的人受益的消费方式，那么，其他人想要生活得更好一些的愿望将会被无情地碾碎。尽管种种数据都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却没有从中汲取任何教训。因为该制

度的既得利益者绝不会为了所有人的解放而牺牲自己（“自戕智性”）。

对启蒙运动、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拒绝构成了右翼的基石，即使右翼很晚才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但实际上从未真正背离过自由主义。这里的“自由主义”一词指的是其政治含意，即推行代议制民主和普选、倡导“舆论”多元化、不断承认某些权利等。

顽固的右翼分子露骨地宣称反对启蒙运动。柏克、海德尔、德博纳尔德和德梅斯特激烈地攻击解放理性，指责其野心勃勃，转而宣称支持所谓的“共识性”政治文化。所谓的“共识性”政治文化，是指所有人，无论贵贱强弱，甘愿接受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命运，无论是基督教共同体还是民族共同体<sup>①</sup>。尽管在现实中我们从未见识过这种所谓的“共识”多么真实可靠，但这一点儿也不重要，因为支持“共识论”的右翼理论总能在需要的时候找到充分的理由。

政治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了一种假象，暗示人们可以超越阶级斗争和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实现共识。当然，阶级斗争的实践并未停止发挥作用，它转而支持以宪法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宪法规定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支持的结果却是削弱了阶级斗争实践。而意识形态的冲突，即是否赞成启蒙运动、是否赞成社会主义等却降级成了观点论争。

无论如何，政治自由主义曾极力通过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

---

<sup>①</sup> 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用“共同体”（gemeinschaft）取代了“社会”（gesellschaft）。

手段来推动以“共识性”政治文化取代“冲突性”政治文化。在此，资本主义全球不均衡扩张的客观现实再度显现，具体表现为：（1）帝国主义的扩张造成了统治中心和被统治周身的对立，最终可能会推动一部分核心民众倒向社会—殖民主义。（2）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持续发生冲突，最终可能会助长民族主义理论的气焰。温和右派、支持它的玫瑰色左派<sup>①</sup>和顽固右派形成了竞争。

在历史上，冲突性政治文化和共识性政治文化随着上述界定的重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而此消彼长。

目前，我们无疑处在一个共识话语的进攻期，进攻的表现是欧洲政治生活的“美国化”。“美国化”一词很贴切，因此从一开始，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就是肯定“共识”，随后通过革新它的有效表现形式而不断地扩张，这里请参见我在《自由主义病毒》（*Le Virus libéral*）中对美国和欧洲政治文化的对比分析。美欧政治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双方在政治上的多样性，如何对待该问题决定着“欧洲计划”的命运：“欧洲计划”面临着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其一是成为“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大西洋主义计划的欧洲部分”；其二是选择左翼前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前提是左翼进行改革。对第二个选择，我曾这样写道：“未来的欧洲计划是否向左？”

冲突性政治文化已经越过了欧洲边界。周边国家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冲突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扩

<sup>①</sup> 在欧洲的政治版图上，一般左派的标志是玫瑰色，如英国工党的标志和法国社会党的标志都是玫瑰花。——译者注

张，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及其带有中心/周边两极分化效应的全球扩张，即现实存在的帝国主义的扩张<sup>①</sup>。除此以外，还存在另外一对冲突，即：追求共产主义革命前景与服从帝国主义不平等秩序之间的冲突。上述两种冲突有时候难分彼此。第三国际把第二种冲突激进化了，具体表现为中国、越南和古巴的革命运动。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可以划归这一类。过去，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表现为阿尔及利亚和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战争、纳赛尔<sup>②</sup>的民族-民粹主义以及万隆精神；今天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拉美人民的觉醒。冲突还表现为在有关国家内和全球舆论层面均出现了鲜明的左右翼分野：左翼支持胡志明和切·格瓦拉，捍卫纳赛尔领导下的受侵略的埃及；右翼则对万隆会议的领袖恨得咬牙切齿，诋毁卡斯特罗。

当今在周边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冲突性的政治文化日渐后退，左右翼的对立已然丧失意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受到误导，同意支持打着“宗教”和“族群主义”旗帜的所谓“领袖”，然而这些人并不可靠，最典型的例子是本·拉登。本·拉登本来效命于美国中情局，结果被主流媒体树为头号敌人，为此赢得了大批帝国主义入侵与压迫者的同情。此外，佛教喇嘛奴隶制的继承人——达赖喇嘛、拉脱维亚的纳粹分子<sup>③</sup>、美国的所谓基督教教派的狂热信徒等都被主流

① 现实存在的帝国主义对应的是传统经济学家、“市场”分析人士假想的资本主义。

② 纳赛尔：埃及政治家（1918-1970），现代最有影响的阿拉伯领袖之一，1956年当选埃及总统，开始在该国施行“阿拉伯社会主义”。——译者注

③ 拉脱维亚的纳粹分子为赞美纳粹党卫军而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可是在欧洲却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设想一下，如果在阿拉伯国家建这么一座碑将会引发怎样的抗议！

媒体吹捧为现当代英雄，这就不再是冲突性政治文化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玩弄暴力。正如纪耳伯·阿胥喀（Gilbert Achcar）<sup>①</sup>所说的，现时代真正的文明冲突已经被野蛮冲突所取代，后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现实和社会主义前景彻底对立，他的分析很有道理。

## 二 我们想要的世界：两种社会理论 ——两种未来观

我们重申，个人自由主义及社会自由主义理论和与之对立的、出自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sup>②</sup>在以下几方面存在冲突：

### 1. 竞争还是团结？

自由主义哲学对达尔文的理解十分特别，它用并非真正达尔文主义的方式来解读社会的演进，将达尔文主义引申到了社会现实领域，视竞争为进步的主要发动机。与自由主义相反，我们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指出，“在历史上，团结发挥了更大的建构作用”；团结就是有效地组织劳动团体、组织国家；团结体现在阶级斗争中，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建构在“平等的人”之间或者是上下有序的框架内。

### 2. 个人还是公民？

自由主义学说把社会定义为个体的集合，并假设原则上人

<sup>①</sup> 纪耳伯·阿胥喀：政治学教授，生于黎巴嫩，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译者注

<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很多分支，我们这里把它作为整体论述。

人平等或者近乎平等，也就是说平等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潜在的可能或者权利，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或者假设本质上人人不平等。在设定了不平等的前提后，在竞争中有成有败就变得合情合理。与自由主义相反，我们强调的是组织即“结构”。我们认为，社会从来都不是个体的集合，任何类型的社会都是通过组织来架构的。“结构”可以划分出等级，无论是经济生产结构还是权利组织结构，无论该结构隶属于统治集团还是被统治集团，无论权利的组织方式民主与否，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取消了不平等的“结构”，但是不会把它简化为理论上平等的个人的叠加，因为要实现真正的平等，恰当的组织方式即“结构”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设想的“结构”是：在该“结构”中，个人的真实性受到认可，个人被鼓励彰显人格，从而成为公民，即成为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如城市、共和国等的积极成员。

### 3. 集体的退却还是政党的扩张？

在自由主义的概念中，个人无法承受竞争游戏所带来的孤独，治疗方法便是从以社团主义为表达方式的团结中寻求慰藉。社团往往以种族或准种族、邻里或职业为基础；不过鉴于宗教的表达方式更为强烈，因此以宗教和宗派为基础的社团数量更多。到社团主义中求安慰的结果是，个人生活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被劈为两半：一边是工作竞争中无边的个人主义；另一边是对宗教团体的沉迷：信徒们四肢匍地拜倒在精神导师的面前。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公民和在公民基础上组建的政党：公民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其目的在于使个人追求变得更有意义，其正常行为方式是号召组建“政党”，即围绕特定社

会目标集中民众的组织。政党可以从阶级意识出发来组建，例如已经组建或者打算组建的工人和社会主义政党；也可以从政治视角出发来组建，例如民族主义政党、世俗化的民主党、激进民主党甚至法西斯政权等。承认利益冲突和观点多元是公民行动的基础。

#### 4. 协商还是创造性民主？

自由民主主义逃避冲突而寻求“共识”，并非真正的多元论主义。“共识”实则是避免个体竞争蜕化为混乱而罪恶的无政府主义的唯一手段，竞争则是自由主义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所以“共识”传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当今“真实存在的世界”即资本主义是无可替代的，利益冲突不过是个别和局部现象，能够并且应该得到调和，出色的“专家统治论者”在听取了院外游说后自然能提出相应的对策。而激进的政党因不为实现“共识”呐喊助威而显得碍事。“共识”假设：所有的破坏行为都能够削弱并最终化解。“共识”认为，理想的状态是美国的“两党制”，在这种模式中，两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尽管其支持者口味各异，注意是支持者而非社会阶级。所有人都得接受“共识”；宪法是神圣的，万不可用他物取而代之；私有财产是确保既有的社会组织方式永存的基石，不容侵犯；不要妄想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景。民主制则全然不同，民主制甚至“民主制”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创新、创造和设想。民主制认为，在现有的社会组织中，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制的本质就是“破坏”，破坏是社会转型的发动机，所谓有破才有立。激进的民主派不喜欢“共识”，当“共识”蠢蠢欲动的时候，例如战争时期，他们会警惕“共识”

对批判精神的损害。

### 5. 由自由市场实现社会化还是由民主方式实现社会化？

自由主义贯彻的是旧政治，即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相配套的传统代议制民主政治，信奉的是私有财产和市场逻辑。它把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割裂为两张皮：经济上奉行去政治化，政治上施行干瘪无力乃至空洞无物的共识性民主，不可能与市场即当今由垄断寡头操纵的资本主义意愿背道而驰。社会化只能经由市场实现，这显然与社会是“个体的集合”的观念相当的吻合，它把市场原则和市场语言引申至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导致市场无处不在，例如政治市场、观点市场、艺术市场、婚姻市场……反之，激进的民主制倡导通过民主途径来实现社会化。这意味着，政治就是不断地创造与创新，而非固守最初的制度设计，原地踏步。它把经济管理原则政治化了。如果让它设计一个由民主和市场联合发挥作用的社会——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它会把发言权留给民主：要实现永久性的民主设想，必须对市场进行管制而非任由市场做主。

## 三 如何施政？

20 世纪的一页历史翻了过去，新生代活动分子及其所青睐的社会运动彻底抛弃了该世纪具有批判精神的左翼特别是第二、第三和第四国际的施政方式。他们指责左翼传统没有把民主原则落到实处：如拒绝多样性；争先恐后地认为自己经过不容指摘的“科学”分析而掌握了“正确路线”；政党、工会和某些社会运动的组织权和决定权过于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致命



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等。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抛弃了“先锋”的概念，因为它委实危险。

我们应认真对待上述批评，特别要重视大家指出的要害问题。这意味着要毫无保留地尊重开放、多样和民主管理的原则，唯有如此，才能把各种社会运动汇聚到社会论坛中来。

所谓的多样性既事关理论也事关实践。在目前进行的抵抗和斗争运动中，各种或明或暗的观点交锋不仅存在，而且往往渗透在运动之中。例如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就有两派截然对立的观点：在第一派观点中，一部分人认为，理论应该从外部给予运动，当然，理论要尽量科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另一部分人认为，要用创造性的空想取而代之，或者与之相结合。反之，第二派观点认为，未来是运动的自然和自发的结果，无法事先进行系统规划。由此可见观点之丰富。

承认多样性意味着允许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承认未来既是事先规划的产物也是运动的自然结果。如果让我来定义，我会把我坚持冠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视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且不断趋同的产物，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理论前提和事前判断是先天正确的。反之，反动力量鼓吹文化冲突是建立在传承自历史遗产特别是宗教遗产等不变因素之上的，处心积虑地要把文化冲突合理化。民众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e des peuples）要与这些文化主义的解读做斗争，并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冲突等当代真正的文化冲突来取代它的前台位置。

多样性还涉及对未来的看法，是未来观的伦理和文化基

础。马克思主义、激进改良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生态保护主义等各种观点在多样性的统一中都有各自的位置。于多样性中存共性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排斥观点的碰撞，不能把不同的观点视作“异端邪说”而横加打击。我在此谨提几条个人建议：运动不会自发地通向人们想要的任何一种未来，也不可能摆脱混乱。如果该运动自称是非政治的，那就更不必提。以马克斯副司令领导的新萨帕塔主义<sup>①</sup>（néozapatisme）为代表的部分运动以十分体面的伦理动机和“政权贪污腐败”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为由，拒绝以“上台”为目标并引起热烈反响。我们承认该立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下有其合理性，但反对从中推导出某种在未来乃至现在都适用的普遍规律。整体而言，走哈德（Hardt）和尼格里（Negri）所谓的“非政治化”<sup>②</sup>道路往好里说是天真，往坏里说无异于投靠北美的反动政治文化并支持其非政治化的市民社会观念。

要应对现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挑战并走出一条积极可行的替代道路，我们在施政方式上就需效仿第一国际，对多样性加以规范，而不能效仿第二、第三和第四国际。第一国际内部的论争和当今的世界社会论坛类似，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很多运动之所以宣称拒绝政治，实则在于害怕一旦成为政党，组织逻辑就会逐渐压过斗争逻辑。其实在自称“非组织化”的小型组织或运动中，组织逻辑一样大行其道，所以上述

<sup>①</sup> 为墨西哥的印第安原住民争取自治与平等权利的运动。——译者注

<sup>②</sup> 或者至少是对与之类似的政治现象的定义。

的担心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关键不在于是要政治还是不要政治，而在于要组织逻辑还是要斗争逻辑。

#### 四 于多样性中求共性

欲整合代表全球新自由主义牺牲者利益的所有运动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就必须尊重其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程度：其一是有些人近乎无条件地支持资本主义，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要求，只针对过度的新自由主义<sup>①</sup>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粉饰太平的改革建议，目的是挽救资本主义。世界银行及其提出的“减贫”计划就属于这一类，斯蒂格利茨等人也在此列。减贫而不是质疑贫困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制度，其真实意图在于削弱而不是加强民众运动。其二是温和的改良主义。温和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是捍卫受到威胁的劳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权利。其三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激进的改良主义者具有超越资本主义、遵循社会逻辑的眼光，和社团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相接近。

第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程度：某些人认为，全球化能够提供机遇，就看人们能否抓住，所以全球化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而且仍然具有积极的潜力。另外一些人则强调，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特别是它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其本质是帝国主义，美国霸权主义就是例证。

<sup>①</sup> “过度的新自由主义”是借用乔治·索罗斯的说法。

第三，民主观念的激进程度：在南方和前东方地区、在支持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买办阶级与当局、在美国和具有民主传统的欧洲都存在着公开的反民主立场。证据是：在美国，近一半的共和党选民属于所谓的基督教和原教旨主义右翼；在欧洲，存在着以海德尔、贝卢斯科尼等人为代表的新民粹主义。不过大多数人持中间立场，即满足于最低限度的民主，从美国和贯穿整个第三世界的选举闹剧直到建立在所谓去政治化共识基础上的低强度民主<sup>①</sup>，我们都能看到这点。左翼则不同，它积极开展斗争，使民主具有了“解放”意义，即在考虑全体挑战的基础上，提出肯定人权和公民权、肯定个人和集体的社会权利、肯定经济制度控制权的长远设想。左翼的激进立场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团主义相一致。

第四，对两性关系的立场：以美国、伊斯兰、印度教和佛教世界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某些理论反对女权运动，事实上它们奉行的是男尊女卑的思想。还有一些政治思潮打算承认女权运动的诉求，但有一个前提，即：女权运动不会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秩序构成质疑。激进的女权运动和激进的民主派一样遵循解放逻辑，其最终的设想和前景必然会超越资本主义。

第五，对主流全球制度造成的生态问题的批判程度：我们不能无视美国权势集团的立场，即为了跨国公司的眼前利益和维护以浪费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而牺牲地球的未来。资本主义的这一破坏性特征完全出自它的短视，即只凭利润来计算相

---

<sup>①</sup> 议会投票无论是支持左翼还是支持右翼都毫无意义，因为选举的政府软弱无力，任由“市场规律”做主。

对的合理性。天真的环境保护论者拒不承认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彻底的环境保护论者则和社会主义者持相同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予以无情抨击。

实际上，上述五重挑战在有些地区不存在，因为各项标准互相冲突而无法并存；有些地区是主流右翼势力的大本营；很多有可能取代左翼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则分散在各个地区。

今天，支持新自由主义议题及与之配套的主流全球化观点就是右翼，即便是披着左翼的选举外衣<sup>①</sup>或者操一幅立志反帝的民族主义论调<sup>②</sup>。霸权主义右翼充其量是建立在民主“共识”<sup>③</sup>基础上的温和改良分子，在欧洲的整个党派构成中占据着多数；种族主义或激烈的反女权主义等非民主的理论运动和社会运动则更右，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突出，共和党集团把这些更右的运动作为所谓的“道德战线”而吸收为盟友。在作为资本主义周边的南方和前东方地区，买办右翼掌握着实权，其社会基础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发家的唯利是图的商人（*affairistes*）阶级。“唯利是图的商人”是个流行于第三世界和前苏联地区的词汇，准确地表达了该资产阶级的本质：毫无民主可言、虚伪而无所作为，所以终究是不堪一击。

我们要构建一个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并持有先进民主理念的左翼，该左翼即使不反对帝国主义，至少也要反对霸权主义。不过当今反对主流右翼政权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未必都持上述立场。例如：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有一支左翼力

① 这种情况经常在欧洲出现。

② 也仅仅是一种论调；这种情况有可能在南方出现。

③ 按照该词的流行用法。

量，尽管有时也持十分激进的立场，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特征却并不关心。目前整个北方地区的反帝意识都非常薄弱：持第三世界主义立场的西方青年曾动员起来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该运动却逐步偏航，令他们深感失望。周边地区存在着一股怀念苏维埃制度和民粹主义的情绪，民粹主义虽然谈不上民主，但至少对新自由主义或帝国主义持批评态度。周边地区还有一部分政治和理论力量更有可能在未来追求捍卫合法的民族权益。上述地区的部分政府似乎分析了力量关系对比，发现无力反抗而被迫归顺了全球化并接受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这部分力量正在左右摇摆：是加入民主的反帝人民阵线？还是对不甚民主的右翼民族主义抱有幻想？右翼民族主义持讨价还价、有条件地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只有加入民主的反帝人民阵线，才能壮大自己并加入建设中的世界左翼阵营，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只能一事无成，甚至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族群主义或者政治伊斯兰、政治印度教等伪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蛊惑。一些反民主的运动任民众阶层由资本主义全球化摆布，尽管它们天花乱坠地吹嘘自己持“反西方”的文化主义立场，实则是世界右翼阵营的盟友。

要建设一个新左翼，就必须制定恰当的战术和战略，把一切政治力量、理论思潮和一切反自由主义、反帝国主义以及一切以促进民主、推动妇女解放和尊重生态平衡、正确管理地球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团结到该左翼的周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认为改良主义者、民主和妇女权利的捍卫者、环保人士、和平主义者等会从“温和”道路的碰壁中汲取教训，尽管

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仍持“温和”立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坚持这种立场。当然一些改良主义者会继续执迷不悟，满足于无关痛痒、粉饰太平的改革而看不到自己正沦为右翼的工具；一些革命者会继续纸上谈兵，只为人类描绘社团计划的蓝图而逃避如何加以实现的问题。同样，我们也有可能推动南方国家的思潮甚至组织（organisations）以及与反帝舆论采取更趋一致的立场，以赢得民众的大力支持。但始终会有部分力量继续受买办集团的诱惑，就像始终有部分民众运动会继续沿着文化主义的歧途前进一样。

霸权主义右翼阵线远没有看起来牢固，现实中它充满矛盾，而且矛盾会随着右翼计划的表面成功而进一步深化。因此右翼集团面临着分裂：被右翼计划彻底撇在一边的南方国家仍然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一系列薄弱环节构成。北方国家则要重新审视深深扎根于欧洲历史上的民主、人道和社会主义传统，并把自己树为一道日益坚固的屏障，以阻止人类最终走向美帝国主义的可怕前景。资本主义显然不会像今天许多进步的民众运动领袖和理论家所坚信的那样，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前景”。目前，我们只能先打响反对自由主义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斗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反动形式，美国则是新帝国主义的先锋。斗争将激进，激进，再激进！

世界上还会有很多我所谓的“见风使舵的政客”，即积极而精明的、信奉政治投机观的男男女女。政治投机观是一门从既有力量关系对比中渔利的艺术，因为激进派和革命者把政治定义为“改变力量关系对比的艺术”。不过“见风使舵的政

客”不会对其赖以发家的社会阶层的意见无动于衷，无论是在施行民主选举制的社会还是不施行该制度的社会。他们靠目视行驶在布满暗礁的大洋，凭本能进行利益的取舍和方向的选择。不少人将来会加入左翼阵营，前提是左翼经过重建改变了力量关系的对比。他们这么做不完全是受野心的驱使，也不全是庸俗的机会主义，而是由于会在左翼身上找回他们看中的价值观。这种属于我们的价值观将感动这个世界的改良派和反帝人士，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

我们可以用下列政治辞藻或互相对仗的排比句来表达共性的构建，例如：“实现有利于社会公平和国际公平的统一阵线”，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和“国际”这两个词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中心地区的社会公平必须伴随着坚决的反帝意识，而周边地区的反帝斗争如果不由需要社会公平和民主的民众阶层来发动就没有未来可言；或“经过长期过渡所实现的超越野蛮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是公民至上、社会规范的国家”；或“经由公民和社会民主制所实现的社会化具有整合效应，经由市场所实现的社会化具有排他效应”，或“没有民主就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满足社会需求就没有民主”。

上述口号出自最近的历史教训：在南方各国，政府甘愿放弃民主进程而听命于新自由主义，结果是，或者回到了极权的民粹主义道路上，或者效力于帝国主义的野蛮独裁，使民主失信于民。在北方各国，左右翼围绕经济自由主义达成共识，用美国式的低强度民主取代了历史上左翼的公民与社会民主，致使反帝环境支离破碎、一盘散沙，成熟中的反帝意识遭到扼杀。



## 五 展开讨论：经过长期过渡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不否认列宁曾对现实的挑战和革命条件的成熟度做出错误判断，但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对 20 世纪共产主义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而应本着公开的原则，以创造性的方式展开讨论，为 21 世纪寻找积极的替代战略。在此，我不再赘述在别处讲过的观点，只对其中的主要内容作如下综述：

第一，面对挑战，我们提出的战略设想应该具有长远眼光，即：经过“长期的过渡”最终从世界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社会主义。

第二，当今世界有两种社会斗争，其一是包含有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因素的社会斗争，其二是孕育或催生着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社会斗争，出自两者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会在上述漫长的过渡时期内同生并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也将处于不断的冲突与结合之中。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所有地区，无论是帝国主义中心还是买办周边，都有可能也有必要一步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当然每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目标都必须具体而具有针对性，特别是在中心与周边的对应问题上。

第四，代表民众利益的思潮和社会及政治力量，尽管混乱，但是已经开始沿着上述方向前进。所谓的“替代全球化”运动就是例证。这些运动代表着不同的选择，有些选择以上述方向为目标，具有进步意义；有些以准法西斯方式来应对挑战，不仅不切实际甚至是十足的反动。只有将论争彻底的政治

化，才能在保留多样性的进步力量的同时寻求一定程度的统一。

第五，在全球各地区，沦为资本主义扩张牺牲品的都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要抓住这一崭新的历史机遇来发动民众。首先要了解科技革命给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而持久的改变，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代表产业工人阶级，而要逐步成为绝大多数劳动者<sup>①</sup>的信仰。只有把劳动者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非主流但多少占有一席之地的以及受排斥的人们重新团结起来，才能以创造性的思维复兴共产主义，这便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周边地区，团结劳动者还意味着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全体农民争取平等的土地使用权。我们经常忘记农民仍然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且无论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没有能力解决农民问题，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重要。

要采取有效的行动战略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设想，必须同时在以下三方面有所建树，即社会进步、推进民主和建立多中心的世界制度。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路线相配套的政治民主倡议不是赋予民众阶层民主表达权力，从而满足他们的民主诉求，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运动来取得社会进步，无异于使民主制彻底失信于民，今后将失去可行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进步也谈不上民主。鉴于各国有各国的国情，特别是政治文化的不同以及由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发展程度的不同，我们在追求社会进步和合理民主的同时，必须建立

<sup>①</sup> 无论劳动者的身份如何五花八门。

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制度，从而获得必要的行动空间。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挫败华盛顿的全球军控计划。

## 六 中期目标

首先，对欧洲而言，挑战的关键在于欧洲机构。欧洲诸机构建立的目的是在经济上加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加强大西洋主义。欧盟委员会是确保欧洲反动政权长盛不衰的最佳工具。若不彻底反思欧洲的制度建设，则另立欧洲、建立“社会欧洲”的号召只能是呓语。

欧洲机构破坏了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施行民主的基础；失去了国家主权，又未能以联邦主权或邦联取而代之<sup>①</sup>，民主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主制度便沦为闹剧，这无异于把真实存在的欧洲削弱为美国政治计划的欧洲部分。在现实中，欧洲奉行大西洋主义的外交政策，俯首帖耳于华盛顿领导下的北约。美、日、欧集体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主义，欧洲机构无异于实现该目标的重要工具。

所谓的欧洲多元左翼虽然支持政权更迭，但前提是不超出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色彩浓厚的欧洲机构所限定的范围，因此远非真正的政权更迭，欧洲的民众不能指望它们，必须另立左翼，否则很难当政。在该背景下，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是否仍然会不断地凸显？一些人认为在经济领域有这种可能<sup>②</sup>，

① 目前建立联邦或邦联的条件尚不成熟。

② 姑且不论他们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表示欢迎还是遗憾。

他们指出，左右欧美双方经济生活的大公司可能会在经济利益上起冲突。我不赞同这种观点。相反，我认为：欧洲和美国政治文化的不同可能会引发政治冲突，实际上政治冲突已经初露端倪。此外，如果对受到美国化威胁的欧洲政治文化重新加以肯定，就有可能诞生一个有能力应对新挑战，即反对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新左翼。自由主义是民主的敌人，施行自由主义将破坏欧洲的民主传统。在有些国家，一些重要的右翼团体死心塌地地反对民主、追求独裁。另一些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则坚持捍卫民主，但同时也支持自由主义：它们认为民主和自由主义可以调和。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切不可无视这一对现实的矛盾。

其次来看看亚非拉三大洲。今天，摆在三大洲人民面前的世界体系在很多方面和“二战”后的殖民体系相类似，其特点是：否认亚非拉各国的主权，向各国强制输出有利于帝国主义中心垄断扩张的经济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最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可谓不折不扣地制造全球性的种族隔离。

1955年，亚非国家在万隆召开会议，对类似挑战做出了回应。这些国家要么诞生于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出自强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既定的合法性。此外，在革命集团和民主解放运动组建的超越多样性的联盟中，至少始终包含着相当一部分渴望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新社会扮演领导角色的资产阶级，尽管当时该阶级还无力单独左右国家的方向，这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再次得到肯定，此前人们还以为“二战”一结束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雄心，另

一方面是民众阶级的夙愿，万隆时代的几十年就由两者的磕碰构成。

目前，帝国主义新秩序是否会受到质疑？质疑者会是谁？将是谁？其结果又如何？这便是今天周边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今天，我们不可能马上对现行秩序提出质疑。在南方国家，受到挫败的领导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买办附庸的角色；不知所措的民众忙于糊口，似乎也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或者是沉浸在统治阶级灌输给他们的幻想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政治伊斯兰。不过局面并非完全悲观：反资反帝斗争在五大洲不断沸腾，拉美人民在新左翼领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sup>①</sup>、众多运动日趋激进，南方国家在世贸组织中开始发出批评的声音，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完全有可能另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好世界。

要采取攻势战略，就必须重建南方人民统一战线。面对帝国主义的资本反攻，我们必须把社会抵抗运动激进化并全力政治化，也就是说要协调农民、妇女、工人、失业者、非正式团体分子、民主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的斗争，并为民众运动制定民主和社会进步等两项目标，两者密不可分，目标要分为当下与长远两项；要使社会运动具有普遍价值，即有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设想；要使社会运动具有合法性，从而帮助南方人民克服内部的比如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切记，政治伊斯兰、政治印度教等准宗教文化主义可不是反帝斗争的盟

---

<sup>①</sup> 成功至少表现在选举层面，尽管它包含着一定的局限性。

友，他们是帝国主义统治力量的根本的反动盟友。

民众的斗争动员和斗争成果可能会使南方国家有关当局的政策发生转变，甚至会促使当局发生积极的质变，这一点已初露端倪，世贸组织内 20 国集团和 99 国集团的建立就是证明，姑且不论它们所代表的各种利益是否相同。

某些南方国家的领导阶层显然选择了另外的战略，既不被动屈服于世界体系的统治力量，也不公开反对它，而是积极参与，并把加快国家建设的希望寄托其上。

新中国以毛泽东主义为指导，一心一意进行国家建设，保留了对人民币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权，拒不动摇土地集体所有制，因此比其他国家更有条件做出上述选择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经验能否持续？它可能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我在分析了中国道路所蕴涵的矛盾后得出如下结论：民族资本主义的战略构想要和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这在当时还是幻想。出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客观条件不允许劳、资、农三方达成能够确保社会稳定的社会妥协，最终只能是：要么右倾与代表民众阶级利益的社会运动发生冲突；要么左倾形成“市场社会主义”，经历漫长的市场社会主义过渡期。

其他所谓“新兴”国家领导阶层的选择，表面看来与中国类似，实则更加脆弱。巴西和印度都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激进革命，无法像中国那样抵抗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阶级的联合压迫。两国政府于 2005 年 12 月在中国香港倒向了世贸组织的全球自由主义，对刚刚萌芽的南方国家的统一战线造成了重创，可谓帮帝国主义躲过了一劫。这个大错误只能是符合当地最为反动的阶级——巴西和印度的大庄园主和大地主的利益！即：

符合帝国主义的天然盟友和民众阶级的当然敌人的利益。在拉美历史上，部分左翼分子一度青睐社会民主主义并对它寄予厚望，可惜他们眼光很成问题：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形成气候，是因为它能够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而巴西和其他南方国家则不具备类似的土壤。圣保罗论坛集中了拉美的左翼民主政党，虽然最近几十年间对当地人民取得民主斗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强化了各地的社会民主幻想。

## 七 奔向第五国际？

如果按照我建议的方向前进，就要事先对我所说的各民族的政治文化进行深入分析。政治文化既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集社会、政治和思想斗争成果为一体的产物，也是它们融入全球现代性的特定表现。在同处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提下，各国的政治文化虽然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但整体而言还是各具特色、形式多样。在若干因素中我只强调一点：欧洲各国的政治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和无视法、俄革命的美国政治文化有着天壤之别。

统治资本的战略已然全球化，这要求其受害者的反击也要全球化，何不酝酿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才能有效整合各方面的力量，确保各国取得反资斗争的胜利。

上述构想有一个前提，即：要参照第一国际而非第二、第三或者第四国际来设计新的共产国际。新生的国际工人协会要对所有希望携手行动、于多样性中求共性的人敞开大门。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要出自具体的社会运动，而非事前的空洞

定义。我们需要相关的理论，而且理论应尽量地周详，但坚决杜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错误做法，也就是说坚决避免只把一种理论及其所倡导的道路及实现方式奉为圣旨。

要确保上述的基本民主原则得到贯彻并非易事，要划定“界限”，明白两点：第一，一旦确定了战略目标，就要有所取舍；第二，不要企望事先处理好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我谨通过以下三点提几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帮助我们有效地应对当前的挑战。

第一，扫清国家和全球层面的自由主义倾向，恢复各民族的主权，即：承认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管理观。目标建议可参选以下几点：例如把农业事务剔出世贸组织管辖权；撤销帝国主义强权有关工业和知识产权的单边决定；废除有关规定，承认自然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非营利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废除有关规定，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允许有关国家要求债务减免，杜绝放债等卑鄙行径。此外，伴随着最近30年的自由化进程，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处境日益艰难，针对这种现象，政府要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采取预防措施。法国对“首次雇用合同法案”<sup>①</sup>的反抗就是一个可行的例证。

<sup>①</sup> 首次雇用合同法案是法国政府于2006年出台的一项劳动法，旨在促进青年就业，缓解青年人失业率、就业不易的难题。法案规定，今后20人以上的企业在雇用26岁以下的年轻人时，可以在两年试用期内无条件中止合同。按照法国原先的劳动雇用法的规定，企业一旦雇用了一名员工，即使该员工不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也很难将其解雇或者解雇的成本很高。过于僵硬的用工规定吓退了法国企业，使它们不敢冒险雇用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致使法国青年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新法案的本意是企业放权松绑，鼓励它们雇用年轻人。但青年人认为该法案是对青年人的就业歧视并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最终使法案流产。



第二，挫败美国及其北约的全球军控计划。坚决谴责美国践踏国际法；坚决谴责美国随心所欲地发动“先发制人”战争；恢复联合国的作用；敦促驻伊拉克占领军立即无条件撤出该地区；敦促以色列立即无条件撤出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拆除美国部署在全球的军事基地；概言之，如果不能从道德、外交、政治和军事层面有效遏制上述的全球军控计划，各地民众经过艰苦斗争所取得的社会和民主成就就会处在美国空中打击力量的威胁之下，十分危险。

第三，清除欧盟机构中的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思想基础，彻底反思欧洲的机构建设并解散北约。

针对上述挑战，人们已着手制定目标，细化趋同战略。2006年1月18日，在多中心世界社会论坛<sup>①</sup>开幕的前一天，人们就斗争战略、于多样性中求共性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表明，世界社会运动正在沿着上述道路前进。

建议中的第五国际旨在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这是《巴马科倡议》<sup>②</sup>行动战略的前期目标。这里的人民既包括南方人民也包括北方人民，这里的团结既事关无产阶级，也事关所有受资本主义制度损害的民众阶层和阶级，事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陷入生存危机的全人类。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和被帝国主义三边世界所压迫的亚非拉人民的大团结不矛盾。相反两者必将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此外，南北方人民的大团结绝不是一

<sup>①</sup> 在巴马科和加拉加斯等地举行。

<sup>②</sup> 参见附录二。

方对另一方进行施舍，而是携手同心，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全世界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才能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社会进步，深化民主，巩固民族独立。这三项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协商性全球化的替代选择。

那么谁会赞同该设想？这就涉及我们上文提到的界限问题。我们认为，第五国际不能只面向政党，还应该面向人民大众的所有抵抗斗争和运动，并确保他们自愿参与建构共同战略并享有决策自由。当然，也不应排斥政党或部分政党——政党是市民社会活动的重要集结点。

我们把有关的基本原则阐述为下列两点：第一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即：没有民主实践就不会推动社会进步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第二点，民主进步如果不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也不可能实现。两点互为补充。社会主义不仅要和追求自由平等相一致，而且要与之相结合，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特别要警惕并杜绝下列现象：个人主义野心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怂恿下无所顾忌、肆意膨胀的现时代，平等目标受到摒弃，被可疑的机会平等目标所取代。

各政治和社会力量要想在上述设想中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就万不可将自身削弱为极端的政治小团伙和善意的非政府组织。很多大的运动组织如工会和农民、妇女、公民联合会等都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第三和第四国际的政党要不是自诩并自立为先锋，原本也会在上述设想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周边地区的民主、社会和反帝政党自然知道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也有反面案例，如第二国际就错误地投靠了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结

果丧失了自己的位置。要引起警惕。

我们不再分析新共产国际的加入条件<sup>①</sup>问题。尽管应该对它的原则和身份进行认真的思考和严肃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提醒大家开始思考。

第五国际一旦问世，必然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而且反对的声音将越来越大。这些人已开始反对世界社会论坛，希望论坛一直软弱下去，越软弱越好，为了说服大家安于现状，他们搬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理论建议：什么要平衡论坛代表，充分体现包括“多元左翼”<sup>②</sup>在内的代表的多样性；什么应开辟“非政治乃至反政治的市民社会”；等等，实际上这些陈词滥调不过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贯标志，迷惑并吸引着近几十年间在各地涌现出的一批非政府组织。

反对者想把世界社会论坛变成达沃斯论坛的补充，换言之，就是不触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原则，只考虑反贫困等最低限度的社会需求，从而为自由主义披上新的合法外衣。为提出社会需求，他们认为有必要拉上尽可能非政治化的“市民社会”。在达沃斯集团、7国集团、美国的大基金会和欧盟机构等的支持下，它们已围绕上述目标着手行动。“地中海论坛”<sup>③</sup>、北美代理人发起的“阿拉伯民主论坛”<sup>④</sup>、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倡导并精心建立的非政府组织联盟<sup>⑤</sup>等的诞生大概就是基于上述目的，即分裂乃至

① 可参照第三国际强加给大家的21条。

② 多元左翼是他们自诩的，主要出现在欧洲。

③ 即欧盟发起的所谓巴塞罗那倡议。

④ 后更名为未来论坛。

⑤ 其目的是“跟踪”世贸组织等资本主义制度内各机构组织的大会。

粉碎社会论坛，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发展和壮大潜力，防止它采取有效的强硬立场。

新的共产国际一旦问世，社会论坛无疑将成为它的朋友。共产国际奉行基本的民主开放原则，对支持者敞开大门。新共产国际的成员、不参加社会主义计划但愿意为“于多样性中求共性”贡献力量的组织以及不参加共同战略讨论的组织等必定能在其中和平共处。这种多样性正是社会运动的力量所在，应当予以保留，尽管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

## 附录一

# 为帝国主义扩张效力的政治伊斯兰

我曾多次表达过对政治伊斯兰的看法。主张政治伊斯兰的所有派别都宣扬“伊斯兰特性”，并强调它根本不具有“基督教”的政教分离意识。这种说法与19世纪初欧洲反革命派<sup>①</sup>的言辞如出一辙！他们曾严词谴责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割断了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历史。当然，向主张政治伊斯兰的派别指出这一点并不起任何作用。

基于上述立场，主张政治伊斯兰的所有派别都选择在文化领域展开斗争。实际上，这种文化仅限于习惯性地强调对传统宗教的归属。政治伊斯兰分子对讨论宗教教理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注重的只是反复强调对共同体的归属。对现代世界所持的这种“看法”反映出政治伊斯兰的思想极度空虚。更令人痛心的是，它还维护了帝国主义的战略，即以文化冲突来取代帝国主义中心与被统治的周边之间的冲突。主张文化排他性使政治伊斯兰撤出了现实社会冲突的所有领域，即：脱离了民众阶级与压迫剥削他们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政治伊斯兰分子从不介入这些领域，他们的领导人总是说：该领域的斗争

---

<sup>①</sup> 如波纳德和德·梅斯特尔。

没有任何意义。伊斯兰主义者出现在这些领域则只是为了开办学校和诊所，属于慈善活动和思想灌输，而并非支持民众阶级与导致其苦难的制度相斗争。

在现实的社会博弈中，政治伊斯兰站在了附属资本主义和主导帝国主义一边。政治伊斯兰维护财产神圣的原则、合法的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所有要求。例如：埃及议会中的“穆斯林兄弟会”最近投票支持了一些反动法律，这些法律强化了有产者的权利并损害了佃农（大多为小农）的权利。没有任何事例表明，伊斯兰主义运动曾反对过某个伊斯兰国家推行的任何一项符合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的反动法律。政治伊斯兰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即使其活动分子以为它是反帝的！政治伊斯兰是帝国主义的宝贵盟友，它自己对此一清二楚。因此人们不难理解：政治伊斯兰初创时，最积极的发起人何属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领导阶级。地方买办资产阶级、暴发户，以及当地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大都支持政治伊斯兰。政治伊斯兰放弃了反帝目标，并以近乎反基督教的立场取而代之。这种立场显然只能将有关社会引向绝路，而有助于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

政治伊斯兰不仅在某些问题特别是妇女的地位问题上 is 反动的，甚至还鼓动针对非穆斯林国民如埃及的科普特人的宗教狂热。政治伊斯兰在根本上是反动的，因此它自然不会加入人民解放的进步过程。

有人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以促请所有“社会运动”与主张政治伊斯兰者进行“对话”。

第一个理由是，政治伊斯兰集合了大量民众，不应当不顾

和蔑视这些民众的声音。然而，我们更应保持冷静头脑并正确估价有关的“动员”。一旦进行严格的分析，被操纵的选战“成功”便失去了绝对价值。在此仅以埃及的选举中出现高达75%以上的弃权率为例。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主义的街头力量只是反衬出左派力量的弱小：在现实的社会冲突领域完全看不到这些左派组织。

即便承认政治伊斯兰确实集合了大量民众，是否就可以说左派应当将主张该思潮的组织纳入其行动联盟？如果政治伊斯兰的动员能力是事实，那么任何有效的政治策略都应将此纳入其思考、提议和选择之中。但是，组成联盟不一定是应对挑战的最佳办法，难道能将主张纳粹或法西斯的群众纳入共同阵线吗？而且人们应当明白，政治伊斯兰的组织，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并不寻求这种联盟，甚至会持摒弃态度。如果某些左派组织自以为能被政治伊斯兰所接纳，那么一旦掌权，政治伊斯兰所做的第一项决策便是以最暴力的方式清除碍事的盟友。在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人民战士组织便是这种情况。

主张对话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便在社会主张上是反动的，政治伊斯兰毕竟是“反帝的”。有人说我提出的标准是“经济主义的”，它忽视了南方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我不能接受这种批评，因为我已谈到过在民主和民族方面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我认为，在应对挑战时，行动力量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做法不必要完全一致。于是有人会想到尽管在社会方面倒退但却反帝的政治伊斯兰。人们还会立刻想到伊朗、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的某些抵抗运动。从整体上讲，政治伊斯兰根本不是反帝的，而是全球统治强权的追

随者。

第三个展开对话的理由是告诫左派必须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真正的左派不能无视“郊区问题”，即当代发达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大都市中移民出身的民众阶级所面临的处境问题。当事人、欧洲参选左派和激进左派如何分析上述挑战并提出了哪些应对办法，这些内容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此仅对该问题提出原则性的看法：进步的应对办法不应是将“社群主义”制度化，因为社群主义在本质上与不平等密不可分，其本源是种族主义文化。作为美国反动政治文化的特殊产物，已在英国获胜的“社群主义”开始在整个欧洲大陆污染政治生活。伊斯兰恐惧症得到政治界和传媒界重要部门的系统煽动，并在有利于资本的社群多样性管理战略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实际上，所谓尊重多样性不过是加剧分化民众阶级的手段。

“郊区”问题有其特殊性，有人经常将其与帝国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帝国主义问题，即用帝国主义方式处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心与被统治周边之间的关系，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丝毫无助于在截然不同的场地推动问题的解决。混为一谈是反动势力惯用的手法，它旨在加强伊斯兰恐惧症，以便将针对帝国主义中心的民众阶级及其周边人民的进攻合法化。总之，混为一谈和伊斯兰恐惧症会使人相信政治伊斯兰的“反西方”论说，并为反动的政治伊斯兰提供宝贵的帮助。因此我要说，分别由西方种族主义右派和政治伊斯兰发起的这两种反动思想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它们都支持社群主义实践一样。



## 现代性、民主制、世俗化与伊斯兰

今天，人们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的印象始终是：伊斯兰教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占主导地位。因此，认为它可以改变现状的想法显得很不合时宜。大多数外国观察家、政治领导人和传媒便由此得出结论：现代性和民主制必须适应伊斯兰的这种深刻影响，即禁止世俗化。如果有可能实现这种妥协，就应当给予支持。如果妥协不能实现，那就应当接受该地区的现状。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现实主义观点。对该地区和其他地区人民来说，民主制和世俗化才是他们的未来。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这种前景都有可能实现；但就像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前景全然不能确保和肯定。

现代性造成了世界历史的断裂，这种断裂始于16世纪的欧洲。现代性宣布人类应当以个体和集体方式成为自身历史的主人，从而与占统治地位的前现代思想实现了决裂。现代性促进了民主制，并要求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现代性、民主制、世俗化这一复杂组合是由18世纪启蒙思想提出的，并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实施。它的进展和倒退体现在当代世界的塑造过程中。然而，现代性本身不只是一场文化革命，其意义在于它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决定了实际存在的现代性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民主制和世俗化在各地的具体形式应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的产物，它取决于资本统治的具体条件，即确定霸权集团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作用的历史妥协，我称之为“政治文化的历史行程”。

我对自己解读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做了简要介绍，其目的仅在于将资本主义现代性、民主制、世俗化组合方式的多样性置于其理论背景下。

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提出了彻底世俗化的模式。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无论是自然神论者还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国家对此不予过问。在欧洲大陆和复辟王朝后的法国，倒退和妥协使前现代制度的统治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联合起来。这种倒退和妥协决定了世俗化的“缓和”形式，这种“宗教宽容”使政治结构并不排斥教会的社会作用。而在美国，其特有的历史进程塑造出一种不承认世俗化的、在根本上反动的政治文化。在这里，宗教是受到承认的社会参与力量，而世俗化则被混同于正式宗教的多样性。<sup>①</sup>

一边是有保留的世俗化观念的激进程度，一边是对塑造社会的现代性主题的参与程度，这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激进的或温和的左派相信政治能将演变引向所需的方向，它们拥护世俗化的强大观念。保守的右派主张放任自流，在经济方面：倾向于市场的选择明显有利于资本；在政治方面，低强度的民主成为规则，“政权更迭”被“轮流坐庄”替代；在社会方面，政治无须积极地世俗化，因为社群可掩盖国家的机能缺陷。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创造了历史，应当放任它们这样做。在当前左派处于退守的时刻，这种保守的社会思想在从图海纳到奈格里的论说中都占了主导地位。美国的反动政治文化在否定政治行动的责任方面走得更远。反复强调上帝启示美利坚民

<sup>①</sup> 任何宗教，甚至邪教都有正式地位。

族，众多人投入这种“信仰”，这些事实彻底消除了世俗化观念。说上帝创造历史，这实际是想让市场单独创造历史。在这个社会里，自由思想者，即不参加教会或邪教的人被视为反社会的离经叛道者，就像同性恋一样长期不被宽容<sup>①</sup>，并被怀疑是“非美国人”，麦卡锡委员会和如今的小布什经常提到这一点。尽管各色人等的生存权于不久前得到承认，但其条件是，离经叛道者要同意自我封闭在贫民窟中。

按照上述观点，有关的“中东”地区人民处于何种状态？成群的蓄须男子下跪祷告，成群的妇女头戴面纱，这种图像使人急于断言他们高度依附宗教。很少有人提到这是施加社会压力的结果：戴面纱并不是妇女们的选择，而是别人以暴力强加的；谁若被发现没有出席祷告，他便可能从此失去工作乃至生命。提倡尊重信仰多样性的西方的“文化主义者”不大关心政权为打造上述画面采取了哪些手段。“主的狂热信徒”当然存在，但他们的比例是否大于参加复活节游行的西班牙天主教徒和在美国聆听电视传教的众多人群？

总之，这个地区所展现的自我形象并非一贯如此。除了国家间的不同，人们还能看到，在从摩洛哥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除阿拉伯半岛国家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人、伊朗人、阿富汗人和前苏联地区的中亚人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发展世俗化的潜力。

阿拉伯半岛和巴基斯坦等其他邻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该地区，政治传统受到现代性激进思潮的深刻影响：启蒙思

<sup>①</sup> 不要忘记萨勒姆女巫案。

想、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为人所共知，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重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制度。这些优势思潮为领导阶级提供了实施政治变革的重要模式。根据这种政治变革的某些表现形式，人们可以将其称作“开明专制”。

穆罕默德·阿里和赫迪夫·伊斯梅尔治下的埃及无疑是这种情况，土耳其的基马尔主义和伊朗的现代化在实施过程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最近出现的民族-民粹主义也属于现代主义政治计划的范畴。上述模式有众多表现形式：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主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等，运动的领导者基本相同。表面看来很极端的经验，例如阿富汗和南也门的所谓“共产主义”制度实际上也无任何不同。所有这些制度都有不少建树，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尽管并非真正的民主制度，它们还是为朝这一方向的演变开辟了道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1920~1950年在埃及，选举的民主尝试得到了温和的反帝中心华夫托党的支持，但却遭到帝国主义统治强权——英国及其当地盟友——王朝的打压。以温和方式实施的世俗化并未遭到人民的拒绝，相反，宗教人士被舆论普遍视为蒙昧主义者，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如此。

从开明专制到激进的民族-民粹主义，现代主义的尝试并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在强大政治运动的压力下进行的。在运动中占主导的中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他们的意愿：作为全权合伙人来主宰现代全球化。这些可称作“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具有现代主义和世俗化的性质，并有导致民主演变的潜

在可能。但是，由于这些计划与占优势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冲突，所以帝国主义要不遗余力地打压之，并为此而有步骤地动员没落的蒙昧主义力量。

我们知道“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它是20世纪20年代被英帝国和埃及王朝扶植起来的，其目的在于遏制主张民主和世俗的华夫托党。我们也知道他们从沙特避难所大批返回的历史：纳赛尔死后，中央情报局和萨达特组织了这项活动。我们还知道塔利班的历史，它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创建，目的在于打击那些为所有儿童开办学校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甚至还知道，以色列人最初曾支持哈马斯，为的是削弱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主张世俗化和民主的派别。

没有美国经常、有力和坚决的支持，政治伊斯兰很难越过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当沙特阿拉伯的地下发现大量石油后，该社会从未起步走出传统。帝国主义与传统领导阶级的联盟立即建立起来，它除了为两个合伙者服务外，还为瓦哈比教派的政治伊斯兰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英国人成功地破坏了印度的统一，因为他们说服首领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使其自诞生起就封闭在政治伊斯兰中。该计划由效忠女王的英国东方学专家精心策划。

事情就此水落石出：美国为了粉碎亚非国家在万隆所建立的统一阵线，提出创立“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主张。该建议从1957年起得到了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支持。政治伊斯兰便是通过这种手段渗透到该地区的。

通过以上回顾，得出如下结论：政治伊斯兰并不是人民在表达宗教信仰的真实力量时所产生的自发结果。政治伊斯兰是

帝国主义通过系统行动所建构，得到了反动的蒙昧主义力量和俯首听命的买办阶级的支持。除此之外，左派既没有看到这种挑战，也不知如何应对，它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 关于前线国家——阿富汗、伊拉克、 巴勒斯坦、伊朗的问题

美国计划建立针对全球的军事控制，这一计划得到了其欧洲和日本等下属盟友的支持。该计划中，中东被选定为最先打击的地区，其理由有四个：第一，它蕴藏着全球最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的武装力量如将其直接控制便会使华盛顿占据优势地位，并可将其欧洲和日本盟友，以及潜在的对手中国置于依赖能源供应的被动处境；第二，该地区处于旧世界的范围，有利于对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实施经常性的军事威胁；第三，该地区正处于削弱和混乱时期，这有利于侵略者轻易获胜；第四，美国全球战略之鹰爪——以色列在这个地区。

实施这种侵略定会将处于前线的国家和民族——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伊朗置于被摧毁或即将被摧毁的境地。<sup>①</sup>

#### 阿富汗

阿富汗在“共产主义”共和国时期经历了其现代史上最好的时光。现代主义的开明专制制度把教育向男女儿童广泛开放。它反对蒙昧主义，因此在社会中得到了决定性的支持。它进行的农业改革基本上是一整套旨在削弱部落首领专制权力的

<sup>①</sup> 已经被摧毁的是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即将被摧毁的是伊朗。

措施。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至少是默许的支持使业已开始的演变有可能获得成功。西方的和政治伊斯兰的传媒所做的宣传却都说这种尝试有“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极权主义”性质，并遭到了阿富汗人民的反对。而实际上，和阿塔图尔克当时的制度一样，这种制度远非不得人心。

阿富汗两个主要派别（Khalq 和 Parcham）的发起人都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和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巴基斯坦的管理不断造成社会灾难相比，苏联中亚邻国完成的进步模式在阿富汗和该地区许多国家产生了一定效果，尽管人们可以对此颇有议论，尽管该制度带有不少君主专制的痕迹。它鼓励爱国者认清帝国主义是所有现代化尝试的障碍。一些人为摆脱另一些人便请苏联进行干涉的做法无疑起了负面作用，并阻碍了实现民族—民粹—现代主义计划的可能性。

美国及其三边世界的盟友一贯顽固敌视阿富汗的现代化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否是共产党人。是美国及其盟友动员起巴基斯坦式的政治伊斯兰蒙昧主义力量——塔利班和军阀们——被“共产主义”政权制服的部落首领，并对他们进行训练和武装。即便在苏联撤出后，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支援塔利班，如果没有军阀力量的武装进攻加剧了混乱，抵抗运动很可能取得胜利，因为纳吉布拉政府已经表现出这种能力。

阿富汗被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伊斯兰分子的干涉活动破坏殆尽。阿富汗不可能在它们的权力指挥下实现重建。这种权力以一个在国内毫无根基的小丑主持的政府做伪装。这个小丑原为德州跨国公司的一名雇员，后被该公司空降到了阿富汗。华盛顿、北约，以及出面救助的联合国借“民主”之名，声称

有理由在那里继续“存在”下去，所谓“存在”实则是占领。这彻头彻尾的谎言已成为一场拙劣的闹剧。

阿富汗问题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即所有外国军队撤离该国；所有列强必须放弃对其“盟友”的资助和武装。一些有良知的人担心阿富汗人民会容忍塔利班专政或军阀。我要告诉他们，外国存在始终是对该专政的最有力支持！在西方不能过分干预其事务的时代，阿富汗人民选择了另一个通往最佳目标的方向。和共产党人的开明专制相比，文明的西方总是更喜欢蒙昧主义专制制度，因为它对其利益的威胁要小得多！

### 伊拉克

早在两次获得借口之前，美国的武力外交便把彻底摧毁伊拉克作为既定目标了。这两次借口：其一是1990年科威特遭入侵；其二是“9·11”事件。小布什以戈培尔式欺诈——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利用“9·11”事件来达到摧毁伊拉克的目的。与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侯赛因的血腥专制<sup>①</sup>下“解放”出来的论说毫无关系。真实的原因在于：伊拉克地下蕴藏着全球很大一部分优质石油资源，而且伊拉克已建成了能以临界质量作为技术支撑的国家核发展战略框架。美国认为：为消除这种“危险”，自己有权决定在何时何地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而丝毫不用顾及国际“法”。

还有若干组严肃问题需要人们考虑：第一，华盛顿的计划为何好像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第二，该计划造成了何种新局面，使如今的伊拉克民族陷于何种处境？第三，各部分伊拉

---

<sup>①</sup> 萨达姆的血腥专制是事实。



克人民如何应对这种挑战？第四，伊拉克、阿拉伯和国际上的民主进步力量能够推动何种解决方案？

萨达姆·侯赛因的失败是可以预料的。当人民面对的敌人处于优势地位，即能够以空中轰炸实施种族灭绝而不受惩罚时，他们唯一有效的应对办法是在遭受入侵的本土展开抵抗。然而，由于萨达姆政权彻底铲除了开创现代伊拉克历史的所有组织和政党，包括共产党，也包括在现代伊拉克历史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复兴党，所以该政权早已摧毁了本国人民的一切自卫手段。在这种条件下，令人吃惊的不是“伊拉克人民”束手让国家遭受入侵，也不是似乎表明人们可能接受失败的某些态度<sup>①</sup>，而是当地的抵抗活动日渐加强，并挫败了建立保障表面“秩序”的傀儡政权的计划，尽管它们表现出许多严重的弱点。可以说，抵抗活动证明了华盛顿计划的失败。

然而，外国军队占领也造成了一种新局面。伊拉克民族确实受到威胁，即便这是由华盛顿计划的无能所造成的：该计划难以借助所谓“民族”政府来维持美国对该国的控制<sup>②</sup>，美国便只能用砸烂这个国家的做法继续推行该计划。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华盛顿最初的目标可能就是将伊拉克至少分解成三个国家：库尔德、逊尼派阿拉伯和什叶派阿拉伯，档案资料将会揭示这一点。时至今日，“内战”仍然是华盛顿为使继续占领合法化所玩的一张牌。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长期占领都是美国的目标：对华盛顿而言，这是确保控制石油的唯一办法。我们当

① 例如参加由入侵者组织的选举，在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爆发的相互残杀，华盛顿将其盘算建立在这种基础上。

② 其首要目标是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

然丝毫不能相信华盛顿的意图声明，即：“一旦恢复秩序，我们将撤离该国”。我们还记得，从1882年起占领埃及的英国人从来都说这种占领是“临时性的”，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占领期间，美国肯定每天都会以各种手段，包括极其罪恶的手段来逐步摧毁这个国家和它的学校、工厂和科学能力。

面对这种极为严重的挑战，伊拉克人民的反应并没有当即表现出来，人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其中的原因何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媒不厌其烦地宣称，伊拉克是个“人造”国家，萨达姆的“逊尼派”政权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压迫统治是导致内战不可避免的原因，只有延长外国占领才能避免内战。因此“抵抗活动”仅限于逊尼派“三角地带”亲萨达姆的少数伊斯兰核心。人们很难理清如此众多的不实之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殖民化曾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来克服伊拉克人民的抵抗。为维持其政权，深谙帝国传统的英国人炮制了一个引进的王朝和一个大庄园主阶级，并将特权地位赋予逊尼派伊斯兰。然而，尽管机关算尽，英国人还是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和复兴党成为主要的政治组织力量，是它们打败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都憎恶的“逊尼派”王朝政权。1958~1963年间，上述两股力量的激烈竞争日趋明显，最后以复兴党的胜利告终。在当时，西方列强为复兴党的胜利感到宽慰。然而，共产党人的计划带有民主演变的潜在可能，而复兴党的计划则全然没有。复兴党原本是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它信奉中央集权原则，推崇实现德意志统一的普鲁士模式，其成员来自主张现代化和世俗化、反对宗教蒙昧宣传的小资产阶级。但是，完全不出人们所料，掌权后的复兴党即演变

成一个专制政权。它的国家主义只有一半反帝性质，因此根据形势和情况变化，合作的双方，即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和在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美帝国主义可以达成妥协。这种交易助长了伊拉克首领妄自尊大的倾向，他们认为华盛顿会将其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盟友。1980~1989年，在针对伊朗的荒谬和罪恶战争中，华盛顿对巴格达的支持<sup>①</sup>似乎增加了这种盘算的可信度。萨达姆想不到的是，华盛顿会弄虚作假，帝国主义不能容忍伊拉克现代化，摧毁伊拉克的决定已经做出。伊拉克掉进了陷阱<sup>②</sup>，受到10年的制裁。这种制裁旨在将伊拉克变为废墟国家，从而使美国军队实现对真空的光荣征服。

对于复兴党历届政权以及在萨达姆“领导”下最终失势的政权，人们可以谴责它们做了种种坏事，但却不能说是它们挑起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谁应当为现在这两个共同体发生的血腥冲突负责？人们有朝一日定会知道中央情报局及以色列情报机关是如何组织众多此类屠杀的。除此之外，萨达姆政权制造的政治沙漠，以及他在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方法上提供的榜样也“激励”各种谋求政权者选择了这条道路。他们往往受到占领者的保护，因此有时竟会幼稚地以为自己可以利用占领者。这些谋求政权者，无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的“宗教”领袖、准部落性的“知名人士”，还是来自美国并公然腐败的“商人”，他们在这个国家全无实际的政治根基。就连受信徒尊重的宗教领袖候选人也没有可被伊拉克人民接受的政治影响。

① 提供化学武器便是证明。

② 萨达姆吞并科威特的计划获得了绿灯。实际上，科威特原本是伊拉克的一个省，是英帝国主义者将其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它们的石油殖民地。

如果没有萨达姆制造的真空，人们永远也不会听说这些人的名字。是推行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制造了这种新型的政治世界。面对这个世界，真正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并可能具有民主性的其他政治力量是否有办法实现重建？

在以往一段时间里，共产党是伊拉克社会所能产生的最佳凝聚中心。共产党在本国所有地区都扎下根，并控制了大多出自什叶派的知识界<sup>①</sup>。共产党真正具有人民性和反帝性，不喜欢哗众取宠，有潜在的民主倾向。复兴党专政屠杀了成千上万优秀的共产党人；苏联崩溃后<sup>②</sup>，伊拉克的知识分子便认为搭乘美军的辎重车从流放地返回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些情况发生后，共产党是否会永远在历史中消失？可惜的是，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更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是个实际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同样不应忘记，西方列强一贯厚颜无耻地实行“两种砝码，两种尺度”的规则。在伊拉克和伊朗，对库尔德人要求的压制从来没有像安卡拉那样达到经常使用治安与军事、政治与精神暴力的程度。伊朗和伊拉克从来没有否定库尔德人的存在。然而，人们却原谅了土耳其所做的一切。传媒提醒我们：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而北约是民主国家的组织；杰出的民主派萨拉查，以及希腊军官和土耳其将军这些民主色彩稍逊的人物都是该组织的创始人！

在伊拉克动荡历史的最佳时期，在共产党和复兴党周围组

<sup>①</sup> 什叶派教旨所造就的多为革命者和宗教领袖，很少有官僚或买办。

<sup>②</sup> 苏共对苏联的崩溃毫无准备。

成的伊拉克人民阵线每次行使权力时都能与主要的库尔德党派达成共识，而且这些党派是其一贯的盟友。

萨达姆政权反什叶派和反库尔德的倒行逆施无疑是事实：1990年，萨达姆的军队在科威特败北后，轰炸了巴士拉地区，并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这种做法是为了回应华盛顿的武装外交手段，即发动一些迫不及待但成事不足分子。尽管如此，上述做法仍是一种罪行，而且是愚蠢的做法，因为响应华盛顿号召的人十分有限。然而，人们能指望萨达姆式的专政做出其他行为吗？

在这种条件下，对外国占领的抵抗表现出令人意外的强大力量似乎是一种奇迹。实则非也，因为基本事实在于，全体伊拉克人，无论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憎恨占领者并深知他们犯下的暗杀、轰炸、屠杀、酷刑等各种罪行。人们似乎应当认为，一个全国抵抗统一阵线会宣告成立，并将其成员姓名、组织和政党名单以及共同纲领公布于世。这种情况至今尚未出现，其主要原因是伊拉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已被萨达姆及占领者的专政所摧毁，这一弱点毕竟构成了严重的不利条件：它为分裂诡计开了方便之门，使机会主义者有恃无恐，甚至与占领者合作，并且扰乱了解放目标。

有谁能克服这些不利条件？共产党人应当最有资格做到这一点。身处当地的活动分子已经与“首领”的追随者拉开了距离。不知所措的首领们试图将其归顺合作政府的行为罩上合法的外衣，并声称这与武装抵抗行动是相辅相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政治力量都可能为创建统一阵线发挥决定作用。

事实上，尽管伊拉克人民的抵抗力量还很弱小，但它已经在政治上甚至在军事上挫败了华盛顿的计划。这使华盛顿的盟友，即欧洲联盟的大西洋主义者倍感不安。如今，美国的下属合伙人都担心美国的失败，因为这会使南方国家更有能力迫使帝国主义三边世界的全球化跨国资本集团尊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伊拉克的抵抗运动早已提出过能够打破僵局和帮助美国脱离陷阱的建议。它的建议是：第一，在安理会的支持下建立过渡性行政当局；第二，立即停止抵抗行动和占领军的军事和治安干预；第三，所有外国的军事和民事权力机关在6个月内撤出。这些建议的细节发表在贝鲁特出版的阿拉伯著名刊物《阿拉伯未来》上<sup>①</sup>。

欧洲传媒对这一信息的传播持绝对缄默态度，这表明了帝国主义同伙之间的团结。欧洲的民主进步力量应当脱离帝国主义三边世界的上述政策，并支持伊拉克抵抗运动的建议。让伊拉克人民孤身对敌不是一种可接受的选择，因为它会强化一种危险观念，即不能对西方及其各国抱有任何期望。这种观念会激励某些抵抗运动步入不可接受的，乃至罪恶的歧途。

外国占领军越快从该国撤离，则世界和欧洲民主力量对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会越有力，饱受苦难的伊拉克人民也越有可能迎来更好的前途。外国占领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其终结后的前景会越加凄惨。

<sup>①</sup> 2006年1月。

## 巴勒斯坦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贝尔福宣言》<sup>①</sup>发表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便成为外国定居者殖民计划的牺牲品并沦为红皮肤印第安人，无论人们承认还是佯装不知这一点。上述计划始终得到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权<sup>②</sup>的无条件支持，因为在该地区如此建立的外来国家肯定也会无条件地支持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动。而这种干涉行动旨在将阿拉伯的中东地区置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sup>③</sup>

在非洲和亚洲人民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在这两块大陆上，强调和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能够促成自发的团结。然而在欧洲，巴勒斯坦问题却引发了分裂。这是由于受一些人赞同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混淆了视听。<sup>④</sup>

为配合美国“大中东”计划的扩展，废除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做法愈演愈烈。然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接受了奥斯陆和马德里计划以及华盛顿起草的路线图。是以色列公然拒绝签字并实施了更为大胆的扩张计划！这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受

① 《贝尔福宣言》发表于1917年，是英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公开保证：1917年11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致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莱昂内尔·沃尔特，表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之家”。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提供了依据，也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不断爆发纠纷与冲突埋下了祸根。——译者注

② 以前是英国，如今是美国。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四个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德意志帝国的瓦解导致了国社党问题；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导致了社会主义问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奥匈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延续至今的东南欧问题；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延续至今的阿拉伯民族自决问题。四个帝国的瓦解都未产生战略挤压的效果或大规模民族迁徙。——译者注

④ 亚洲国家强调和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基于地缘战略的反帝共识。——译者注

到削弱：舆论会因此谴责它幼稚地轻信对手的真诚。占领当局对其伊斯兰对手哈马斯的支持（至少在初期）以及巴勒斯坦行政机关腐败行为的扩大会导致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而世界银行、欧洲、非政府组织等对巴勒斯坦行政机关的腐败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涉身其中。这种预测或是期望立即成为旨在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无论何种”政策的附加借口！

除了对巴勒斯坦外，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计划对阿拉伯邻国也始终是一种威胁。以色列吞并埃及西奈半岛的野心，它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实际兼并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大中东”计划中，以色列以及它的核军事装备的地区垄断和“无可替代的盟友”作用都占有特殊地位。其荒谬借口是：以色列的“科技能力”是任何阿拉伯国家都不可能具有的！这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我们并不想在此分析抵抗斗争与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扩张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和黎巴嫩、叙利亚的冲突与政治选择。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以其特有的方式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和以色列的要求。这种抵制同时也维护了有争议的野心：控制黎巴嫩，这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叙利亚在黎巴嫩危险性最小的人中精心选择了自己的盟友。众所周知，抵抗以色列入侵南黎巴嫩<sup>①</sup>的运动是由黎巴嫩共产党组织的。为了摧毁这一危险基地和以真主党的基地取而代之，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的政权曾经密切合作。对拉菲克·哈里里的暗杀<sup>②</sup>显然给以美国、法国等为

① 包括将河流改道。

② 此案的真相远未揭开。



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干涉的目标有二，其一：迫使大马士革从此站到阿拉伯从属国集团即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一边，至少要清除变质的复兴党政权的痕迹；其二：摧毁抵抗以色列入侵的残余能力，要求对真主党解除武装。在这一框架内，如有需要也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号。

如今，容忍以色列的计划继续推行无异于赞同废除人民的生存权。这是对人类的最大犯罪。给拒绝这种罪行的人扣上“反犹太主义”的罪名，这只是一种令人憎恶的讹诈手段。

### 伊朗

在此，我们同样不打算对伊斯兰革命展开分析。这场革命是否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是否像政治伊斯兰阵营和“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预示并开启了一场必将征服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sup>①</sup>的演变？或者这场革命只是一起特殊事件，因为它主要是什叶派伊斯兰的看法与伊朗民族主义的观点相结合的产物？

我只想从与我们相关的角度提出两点看法。首先，在本质上，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政权与把国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做法并非互不相容，该政权依据的原则与经济的自由管理观念相关。其次，现实的伊朗民族是个强大的民族，也就是说其主要组成部分，即民众阶级和领导阶级不愿让国家以被统治者的身份融入全球化体系。当然，伊朗的现实在这两方面具有矛盾性，第二方面涉及德黑兰的外交政策走向，并表现出抵抗外国操纵的意愿。

<sup>①</sup> 伊斯兰世界有时也称作“乌玛”，即从未实现的民族。

从历史角度看，伊朗强大的民族主义完全是正面的，从伊朗国王到霍梅尼主义的历届政权在科学、工业、技术和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南方国家中，伊朗属于少数几个拥有民族资产阶级计划的国家，此外还有中国、印度、朝鲜、巴西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从长期看，该计划是否能够实现？我认为不可能。如今它业已付诸实施。

由于伊朗构成的临界质量使其有能力成为必须尊重的合作者，美国才决定用一场新的“预防战争”摧毁该国。众所周知，冲突的焦点在于伊朗持续开发核能力。为什么这个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没有权利具有核能力和成为核军事强国？帝国主义列强及其玩偶以色列有什么权利炫耀自己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垄断？人们是否能够相信这样一种论说，即民主国家永远不会使用核武器，而“流氓国家”则不然？人们难道不知道，正是这些“民主”国家制造了最大规模的现代种族灭绝，其中也包括对犹太人的灭绝，正是美国已使用过核武器并至今仍不同意全面绝对禁止使用该武器？

## 结 论

今天，卷入该地区政治冲突的有三大力量，即主张恢复民族主义的力量——他们只是民族-民粹主义时期官僚制度的蜕化变质的继承人，主张政治伊斯兰的力量，围绕与自由经济管理相容的民主要求而形成的力量。这三种力量的政权均不能被注重民众阶级和民族利益的左派所接受。实际上，这三种倾向所代表的是投靠帝国主义现有政权的买办阶级的利益。美国的

外交战略是坐山观虎斗，并从这三股势力的冲突中获得渔人之利，避免只与其中一方结盟：支持现有政权以避免出现政治伊斯兰的最坏结局；或与政治伊斯兰结盟以摆脱现有政权，以这种方式来“介入”冲突只会导致失败。左派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投入当地固有的斗争：捍卫民众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争取民主制度，强调民族主权。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如今的大中东地区是帝国主义领导者与全世界人民之间冲突的中心。只有挫败华盛顿当局计划，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斗争成果才有可能巩固。否则，已取得的这些成果都是极为脆弱的。这并不是说可以低估在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开展斗争的重要性，而只是说这些斗争应当融入中东地区挫败华盛顿的总目标，因为该地区是其罪恶打击的首选对象。

## 附录二

### 《巴马科倡议》

经过5年多的整合，全球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催生了一种新的集体意识，这种新意识的主要缔造者是全球性、主题性、洲际性和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论坛以及社会运动大会。2006年1月18日，在多中心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前夜，人们在巴马科集会，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表达了如下愿望：制订新的发展目标；建立一个消灭阶级、性别、种族和种姓剥削的平等社会；探索新型的南北关系。

《巴马科倡议》的目的是推动诞生一种新型的、民众性的历史主体，巩固社会论坛取得的成果，即人们就下述三方面问题达成的共识：（1）基本原则是：人人享有生存权；（2）主要方针是：确保人们在和平、公正和多元的环境中共同生活；（3）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式。

为了催生一个民众的、多元和多极的历史主体，我们要以能够动员社会和政治力量为标准来确定替代目标并积极行动起来，实现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对地球的破坏和对人类的涂炭、伴随并滋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列强对上述灾难的强行制造等，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确立替代目标，

既要依靠民众长期的抗争传统，也要从一点一滴的、与资本主义制度受害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集会以委员会形式围绕几大主题进行了讨论，达成《巴马科倡议》，表达了如下愿望：

第一，构建国际主义，把在金融市场独裁统治和跨国公司失控的全球扩张下饱受蹂躏的南北方人民联合起来。

第二，把面临 21 世纪发展挑战的亚、非、欧、美各大洲人民团结起来。

第三，构建政治、经济与文化共识，取代新自由主义和军国主义全球化，取代美国及其盟友的霸权主义。

## 原 则

### 1. 建立一个以全人类和各民族团结为基础的世界

现时代的一大特点是劳动者、各国、各民族被迫展开残酷的竞争。然而历史表明，“团结”原则具有更大的建设作用，该原则在组织物质和精神生产方面更加有效。因此我们希望恢复“团结”原则应有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

### 2. 建立一个以充分肯定公民权和性别平等为基础的世界

公民应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承担起最终的管理责任，这是确保真实民主的前提，倘若缺乏这一前提，人类就会沦为劳动力供应者、决策旁观者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怂恿下不断挥霍的消费者。真实的民主包括：在法律和现实两方面都充分保障男女平等；真实民主的前提之一是消灭任

何形式的或公开或隐秘的家长制。

### **3. 建立世界文明，为所有人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潜力开创条件**

新自由主义认为，肯定个人而非公民有助于人类淋漓尽致地发挥聪明才智。资本主义竞争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置于孤独的境地，个人被迫转向并陷入所谓的共同体——通常是准种族和准宗教性质的，通过共同体认同来寻求慰藉，可惜这只是一剂虚幻的解毒剂。我们则希望建立一个面向未来而非怀旧的世界文明。在建构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公民的政治多样性和各国政治与文化差异的多样性，为个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

### **4. 通过民主途径构建社会化**

新自由主义只信奉并推行一种模式，即通过市场力量实现社会化。这种模式对大多数人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已尽人皆知。我们的设想是，社会化主要经由无界限的民主方式产生，允许市场继续发挥作用，但不是全部；经济和金融要为社会计划服务，而非效命于只为极少数人谋福利的统治资本。我们希望推进激进民主，全面恢复政治创新能力。在我们的设想中，社会生活建立在永不衰减的多样性之上，而非抹杀深入讨论、排斥不同意见的所谓共识之上。

### **5. 建立一个以承认自然、地球资源和农业用地的非商品属性为基础的世界**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目标是，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无例外地置于商品逻辑之下。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性后果：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态面临威胁；地球资源特别是水和石油受到肆意挥霍；农民被大量逐出土地，

农业社会遭到灭绝。我们的建议是：把社会生活的上述领域作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加以管理，由各国政府做主而非任由市场支配。

#### **6. 建立一个以承认文化产品、科学知识、教育和卫生服务的非商品属性为基础的世界**

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是，文化产品商品化，大型社会服务特别是卫生和教育私有化，低质的泛文化产品泛滥成灾，科研短视而功利，大众教育和卫生服务质量低劣甚至被取消。为扭转这种局面，应恢复和扩大公共服务，进一步满足民众对教育、卫生服务和食品供给等的基本需求与权利。

#### **7. 将无界限与无限民主与社会进步及肯定国家和民族自治紧密相连**

新自由主义政策否定社会进步，否定国家和民族自治——民族自治是纠正不平等的前提之一，认为社会进步可通过市场扩张而自发产生，致使民主丧失了其全部有效内容，变得脆不可击。要肯定真实的民主目标，就必须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注重社会进步，把社会进步放在决定性的位置。由历史造就的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们都应该对国家和民族自治予以肯定。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都不存在不经由自治就能取消不平等的不二法门，实现平等目标须通过多种途径。

#### **8. 在构建以反帝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的过程中确保南北方人民大团结**

在构建全球文明的过程中，要确保南北两方人民的大团结；团结不能建立在施舍的基础上；团结不能抹杀不同阶级和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天真地认为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定会同舟共济；团结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规则与价值观。支持“替代全球化”的地区组织应以加强各国和各民族的自治与团结为目标，该目标与当前构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地区化主导模式形成对照。万隆会议 50 年后，《巴马科倡议》再现了万隆精神并表达了沦为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受害者的南方人民的要求；把南北方人民联合而非对立起来，重建南方人民阵线，挫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美国军事霸权主义，于多样性中构建共同的文明，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国际主义奠定基础。

## 长期目标和当下行动建议

从集体意识出发，构建代表集体大众的、多元与多极的行为主体，应明确主题并制订具体的战略，提出具体建议。

《巴马科倡议》分为以下十大主题，有些主题互有交叉，但不完全吻合，它们是：全球性的政治组织、世界体系的经济组织、农业社会的未来、劳动者统一战线的建立、服务民众利益的地区化、对社会的民主管理、性别平等、地球资源管理、对传媒和文化多样性的民主管理、国际组织的民主化。我们将这十大主题分为长期目标和当下行动建议两大类。

《巴马科倡议》是向所有为绝大多数人——劳动阶级和被新自由主义制度排斥在外者——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以及所有支持上述原则的个人和政治力量发出的邀请，邀请大家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奋斗。



## 附录三

# 《巴马科倡议》建议

构建超越地理和行业界限的合作与团结是在全球化世界中采取行动、另立世界的唯一途径。近几年，各工作小组将继续深化、细化上述议题，为下次聚会作准备。在下次聚会中，我们将在进一步认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战略行动优先。

### 1. 建立一个以和平、权利和协商为基础的多极世界体系

为创建一个货真价实的多极世界制度，摆脱美国的全球控制，充分保障公民权，确保所有民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加强反战和反军事占领运动，进一步团结战斗在全球热点地区的民众。把为反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驻军而将于2006年3月18~19日举行的、全球性示威活动与下列目标结合起来：

第一、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销毁现存的所有核武器。

第二、拆除设在美国本土以外特别是关塔那摩的军事基地。

第三、立刻关闭美国中情局的所有监狱。

(2) 反对北约干预欧洲以外的地区，要求欧洲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争拉开距离，采取行动促使北约解散。

(3) 反对全球种族隔离制度及其所制造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藩篱，进一步团结巴勒斯坦人民并对此加以肯定，加紧敦促以色列拆除耻辱墙并将军队撤出占领领土。

(4) 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是构建新自由主义替代战略和推进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前沿阵地，要进一步采取行动，加强对两国的团结。

除上述几点外，还应考虑采取以下行动：

第一、建立科研网络，与活跃在地区层面的积极分子团体密切合作，共同建设数据库，全面搜集美国和北约军事基地的相关数据，力争提供有关两者的最新信息。

第二、建立“帝国主义观察站”或类似机构，全面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行径、宣传伎俩、阴谋诡计及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对各国的压力。

第三、建立全球反帝网络，协调全球范围内的斗争动员。

## **2. 重塑世界经济体系**

为改造世界经济体系，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加强反对世贸组织现行规则的抗议运动并探索替代规则，将农业、服务、知识产权等事务从世贸组织中剥离。

(2) 建立工作小组，与已长期活跃在相关领域的团体联手行动，力争全面、严谨地打造一个能在下列最基本的经济领域提出替代方案的阵地：

——组织资本和技术转让。

——提出《投资法》等立法建议，明确国家和劳动者的权利。

——建立货币体系：控制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流动；取

消税务天堂；建立地区外汇交易管理制度；改革国际外汇交易管理制度并与地区制度相配套；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某些作法，要求回到民族权利优先的原则上并以该原则为基础来确定各国的经济制度；废除国际组织不经协商就强加于各国的限制性规定……

——就外债问题立法，要求相关国家准许确定恶债，加强超短期动员，力争取消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

——改革教育、卫生、科研、养老等社会服务及其融资方式。

(3) 组建专家与科研小组，跟踪资本的流动，跟踪各国金融资本对国际金融资本依赖机制的演变。

(4) 组建工作组，与国家或地区性网站和研究小组共同研究如下课题：资本的财产结构、资本主义在各国的运行机制及其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

(5) 建立新闻从业者培训基地，对相关人员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复杂机制进行培训。

(6) 通过国际互联网，把全球五大洲各种进步的、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寻找替代方案的经济学家组织联合起来。

### 3. 推动服务民众利益并在全球谈判中加强南方阵营的地区化进程

自由贸易只惠及最强者，它是地区一体化的敌人。地区一体化不能基于自由贸易逻辑，我们必须紧密联系社会运动，阐明在亚、非、拉三大洲内部以及亚非拉三大洲联合体内建立替代合作方式的条件：

(1) 在拉美地区，劳动者通过地区一体化来应对跨国公司

的进犯，为地区一体化开辟了新前景。今后地区一体化将建立在合作优势而非比较优势之上，南方国家在石油、减债、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替代合作，如加勒比石油公司、南方国家间的债务回购、古巴医生等就是例证。合作的目的是促进全体国家的增长与团结，合作通过政治原则而非世贸组织的强制性规则而建立。

(2) 在非洲，追求统一的愿望十分迫切。与此同时，非洲人民意识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压力下，孤立地反抗或发展都不可行。非洲地区的一体化组织数量众多，但均不得力；而且最为活跃的是继承自殖民和种族隔离时期的组织：在非盟及其经社计划<sup>①</sup>中看不到任何集体反抗的迹象。民间社会要意识到分裂并且超越之。对地中海周边的北非国家而言，欧盟-地中海协议是有损南方国家利益的另一种地区化范本。

(3) 在亚洲，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斗争面临诸多困难，尽管如此，多数国家的民众已行动起来，力争创建一个有别于新自由主义一体化的地区化，众多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围绕该目标携手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是起草了旨在加强贸易合作的民众宪章。

因此，在加强反战和反战争威胁运动之余，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建议：

(1) 对拉美而言，要扩大有关运动，进一步支持美洲玻利维亚联盟，彻底挫败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促进拉美各民族独立，促进民族平等与公正，构建以合作和团结为基础的、符

<sup>①</sup> 即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合拉美民情的一体化；动员社会运动，扩大和深化加勒比石油公司、南方电视台等替代新自由主义一体化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促进以合作为原则的贸易；加强社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并确保上述建议得到贯彻。

(2) 对非洲而言，要提请民间社会运动关注在非洲动议的基础上提出替代性建议和把国家和地区行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发起和平运动，结束现有冲突并预防新冲突；放弃建立在种族或文化基础上的一体化观念。

(3) 对亚洲而言，要反对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扩张与竞争并加强各国劳动阶级的团结；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地区流通；促进乡村重建意识的觉醒。

南方各国的合作要行之有效，必须以南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团结为基础，大家共同的目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并寻求替代途径、最终建立多极世界。

#### **4. 对自然资源施行民主化管理**

应把“自然资源”这一概念划归“生物”和“生存权”范畴，制止人们破坏和掠夺地球资源。这不仅事关自然资源的管理，更事关人类的命运，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性问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要符合各国的具体国情，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应制订自然资源的使用标准，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要鼓励开发替代资源，用以取代不可再生资源；人类为争夺石油和水等资源而不惜发动战争，生活日益商品化；农业商人强制推行某种技术或经营模式，如同农业生产者签订经营合同，强制其使用某种原料、饲料、肥料或种子，如转基因种子等，造成了对环境的依赖和破坏，

打击了生计文化而助长了地租文化。应与上述种种现象做斗争。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应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行动结合起来：在以国家为代表的宏观层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多边协商框架，该框架要具备采取行动、向各国施加政治压力、以便采取全面措施的能力。在以地方和地区为代表的微观层面，民间社会在传播信息、转变作法、从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决策往往集中在宏观层面，因此应加强地方层面的行动，建议采取如下行动：

(1) 在国际层面建立生态法庭，审理生态犯罪，判处北方国家及作为其中继站的地区为南方国家支付环境修复费，即偿还生态债。

(2) 若种子供应商和农业生产者签署的合同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一定程度的依赖，则宣布该合同非法——农业生产者在此类合同的胁迫下沦为技术的奴隶，损害了生物多样性。

(3) 废除污染权及其市场，强制富国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穷国实现工业化创造条件。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为年均5.6吨，八国集团以外的国家为0.7吨。

(4) 禁止修建大坝——在非修不可的情况下——而不补偿动迁居民或曰经济难民。

(5) 保护被北方国家注册为专利的生物和基因资源，北方国家的这一行径是对南方国家的剥夺，近乎殖民抢劫。

(6) 反对正由世界银行推动的水私有化进程——尽管是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尊重含水层的更新节奏，确保人均最低用水量。

(7) 建立环境观察站如生态观察，揭露并抵制破坏环境的典型行为。

## 5. 为农业劳动者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农业领域，在国家、国际、多边和双边层面同时存在着事关粮食主权的中期和长期目标，多边层面以世贸组织为代表，双边层面以非加太国家集团（ACP）<sup>①</sup>与欧盟（UE）达成的“经济伙伴协议”（APE）为代表。国家层面的目标涉及价格、农业市场政策、结构政策和农业生产者对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的使用等。从超短期来看，2006年的目标是挫败多哈回合的最终决定，为拒绝签署经济伙伴协议创造有利条件。围绕下列两大基轴——中期内确保粮食主权；挫败多哈回合和经济伙伴协议。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 （1）确保粮食主权的建议

粮食主权是各国或国家集团制定农业政策和为进入国际市场而制定相关规定时都要承认的权利。粮食主权包括：面对进口施行自我保护的权力，为以不低于成本价出口农产品的生产者提供除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外的其他保护的权力。粮食主权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有助于各国全面恢复行使主权。粮食主权是促进民主的工具：它要求从家庭农业生产者开始的农产品加工链条上的所有行为者，制定明确的目标和手段。为促进粮食主权，我们建议在国家、次地区和国际层面采取如下行动，对相关领域加以规范：

#### 第一，在国家层面

国家要确保农民对以土地为首的生产资料的使用；叫停民族资产阶级（其中的公务人员）与跨国公司囤积土地等损害农

<sup>①</sup> 即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集团——译者注

民利益的农业商业化行为；为家庭农业经营活动提供投资便利；转变地方产品，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列为一项基本权利，对土地乃至耕地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

建议通过以下三方面行动来促使城市消费者分担粮食主权目标，为政府进行干预提供必要的前提：

——对损害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家行为做出规范。

——加大宣传力度，让消费者意识到：依赖进口产品会对本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害，如西非等地的超市只卖进口产品，应杜绝这种现象。

——通过提高进口税来逐步恢复农产品价格，同时参照美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做法，为购买力十分有限的消费者提供消费券，确保其以原价购买食品，避免其利益受损。恢复农产品价格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最终降低售出价，减轻消费者的负担。

第二，在次区域层面

事实证明，地区政治一体化是南方的小国全面恢复国家主权特别是粮食主权的必由之路。为此，应改革现有的地区机构。非洲地区应重点改革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这两家机构过于依赖资本主义列强。

第三，在国际层面

向联合国施压，敦促其承认：粮食主权是各国落实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199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定义的“食品权”的基本核心。在全球层面，建议出台以下4种工具，规范国际农业贸易，确保粮食主权行之有效：



——为进口提供保护：通过征税确保入市价稳定，从而确保国内最低农业价格，确保农业者的投资安全和银行信贷安全——面对剧烈波动且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加倍波动的全球价格，关税不足以提供充分保护。

——取消任何形式的倾销，禁止以低于无直接或间接补贴的国内平均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产品。

——建立国际协调机制，控制供应，避免结构性生产过剩，最大限度地减少导致农产品价格暴跌的投机性生产过剩。

——停止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处理农业问题，把在国际范围内规范农业贸易的任务交至粮农组织等联合国机构手中。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三边模式来改革粮农组织<sup>①</sup>。

## (2) 为挫败多哈回合和经济伙伴协议而提出的短期建议

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巴西、印度以及二十国集团诸国日益背离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事实表明，它们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关键推手。多哈回合是“一揽子协议”，我们有办法挫败它。国际民间社会，特别是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农业组织应加大宣传力度，向世人揭露，这类补贴特别是绿箱政策<sup>②</sup>是一种比公开的出口补贴更值

① 三边模式的第一方是农业工会代表，如国际农业生产者联盟、农民之路等；第二方是粮农公司，它们在暗中对参与世贸组织谈判的政府发挥了作用；第三方是国家。三者共同参与规范农业贸易。

② la boîte verte，英文为 green box policies，国内支持措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叫“绿箱”政策，它是指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中转移而来，且对生产者没有影响的农业支持措施，这些政策都可以免于减让承诺。另一类是可以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叫“黄箱”政策，要求予以削减，用“支持总量”（AMS）来进行数量表示。国内支持减让承诺的政策范围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等。——译者注

得关注的倾销手段，而且从 2014 年起，随着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取消，它将进一步成为倾销工具。

## 6. 建立劳动者统一阵线

劳动者手里的两件主要武器是否决权和工会组建权。迄今为止，民主和工会的建立主要以国家为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全世界劳动者的共同挑战，因此，反全球化斗争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层面。今天我们肩负着双重使命：加强国家层面的斗争，同时把民主化进程扩展到全世界并重新组织全球工人阶级。

大规模失业和非正式劳动的不断增加促使我们反思现有的劳动阶级组织。制定全球劳动战略不能只考虑有稳定劳动合同的工人：即便在工业化国家，也还有众多劳动者从事非正式工作，且人数日益增多。在大多数南方国家，临时工、非正式工、自雇者、失业者、街头游商小贩等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等构成了劳动阶级的大多数；在失业和下列双重进程——有保障的就业岗位的减少和非正式化，乡村人口的不断外流——的影响下，这部分人不断增加。对于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而言，首要任务是进行自我组织；对于传统工会组织而言，首要任务是为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敞开大门，团结起来、共同行动。

传统工会在应对上述挑战方面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在进行自我组织时不一定非采取工会或者类似的形式。与此同时，传统工会也应对自身做出改变。传统工会和新型社会运动应在横向联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开创新前景，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 (1) 工会应敞开大门，与其他社会运动携手行动，但不要

把这些运动置于传统工会或某个专门政党的领导之下。

(2) 为应对跨国雇主而建立真正的跨国工会组织。跨国工会应具备谈判能力和组织跨国共同行动的权利。为此，首先要在某些跨国公司内部组建强有力的工会组织。这些跨国公司拥有复杂的生产网络，十分脆弱，对生产和流通链的任何中断都异常敏感。因此，若能在反抗跨国公司的斗争中取得局部胜利，或许会从实质上改变全球劳资力量关系的对比。

(3) 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变是改善生活条件和消除贫困的必要条件。但是，当今的生产回迁，即使不单以利润为目的，也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必须推动企业做到下列事宜：逐步改善工资和劳动条件；正视地方需求，增加地方生产；建立谈判制度，寻求替代出自利润和自由贸易逻辑的生产回迁。把企业回迁列入跨国公司的谈判，避免各国劳动者同室操戈、彼此竞争。

#### (4) 重视移民劳工的权利

重视移民劳工的权利，将之视作工会的基本任务。确保劳动者的团结不受国籍干扰——隔离和歧视，无论是出于种族因素还是另有原因，都会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构成威胁。

(5) 劳动阶级在未来组建扩国组织时要避免形成单一的、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应形成多样化的、网状的组织形态，在彼此之间建立多种横向联系。

(6) 推动重组工人战线，把全球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悉数纳入进来，建立一个能够协调行动、有效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阵线。只有这样一种经过革新的全球工人总运动，在其他社会运动的配合下，才可能改变现有世界，建立一个以团结而非

竞争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

### 7. 推动实现社会民主，确保人类充分发展

社会主义性质的替代社会应是充满民主精神的社会，鉴此，进步力量应用民主观念重新武装自己。民主不能靠上级发话，民主是一个文化转变过程，人是通过自身实践来实现自我转变的。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和左翼及进步政府应为民众开辟参与渠道，使其在工作和居住地都能参与决策。倘若人不能转变成为主导自身历史的积极主体，那么人民的健康、食品、教育、住房等问题就得不到有效解决。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为民众提供参与机会。这些国家的人民缺乏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他们是该制度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

争取民主的斗争应与消除贫困与社会排斥的斗争相结合。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民众须得成为权利主体，即：要与资本的赢利逻辑做斗争，用人道主义和团结原则取代之。仅强调创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还不够，还必须提出能够取代资本主义、打破商品逻辑以及该逻辑所附带的社会关系的民众性动议。

斗争不仅要以经济诉求为目标，尽管经济诉求是必要的，还要提出替代性的社会计划，切实涵盖权利和民主，从而超越现存的代议制、议会制和选举制等民主。必须为创建一种新型的，出自下层、服务于下层，通过地方政府、乡村社团、劳动者阵线、公民阵线等方式而实现的民主而斗争。该民主与团结实践是吸引新的社会部门加入进来、为创建一个充满民主精神的替代社会而共同斗争的良方。

为落实上述原则，特提出下列几大行动建议：

(1) 把民主列为个人和集体解放运动的前提之一。

(2) 需认识到，苏维埃主义和诞生自非殖民化运动的政权，之所以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自由的否认和对民主的低估。鉴此，制定替代目标时，必须充分汲取上述教训，把民主建设放在首位。

(3) 质疑统治列强的双重话语，他们动辄以民主为借口来教训别人，特别是美国，其自身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战争贩子，它滥用酷刑、践踏自由，其厚颜无耻的霸权主义行径令人发指。坚决反对他们以双重标准来限制自由和民主实践。

(4) 否认由美国和西方列强提出的主流民主观。不能把民主定义为接受市场规则，服从世界市场，接受受外部势力操纵的多元选举制度，接受种种削弱人权的思想潮流。这类民主专横地把市场化与承认自由选举、尊重权利捆绑在一起，其目的是强制推行商品化，其所作所为实则是遏制民主，扭曲民主。

(5) 要认识到，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辩证互动的关系：不平等、剥削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的持续存在表明政治民主还有待完善；反之，若放任压迫与歧视，社会民主就得不到有效推进。任何社会政策，若限制自由、践踏基本权利，都不合法。

(6) 肯定民主需要民众、生产者和居民等大范围的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和责任分工必须透明，这不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否定，相反是对代议制民主的深化和补充。

(7) 民主应为反贫困、反不平等、反不公、反歧视斗争打开方便之门，应给予穷人和受压迫者及其斗争与运动一定的战略地位。上述运动在实践中应奉行民主原则，以确保可持续性

与成功。

(8) “替代全球化”运动中的民主原则是该运动在方针路线上重视民主的一大体现，为此应革新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高度重视权利与等级。针对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下列行动倡议，并建议立刻付诸行动：广泛开展运动，把公民教育和民主教育列为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付诸教学。“替代自由化运动”旨在全面施行民主计划，为所有人伸张公民权、政治权等基本权利，特别是作为民主自由之基石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伸张作为社会民主之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为广泛民众伸张反压迫、反暴力权利。应为民主原则的落实制订详尽计划。

(9) “替代全球化”运动认识到，公共服务是确保所有人平等享受有关权利的基本手段，具有重要作用。“替代全球化”运动支持劳动者、患者、学生等公共服务使用者的斗争，尤其重视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运动所提出的为患者提供部分免费药品，拒绝药物垄断，拒绝专利独裁、拒绝申请生物专利等建议。

(10) 争取民主的斗争需要各个层面的参与。我们划分了5个层面，即企业、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每个层面都要实现民主。我们为每个层面提出如下行动建议：

第一，企业民主。企业民主是一项主要诉求，它意味着：承认劳动者、使用者和地方与国家公共单位的权利；拒绝股东独裁和金融资本的破坏逻辑；对决策进行监督，对企业外迁进行管控；丰富生产形式，拒绝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效率假象，发展创新性的自我组织与互助；要求企业承担社会 and 环境保护

责任，尽管这可能会把企业置于某些国际法通则的管制之下，从而有使企业受到外来操纵的危险，但是社会和环保问题事关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不容怠慢。

第二，地方民主。地方民主的原则是“就近”和“参与”，它建立的基础是能够满足下列两方面条件——保障公共服务，探索新自由主义替代模式——的地方机构。新自由主义替代模式不应被世界市场牵着鼻子走，而应优先考虑地方层面，满足民众需求。地方民主有助于革新公民权，特别是居留权及与该权利息息相关的投票权。

第三，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属于战略范畴。身份认同、边界、尊重少数族裔权利、机构合法性等是人民主权的基础。应利用公共政策来对抗新自由主义；捍卫并扩大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最低收入制度和以代际间团结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条件，让各国平等分享劳动所得和专项收益。

第四，地区民主。地区可以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载体，比如欧盟；也可以是反对该潮流并进行抗争的阵地，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和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失败就是例证。由此可见，各大洲际社会论坛发挥着生死攸关的作用。

第五，全球民主。全球民主是为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提出的畅想。“替代全球化”运动目前有如下优先目标：取消债务；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世贸组织；取消税务天堂；开征针对跨国企业的国际税特别是金融资本税，如资本转移税、跨国公司利润税、生态税等；彻底改造国际金融机构，施行“一国一票”原则；改革联合国，使之尊重人民权利，拒绝先发制人战

争。为此，我们须做到如下几点：建立民主观察站，和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做斗争；鼓励市民监督；促进创立新型民主并通过社会和公民运动加以落实。

### 8. 消灭任何形式的对妇女的压迫、剥削和异化

家长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与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联系也十分丰富。分析家长制对妇女的影响十分重要。“家长制”这一概念表现了父亲或家长的统治地位，用于描述由男性做主、其他家庭成员居于从属地位的家庭模式。包括非洲在内的许多地区尚停留在母系社会，或施行母系、父系两元制<sup>①</sup>，因此，“家长制”并非一种普遍模式。家长制是随着亚伯拉罕诸教和殖民思想与法律的发展而传播的。今天，家长制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男性占统治地位、男女两性不平等、女性权益受到损害、女性从属于男性等。作为儿童“社会化”的基本单位，家庭是“奴化”女童和妇女的第一场所。受以占有女性的生产和生殖能力为导向的文化准则和宗教价值的支持，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更加显著。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了家长制的气焰。在家庭、教育、自然和物质及财政资源的获取、就业和参政议政等领域，对女性的歧视持续存在。尽管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伴随着以新自由主义组织为代表的机构的“男性化”倾向，男性的统治还会长期持续。

针对上述局面，我们做出如下行动建议：

---

<sup>①</sup> 所谓的两元制，即整个家族由男性支配、但女性对单个家庭成员发挥着一定的支配作用。



1. 停止对妇女问题的漠视，漠视妇女问题是政治和科研领域出现种族隔离的根源；性别问题是横向问题，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建议。

2. 继续民间社会和政治阶层的游说活动，加强女权组织和进步力量之间的联盟，把为女性争取如下权益列入其议事日程：

——破除女性在全球政治、文化、社会和宗教话语中居于劣势的传统看法，提升女性在上述领域的形象；

——大力发展妇女教育与培训，制止女性劣势地位的全球蔓延；

——加强宣传，帮助人们充分认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鼓励男性反思男性的统治地位，瓦解男权机制；

——加强司法建设，切实实现两性平等；

——施行代表均等制，提高女性在各类机构中的代表性。

3. 大力宣传女性历史及其所采取的个体和集体行动，特别是：

——多个组织联手发起的、为全球千名妇女争取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计划；

——以反对伊拉克战争为宗旨的“妇女对战争说不”活动；

——针对各种社会现实或社会计划而开展的行动。

4. 促进妇女对自身身体与精神的支配权和生活选择权。女性的身体集中体现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迫和暴力，因此女性对自身身体与精神的支配权和生活选择权不仅涉及教育、就业和社会参与等权利，而且涉及避孕、生育、堕胎等权利。

5. 支持从女性经验出发的理论思考，反对男权统治。加强未来女性对各类重大社会问题的参与，拓宽研究与行动视野，特别是在人口<sup>①</sup>或环境领域<sup>②</sup>。在开罗和里约会议期间，妇女都提出了在健康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6. 建立数据库和门户网站，研究妇女和帝国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 9. 民主管理传媒，尊重文化多样性

### 1. 争取受教育权

文化、信息和知情权的根本是受教育权。虽然世界各国都把受教育权列为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很多国家并没有把这项权利、特别是女童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所以一切社会运动都要把争取受教育权作为首要任务之一，并向政府施压，迫使其履行在教育领域的基本责任。

### 2. 争取信息和知情权

第一，针对大型传媒发起行动

信息和知情权与传媒系统的普遍逻辑相矛盾。传媒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趋于集中，它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机制的直接收款人和获益者，更是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者，向人们灌输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不可替代性，甚至鼓动人们欢迎它，我们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与之斗争。每个国家都要围绕下列目标、在国际范围内协调行动：

——发起立法动议，反对传媒集中。

<sup>①</sup> 1994年开罗人口大会是个起点。

<sup>②</sup>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是个起点。

——发起立法动议，确保编撰自由，不受股东和经营者操控；鼓励在尚未建立记者协会的地区建立记者协会并取得实权。

——通过学校和民众机构引导大家对媒体进行监督批评。

## 第二，创造条件，构建替代传媒

替代传媒形式多样：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它们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存在有利于信息摆脱金钱和跨国公司的操控，对促进信息多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要求各国政府给予其税收和政策优惠；替代传媒观察站要善于发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立法；应借鉴大传媒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做法，每年把全球替代传媒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举行一次例会，并可把该聚会置于世界社会论坛的框架内。

## 第三，杜绝北方国家的电视画面垄断世界

CNN 等北方统治列强的大型电视频道长期垄断全球，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报道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半岛电视台问世之后，本着高度的职业精神报道近东冲突，终于打破了该报道上的“一言堂”局面；在拉美，伴随着南方电视台的新近诞生，拉美各国告别了只能通过美国传媒的有色眼镜来窥探拉美世界的局面；非洲频道的筹建出于类似的目的，我们应竭尽全力促使该频道诞生。

## 3. 争取民族语言的表达权

全球的精英都把讲英语作为头号身份标志。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致使英语成为唯一的国际交流工具。然而汉语、罗曼语系内各语言，未来还有阿拉伯语等，也能够胜任国际交流的使命，所以用与不用、讲与不讲不过是政治意愿问题。我们应采

取如下措施来打破英语的霸权地位：

第一，条件许可的国家和地区可在学校教育中引入两门外语教育，即除英语外，再教授一门外语。培养包括听、说、读、写在内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语言能力；同时引入一门或两门只培养听、读能力的其他语言教育。

第二，罗曼语系内语言众多，如被 60 国作为官方语言的西班牙语、卡塔鲁尼亚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等，要通过教学促进它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只有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语言并且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沟通才最为有效。

第三，非洲的情况比较特殊，要促使非盟把教授非洲各民族的语言、促进民族语言大发展作为政治要务。

建立国际基金，支持下列工作：把各种文献尽可能地翻译成文化资源匮乏的国家的语言，并帮助这些语言登上国际互联网。

## 10. 对联合国的看法和建议

联合国是民众机构，代表着某种斗争既得，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力量角逐的场所。对某些民族而言或在某些情况下，力量对比的结果是相互矛盾乃至负面的。

联合国正在世界几大强国的操纵下沦为为其效力的工具，必须对之进行改造，特提出如下建议：

1. 对联合国空间进行民主化改革。
2. 改革联合国机构，限制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不平衡。
3. 敦促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采取下列行动：在各国建立观察站，确保各国政府在联合国和布列顿森林体系内建立的各类

专门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内的行动公开、透明。

4. 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另觅资金，防止其依赖跨国企业。

5. 确保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机构内广泛并有效存在。

6. 推动国际法庭特别是经济法庭进行改革，避免其沦为统治列强的工具。建立舆论法庭，推动以其他方式建立公正。

7. 对联合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扩大联大权利；打破否决权、发言权等权力垄断，敦促安理会民主化。

8. 推动联合国在地区化问题上采取行动，给予各大洲的地区化组织以实权。特别建议推动建立中东社会论坛，集中中东各国的进步力量，共同寻求有别于美国“大中东计划”的解决方案。

9. 推动联合国尊重国际主权，特别是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发起的行动。

10. 推动建立世界人民大会，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研究系列

####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精）

李慎明 主编  
2001年4月

#### 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前景 （上下册）

靳辉明 主编  
2004年5月

#### 且听低谷新潮声： 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李慎明 主编  
2005年2月

####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毛相麟 著  
2005年10月

####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刘国平 著  
2006年8月

####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

谭索 著  
2006年9月

####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

聂运麟 等著  
2007年11月

#### 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

周新成 张旭 著  
2008年2月

#### 美国保守主义及其全球战略

姜琳 著  
2008年3月

####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批判

周新城 著  
2008年4月

#### 变革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研究

聂运麒 著  
2008年5月

#### 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李慎明 等编  
2008年5月

#### 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王金存 著  
2008年6月

#### 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11月

#### 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

谭索 著  
2009年6月

#### 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7月

####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 编著  
2010年5月

#### 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6月

####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 跟踪研究

何秉孟 主编  
2010年7月

#### 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 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7月

#### “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 与执政能力的关系

赵常庆 主编  
2011年1月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研究系列 (续)

### 历史在这里沉思： 苏联解体 20 周年祭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9月

###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

蔡文鹏 著  
2011年12月

### 世界在反思之二——批判 新自由主义观点全球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2月

### 美国中亚战略 20 年： 螺旋式演进

杨鸿玺 著  
2012年9月

### “改革新思维”与苏联演变

李瑞琴 著  
2012年9月

### 世界在动荡、变革、调整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1月

### 世界在反思 (3)：当代资本主义评析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2月

### 探索与变革：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 理论与现状

聂运麟 主编  
2014年6月

### 世界格局与我国安全战略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9月

### 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 现状与发展趋势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10月

## 参考系列

### 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王玫 等译  
2000年11月

### 古巴雄师卡斯特的青少年时代

[古巴] D. 施诺卡尔  
P.A.塔维奥 编  
宋晓平 杨仲林 译  
2000年11月

### 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 戈尔巴乔夫现象

[澳] 科伊乔·佩特罗夫 著  
葛志强 马细谱 等译  
2001年6月

### 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俄] B.A.利西奇金  
И.А.谢列平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3年9月

### 论意识操纵

[俄] 谢.卡拉-穆尔扎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4年2月

### 苏联的最后一年

[俄] 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译  
2005年1月

### 大元帅斯大林

[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何宏江 等译  
2005年9月

### 富国陷阱

[英] 张夏淮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 俄罗斯、中国与世界

[俄] A.P. 雅科夫列夫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7年5月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参考系列 (续)

### 文明的对话

[保] 亚历山大·利洛夫 著  
马细谱 等选译  
2007年9月

###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英] 唐纳德·萨松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8年1月

### 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

[日] 伊藤诚 著  
孙仲涛 等译  
2008年6月

### 总司令的思考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徐世澄 宋晓平 等译  
2008年1月

### 世界规模的积累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 译  
2008年11月

### 富国陷阱 (修订版)

[英] 张夏淮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 富国的伪善

[英] 张夏淮 著  
严荣 译  
2009年1月

### 苏联的最后一年 (增订再版)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等译  
2009年6月

### 从“休克”到重建: 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

[法]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 著  
陆象淦 王淑英 译  
2010年3月

### 卡斯特罗语录

[古巴] 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 编  
宋晓平 徐世澄 张颖 译  
2010年6月

###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日] 中谷岩 著  
郑萍 译  
2010年7月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英] 拉斐尔·塞缪尔 著  
陈志刚 李晓江 译  
2010年8月

### 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粟瑞雪 等译  
2011年12月

###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

[巴]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著  
郝名玮 译  
2012年2月

### 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

[英] 莱斯利·斯克莱尔 著  
梁光严 译  
2012年3月

### 亲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张树华 等译  
2012年5月

###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

[俄] 根纳季·亚纳耶夫 著  
胡昊 译  
2012年11月

### 帝国的消亡: 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

[俄] 叶·季·盖达尔 著  
王尊贤 译  
2013年1月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参考系列 (续)

### 资本主义十讲 (插图版)

[法] 米歇尔·于松 著  
沙尔博 插图 潘革平 译  
2013年4月

### 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

[日] 鹤田满彦 著  
张迪 译  
2013年4月

### 美国社会主义传统

[美] 约翰·尼古拉斯 著  
陈慧平 译  
2013年11月

###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等著  
徐曦白 译  
2014年4月

### 苏联军队的瓦解

[美] 威廉·奥多姆 著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2014年7月

###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

[英] 卢克·马奇 著  
于海清 王静 译  
2014年9月

## 皮书系列

### 2005 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二)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3月

###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一)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5月

### 2006 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三)

李慎明 主编  
2007年3月

### 2007 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四)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3月

###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08~2009) ——且听低谷

新潮声 (之五)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3月

###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09~2010) ——且听低谷

新潮声 (之六)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2月

###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10~2011) ——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七)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3月

###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11~2012) ——且听低谷新潮声 (之八)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3月

###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12 ~ 2013)

李慎明 主编  
2013年5月

###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2013 ~ 2014)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3月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  
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李慎明 著  
2012年7月

**“普世价值”评析**

汪亭友 著  
2012年7月

**戈尔巴乔夫与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王正泉 著  
2012年7月

**古巴：本土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毛相麟 著  
2012年7月

**新自由主义评析**

何秉孟 李千 著  
2012年7月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陈之骅 著  
2012年7月

**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

姜辉 于海青 著  
2012年7月

**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

徐世澄 著  
2012年7月

**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周新城 著  
2012年7月

**历史虚无主义评析**

梁柱 著  
2012年7月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革新**

谷源洋 著  
2013年5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罗文东 著  
2013年5月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八集党内教育参考片解说词)**

李慎明 总撰稿  
2013年5月

**全球化与共产党**

卫建林 著  
2013年5月

**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徐崇温 著  
2013年5月

**俄罗斯的私有化**

张树华 单超 著  
2013年5月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朱继东 著  
2013年5月

**苏联历史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

吴恩远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

李捷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崇富 著  
2013年5月

**《共产党宣言》与世界社会主义**

靳辉明 李瑞琴 著  
2013年5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王伟光 著  
2013年5月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  
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修订版·大字本)  
李慎明 著  
2013年7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历史命运(大字本)**

王伟光 著  
2013年8月